



少年中国评论文萃

(第三期)

少年中国评论文萃编委会

<http://review.youngchina.org/>

二零一三年九月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卷首语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特约评论员 邵钟萍

与理论气功师狂妄的历史终结幻想相反，世界正进入一个动荡重组的多事之秋。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激荡风雷激。短短几年间，打着不同招牌的改良与保守、革命和反革命势力在若干国家里已经纷纷唱罢登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动荡的时代，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左翼力量却无力抓住机会将危机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究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都远远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

就像列宁很早就尖锐指出的那样，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正在逐步从低潮中逐步复苏的共产主义运动，要想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进而重新获得改变世界的能力，必须走列宁所指出的路线，塑造先锋队的坚强斗争力量。历史要求我们必须用与历史上伟大革命一样的决心和毅力，来鼓舞比过去更广阔和更深刻得多的运动。是否有利于先锋队形成、发展和确立领导地位，是裁决一切行为得失利弊的标准。

广阔的运动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变幻莫测的形势中，更需要有适宜长期、中期和近期的工作规划，明确在运动的每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根据历史的需要制订适宜的政策和策略。

狭小的工作规模不能形成足以让反动势力恐惧的力量。已经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同志，不应再仅仅将视线集中于网络上茶杯里的风暴，应该走出斗室，与大地亲近，面向积极分子进行宣传、说服工作，积极用适宜的方式利用公众媒体扩大影响。利用一切现阶段可资利用的公开平台，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默默无闻却卓有成效的基层工作，赢得群众的信任、赞赏，获得持久可靠的底层动员能力。在实际发展磨合中，区分不同层次的对象，使用恰到好处的工作手法，锻炼壮大核心骨干，教育接受左翼影响的群众，调动一切积极的社会力量为实现每一阶段的革命目标而服务。

长期持续的冷板凳奋斗，需要先进分子坚定的革命信仰作为支持。坚定的信仰不会来源于自我催眠的创制，而应该来源于对现实斗争进行分析提炼的理论前瞻性。从现实需要出发，深入、系统、全面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理论普及，并积极将新的斗争经验上升为理论。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队伍里的先进分子，积极总结自己的实际经验，将为形成富于时代精神的服务于新斗争形势的理论形态做出必要准备。

复杂而繁重的任务，需要先进分子加倍的自觉性和持续性。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冷遇和误解，都愿意不畏艰险挑起担子的螺丝钉，不会被历史所埋没。子规半夜仍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时代的车轮终归会在宏大的运动推动下转动，每一个为之奉献的人都是无比幸福的。



少年中国评论

网站：

<http://review.youngchina.org/>

新浪微博（@少年中国评论）：

<http://weibo.com/youngchina/>

人人网（@邵钟萍）：

<http://www.renren.com/352202815>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youngchina/>

少年中国评论编委会

投稿、合作、咨询、建议

请发信至：

youngchinaassociation@gmail.com

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来意

投稿请用附件的形式发送

卷首语

调查研究

从私有化狂潮中的一叶小舟说起	3
玩具厂半个月打工经历	8

中流击水

钱怎么来的	1 3
漫谈近日的爱国风潮	2 3
钓鱼岛钓出了阶级统治的“奥秘”	2 7
斗争的逻辑	3 3
中国农民也会终结？	4 1
去工业化的问题	4 3
我们今天怎样做子女	4 7
解构时代的革命话语重建	5 1
曼德拉、非国大和南非，几点随想	5 4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与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5 6

理论视野

硝烟后的双眸	6 3
关于科学的几点思考	7 5
评萨缪尔森—张忠任转型模型及正确的转型表达式	7 9
关于社会权利关系及其变革规律的常识性讨论	8 3
消灭知识产权	1 0 4
为什么读柄谷行人	1 1 7

文艺评论

工业时代的铁与花	1 2 7
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1 2 9
讲故事的政治	1 3 2
镜中碎脸	1 3 4
“女性”的建构 与 “男性”的邪典电影	1 3 9

译文选编

印度共产党(毛)中央军委会负责人巴萨瓦拉吉同志访谈 ...	1 4 7
1990 年代初以来希腊共产党的经验	1 5 9
不破哲三：回首日共九十年	1 6 4
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看当今的阶级意识	1 7 3
事实胜于雄辩	1 7 6
“自由市场”体制使我们所有人注定走向威权主义吗? .	1 8 0
为了全学联的大跃进	1 8 3
有名无实的激进分子、希腊的新星	1 8 9

新书推荐	1 9 3
------------	-------

后记	1 9 9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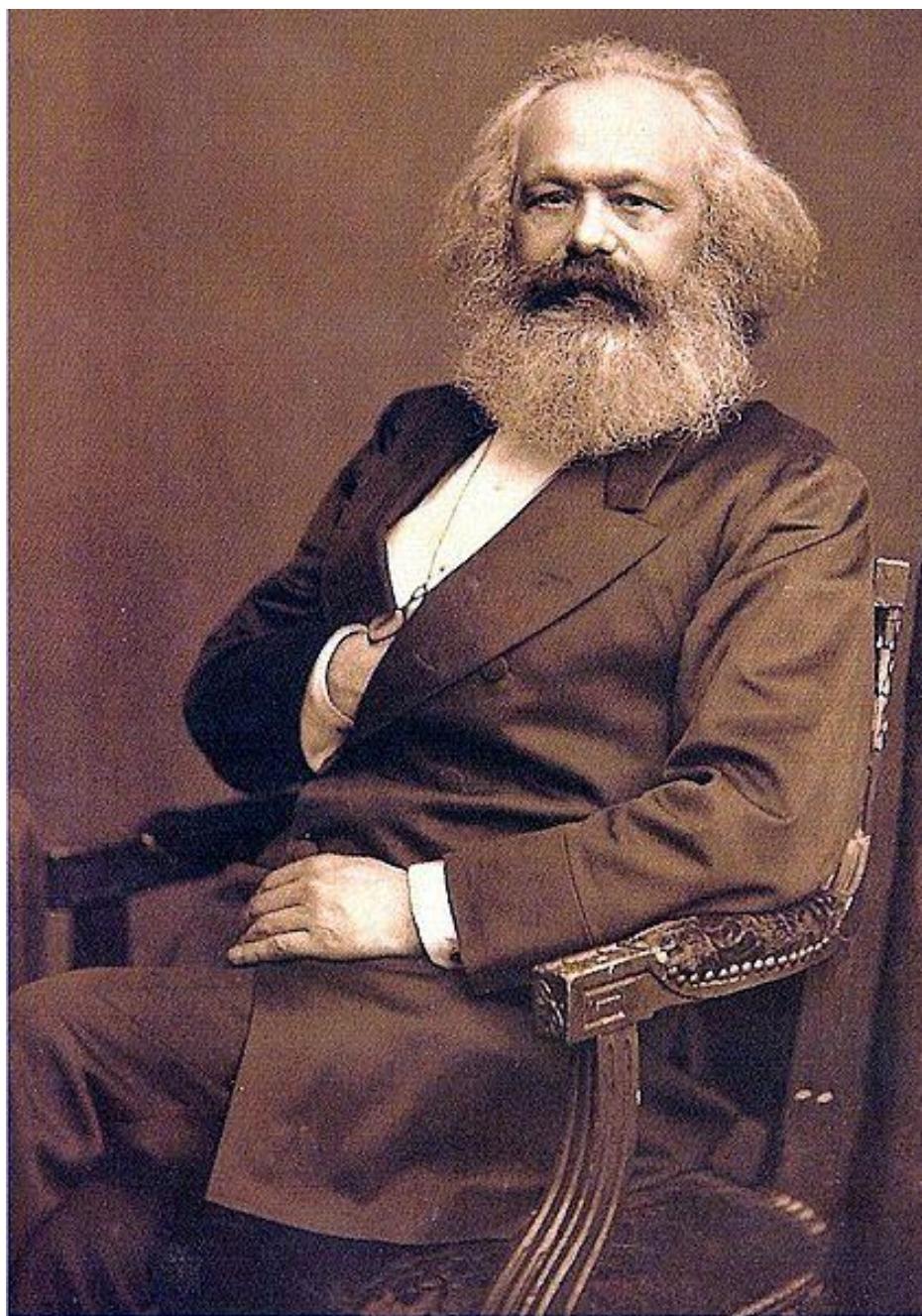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马克思

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

——列宁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

【编者按】二〇〇九年三月底开始连续数天，河北保定依棉集团数千名失业员工以步行方式前往北京旅游，同时罢工的工人为防止资方转移设备，数千工人包围工厂，昼夜守护，这就是保定依棉的工潮事件。

这篇调查写于工潮之后，作者简述了罢工前后的情况，并试图理解老工人的斗争和意识。

不过编者认为调查并不够深入，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是蜻蜓点水，尤其对老工人与工厂、国家之间的关系、感情描述的不够。另外，依棉工人的斗争形式，与目前沿海地区新工人为阻止老板跑路不给工人补偿的斗争，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也值得互相借鉴学习。

文章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殖民化，这种认识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为了掩盖和转移阶级矛盾而推出的观点，其严重背离事实，对其的批判以及详细的论证参见本文萃第二期《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希共中央委员：中国的国际角色》等文章。

从私有化狂潮中的一叶小舟说起

——访问依棉感受



：红途

保定依棉工潮过去半年多（注：2009年底）了，忘却的救主早已降临。4月初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前去访问，渐渐地也就几乎没人去了。局外人既然无力回天，多数也只能在事件的风头上疾呼几声，然后归于日常，等着下一个事件的出现，再疾呼几声。但对于依棉工人来说，工厂的命运就是近万个家庭的命运，公众的目光离开了，他们还要在那里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几个青年在寒冬中到了依棉。虽说不能阻止依棉工人斗争的失败，但我们迈出了这一步，试图把这个事件从纯粹作为谈资的“新闻”拉向更深层面，呼唤更多的人为保护公有资产行动起来。

靠依棉生活的小商贩

对依棉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小商贩。

依棉集团非常大，分为厂区和生活区两大块，之间是一条小街。一街两行熙熙攘攘，满是小商小贩。卖水果的、卖鱼的、卖肉的、卖调味品的、卖熟食的、卖废旧书的、卖衣服的、卖鞋帽袜子的、卖锅碗瓢盆的、卖卫生纸的，还岔出一条胡同，挤满了小吃摊。我们去的时候是下午，听说早晚还有很多卖菜的。走在街上，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连寒冷的空气似乎也被温暖了。

这些小商贩都是靠依棉生活的。依棉人从他们那里购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他们用挣来的钱养活家庭，两者是共生关系。

但是，他们或许不知道，依棉从3月底停产以后，保定市政府给工人的生活费，到12月份就停发了，这无疑会打坏共生关系。依棉工人失业，影响的不仅仅是工人们的近万个家庭。

用各种方法来瓦解工人

在罢工 7 天以后，依棉几千工人在 2009 年 4 月 3 日上京“旅游”，最后在徐水被保定市领导劝了回来。回来后，依棉董事长汪丽娟被抓，工人们消了一些气。保定市政府找借口没有让依棉复工，但是还发给工人生活费，采取了拖的办法。时间一长，工人越拖越散。等到他们已经组织不起来的时候，保定市开始了善后工作。

我们在依棉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招工广告，从火车司机、纺织工人，到推销员、保姆，门类齐全。当然这些地方用不了几个人。据知情人讲，保定市政府又是开招聘会，又是给不少工厂下死命令，必须收留依棉工人若干。问题是，你把人硬塞进去了，能消化得了吗？比如有的修理工被其他纺织厂“招聘”去带徒弟，有依棉厂内部人士说，看吧，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等“试用期”结束，他们八成没办法转正。就算转正，又能干几天呢？人家随时可以把你踢出去。

对于年纪比较大的工人，就让他们内退。下面是一位 40 多岁工人写的话：

“12 月 3 号下午，通知我们都去厂里签内退。在办公楼里，发现不管你是内退还是买断都没有与之有关的文件。”

“当我要文件时，告知：没有，不知道，不清楚，找领导。”

“当找到领导时，我问：是依棉给我们办的内退还是政府给我们办的内退？把文件拿给我看看？各项保险是按怎样比例扣除的？告知：没有文件，不知道，不清楚。你还是争取机会签了吧。”

“就是把自己卖了，也得知道是谁逼我卖的啊！……这是共产党办的事情吗？早晚会有一天‘官逼民反’！”

其实，什么“招工”、内退，关键是让你分散开，再也聚集不起来了。一捆箭折不断，一支箭还不好对付吗？我们说，工人之所以有先进性，有严密的组织性，是因为他们和现代大工业相结合。当这种结合被打破，工人被瓦解后，也就闹不起“群体性事件”来了。

从集体农庄抛进原始丛林

从当局角度看，给你招工，让你内退，是给工人的最好出路，已经仁至义尽了。但果真如此吗？

在依棉，我们看到了幼儿园、小学、技校、医院，以前都是属于企业的，都是依棉工人的福利。说起待遇，工人们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透着些许自豪：逢年过节，几乎不用自己买什么，啥都发，粮食、蔬菜、茶叶，甚至啤酒。依棉女工工资又高，福利又好，找老公精挑细选是全保定闻名的。

后来，为了给企业减轻负担，据说除了实在没人要的医院，幼儿园、小学等都剥离出去了。再后来，要跟一个叫“中策”的公司合作，工人们的终身合同被废除，改成了五年合同。再后来，说是资不抵债了，要破产。

失业的依棉工人就算是没有饿死，能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苟延残喘，如此天翻地覆的地位改变，又怎么不让人寒心？如果说他们以前是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生活，现在可是彻底被抛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丛林。原始丛林自然遵循丛林法则，你在食物链中不能成为吃人者，就会被别人吃掉。

温水煮青蛙，软刀子杀人

依棉工人是怎么从集体农庄被抛进原始丛林的？这里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第一步，厂长负责制，工人不参与企业管理。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给工人涨工资、发奖金，企业管理就不要参与了。依棉老厂长马恩华 1998 年去世前说过，全厂就算三年不生产，光吃老底也够了。但老底是多少？工人们并不知道。

第二步，拉大管理层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依棉工人说，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几百元，而中层以上干部每月拿两三千元。当然，两三千元只是工资，干部们这个补助那个津贴还有一大堆，腐败收入更是天晓得。工人们在工潮期间发出质问：“你们

住着一百多平米的房子，甚至有的干部在外边还购置一处或几处房子。他们的钱都是合法所得吗？”

第三步，引入“战略投资者”。据工人们说，2003年，依棉集团改制，引进了“战略投资者”中策集团，说中策要在三年内给依棉注资5000万美元发展生产。当时，企业给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前景。

第四步，掏干公有资产。美好前景并没有出现。改制以后，依棉工人从没见过中策集团的董事长（据说在保定监狱呆着呢），中策的注资更是没了下文（据说中策只是在太平洋什么群岛注册的一个皮包公司），只见到董事长汪丽娟不停地卖地、卖厂、卖货，钱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工潮期间，依棉总经济师就曾经在大礼堂当着工人们的面，把董事长汪丽娟掏干公有资产的帐一笔笔讲了出来。

有了以上的量变，质变发生了，依棉“资不抵债”了，必须要破产了。

企业一步步走向末路，依棉工人像全国其他厂的工人一样，并没有闹事，等到闹事的时候，形势已经无法挽回了。鲁迅说过：“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依棉就是被软刀子杀死了。

“汪丽娟就是替罪羊”

依棉闹到爆发工潮，上千工人到北京“旅游”的地步，当局总要给一个交代。保定市领导在徐水拦下“旅游”工人的时候，用恳求的语气说：只要你们回去，什么要求我们都答应。果然，回来后董事长汪丽娟等8个人被抓了。这只是为了安抚工人。据说保定当局已经决定，只抓这8个人。

工人们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汪丽娟只是在前台的人，她后面是保定市政府。据说汪丽娟现在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日夜有人守着。她在里面寻死觅活，给自己叫屈。

依棉工潮以后，保定市长于群不声不响走了，神通广大的他到文化部当了司长。但于群也没说离职，别人也没说接任，保定市长空缺了半年多。直到12月5日《河

北日报》才报道：“12月4日，保定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定：接受于群同志辞去保定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李谦同志为保定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山芋不烫手了，终于有人接了。

“汪丽娟就是一个替罪羊”，工人们说。

“公有”还是“国有”？

在不少自由派精英，或者被自由派精英洗脑的人看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最好的所有制形式。只要把拖欠养老保险金等问题解决，依棉工人就不会起来闹事，就会诞生一个国退民进的光辉典范。

我们要问了，某些人凭什么把工厂说改成私有就改成私有，说要工人下岗就要下岗？他们有这个权力吗！？

现在都说国有企业，以前没有这种说法，以前叫国营企业。什么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只不过委托国家经营罢了。后来偷天换日，说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企业就不属于我们老百姓了，是国家的——也就是政府的。既然依棉是政府的，政府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卖掉，要破产，还是名为国有实为官有，不但全国老百姓管不着，保定老百姓管不着，依棉工人也管不着。工人们喊保卫国有资产，人家会说：你一个工人，到哪儿不是吃饭，国家的事你操什么闲心？

工厂是工人一砖一瓦建起来的，也从来都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企业。什么“国有”企业，不能听这样的忽悠，社会主义就是要搞公有制，我们应该名正言顺地举起保卫公有资产的大旗！

效率低吗？资不抵债了吗？

某些人在上世纪80年代就说“大锅饭养懒汉”。真是这样吗？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当过工人，后来又在美国当过工人的阳和平老师说过：“我是到美国才学会偷懒的。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以前中国工人拥有主人公地位，没有任何后顾

之忧，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完成生产任务。毛泽东时代，我国工业年均增长 13.5%，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依棉在内的大工厂基本都是那个时候建设起来的。那时候可是大锅饭，“懒汉”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怎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就的？

“大锅饭养懒汉”，还有什么“国企效率低”，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国企工人确实慢慢懒了些。这和社会上私有观念日益严重，个人发财的风气严重有关。最重要的，是工人不能参与管理，干部也不从事生产，成了两个世界的人；工人辛辛苦苦工作，跟干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企业性质从公有变成国有，把持在干部手里，工人成了雇佣劳动者，铁饭碗说砸就可以砸。主人公地位没了，怎么还会有积极性？

企业把持在干部手里，又没有工人监督的机制，于是国企成了老总和官员们发财升官的工具，谁来了都可以捞一票，生产却不去认真管。加上政策鼓励外资和私企，一来二去，又是没有活力了，又是资不抵债了，哭着喊着要转制，要破产。依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总经济师曾对董事长汪丽娟说：你说企业在亏损，你敢把最近一年的报表拿出来吗？汪丽娟没话说了。

产权为什么“不清晰”？

工潮期间，保定市领导在回答工人质问的时候，一会儿说依棉是国有企业，一会儿说是股份制企业，一会儿说是私营企业。最搞笑的是，据说已经卖给中策集团的依棉，现在又挂在了中纺集团名下。有人又说了，这个叫“产权不清晰”。

我们又要问了，产权为什么“不清晰”？为什么产权问题只有现在才有，实行公有制的时候没有？

以前企业领导和普通工人收入差距不大，企业利润在支付职工工资福利以外，要么扩大生产、进行技术革新，要么上交国家，皆大欢喜。所以，没必要说企业百分之多少属于这个部门，百分之多少属于那个部门，没那么多废话。就是一句：企

业是国家的。

后来有人说私人企业更有效率，代表了先进生产力，更符合宇宙发展的要求，要搞“国退民进”。企业产权开始“不清晰”了，所以要“明晰”起来，也就是要把企业卖给甚至是送给个人，才能“明晰”产权。说白了，就是一些人需要获得超额收入了，而超额收入最好是按资分配，不把产权说模糊了，怎么好弄到自己手里？

企业是政府的，所以工人没有发言权；国企效率低，所以要改成私营以“提高效率”；产权不清晰，所以要让它在私人手里“明晰”起来。不管绕多少弯子，都会归结到一点：要搞私有化。

不可能让工人最终胜利

从“旅游”途中回来的依棉工人满以为可以继续生产，结果被告知，开不了车了，要破产。接着，据说能值两个亿的库存原料、半成品被人拉走，再不见下文。

工人们现在已经对企业的存活不抱希望了，他们只希望能在分家当的时候多拿一点儿。一部分工人想要打官司，拿到这些年的住房补贴。但是，就如知情人士所说，保定市政府不可能让依棉工人斗争取得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依棉工人那么多，满足了一部分人，其他人怎么办？这些年企业破产、改制在保定上演很多了，只是有的厂比较小工人闹不起来，或者闹起来也没那么大动静，结果都是按 24000 块钱买断了工龄。如果依棉打破了这个规矩，那些人势必都来要求，闹起来怎么收场？（实际上，依棉工潮以后，保定市其他几个企业部分工人就起来闹过。）照此办理肯定不行，那只能都按老规矩办，能给一点点优惠就不错了。

何止保定，全国又何尝不是这样？通钢打死了人，改制暂时停止了，马上就有河南林钢工人要“学习通钢”。所以对当局来说，通钢的改制只能是停止，不可能终止。他们很清楚，要推行私有化，必须全国一致，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规矩，就收不住场了。所以不能让通钢工人最终胜利，也不能让依棉工人最终胜利。

私有化的严重后果难以预料

各级政府官员勾结企业负责人掏空公有资产，把工人弄到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地步，他们自己得利了，后遗症是要整个社会承担的。

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很少，地区发展不平衡，我们又不能靠对外掠夺，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才可能让每个人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搞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的趋利性会让我们的经济依赖西方，成为人家掠夺的对象。经过西方国家、本国政府、资本家层层剥皮，到老百姓手里还能剩多少？毛主席说过：“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一位依棉工人说，20年前，曾经有学生到依棉厂想要发动他们上街，结果被工人堵在厂门口。相持半天，学生不得不撤

走，临走时对他们说：“工人师傅们，你们不出来，有你们后悔的一天。”这位工人说，那时候工人还是受惠的，要早知道有今天，当时肯定就上街去了——“打住吧，不要再这么改下去了”。

随着中国经济的殖民化和私有化，从前当家作主的工人已经彻底沦落到弱势地位。依棉只是私有化狂潮中一叶小舟，看似敌不过风浪，但如果有无数这样的小舟，就会联结成巨舰，任何风浪都会被踩在脚下。如果某些人再不停止这种自掘坟墓的私有化，后果是什么难以预料。

海涅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里面写道：“德意志，我们织你的尸布！”

搞私有化的人可以站在高处，扬着头，对下面千万张菜色的脸视而不见，但他们下一秒就可能掀翻你脚下的台子，把你踩烂在他们脚下！

【编者按】这是一篇不错的融工经历的文章，很显然，作者是带着很强的目的性去打工的，就是要认识现实的工人，发现工人的力量在哪，工人的前途在哪。当然，对工人的这种认识显然不是一两次融工经历就能得到的，但是我从作者的文字中感觉到他已经能在一定程度上以工人的角度去看问题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建立在工人阶级上的，因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了解工人，学会用工人的方式去思考、去说话。这也是作者最难能可贵的，我也相信作者会在日后更多的融工经历中更全面的认识工人，从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念。

玩具厂半个月打工经历

 : 村姑

我曾在信丰县一玩具厂工作半个月，在这半个月中除了累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如今入 xx 厂打工，就不仅仅是一“累”字了得的了。

刚刚到 xx 厂门口时，有一群人在那里，原以为是去应聘的，没想到是结工资走人的。在没结工资前工人就只能够在外面，顶着个大太阳在那里领工资。这让我很不舒服。后来在那里的二十多天里头更悲惨的事就更多了。

首先是性骚扰问题！这是女工最难以忍受的事。首先是保安队长，岁数也不小了，大概 40 上下吧，和女工聊天除了黄色笑话外就没有别的对话。有时候还会抢女工的手机，然后拨一个号给自己，好记住人家女孩子的号码！我刚开始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信息，没想到他身上竟只有一些低俗的东西出现，从那后我再也没有和他说过话，见面了也当他是空气。如果仅仅是保安那也就算了，可以不理，可是组长也是一个熊样！组长是每天都会见面的，多少会要打打交道的。在 xx 厂的最后那些天，有一个晚上加班到十点，只有几个工人在车间了，那个胖组长就在那里讲黄色笑话，很想呕吐！从此我是对他敬而远之。还有那个仓库管理员，被我们评为最好色的人。色迷迷的眼睛到处飘，还和女工们

动手动脚的，女工们只能忍着。只有我把他从我们宿舍轰出去了。从此我没再和他说过一句话。214 的阿姨说，不仅仅 xx 厂这样，所有的工厂都是这样的，整个社会风气就这样。我的室友说，现在的人，别说有男女朋友，就是结婚了一样在外面乱搞。她才十八岁而已，已经在外打工两年多了。个人人品很重要，可是社会已经把人的价值扭曲到这种程度了，除了最原始的动物需求，似乎没有更好的东西值得追求。

面对骚扰女工们往往采取“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态度。然而事实上依然摆脱不了骚扰。可是我敢，我敢和那个女工们怕的小混混闹翻。当然这样的不同是有原因的，我和他们有区别，我分析过这种区别，我只能说，我是有退路的，我没有经济压力，大不了我走人。我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同志们支持我。可是她们不行，她们要养活自己，乃至家人。我的室友几乎都定期给家里寄钱，甚至于先借钱寄回家，她们离开是有很大的成本的，而且她们几乎没有支持。唯一可以帮点忙的也许就是老乡和室友了。所以她们忍着，直到实在不行才会选择离开。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抱怨她们是温顺的绵羊。如果我们处在她们这种状况，我们做得未必比她们好。试想想，当

我们被学校或老师们侵权的时候我们反抗了吗？说了吗？（事实就是如此 ---该句为修订者增添）。

除了心理的煎熬外，身体同样处于被摧残的状态。从时间方面来说，一整天几乎都被困在车间里面。一男工友说的很形象，每天就像在坐牢，工厂就是牢房。每天12个小时，重复做同一种动作，身体酸痛不说，还让人无法思考问题，记忆力下降，脑袋反应迟钝，人变得麻木，只想睡觉。而工作的环境条件就便是是加速身体走向崩溃的罪魁祸首。我们几个暑假工用很形象的一句话形容xx厂：xx厂如此多胶。几乎每一个部门都不可避免的要用上各种胶水，万能胶、502胶、白胶等等。有胶就会有白电油、天那水之类去胶的危险化学品。墙上贴着各种化学品及胶水的危险和防护措施，可惜都是装版门面的。例如，天那水主要成分是苯，有刺激性气味，有毒，接触它需要手套之类。可几乎没有人在工作时候会戴手套。老大们从不主动给手套，只有主动去要才会给。工作前没有任何培训，就连墙上的纸也少有人看。所以有的工人会用天那水去洗手！他们根本不知道天那水洗手意味着什么，他们认为只有一点点毒不怕。他们并不清楚真正的毒性。橡工艺部整个车间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胶水味，油漆味以及各种化学品交织的味道，很是刺鼻难受，走进去就会有一种想吐的感觉，再加上机器发出的杂音异响，令人异常的烦躁不安，度日如年！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真不知道工人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尤其是计件工资的工人，他们为了多挣点钱必须拼命的干，同时在各处节俭。

对于工厂和生产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只要按照老大的吩咐去做就行了。这相对于当年国企工人来说压根就是两回事。同是工人，一是工厂的主人，一是工厂的奴隶。很可惜的是大部分的新工人并不清楚当年国营企业中工人的地位和待遇。他们有些人认为，打工就是这个样的，

甚至认为没有老板，自己也没活。这种资本家养活工人的想法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我很奇怪，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非常明白的说明了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致富的，是靠工人的剩余价值肥起来的。

说说福利吧。除了工资外已经无所谓福利了。像国营企业工人的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等福利已经完全消失了。工资也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如果要养家是很困难的。别说福利，连最基本的食宿都是难以想象的糟糕。吃的差，工友形容就是：简直就是猪食，很难吃，而且这餐没吃完的留着下一餐，甚至今天没吃完的留着明天吃。尤其是周日，很少人在食堂吃饭，但是老板依然弄很多饭菜，因而周一差不多都是周日剩下的饭菜。吃不好，怎么会有精神工作，怎能不虚弱？住宿条件就更是难以想象，简直就像难民营。没有地方放行李，没有隐私，冲凉和上厕所很不方便。刚过去时很不习惯，很难受。吃不好，睡不好，这就是工人的生活。

工人的反抗。也许很多人都认为工人没什么反抗，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我发现工人不爱惜工厂，不关心工厂，也从不为工厂考虑。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大量的浪费水电，尤其是住宿区的水电。人走，不关水也不关电。这不是他们忘记，而是故意。我的室友说，反正交水电费了，又不是浪费我们自己的，是老板的，谁让他挣这么多钱。对工厂没有感情。甚至我们的部长也一样。他说订单的多少与他无关，他只拿他的工资就行了。工厂挣多了也没有他的份。这就是工人对工厂的态度。干活的时候则是能慢就慢，能休息就休息，绝对没有出现过国企里头下班了拉都拉不走的现象，而是相反。上至部长组长，下至员工，无一例外的等着打铃下班。铃声一响，风一样的出去了。一广西的女学生说，工人怎么这样，总是偷懒。我只能和她说，这是工人反抗资本的手段。资本家最大限度的剥削工人，上层拿着高薪，员工拿几百元一个月，心理怎能平衡？他们

目前就以怠工的形式对抗着。所以国企改制后国企工人会想方设法偷懒。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已经不再是为自己和国家干了，而是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干了。主流舆论污蔑国企工人“大锅饭养懒汉”，并由此得出国企效益低下的结论。却不分析国企工人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就变了，变懒了，为什么在毛主席时代工人那么拼命的干。因为工人的地位已经变了，此国企已经不再是毛时代的国企。工人其实是很聪明的，他们看得很明白，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忽悠的。而比怠工更激烈的反抗我们也看到了，罢工，堵路，以及通钢工人打死资本家代理人陈国军。而这还仅仅是工人反抗的开端而已！更大规模的，更剧烈的，更天翻地覆的还在后头！试问我们祖辈们奋斗过来的果实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拱手相送？

我一直试图发现工人的力量在哪，工人的前途在哪。可惜的是我在 xx 厂并没有

找到。因为单从一个工人来说那简直就是太糟糕了，很多错误的认识，吃喝嫖赌也干，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不可避免的染上了不少。但是我一直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工人的团结是工人的最大力量所在，至于工人的前途，除了社会主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让工人阶级做主人而不是做奴隶。

资本的力量很强大，几乎无孔不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一二十年的人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资本的影响，然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我们成了资本的奴隶，我们要改造，我们要过人的生活。同时资本又是很脆弱的，是纸老虎。然而我们要的并不是增加工资加班费或是别的什么福利，我们要的是当家作主的权利，即拒绝工联主义，通过斗争取得无产阶级专政，实现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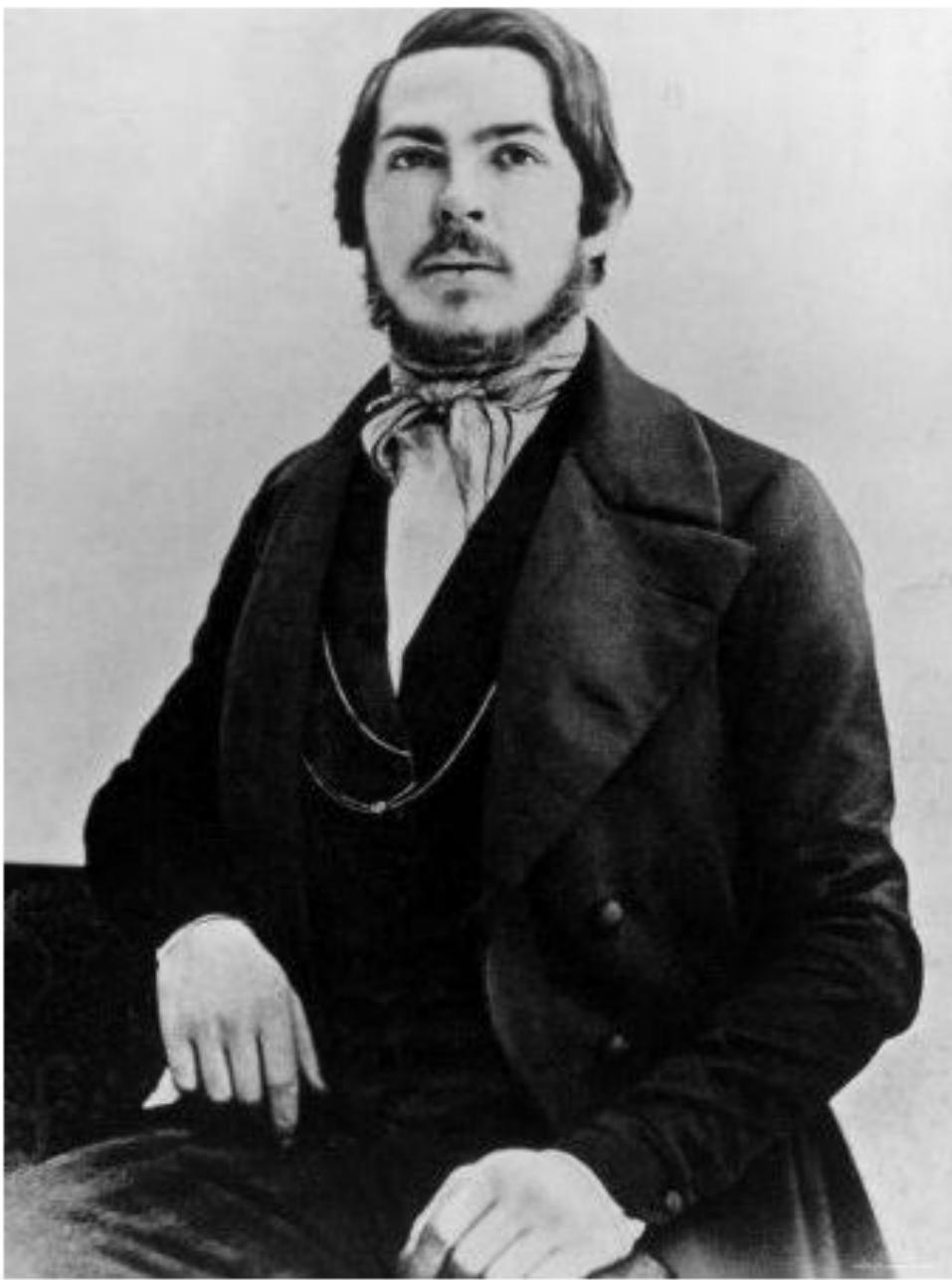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是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毛泽东

为了履行对无产阶级的保证，必须对在自由时期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对主要是被口号的坚决性、革命性和“引人注目”所吸引的人，对缺乏坚毅精神，只能在革命节日，不能在反革命得势时期坚持斗争的人，不断进行锤炼和教育。

——列宁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

【编者按】社会主义比凯恩斯主义“更左”是一个重大误解。“管到底”的计委和只会松紧钱袋子的央行根本不同，只有前者能走出后者“宽严皆误”的困境，推进生产力发展。但“管到底”意味着否定“我的财产我做主”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经济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问题。

钱怎么来的

 马前卒

一、怎样“印钱”

钱是啥？是中国人民银行印刷的纸币，是在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下，其他银行增加的存款数字。这些钱是怎么到企业、到普通人手里的？为何钱能越来越多呢？

从逻辑上说，人民币的印发方式有这样几种：

首先是最古老的发钞方式——买黄金。金矿出产黄金，中央银行用现钞收购一部分，相当于借助金矿向社会发钞。

其次是近十几年重要的发钞方式——购汇。中国企业从国外市场弄到了外汇（主要是美元），拿到国内，央行指示外汇管理局一律按照牌价兑换成人民币。等到需要进口的时候，企业再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支付。这些年中国经济年年巨额顺差，无数个出口企业赚进来的几万亿美元交给央行，央行拿出人民币来兑换。企业花销这些钱，买东西、开工资，最后合法地流到普通人手里。

第三种方式就是央行买国债。国家发债，央行出钱买（不一定直接买）。国家得到现金，央行得到债券。这近似于国家左手创造钱再送给右手。显然，这很容易造成通货膨胀。1988年大涨价导致了惊心动魄的1989年政治风波，几乎把政府推到自杀的悬崖上。

所以，现在中国法律禁止央行直接买中国国债（美国倒可以），即禁止中国政府凭空印钱。但人民银行可以从商业银行的

手里买国债，政府要先把债卖给现金充足的商业银行，绕个圈子算是制约一下政府无限制印钱。无论怎么绕圈子，央行买国债，本质上就是把现金交到了财政部手里，成为政府的财政收入，买军舰，修水利，发低保，盖学校，钱最后也流到了社会上。

第四种方式也是买有价证券，只是不买国家的债券，买银行的各种票据，各种资产。比如买一张没到期的银行汇票，现金自然转给了卖主。

第五种方式就是往外借钱。比如说通过“再贷款”把钱借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有了低息的进项，不能干放在家里付息，会加点利息把钱贷出去。贷款人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个体。

其实第四、第五种方式的本质区别不大，央行借钱给商业银行，实际上也需要银行有相应的资产做实际上的抵押。央行买了证券、票据，到时候也是要换成钱的，相当于借钱给社会再要回来。这两种模式算是比较“正常”的发钞模式。

除此之外，改变贷款准备金率也可以控制市面上货币的增减。但这不影响基础货币的发行，也不影响普通人（企业）拿到钱的方式。从长期来看，政府会保证准备金率基本稳定，不会通过连续降低准备金率来发钞。

央行自己也会发一些债券，反过来向市场支付利息，调节市场流动性，但数量不大，利息也远低于市面资金价格。为了讨论简洁，在此暂且不谈这两个问题。

二、借新债还旧债

除了印伪钞之外，钱的来源主要就是上面这五种。

第一种发钞方式有个最大的缺陷——黄金太少了。当今社会，黄金货币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发钞方式，在讨论全局问题的时候可以忽略。

第二种换汇印钞的方式虽然量大，但从长远来看也靠不住。外国不可能永久性地让中国占有巨额顺差，摧毁他们的产业。从中国整体来看，美元是凭空印出来的，不花掉都是纸，也不能无限制的攒下去。最近几年，出口增速开始下降，换汇增加的货币不那么多了。

剩下三种印钞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央行（人行）最终要收回更多的钱。政府要收税来赎回国债，商业银行要赚钱来偿还“再贷款”本息，开出票据的银行要付出更多的钱收回票据。就算央行长期持有社会资产，也会为此收取永久性的利息。至少在账面上，央行是不做赔本买卖的，否则借出的多，收回的少，商业银行和企业不用经营就能从央行赚钱，谁还会做别的生意呢？

不过，按照这个规则，央行发出去的钱最终都会回到自己手里——而且比发出去的时候更多。如此说来，岂非市面上每一块钱最终都会被央行收走？现实中从未出现这么荒谬的情况，因为在前一轮现金涌回央行之前，央行用另一轮发行制造了更多的货币，推向全社会。然后，新一轮发行的货币必须用另一轮更大的发行来平衡。如此往复，完全可以说整个社会需要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

这指向一个重要结论——只要国家开始用央行发行信用货币，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就会稳步地以指数增长，永不停息。钱会不会因此不停贬值呢？

温和通胀的确是大部分国家的通例，但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基本保证了币值的稳定，这需要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结合起来解释。

央行一般不会直接给企业放贷，而是通过商业银行放贷。商业银行会有什么样

的企业贷款呢？显然是有偿还能力的企业。企业从银行贷款，不能去给老板买豪车、办婚礼，而是要建工厂、雇人手、盖房子、搞研发，用贷款形成一份比贷款本身更大的资产，或者至少用这份新的资产当抵押，借到一笔新的、更大的的贷款，才能还掉旧债，不至于破产。

社会总的生产能力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这些新增生产能力意味着更大的社会总资产，让央行有理由向全社会（包括政府）“借”出更多的钱，“钱”就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多起来的。反过来说，要是央行没能完成释放更多贷款的任务，钱就会在动态过程中流回央行，形成钱荒。

三、有工业才有中央银行

要实现这个理想状态，有一个“潜在的”前提必须满足——整个社会（包括企业、个人、政府）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更大的生产能力。这在今天是个不言自明的常识，但在过去的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在整个农业社会，这可是个稀罕事。

农业社会的特性是稳定，典型的经济模式是大部分人口当农民种地，除了自己吃饭之外还能生产比例不高的剩余粮食，用来供养一些手工艺人、商人、军人、官僚和贵族。几乎所有工作都要靠肌肉（人和畜类）来驱动，所有能开垦的土地都已经开垦。要增加一点点经济总量也几乎不可能。对已开垦土地新投入劳动力，增加的一点点产量甚至不够养活新增的人口，剩余粮食反而可能下降。

这说明，在农业社会，除非可以开辟新的未开发地区，否则向农民或手工艺人贷款意义不大。因为怎么贷款也改变不了用肌肉劳动，靠有限的土地活命的事实。所以，大部分借款不是用来投资，而是用来救急的消费贷款，比如常说的“卖身葬父”。这种借款往往意味着兼并，因为偶然事故而借款的农民不得不把土地交给债主，自己变成佃农，甚至交出人身权变成奴仆。但这依然不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上限，最多改变一下分配方式。

工业社会结束了从肌肉→产品的生产

方式，使用机器造产品，使用机器造机器成了新的经济模式。从这时起，用投资来促进生产才成为正常现象，企业普遍的贷款发展成为可能，政府每年都可以预期社会总产品比上一年多，从而多印一些钞票来满足使用。这就是中央银行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有了指数增长的工业经济，才能（必须）有指数增长的钞票。

四、央行不是上帝

经济制度的一个理想状态：政府和央行印钱，企业生产，银行做中介，一起分享工业经济带来的好处，一起给工业经济加油。

实际情况是，20世纪中期以来，这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比此前快得多，稳定的多。但表现为通货紧缩的萧条和衰退从不曾消失，隔几年，至多十几年就要跳出来占据一下新闻头条。远的不说，只看最近的钱荒和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难道人行和美联储打盹了吗？

这还是要谈一谈“理想状态”里的“潜在前提”。

在前面的模型里，所有的企业都会努力扩大生产，制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把资产变的更值“钱”；银行则按照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评判资产，依据资产发放贷款，让最能创造财富的企业（个人、地方政府）拥有最多的货币。

在现实中，“创造财富的能力”是由市场利润来评价的。利润更高，拥有更高的还款能力，可以贷到更多的款。这就是理想模型下的经济增长模式。

市场之所以能对资产作出比较正确评价，是因为市场的末端站着消费者。不管看起来多么神奇、多么壮观的资产，若是最终不能增加消费品供应，不能让最终用户掏出钱来，那也一文不值。不过，从央行到银行，再到消费者，其中要经过许多环节才到最终用户。这就有了投机和炒作的空间。

市场的精髓在于供需决定价格。有人出钱收购市面上某种东西，无论他是否拿

这东西去消费，都会抬高价格。而对于企业或者有钱投资的个人来说，市面上的东西自己可以不消费，也不拿来搞生产，但只要有涨价预期就可以买入，涨价了再卖出赚钱。所以，只要有资金干预，即便基本需求不变，市场上的“资产”价格也可以大幅涨落。银行当然不喜欢这种能造成坏账的风险，但银行同样喜欢利润，也没有能力分辨每一份资产到底为什么增值。所以在投机风潮刮起来的时候，银行也会直接或间接地跟进放款。市场也会对这些资金照单全收——炒作1000万元的“艺术品”，和工厂购买同样数量的原料，所需的资金数量没什么区别。

这正是我们身边的现实。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我们看到，无论是住宅、商铺，还是古董、珠宝，乃至茅台酒、普洱茶、大蒜。没有什么不能成为炒作题材。购买者往往不是因为自己真的需要这些东西，而是认定了可以在涨价中赚钱才买入。但不管基于什么原因，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根据涨价后的价格来认定资产价值，根据炒作利润来确定企业盈利前景，从而发放贷款，支持了价格进一步上涨。这就是“资产泡沫”。央行贷款通过商业银行，间接吹起了泡沫。

五、泡沫的杀伤力

资产泡沫意味着价格远远超出成本。从整个市场来看，畸形价格会错误地引导资源配置，造成巨大浪费。当资金都涌向投机行业时，其他行业相对就会缺少资金。

我前几年曾碰到这样的事情。当时陕北煤价高涨，陕北房产泡沫也很厉害，几个县城的房价动辄上万，远远压倒西安。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自然渴望着盖房子发财。拿不到耕地指标，地方政府就在山谷两侧炸山造地，整个住宅小区和广场的位置比原来的地表低七八十米。每亩地仅平整费用就高达六七十万元，在石头基底上修基础设施更是麻烦。这些费用全部要加到房价里。

这里的购房者如果只是为了居住，完全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到基础设施更好、工

作机会更多的西安等地区购房，或是步行几分钟，穿过黄河大桥到对岸的山西县城居住——那里的房价便宜一半以上。但考虑到房价的增值潜力，他们完全不介意在房价中支付高昂的平整费用——直到房价泡沫破裂。这些陕北县城和西安的房价之差不仅仅是纯粹的炒作利润，还包括了好几倍的建设成本。

房产泡沫促使中国人在这些本不适合盖房子的地方修居民区，多付出了天量的劳动。而这些劳动本来可以在其他行业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品，或是加快经济增长率的投资。这就是泡沫的第一个害处。

泡沫的更大危害在于破掉的时候。泡沫早晚会破，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早晚有人会套利出逃。一旦泡沫破裂，贷款偿还无望，都成了坏账。

从央行的角度来看，泡沫破裂意味着央行以外的社会总资产价格下降，不能再抵押此前那么多贷款，导致央行新发的货币减少。但此前放出的资金还要按时返回央行。市面上的钱自然就少了。

和别的企业不同，商业银行的“原料”和利润都是钱。钱紧张的时候，无论自己的贷款是否因为泡沫破裂变成坏账，银行都要囤积原料自保。最起码要能应付正常的存取款，不至于对着存单付不出款，倒账破产。所以快到期的贷款要催着还，新的贷款要想尽理由不放。

银行不放款是自保，其他企业拿不到贷款可是要命了。这年头纯粹靠自有资金发展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大多被积极利用贷款的企业挤垮了。大部分企业本来要靠贷款当血液，忽然拿不到贷款，进不了原料、发不了工资，甚至没法卖固定资产来筹集救命的资金，只能一步步地走向破产。至少也要停工减少产能，艰难度日。

企业破产、压缩产能，在银行视角看来意味着新一轮的资产缩水，必须继续减少贷款，规避风险。这又会打击新一批急需资金的企业，给银行更大的压力。经济就此进入恶性循环。美国两房债券泡沫破掉后，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这种情况。

泡沫破掉固然不好，但泡沫涨大以后再破会更可怕。所以有的时候，或是商业

银行，或是央行自己，会主动地收缩资金，戳破已经很大的资产泡沫，客观上无差别打击了投机行业和实体经济。这就是眼前的“钱荒”。

六、开银行不能忘本

在理想的模型中，资金扩张可以和企业生产能力扩张同步进行。但现实中投机泡沫一个接一个，泡沫后的紧缩又对那些不投机的企业进行全面打击。连续不断的折腾说明，理想模型正常运行的某个前提一定未能得到满足。一定有某个地方出了差错。

论语里有这么一段：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您如果给卫国打工，先干啥能镇住场子？）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老师您太老套了，一个名头有啥好争的）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混小子，你傻不要紧，闭嘴就没人知道的。现在我告诉你，名分决定了讨论的逻辑，逻辑不对啥都得干砸了。正名是第一要务）

孔子不问卫国的情况，上来就回答“正名！”。可见孔子认为“正名”是通用的管理逻辑：名分是对任务的定义，你对任务不满可以重新定义，但做了定义就必须让机构（人）按照定义做事，否则一切都沒规矩，一切都做不成。

按照孔子的逻辑，要解决经济模型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各个机构真正的“名分”，看看他们是否按照这个“名分”做事。银行的“名分”是什么？

现在是信用货币时代。前面已经清楚地定义了这个时代的“钱”——为了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交易工具，是用不断增长的工业资产抵押出来的纸片。

银行还是企业，目标是赚更多的钱。但既然“钱”的增长，根源不在金矿，不在投机，而在于工业经济的指数扩张，那么银行的“本分”就不应该是简单地追逐高回报，而是应该把资金投向工业经济，保障工业经济的指数增长。这样央行才有足够的理由制造货币，商业银行才有长久的利润。做人不能忘本，银行在信用货币时代快乐地赚钱，要是忘了“工业”这个“本”，那早晚会被泡沫炸的人仰马翻。

这个问题直观地理解，就是大楼不会生出别墅，黄花梨的桌子不能生出红木板凳，但组成完整体系的工厂和研究所可以制造更多的工厂和研究所——当然还可以制造我们需要的大部分商品。要是房产泡沫把太高比例的钢铁、人力吸纳去搞楼盘，而不是修新的工厂，那经济增长率迟早会下降。

七、发展动力

工业发展，短期看是需要乔布斯这种创意大师来设计、要史玉柱这种高手来营销；长期看，创意高手和营销高手是最过剩，也最容易被人仿效，基础工业的进步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农业时代的人想了几千年神仙楼阁，抗拉材料只能用木头，再有创意的建筑师也只能修个大教堂、祈年殿什么的；最后还是因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足够的钢铁，在建筑中大量使用钢筋，让建筑材料既能抗压也能抗拉，这才有了当代的高楼大厦，才有了几十层的住宅楼和央视大裤衩。

既然基础工业这么重要，直接向基础工业投资，拉动经济不就行了么？但是，在金融业的视角看来，基础工业有重要的“先天不足”。

基础工业的进步和一般工业企业不同。一般的工业企业的进步往往是基于现有的各种工业技术，重新组合，改进修补，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或是新的消费品。基于现有技术基础，重新组合出来的技术进步很容易预估利润，因此能够被金融企业理解，获得信用货币支持。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创意班子带头

人，爱迪生就是这样和摩根财团勾搭上的。

相反，基础工业需要不断地向未知领域探索，才能持续地提高效率，向整个工业体系提供新技术。大型的重工业企业甚至要深入到科学的前沿，把最新的科学成果转化为工程成果。这意味着经常性地承受失败，以及利润前景的不明朗——这正是金融资本最厌恶的东西：风险和未知的风险。

简单地说，金融资本的判断，最终必然体现为银行工作人员的判断。作为外行的工作人员，对于基于现有技术的开发可以预估盈利能力，对于向未知领域的技术探索很难估算盈利能力和风险，所以本质上厌恶向基础工业进步投资。

对银行来说，一块钱和另一块钱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对全社会来说，投向基础工业升级和研发的一块钱，和投向一般消费品领域的一块钱、投向房产泡沫的一块钱大不相同，区别就像给孩子交学费和买玩具那样大。如果让金融行业自主地决定投资方向，就像把家庭财政交给小学生来管一样。

这正是欧美多年来的现实，而且随着技术开发成本不断增加而越来越严重。

八、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扭转这个现实的因素是军备竞赛。

如果你有一个实力接近的敌人，就不用担心没目标——敌人会给你指定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不是一两个简单的指标，而是全方位的发展，这是非常充足的升级工业的理由。冷战时期的美国有苏联这个对手，兢兢业业，料敌从宽，在工业上丝毫不敢放松，在国防部订单和 NASA 的引领下，全方位地升级工业。

军事投资有个很大的特性——最大的风险来自于敌人。军队虽然不喜欢浪费钱，但更不希望看到敌人拿到比自己先进的武器。所以，在财政允许的范围内，军队愿意承担一部分失败风险，乐于在武器订单内开销巨大的研发费用，向基础研究投资，拉动基础工业的进步。而且现代军队作为一个国家机构，本身也拥有足够的技术专

家。他们能够对某些风险研发做出比金融界更正确的判断。

所以，虽然军备耗资巨大且不能吃不能穿，但往往越是增加军费，基础科技进步和基础工业发展就越快。从军事角度说，这些研发或成功或失败，但这些技术进步

“溢出”到民用工业，会迅速地转化为看得见的财富，让所有人更有钱。微波炉的发明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雷达研究中一个工程师发现磁控管融化了他口袋里的巧克力，他说服军方基于这种热现象研发一种新武器，新武器没出来，但微波炉上市了。

冷战中这种故事千千万万。看似浪费的军事订单成了美国经济实际上的发动机，看似政绩工程的阿波罗计划换回了百倍的收益，美国（以及享受美国技术溢出的盟友）因此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老大地位。这正是孙子兵法上说的“以迂为直 以患为利”。

苏联也在搞军备竞赛，也因此占住了世界一级的地位，70年代前增长速度还远高于美国，从不到美国3成的实力逐步上升到美国7成的水平。但80年代后的苏联并没有因此欣欣向荣，反而逐渐停滞，最终解体。这除了文化上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苏联并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没有理解强大军工-重工业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财富。

80年代的苏联和美国一样，大部分精华人力投入到以军事为中心的高科技工业，剩余人力已经不足以去转化军工业的技术进步，生产足够的消费品。面对这个问题，美国把工业向海外转移，通过金融优势回收产品解决问题。苏联却反过来开始怀疑自己的优势所在，转向市场化路线，放弃工业规划、减少军费、降低重工投资以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自然越改问题越大，最后一垮了之。

不过，既然军备竞赛成了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冷战结束对于金融集团本来就异常强大的美国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随着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美国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少，等到互联网-集成电路代表的这一轮

经济高潮过去，美国最大的依仗已经是通过金融向全世界吸血。等到吸血也填不满美国金融泡沫的时候，2008金融海啸就来了——距苏联解体不过17年。

九、工业总参谋部

吸取美苏经验教训并不等于重演历史。既然军备竞赛拉动经济只是一个间接路线，中国不一定非得发起一场新冷战才能拉动经济。中国并不缺把新科技成果转化成消费品的人力，只要中国能避免被眼前的经济波动牵着鼻子走，坚持落实产业升级规划。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消耗世界一半的军费，也能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也能让“钱”越来越多。

凡事说来容易做来难。如果简单地下一道命令“原则上只给工业经济贷款”就能解决问题，泡沫经济早就被消灭了。然而“工业经济”是个很宽泛的定义，里面既包括机床厂、重化工业，电子研究所等核心产业，也包括玩具厂、装修队、物业公司等外围配套产业。甚至最近被热炒的普洱茶、大蒜乃至墓地，严格来说也不是完全和工业经济没关系。比如说煤老板有闲钱去炒墓地，声称自己是因为煤矿死亡率高才预购墓地，你能说他完全没道理么？

非要给某个行业安一个“工业”概念太容易了。所以，具有可操作性，也符合工业经济逻辑的金融操作方案必然是一个量化的复杂规划，根据技术升级路线、产业链配合和资源现状，对各行业、各地区乃至各企业做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规定银行能自行操作的融资空间。而且要根据最新的形势随时调整。很显然，银行既不愿意给自己带上这样一幅枷锁，也没有制定这种规划的能力。虽然银行里也有人会看数字，会分析企业前景，但如果企业自己都没有全面的产业规划视角，怎么能指望完全不懂工业技术的银行（央行）懂呢？。

没法做细致的规划，央行的手段就只剩下收放钱了，要么全面放，要么全面收，结果往往是在投机繁荣和通缩萧条之间摇摆，屡屡造成巨大损失。

既然金融业乃至央行管不了这事，那正确的思路就是不让他们管。产业规划涉及到外交战略、人口迁移、社保配套等许多只有国家才能控制的领域，甚至可以直接被视为国家战略的主体。这样的规划本来也不是一个银行——哪怕是央行能控制的事情，必须由中央政府亲自操盘才可能做好。

眼前的中央政府有发改委、国资委两个部级单位，但实际上一个主要功能是审查企业提出的计划，一个基本只负责基本的行政管理，完全没有全面掌握产业信息，指导整个工业体系升级的能力。更不可能要求总理挂帅的金融工委、政协副主席领衔的央行配合自己。至于地方发改委，已经完全蜕变成为项目补手续的盖章机构，能在项目上马前看看可行性研究已经不错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指望不出泡沫和“钱荒”，真的很难。

这几十年，中国走的是跟进路线，眼前总有一个成型的工业国当榜样（或是教训）。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和是美国。这样发展路线，产业政策的确可以相对弱一些——抄就是了。银行也好，政府也罢，都可以照猫画虎地调配资源，虽然免不了波动，但总不至于出致命大错。所以计委先是被弱化，权力大幅度地向地方政府分散，最后变成了今天的发改委。但这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致命伤害。

今天的情况不同，中国基本工业品产量、工业人口数量、工业地区覆盖面积都达到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在具体的工业门类上，中国需要学习，需要跟进的地方还很多，但整个工业布局，未来几十年的规划，任何国家都没资格当中国的老师。这既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再也没有任何试错的经验可供参考。**必须有一个机构全面掌握工业信息、制定产业政策，还必须拥有直接干预企业人事、财务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审批和事后监管。**换句话说：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工业总参谋部”，只有空头司令部和顾问团是远远不够的。更不能允许金融企业另起山头，建设一个以“赚钱”为单一目标的经济权力中心。

十、四万亿

总的来说，中国现在经济学界流行的是自由市场至上的思想。对于这一番政府干预的言论，必然会有搬出四万亿投资的事情来打脸：若非政府主导投资，扔出四万亿廉价资金见项目就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投机泡沫？怎么会惹得李总理不惜主动引发“钱荒”来挤泡沫？吃政府的亏还不够吗？

谈到这个话题，这就必须好好回顾一番四万亿的前因后果。

前面提到过，那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印钱办法恰恰是最不合体统的换汇。金融危机下，中国出口市场明显萎缩，中国央行收兑的美元、发出的人民币大幅下降。而中国实体经济规模还因为惯性而不断上升，所以中国必须用换汇之外的方式来印钱，不仅要补上美元流入速度下降的缺口，还要有更多的数量来安抚一片恐慌的市场。这就是四万亿的原因。这是对通货缺乏的正常反应，但是从实际执行来看，四万亿的确问题很大。

我当时曾经碰上这样的事情，相距上百公里的两个县同时要搞超级工业园区，立项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前颇为繁荣的某大型工业企业要产业升级，要开新厂区，把很大的一部分生产能力和人员搬过来。企业搬迁自然要买工业用地；企业里的工人、工程师收入不错，自然要买房子，占用住宅用地，工人们还要在附近吃饭买菜看电影，还需要商业用地。这工商住宅用地都齐全了，建新城的理由也就出来了。

于是，这两个县区都以平方公里为单位征地、修基础设施。再大的企业也不能一次用几平方公里的地，也得考虑点房地产开发项目，所以项目选址尽量要往省会的方向靠，往快速交通干线上靠，给房地产企业一个开发的理由。

这么大的项目，十几亿贷款是起码的，一家银行额度不够就找两家，还可以找政策性银行要低息贷款。既然有土地做抵押，有财政承诺托底，银行也痛快地签了贷款合同。新城迅速拔地而起。

问题是，最后这个大型工业企业去了

哪个工业园？哪个也没去！因为金融危机之下，工厂销量也大大下降，连过冬的贷款都拿不到，自然也就不琢磨什么新厂区铺摊子的大事。你以为那两个园区吃瘪了？错！人家卖地盖房子红火着呢，起码到这次钱荒之前日子还挺好过。

为啥厂子自身拿不到救急的贷款，拿工厂搬迁当概念的房产项却拿得到贷款？原因很简单，有土地增值做利润来源，修基础设施都是成熟技术，再加上地方政府做担保，自然贷款顺利。相比之下，工厂能拿出来抵押的资产都是设备和技术积累，这东西评估起来又麻烦又有风险，再加上金融危机打压销量，谁愿意吃力不讨好，在这当口支持企业技术升级？就算支持，企业拿出一个亿的资产当抵押，银行能发两三千万贷款就不错了。地方政府那边价值一亿的土地，由于价值直观，起码可以抵押 8000 万贷款，钱往哪边流不言自明。

四万亿之错，不在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在于给地方政府上项目的权利的同时，没有严格地规定投资方向，制定投资计划。结果地方政府和银行一拍即合，大上房地产项目，铺了一个到现在也没铺完的摊子。贷款跟不上的时候，地方政府就发地方企业债、拉信托资金避免烂尾，赚到钱了就发福利。等到房价停滞、钱荒来袭，再高的利息也拉不来接盘资金，地方债（严格来说是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体的地方企业债）危机就开始按照缺口大小逐个吞噬地方政府财政了。

当然，地方政府和银行也不是不重视实体经济，就像上面说的例子，建新城的时候地方政府至少知道搞个产业园的概念。只是地方政府觉得，既然盖房子、修基础设施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用的都是没啥风险的成熟技术，还能立竿见影地拿到回报，当然要优先干。研究工业，配合国家产业升级，那是很了不起的大事，但回报期明显超过官员任期，也长于银行经理升职的考察周期。既然中央也没给分配明确的产业分工，了不起的事情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

所有地方政府和银行都这么琢磨，结

果自然是基础设施相对过剩，工业相对不足。给地方债危机做辩护的人总说“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但实际上这句话必须加个定语才合适：“发展平衡的实体经济怎么会有泡沫？”。中央政府自己不负责调整产业结构，把重大项目的权力扔给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结果就是实体经济中容易炒作的那部分成为泡沫，其他方向依然短板。可见，四万亿的问题不是政府干预太多，恰恰是中央政府干预太少。

十一、管就要管到底

因为政府干预过少的“实体经济”泡沫远不止房地产。最近因无锡尚德破产、欧盟贸易战而引人注目的光伏产业就是好例子。

光伏产业是太阳能发电的一种，理论上大有潜力，但是眼下的设备生产成本很高，折旧周期、运行成本都不能让人满意，发电不稳定，对电网伤害也大，如果不在技术上达成突破，很难和火电、水电等廉价、稳定的电站竞争。暂时本不该有太多的应用，但政府的补贴制造了“奇迹”。

比如纳入“金太阳”项目的光伏厂，政府可以承担 50%-70% 的光伏厂建设成本，再加上其他方面税费减免，光伏电厂只要运作的好，完全可以主要靠政府资金来修。如此优厚的补贴政策，刺激了各路资本疯狂建设光伏电站或光伏电池厂。为此不惜篡改地方气象数据，在并不适合搞光伏的地方建电厂。银行在高额利润面前也毫不犹豫地跟进。

后来国家补贴力度逐渐减弱，再加上国际贸易战影响，这些刺激出来的产能不要说赚钱，连生存都有问题。媒体因此一致谴责政府干预市场，拔苗助长制造泡沫。

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恰恰是政府干预不够。

光伏行业之所以需要鼓励，原因在于“环保”这个概念。即不烧煤不排碳就能发电。但是，光伏设备生产本身就需要大量的能源，排放大量的污染，这正是建设成本高昂的原因。现在国家承担了这部分成本，希望光伏电站能在运营阶段发出廉

价、环保的电力，结果光伏的上网电价还是远高于传统发电方式。至少在现阶段的技术水平下，很难说光伏是清洁能源了。

国家给光伏企业提供补贴，本意是通过财政来“制造”利润，希望获得利润的企业能努力改进技术，提供真正的清洁能源。但是，对于资本来说，既然在现有技术下建电厂就能赚钱，搞产业升级却要冒风险，为何不把利润拿来继续建电厂呢？有了政府补贴兜底，银行怎么会不乐意贷款来支持这个高污染产业？于是就有了高污染的光伏厂遍地开花，上网电价却始终居高不下的现实。补贴稍有变化，庞大的资产就成了泡沫。

要避免这种泡沫，归根结底不是该不该补贴，而是政府应该直接干预企业行为，干预他们使用利润、使用贷款的方式。把产业政策交给企业、把投资审查权力交给只看利润的银行，政府负责出钱制造利润却不管具体怎么花钱，迟早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十二、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本文前面的部分可以总结为这么一句话：以产业规划消灭金融泡沫。不过，多年以来我们被灌输的经济学“常识”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僵化，政府插手经济破坏市场均衡，远不如让市场自己选择投资方向。更有各种论文论证：由于信息不足，计划经济永远达不到完美状态，必然失败云云。

没错，没有任何机构能搜集所有的信息，包括投资公司，包括跨国资本集团，也包括政府机构。但是正如那个古老笑话：如果你跑不赢狮子，能跑赢同行的胖子也可以。计划经济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完美形态出现的，只要做到相对优越即可。如果说政府存在信息不足导致的问题，市场经济也一样。

但是，市场经济有个致命的问题——市场会随机地制造错误，资本更可以利用这些“错误”发财，炒作泡沫（比如房产）也可以赚钱。危害最大的泡沫并不是无数散户追捧的结果，而是少数寡头煽风点火，裹挟社会资金主动炒作的结果。相比之下，

政府至少没有动力公然制造错误。这才是（中央）政府行为能对抗泡沫的原理。

进一步抬杠，还可以说政府里也有腐败，也可能有工作人员制造错误来发财。但这依然和资本集团制造的泡沫的行为有本质不同——在泡沫中发财的资本操盘手可以公然炫耀他的财富和荣誉，可以自称人生赢家、青年典范，反过来再动用资本影响舆论；制造政策漏洞来牟利的工作人员最高成就只能是闷声大发财。公然抢劫和偷偷挖墙脚，危害级别还是有明显不同的。

更原则性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经济增长的原理。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在给定边界下达到资源配置均衡，资源最优化配置。但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恰恰不是通过达到均衡，而是通过打破均衡来达到的。问题是谁来履行“打破均衡”的任务。

从科技发展趋势来看，事实证明，随着科技发展越来越超越普通人和银行经理的认识水平，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越来越不愿意主动承担“打破均衡”的任务，更愿意利用自己相对小资本的信息不对称来炒作泡沫。这体现在工业经济发展上，就是基础技术研发停滞，反过来又会促使资金进一步、制造泡沫，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衰落就是这个套路，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

政府拥有印钞权，即定义财富的能力，有能力也必须认识到财富不是钱，是工业经济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所以，政府必须主动担负起“打破均衡”的责任。否则就是自己忽悠了自己，成了最大的经济笑话。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回到全盘计划经济的时代。在给定的技术、产业框架下，企业积极性和市场博弈过程是很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不需要全盘管制，也不需要对大多数企业行为加以限制，但一定要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实施坚决的管制。从“四万亿”和光伏泡沫的例子看来，在需要政府插手的地方，在需要贯彻产业政策的地方，政府干预切忌半心半意，羞羞答答。既想指导企业行为，又总惦记着“市场原则”，势必两面不讨好。

政府“手软”不仅仅是认识的问题。干预企业行为，势必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在当今社会意味着处理群体性事件，面对利益集团制造出来的舆论压力，乃至戴上“与民争利”的帽子。落实大规模的产业规划，重组产业链，往往意味着十倍百倍于一般房产项目的土地、基础建设问题，这在拆迁日趋艰难的当下，操作起来千难万难。

所谓理直气壮，“理”不直，就没有坚决落实政策的底气。现在政府自身存在严重的腐败，的确有许多官员在管制政策中牟利、忽视普通人的利益，这些事实无可否认。政府缺乏一套自洽的执政理论，以

至于使用强制手段时总是有些心虚。这都是政府陷入舆论陷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重要原因。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让政府面对舆论压力能底气十足地喊出“为民谋利”，面对利益集团没有“比烂”的心态，全面的产业规划才可能成为政府的选项。否则的话，政府手里的牌只剩下货币政策，只能在制造泡沫和戳破泡沫之间来回摆动——每一次摆动都要损失更多的政府信誉。

这正如成都武侯祠对联所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能否促成产业升级的“大势”，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的政治问题。

漫谈近日的爱国风潮



：黑夜里的牛

“钓鱼岛”危机演变至今，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领土争端，而是历史问题、社会矛盾和各种意识形态冲突牵涉其中的综合性热点事件。从领土争端的角度看，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双方政要的讲话更是充满了火药味；而在社会运动的层面，大规模抗议活动在上周末应该就已经达到其顶点。民族主义的激情与现实中的压抑相互交织，未来的图景在秩序和混乱的缝隙中闪现。运动的不同侧面往往能昭示出完全不同的东西，有幻想，也有真相。

真真假假的民族主义

首先，必须认识到，促成运动的显然是爱国主义这样一种作为想象的共同性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已经不能解释运动中出现的不和谐因素。我们不能再认为，示威是被压迫民族的呐喊。激发群众政治参与激情的，已经不是“救亡图存”的紧迫感。对于已然崛起的中华帝国来说，日本不再是“欲灭其国”的豺狼，而是初次“亮剑”的对象，并且是一个最佳对象。

除了统治者带着功利的目的引导舆论之外，其他阶级对运动的参与仅仅是基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普通工农群众的热情所牵连的更多是民族情感，咒骂日本，是他们实践他们所习得的教育的方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激愤则更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大工业的产物，因为对这些没落的阶级来说，民族主义是他们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这些意识形态的分析都无非是老生常谈，历次反日游行中都无非是这阶级的行动，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变化的只是声音和面孔。

这次活动的独特之处是，民族矛盾已经不足以掩盖社会矛盾，反而造成社会矛盾的表面化而被迫限制自身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游行活动中的“打砸抢”事件。在那些理性爱国人士看来，这些事件表现了群众的“幼稚”。这就是他们习惯性的思维，把一切矛盾都缝合到普世的叙事中，根本不提及这些事件发生的真实原因：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某些爱国青年们在运动中“幼稚”的行为，恰恰是在表明，他们的利益与意识形态说辞之间，存在着不可抹杀的非同一性。

爱国青年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非理性的行为，不应该简单地纳入到道德评价的体系中去。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爱国青年为什么不能理性？理性不是谁都可以拥有的，这不仅关乎智识，更受制于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有教养者需要那种可以使其教养持续存在的条件，而粗鲁则是粗鲁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戴的面具。很多人会说，那些砸车的人心里未必真是那么义愤填膺的想砸车，只是示威人群的“集体无意识”发作的癫狂而已，故而应当归咎于爱国主义的泛滥。但他们忘记接着说，在人们所想和人们所做之间，哪一个更真实？人们戴的面具就是他们最真实的社会存在。底层混混的“野蛮”就是他们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年轻工人宁愿自戕，也不愿继续生活下去的时代，以“爱国”的名义杀人又有什么难以想象的呢？一个造就了野蛮群众的社会，是没有资格责怪这些野蛮者的。应该学会成熟的是社会自身，而不是那些二逼的年轻人。

爱国主义者虽然举起反普世价值的唯物主义口号来反抗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

权，但实际上二者同为普世主义。只不过，前者的普世价值的伦理主体是抽象的个人，后者的普世价值的伦理主体是抽象的民族。就像我们无法触摸抽象的个人一样，我们也会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抽象的民族。我们在反美游行中认识了“祖国”，在反日游行中又错过了他，以后又会偶遇然后擦肩而过。只有那些最真实的利益才能造就最真实的感情。任何妄图用“民族”这个抽象的符号来掩盖矛盾的尝试，最终都将归于失败，常常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并不是说要否认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存在。现存之物之所以拒绝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还未丧失存在的根据。帝国-殖民地秩序目前只是在重组的过程中，还远不能宣布完成。不平等的交换仍旧广泛存在于地区和全球贸易之中，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尚未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各种各样的民族冲突会不停地上演。我们要做的不是拒绝民族间存在矛盾的现实，而是去了解民族矛盾的新形式。从游行队伍的标语和口号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所熟悉的只是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冲突，而不了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因此，回顾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历史是非常有益的。民族矛盾怎样地与阶级矛盾相互缠绕在一起，导演了二十世纪乃至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中国不见得具有产生德意志式非理性主义的社会土壤，因而不能像自由主义者那样夸大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作用。但合理地理解民族主义，并辩证地克服之，是我们这个民族获得发展和解放的必经之路。

自由主义者的“高姿态”

与马克思主义者客观地分析民族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内在矛盾不同，自由主义者用漫画式的方式给民族主义贴上“邪恶”的标签，以成全自身的“清高”。而自由主义者能自命清高，嘲笑“民族主义狂热”，皆因他们拥有“视野”。在自由主义者那里，有“全球视野”：在全球化发展到这种程度的今天，怎么能够提出“抵制日

货”呢？抵制日货是一种两败俱伤的行为，而某些爱国人士的行为，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自由的亲和力？），甚至还有在内部搞“多数人的暴政”的危险。其次，还有“道德视野”：这个道德不是“忠孝仁义”，而是“自由、平等、博爱”。要尊重少数人，还要爱你的邻居。这样一来，经济上的现实主义和道德上的理想主义让他们拥有了理性和感性的高贵幻想，在众声喧哗的此刻，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在网上骂五毛脑残了。

一开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要表达一下民族感情。一方面是为了政治正确，另一方面，也诚如郭敬明之类的小资所说，的确是“毫无保留地爱它，为它自豪”。从出身或者目前所从事的职业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相当多数都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天生的不安全感促使他们寻找“集体”。已经融入了自由主义者圈子的，自然固守自己那一套“洋人是天使，国人素质低”的逆向民族主义说辞。

当爱国行为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他们的表现也很典型。老油条自由主义者们，抓住大好时机，猛批民族主义，宣布“自由人必须用全部力量来对付他们，否则即是背叛自由”。而那些真诚地爱着祖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则呼吁理性爱国，强调“要一致对外，不要内斗”。这种情况在左翼也是类似的。

很多公知就表演了这样的一出滑稽剧。爱国风潮起来的时候，他们也随风起舞。游行示威之声一起，他们就跟着高潮。但当示威人群砸了私有财产（汽车）的时候，恐惧和愤怒立刻出现在他们脸上。他们是“镇压”大合唱中分贝最高的演唱者，是皇家和海军的志愿军团。老油条自由主义者把那些关于禁止打砸抢的禁令叫做“进步”，好像忘记了中国已经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进步”。自由主义者对于群众运动的理解都不仅“肤浅”，甚至近于“无知”了。他们刚刚召唤起群众运动这头猛兽，就被它的威力吓坏了。你的私有财产，你的荣耀，哪里敌得过爱国青年的铁榔头。所以，要“珍爱生命，远离爱国青年”。

政治图景的转换

这次游行中表现出来的群众力量不仅在于其巨大的“破坏性”，还在于参与者眼中的“政治图景”。以往的反日运动中虽然也发生过示威群众跟警察的冲突，但最多是为了争取上街的权利。但这次不同，像深圳发生的围攻市委的事件就表明，示威人群并不是把政府看成国家的化身，而只是市民社会中机构而已。这里就出现了政治图景的转换——从上下层级转向平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被裹挟进市场，商品交换的逻辑必然地会从经济领域演变到政治领域。群众与政府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如果现实中的政府趾高气昂，以统治者自居，那么人民心中必然产生“民主国家”的理想。深圳的游行就是这一变化的最佳证明。游行队伍不是冲破阻碍去向日本人表达自己的愤怒（向许多城市那样），而是冲击阻碍游行队伍的政府本身。虽然群众可能会冲击任何地方，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深圳的老市委前出现了催泪弹和愤怒的人群。此前若干城市爆发了几起党群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深层社会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市场逻辑带来的这种政治图景的转变。（值得提出的是，这里谈论的不是针对“日本”的少数恶性打砸抢事件。不可否认，处于癫狂状态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但运动的暴力化如此迅速，而且出现有组织的暴力，不能不让人揣测某些政治力量是否参与其中。）

这种政治图景要进一步展开自身，得有强有力的政治团体的引导和支持。群众的社会心理还未能成功地转化为现实的意识形态。要获得现实政治结构的变化，必须要发生现实地政治冲突，而且必须是代表着大多数人意愿的“意识形态”与占据着政治权利的少数“保守派”的斗争。中国现在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群众展示了力量，但这种展示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目的，所以最急需的是能够掌握这种力量的恰当的“实体”。广泛的群众运动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其实

也就是这样的“实体”逐渐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哲学一点，可以说这就是政治理念的产生及其对象化（物化）的过程。从意识形态降落到经济领域的各种“机构”，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作为斗争中流砥柱的，必然是经济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各种政治性“实体”。但群众所期待的，正是统治者所害怕的，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萌芽，也让他们胆战心惊。民族主义，只要不发展成为法西斯主义，不管多么强大都不足以构成对现存秩序的威胁，但底层阶级力量的聚合，无论怎样弱小，都会导向未来的灾难。最近针对各类劳工NGO的恶性事件，不正表明他们多么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的吗？

所以，此次爱国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启示不是爱国多么重要，或者理性爱国多么必须，群众运动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才是它对那些真诚爱国者的最大激励。这种能量在没有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表述之时，往往只表现为“趁火打劫”的破坏性力量；随着阶级意识逐渐清晰，群众之间的政治交往日益广泛，一个进步的群众运动必将会给中国沉闷的政治打开一个口子。自由主义者的无知和软弱正表现在他们对于群众运动的恐惧上。幻想说理和装逼就能为中国带来期望的“自由”，这是多么可怜的意淫，多么卑污地向统治者谄媚。爱国与不爱国，在具体的历史境遇下有不同的选择是可以讨论的，对于群众运动有不同的甚至负面的理解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但仅仅因为群众运动对社会秩序的一点点破坏，就将其定性为“义和团”，就完全失去了其作为政治人群的必然性。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嘲笑了自由主义者，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嘲笑。年轻的自由主义者们如果要获得真正的政治生命，就必须超越老油条自由主义者的意淫，把自己的脸朝向那些受苦的人，那些孕育着“社会渣滓”的不健康人群。

爱国的“左派”们

自由主义者热议“左派教授”韩德强

打了一个老右派。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此做出道德评价，因为道德评价过于廉价。意识形态冲突演变为暴力冲突的情况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不足称奇。韩德强本人的行为也非常符合他的风格：搞烂左派。毛主席被他们挂在民族主义的破旗上，同时打人的行为更是为对立面“血洗左派”提供了口实。尽管这是较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有现实后果的“口实”，但势弱的左派不去占据道德高点，而是张牙舞爪地打人，不由得叫人怀疑这些“爱国左派”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也许真是处在这样的阶段，所要做的不是去追求那个吸引着自己的东西，而是辨识自己的欲望，直面自身的真实。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最应该做这样的自我剖析，不然往往不仅成为自己信念的叛徒，还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其实，左派参与到此类民族主义运动中来，处境本来就非常尴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毛主席搬出来。新中国的创立其实就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联姻的产物。这也是爱国“左派”们对现政权感情深厚的原因。但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不需要依靠“毛泽东”的旗帜来反抗“帝国主义”。恰恰相反，这面旗帜引发了许多人真实或者想象的痛苦回忆。韩德强打人，在我看来是左派的悲哀。不是道德上的悲哀，而是实力上的悲哀。因为他们打的不是汉奸，捍卫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毛泽东这面旗帜对爱国主义的

专属权。现在看来，爱国主义多元化了，你有你的毛泽东，我有我的常凯申。资本主义时代的爱国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为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形式可以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变化，只要能够完成建构共同体幻想的功能即可。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过是表明，不同阶级眼中的祖国有着怎样的差别呵！

结语

对于“钓鱼岛”事件本身，我们不愿意说太多。那个小岛给太多的人们带来了生活的意义，在此刻保留它是功德无量的。但是，醒来的人们要摆脱虚无的诱惑，则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理论武器，去解读群众话语背后的话语，去把握社会发展最生动的脉搏。自由主义者已经无力做这个事情，而民族主义者除了少部分教父级人物，已经成了这个时代的形势本身。那么，这个重任就落在了左翼身上。群众运动砸碎统一性幻想，工人运动为民主运动打下基石，而左翼思想者们，则应为一切的进步运动担当最忠实的眼睛和头脑。我们期待更多的思想者出现，无论是在庙堂还是江湖。更期待群众在漫长的经济斗争中摸索到正确的道路，摆脱各种幻想，最终实现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统一。

钓鱼岛钓出了阶级统治的“奥秘”

: Ultramarines



中国曾经有一个大独裁者，名叫蒋介石。他代表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进行过二十多年的独裁统治，最后终于卷起铺盖滚了蛋。然而，他这座庙虽然小，刮起的妖风却大。比方说，他有一件杀手锏，叫做画地图。凡是地球上，甚或地球之外勉强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尽管历史上从来不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权的领土，也从来不该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权的领土，而且也不曾被他那个政权所占据，都可以被他划进他“中华民国”的版图，作为中国共产党“丧失领土”的证据。蒋介石画地图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哪怕是膀胱最大的小孩子在床单上画地图的能力，直到他死后若干年的今天，他所画的地图，还被一些愚昧无知的人信仰者，还被他蒋介石死而不僵的孝子贤孙，徒子徒孙，不肖子孙们利用着。

钓鱼岛也引起了一阵地图亢奋。

钓鱼岛是一个小岛，离中国比离日本近些，周围的海底有若干矿产，可以掘出来使用。中国有许多古书，石碑，故事一类的资料，还有外国来的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岛是中国领土。日本只有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却绝不松口。于是两国都没有采取什么像样的行动，天天在岛的周围转来转去。

但是，这个小岛的主权问题在国内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还导致了打砸抢。从表面看，主要有两个原因，日本政府要求钓鱼岛的主权，中国政府没有出兵去攻打钓鱼岛。

可是日本政府就是一个景阳冈上的小流氓，咱们不可能靠游行逼迫他。中国政

府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干，钓鱼岛上只是时不时有几个日本人，去攻打的话，最大的可能性是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一个空岛。钓鱼岛问题本身，如果不和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争霸派的需要以及它的反动统治配合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也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这些游行的实际作用不在于推翻日本政府，也不在于逼迫中国政府攻打日本，抵制日货。因为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中要争霸的还惹不起美国，要投降的更不会去惹美国。游行者自己也知道，这两句常用的口号根本实现不了。

游行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无数矛盾，越来越发展。中国的许多自觉不自觉的人们，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越来越发现，中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本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就是矛盾本身。于是，他们中自觉的人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很多不自觉的，受蒙蔽的人就把“民族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当成了唯一的出路，希望中国变成第二个美国，到时候每人发两个白奴，快活上几百年，之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们期盼着一场对外“强硬”的狂欢。而因为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中的争霸派和投降派现在既没有完蛋，满足觉悟的群众，也没有“强硬”满足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这部分群众的民族主义狂欢梦想破灭了，他们希望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大败日本，看到日货落价，至少精神上做一下“大国崛起”的梦，尽管就算中国资本主义打赢了日本，他们得到的也就是一点残羹。他们是“亮剑”培养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战争的概念仅仅

就是一个晃眼的显像管和两个轰轰作响的电视喇叭，他们不知道，争霸战争中被驱赶到战场上的就是他们自己。但是现实处处使他们失望，他们只有在资产阶级争霸派的引导下，做这种迷梦。

然而这场狂欢还是没有来。如果与中国争岛的是美国，那么这次大概就不会有游行。可惜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争霸派钦定的“民族”公敌，美国也很配合，允许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次受了它的欺负，就打一下他养的狗——日本泄愤。于是就有了游行。所以，就上演了一次规模比较小的民族主义狂欢。国内的矛盾好比锅下的火，烧得厉害，可又不能扑灭，因为这把火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这堆柴点起来的。锅里却还没有放进争霸派许诺的美国，也没有投降派许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即使是把马克思主义者下了锅，锅本身也没有准备好煮他们，电线杆的数目还很不够，日本人怎么请也不来入瓮，眼看锅里的水要干，锅要烧漏了，只好扬汤止沸，拿勺子搅搅，就叫做游行。游行的人们这一次通过游行发泄了自己的失望，但是，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失望远远不止一个小岛，他们的失望要发展起来，要跃出“反日”的范围，要成为政治性的运动。

在这次“反日”浪潮中。获益最大的是资产阶级争霸派，还有台湾的资产阶级代表的中国民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争霸派要造成一种“投降派丧权辱国（正确），争霸派代表民族复兴（错误，他们代表希特勒，墨索里尼，从来就没有一个民族的奴隶和奴隶主一起复兴，主子还是主子，奴才还是奴才）”的印象。要造成一种“不问姓社姓资，日本人生而有罪，大家一起来‘复兴’，‘一致对外’的印象。他们有大批的吹鼓手可以讲这一套的东西，他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把受蒙蔽群众中的一部分抓到自己手里。

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要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争夺剥削的权利，争夺政权。他们要利用这次的游行树立自己的形象，然

而他们还不大具有批准和禁止游行的权利，倒是他们中的那个特殊分子马英九跳了出来，赚回了一点面子。台湾省军队根本打不过日本，台湾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再有什么大起色，只能作作秀。但派几艘船去喷喷水，却颇能蒙蔽大陆的一些人。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与新老国民党（如果真有什么新国民党的话）都没有什么大矛盾，马英九这伙人，实际上还是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过是把用军事力量将“三民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变为洗脑罢了。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水平，并不超过旧三民主义或是《中国之命运》，将来和小马公开合流，颇有可能。

参加游行的人们中，可能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自觉群众。也有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争霸上的人，有因为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逢日必反的人，这些人要经过长期社会现实的教育，要经过长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会认识到，争霸和投降都是死路，才会把反对抽象的“日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

这次游行中，出现了打砸抢，也出现了毛主席的像。群众运动中的暴力，是一个客观现象。问题在于要分清是什么样的暴力，是革命的暴力，还是反革命的暴力，要弄明白这种暴力是名义上和实质上都反对资产阶级的，还是流氓无产者式的，纯粹以发泄和抢劫为目的的，还是资产阶级雇佣，指使的打手，为破坏革命的运动，损害革命的声誉制造的。这次的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参加的人成分极其复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起领导作用，砸掉几个出售日货的商店，对于打击真正掌权的资产阶级，是没有作用的。应当教育群众，使受蒙蔽的群众清醒过来，将斗争的矛头逐渐指向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干扰和破坏，要揭露他们的这种卑鄙行径，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资产阶级为夺权在做准备，我们也应当有所准备。

举起毛主席像的人，也分为几种。自

觉的人们举起毛主席像，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要不仅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要推翻日本的资产阶级，也要推翻美国的资产阶级，也要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统治。另一些人举起毛主席像，是因为模模糊糊地听说，毛主席过去敢于打仗，很厉害，今天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这么厉害，就可以变成美国了。这些人里，有的是相信什么大跃进饿死3000万的，也有2000万的，也有5000万的，他们就因为相信了这些谎话，所以在想打仗的时候才举起毛主席像，其它时候往往要说什么懂军事不懂经济，晚年糊涂了一类鹦鹉学舌的话，他们非摆脱了谎言的束缚，不能够拿得稳毛主席的像，不能够举得起毛主席的像，不然人家大喇叭里红口白牙地一叫什么三千万，他们的心里又要突突跳，觉得自己对于“老干部”，和他们的儿子孙子小干部们有罪，应当给人家当牛做马了。第三种人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把第二种人完全当成傻瓜蛋玩弄，这第三种人就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争霸派，3000万一类话，是他们和民间资产阶级，和其狗头军师们一起搞出来，又特别加以允许的，他们最恨，最怕毛泽东思想，最恨，最怕马克思主义，可是，这就注定了他们很怕群众。他们最怕群众觉悟，最怕群众革命，因为他们杀人再疯狂，杀不尽革命的群众。所以，每当他们的画皮开始腐烂的时候，他们就要逃跑到毛主席像的后头躲起来，避开群众的眼睛，再去梳妆打扮一番，因为镇压已经救不了他们，他们非靠着欺骗，不能苟延残喘下去了。

民族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的进步思潮，但它总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民族主义完全过时了。现在叫喊所谓中华民族优越的人应当回头看一看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看一看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看一看现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想一想自己和他们究竟有什么区别，

想一想问题究竟处在什么地方。

历史上有许多已经完全灭亡了的民族，当初都曾经相信自己的民族是最优越的，负有特殊的使命，注定要永远存在下去，可是他们一样灭亡了。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们不幸即刻灵魂出窍，居然穿越到了索马里，列支敦士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位青年的身体里，从此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一位当地的青年，或者居然不幸变成了日本人，那么他还是他，可是他是否从此就应当认为自己低劣？

一般群众中的民族主义，除了在被利用的时候，是不能独立掀起太多风浪的。利用他们的人，就是准备把自己的伪装从“社会主义”换成“民族精英”，从已经骗不了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变为“民族先锋队”（这两个口号过去一起出现时，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但现在已经完全分离了，大概只有在工人造成威胁时，第一个才会再拿出来）的官僚资本和一部分民间资本。也就是一个从代表“民族”中骗取正当性的法西斯党，希望用16亿人口去完成德国法西斯用7500万人口没有完成的争霸，而取代美国。所谓民族精英，自然可以具有一点世袭性了，因为所谓精英，离不开血统论，到时候他们的资产阶级家天下，也就“名正言顺”了。这种所谓“模式”，也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因为就像你所正确地指出的，完成一点替底层群众索取残羹冷炙的工作，也就是做做“慈善”，当然不是借慈善的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加上狂热的，有着宣传机器支持的民族情绪，就可以对群众起到极大的欺骗作用。如果中国分裂，陷入军阀混战，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群众自然会起而反抗，可是在有口饭吃，还自认为是优等民族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底下，人们却更不容易认识到这个专政的本质。从这个角度上说，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不过是控制群众，愚弄群众的两条路子，不过是一条粗浅些（还要诉诸资本主义应该消灭的传统“民族”关系），另一条精致些罢了。

现在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争夺政权，他们中由官僚资本主导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争霸路线和由民间资本中一些人主导的殖民地路线，也正在斗争。如果这两个资本发生一场战争，那倒创造出了人们“熟悉”，至少是从书本里熟悉的革命条件。如果殖民地派夺取政权，搞得民不聊生，并且大抓大杀马克思主义者，重演四一二，那也是书本里写过的事情。虽然人头要落地，但是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倒容易识破这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欺骗，倒避免了最危险的醉生梦死。

真正危险的，是这两个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或是他们中的争霸路线获胜，创造出上面说到的，具有极强欺骗性的法西斯政权，甚至制造出一个有完全美国式选举的政权。在这种政权下，他们可以蒙蔽大多数人，只镇压够分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干脆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不同的声音”之一，以凸显其“民主”“宽容”，使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变成资产阶级政权的泄压阀，把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变成一个“慈善”机构，或是自己扶持几个修正主义的社民党，夹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最坏的情况，但现在的社会，已经具有这种社会的雏形，应当拿出一套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办法。借口镇压机器强大，社会主义遥遥无期，群众觉悟低，就不工作的人很多。要开展工作，就要有一个党，不按照现在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将来可能的发展，把党的建设好，是不能有效的斗争的。

资产阶级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市民社会里建立起来的小团体，除非有外部杀头的压力，不容易维持。这里涉及到在现在比较稳固的资产阶级秩序下的组织形态问题。

乌有之乡最近遭到了打击，我盼望着其中一些真诚的人醒悟过来，把眼光转向国内，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不要寄希望于所谓好皇帝的健康力量。这件事情，对他们和许多寄希望于奉旨革命的人，都是一

次教育。官僚资本没有安抚他们，反而打击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利的，对于我们和乌有中的理论水平不高，受蒙蔽的人们是有利的。非理性主义不一定要变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即使是最标榜“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常常保留一点，恰如在停电时，或是需要浪漫的场合，可以点一点蜡烛。因为资产阶级那套“理论”常常会磨破，这时候为了不露出裤衩，是需要打补丁的，以防止绝望的人们从这个破洞洞里掉出去。

现在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似乎理论上讲得很明白，其实不过是会走路的书目，时不时引用几句原文，还用不到好处，无非是用来为自己的早产论，社会民主主义辩护，只好像是最不高明的算命先生，时不时引用几句黄历。一到现实问题，一到实践问题，就又拿出那几种错误看法和悲观情绪。他们有的是不要理论，一味去做“社会实践”的人，还有惶惶不可终日，垂头丧气，什么都不愿做的人。革命是一个运动，重视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实践，不怕犯错误，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才是重要的。热心人士希望新的社会能被快递员送上门来，身上还插着叉子，自带番茄酱，还把自己切好，送进他们口中，完事了还能自动擦嘴，那是办不到的。

现在许多人，愿意吹嘘什么人家将来要把他挂上电线杆，但也只是说说而已。要是真有这么一天，大概他们还是像现在一样理论斗争，宣传斗争，军事斗争都没有准备，群众不支持他们，自己内部也派别林立，更不知道井冈山在哪个省份，大概还真要被刮起来风干了。必须要对这些人加以应有的训练。

现在生产力决定论者很多，不少人举起这块盾牌，来护住自己的早产论，护住自己的无所作为和对资本主义的妥协，护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遥遥无期论，一定要把他们这块盾牌拿下来，才能真正帮助他们。现在的形势，并不像读惯了中国和世界革

命历史的热血青年所想象的那样，有许多仗要打，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也没有做好听枪响，挨枪打的准备，他们还是以一种童话似的，浪漫主义的情绪来想象革命，想象斗争，而不知道他们现在就是处在地下斗争当中，就是处在革命低潮的年代，应当以不懈而不是冒进的工作，来促进客观条件的变化，来争取群众，争取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条件下怎么办的问题。

少年中国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种流行的错误思想。“批评者会提出说，即使不培养下一代，革命者也自然会涌现出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革命就不会断绝。”当然，从大的历史尺度来说，的确如此。这其实不过就是遥遥无期论罢了，也就是不敢革命，没有信心革命，是对革命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现在很流行。提出组织问题，就是提出了继续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对革命有益的，但是提组织

问题，还要提的正确，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一味等待井冈山，然后突然冒出一个强大的党，他好参加进去。应当一点一点地做工作，使得组织壮大，在人身上和思想上，也就是宣传上深入到群众当中，这个工作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是没有这个工作，就没有强大的党，也就不会有那个井冈山。

在这种社会下，应当搞好组织，理论，宣传的工作，靠着普遍地组织，研究好理论，用来通过媒体，通过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指导好斗争，再进一步研究理论，推动实践。现代人形成世界观，主要靠媒体，因为他的自然感官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他只能吸收一定量的媒体信息，所以实际上媒体决定一个人知道什么信息。甚至教育也变成媒体的一种。没有媒体，就没有宣传，在这方面，要有我们自己的人才，并且要将他们组织起来使用，为革命的宣传服务。



巴黎五月风暴

【编者按】这是宣武在工人网第三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的整理稿（内容有扩充），文章还比较粗糙，很多地方都可以展开论述。另外，本文对工人斗争状况论述的稍显夸张，作者的本意是一方面以此鼓励革命青年看到工人的力量，并实际的向工人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能为工人的斗争寻找前进的方向贡献一点力量。

斗争的逻辑

——对中国工人斗争动向的探讨


：宣武

毛主席总结人民群众的斗争逻辑时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的国企改制导致国企老工人的斗争，与施行分税制后的农村——大量农民到大城市打工——受到剥削、欠薪导致的新工人的斗争，这些工人的斗争，正验证了主席总结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逻辑。在本文中，老工人的概念是在原社会主义劳动关系条件下进行劳动的工人，新工人则成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意即涵盖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以及现在在国企工作的工人）。

这种斗争逻辑，不仅仅是一种现象的总结，更蕴含着工人阶级意识与斗争层次的提高的内在机理。换句话说，这个总结并不只是一种现象的陈述，而是归纳了工人阶级总是在某种程度的斗争失败之后，才能总结经验教训、丢掉幻想、提高意识水平，为下一个更高阶段的斗争奠定基础。

那么，这种斗争逻辑是如何具体在中国工人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呢？根据这种斗争逻辑，我们可以对近期中国工人的斗争动向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呢？下面具体分析：

一、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老工人

上来我还是先讲老工人。在讲老工人的斗争之前，先对老工人的意识进行介绍，

这样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工人的斗争。

1. 我们的社会主义

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工人，也不同于前苏联那种一长制工厂管理制度下的工人，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老工人（简称老工人）对工厂，具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

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工业的落后状况，使得中国的大小国企、集体企业绝大多数都是老工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出来的，他们见证了这个历史过程，甚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一穷二白的弱国穷国到工业大国，都是靠工农群众的双手建设出来的。

更重要的是，这个建设过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的群众路线，充分调动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给予了工人在工厂中极高的生产地位，使得工人的劳动具有极强的自主性。群众路线还表现在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上，从大跃进到文革，轰轰烈烈的中国工业建设到处洋溢的是工农群众的劳动热情；是发动了工农群众造反夺权，改革不合理的工厂规章制度；是支援中西部工业的三线建设运动。这些群众运动塑造了工农群众对工厂的主人翁意识。

因此，工人看待国企工厂，感情甚至比对他们自己的子女还深。社会主义也许在左翼学者、知识分子意识中仅仅是理论，

那么在老工人意识中，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是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所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属于工人的，这种归属可以具体到工厂的每一个机器、每一片土地。

而改革开放以后，老工人被下岗、买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私人腰包里，他们是比任何人都感到心痛的。正如一个老工人说的：改革就是把原先作为工厂主人的工人变成了工厂的奴隶，而让作为工厂公仆的管理者成为了工厂的主人，这种身份的颠倒，是他们最痛恨的。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一家之主被人从家里赶了出去，而他们急切希望的是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家。即使如此，他们对待这个国家、看待政治事件，仍然是以国家主人的角度去看待的。

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意识，使得老工人天然就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这种意识，是完全不同于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他们爱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国，同时痛恨一切破坏社会主义的东西。

有了对老工人这种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的认识，我们再来讨论老工人的斗争。

2.老工人斗争的第一个阶段

老工人的斗争开始于国企改制，所以他们的斗争也是随着国企改制而进行的。换句话说，这个阶段，处于资本主义进攻工人阶级的状态，基本上是资产阶级进攻到哪，工人就守卫到哪，而这种进攻，工人是以工厂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但面对的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政府行为，所以工人在这个阶段总体处于消极防守，其结果自然是屡战屡败。具体我就不论述了。那么，大致到2007年左右，随着国企改制总体完成，各中小国企基本上破产卖光，大型国企、乃至央企则完成了工人身份的转变，企业也改制成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国企老工人的斗争变得偃旗息鼓，不再那么轰轰烈烈。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既定目标已经完成，另外一方面，很多老工人，尤其是下岗买断工人，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到市场经济大潮中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这也就宣告了，老工人的第一个阶段的斗争

的结束。在这个阶段，毋庸说，工人在战略上是完败。作为其中的典型：辽阳铁合金厂工人、郑州造纸厂工人，和重庆重特钢厂工人，都没有取得任何战略上的成果。

在这个阶段中，工人基本上是以工厂为单位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斗争的具体目标也是工厂的领导。虽然操作这个改革过程，包括对工人的斗争进行镇压的，实际上都是地方政府，但是工人大多没有把目标指向地方政府（唯一例外的就是辽阳铁合金厂工人的斗争，他们最后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辽阳市政府，不过仍然是希望辽宁省政府来解决辽阳市政府的腐败行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工人对国家的政策还抱有一定的幻想，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进攻，所以都走过“先上访，发现解决不了问题，才采取行动抵制改制”的过程。

同时，在工厂内部，退休工人、下岗工人和在岗工人的斗争，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甚至对方会用在岗工人对付下岗工人，譬如，山东胜利油田的下岗工人占领了厂办公大楼，工厂领导就让在岗工人去跟下岗工人对抗。而工厂领导以其在岗子女下岗威胁斗争中的下岗工人或退休工人，更是常见的手段。

有句俗话叫，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拥有的珍贵。对老工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前三十年工人对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意识，更多的是被共产党的宣传鼓动所掩盖，因而也相对是比较模糊的话，那么通过被剥夺主人地位的过程，通过前后三十年的比较，才真正使老工人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他们的工人阶级意识才变得完整。因此他们的斗争，虽然刻意回避了政治化的斗争目标，但是却在每一个斗争内容里都渗透着社会主义。他们的失败也使得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要求必须是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

到这里，他们的斗争失败，促使他们打破对政府的幻想，认清当前社会的性质、资产阶级的特点，完成了向政治化的转变，为斗争进入下一个阶段奠定了基础。而第二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典型就是通钢工人的斗争，所以我们来看看通钢工人的斗争。

3.通钢工人的斗争

2009年7月24日，通钢的在岗工人为了阻止私企建龙集团二次入主通钢，举行了全厂罢工，并在与建龙集团发生冲突时打死了建龙集团的经理陈国军，事后，吉林省政府宣布终止重组方案：建龙退出，永不再参与通钢重组，从而宣告了通钢工人斗争的胜利，也同时标志着老工人的斗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关于这次事件的详细情况，以及产生这个事件的经济社会背景，我就不再描述了，只是分析这个事件中工人的斗争状态。

首先，这场罢工是国企在岗工人进行的斗争，这在老工人的斗争中，属于极罕见的。之前老工人绝大多数的斗争主要是下岗、买断工人和退休工人在进行。而且相反在岗工人表现的看起来比较保守，为了保住工作岗位，他们整体上是不敢斗争的，也因此对方反而会利用这点来让他们去与斗争的下岗工人或退休工人进行对抗。当然，促使这场罢工的诱因也是把工人打死的私企经理扬言要把工人都下岗。但也正因为此，工人的斗争就不再是下岗已成事实后被动的、不得不进行的斗争，而是有一定主动性的进行罢工以阻止下岗。按照一些同志的说法，工人的斗争已经从被动的消极防御，转向了积极防御。事实也是如此，通钢工人的斗争结束不久，河南林州钢厂的工人就效仿通钢工人，并且打出了“向通钢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也取得了胜利。更具有深远意义的是，通钢事件发生后，直到十八大前的三年多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敢提国企改制。

其次，这场罢工是由一些退休工人在里面进行组织、鼓动的，譬如正是因为退休工人吴敬堂在广场进行的演讲充分发动起了工人。而这，正是这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新特点。也就是说，这是退休工人主动将自己的斗争结合到在岗工人的斗争中去了。这种结合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这场斗争并不直接涉及退休工人自身的利益，而他们又是跟在岗工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工人的组织者很难被对方威胁、利诱，换句话说，他们天然就

是工人的领袖。事实也确实如此，通钢的工人早在09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酝酿斗争，对方也试图做吴敬堂儿子、外孙的工作让吴不要参与，但都没有作用。当然，他们成为工人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也因为他们经历过斗争，有一定的斗争经验。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正是因为第一个阶段老工人的斗争整体上失败了，工人斗争失败的结果是促使他们寻找更广阔的力量、更广阔的工人；促使他们打破了原先的一些幻想，从而斗争的意愿更坚定；促使他们政治化。他们不再对以前自己相对狭小的工人群体的斗争抱太高的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团结更多工人群体，并参与到那些工人群体的斗争中去。具体到通钢事件上，退休工人就与在岗工人实现了联合。同时，这种联合实际上就完成了斗争经验的传授。当工人把高举的罢工横幅，一个分厂一个分厂的传递下去，从而一个分厂一个分厂的实现停止生产，这种既有节奏又壮丽的斗争景象，对工人的鼓舞是无疑非常巨大的，他们从这个斗争中得到的自我教育，以及组织训练都是非常宝贵的。

最后，通钢事件的这种退休工人与在岗工人进行结合的斗争，揭示出了这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特点。就是丢掉幻想，继续战斗。第一个阶段老工人在斗争的初期，多少还对政府抱有幻想，对政权的性质认识不清晰，那么通过斗争的失败，促使他们丢掉了幻想。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了。他们丢掉幻想的结果就是认识到，他们遭受的命运，不是某一个或几个工厂领导贪污腐败，他们的敌人也不是在工厂以内。他们认准了斗争的目标，他们要夺回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而敌人如此强大，就必须团结更多的力量进行斗争。所以，他们积极参与到其他工人的斗争中去，积极的与那些工人中的斗争积极分子联系。他们把自己的斗争经验传授给这些工人，他们帮助这些工人进行组织、鼓动。

4.对老工人斗争的总结，以及对他们未来斗争的展望

自09年到现在，国企还发生了很多类似通钢工人的斗争，从山东枣庄万泰二棉罢工、河南林州钢铁厂工人罢工、河南平棉纺织集团工人罢工到去年的华润雪花啤酒武汉公司员工罢工等等，都表现出了多种工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特点。这种联合，是斗争过的工人积极分子与正在进行斗争的工人的结合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些斗争过的工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斗争动向。

首先，是这些老工人因为之前斗争的失败，打破了幻想，从自觉上升到政治化。这种政治化不仅表现在参与其他工人的斗争中，更表现在他们积极的向左翼力量靠拢。他们首先认识到文革的伟大意义，因此更加怀念毛主席，认同马列毛主义，所以积极的向同样认同马列毛的社会力量靠拢，一起进行理论学习、探讨分析现实斗争。同时，自觉的传阅一切他们认为好的文章、资料。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已经在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正象我前面说的，其实这些工人，天然就是左派，就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都具有，并不需要任何人去教育，而他们所需要的，当然也是目前任何人也无法明确告诉他们的，只是如何实现、如何夺回属于他们的主人翁地位，夺回他们的社会主义。

其次，他们积极的做群众工作，积极的参与到他能接触的工人的斗争。实际上，这些老工人通过自己的活动等于在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群众的联系和组织。同时，由于他们对对方已经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因此他们能够充分鼓动起工人的斗争积极性、制定出更合适的斗争策略，从而从被动消极的防御转向了主动积极的防御。目前对方对待这些仍然坚持斗争的老工人的策略也很明显，就是一个字：拖。确实，这些下岗工人、退休工人的生理年龄都比较大，还有可能有各种疾病，国企改制的大势也已经形成，所以不必要再象那样搞的狼烟四起，只需要拖的这些工人疲于家庭、子女的生存，拖到生理上死亡，以前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拖不过了，就象征性的解决一点。老工人也认识到这点，所

以对自己的斗争也并不抱太大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更大范围的其他工人身上，参与他们的斗争，帮助他们，传授他们斗争的经验。这样，以这些老工人为纽带的，大范围的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形成了。象通钢事件反映的是退休工人与在岗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同一工厂内的；还有不仅是同一工厂的，象武汉城市工人反对强拆的斗争。这种广泛的联系，就为工人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一起斗争，提供了现实基础。

目前，虽然大部分国企已经破产、私有化了，但是仍然还残存一些国企，而这些国企仍然在进行改制。事实上，改制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很多大型国企年年都在改制。有改制，就有工人的斗争。虽然，现在国企中的生产关系整体上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了，而且大量的工人多是派遣工和实习工，所以，这些国企工人不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他们是新工人。

二、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新工人

在讲资本主义条件下成长出来的新工人（简称新工人）的斗争前，我们有必要先简要的了解什么是新工人，新工人下又需要细分出哪些工人，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1.什么是新工人？

近些年，劳工界出了不少的关于新工人的书籍和文章，有社会学类的，如《新工人的迷失与崛起》、《中国女工》，有文学类的，如《打工女孩》等等。这些文字都关注的是新一代打工者，尤其是《新工人的迷失与崛起》一书，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给这些打工者正名，称之为新工人。其实我们工人网几年前也在做这样的工作，那么什么是新工人，涵盖了哪些群体呢？在这些书籍、文章主要关注的是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和北京的打工者，而且这些打工者都来自农村。换句话说，之所以提出新工人，主要是为否定“农民工”这个概念。但是，我认为这是不准确

的。而且官方主流媒体也开始推新工人这个概念，深圳就提出了“新工人、新市民”的口号，还为此拍了公益宣传片，前阵我去深圳，在地铁里也看到了这个口号大大的宣传牌。

在本文开头，我即做了简要的解释，所谓新工人，就是成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人。这部分工人，实际上可以涵盖了所有目前在工厂里进行劳动的群体，因为目前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工厂（只有极个别的例外，譬如象南街村这样还坚持集体经济生产的地方）。也就是说，不管是沿海地区的私人工厂，还是内地的国企大厂，譬如去年的闹罢工的川化以及紧随效仿川化的攀钢罢工工人，劳动者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所以他们都是新工人。为什么要这样定义这个概念？因为这样我们不会仅仅把目光放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群体上，也不会有先入为主的意识主导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同时消除一种可能的倾向：城乡的对立，或者国企工人与私企工人的对立。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新工人在意识、斗争要求等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一致性。

但是，新工人里，产业工人与其他工人，如建筑业工人、一般服务行业的工人，显然是不同的。最明显的就是斗争要求，前者主要是要求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而后者多为欠薪进行斗争。另外，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工人与内地开发区的工人又不完全相同。而产业工人里，甚至包括一些政府机关、警察等里面，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派遣工。

我们先看沿海地区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地区。有一个在深圳做劳工工作的同志把这里的工人划分为三类：技术工人、学生工和农民工。他是按照身份去划分的。所谓技术工人，大多出身于原国企工厂，有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历，因为原企业改制等原因到沿海地区打工；学生工是指，没有做过农活，从学校（大多数是从中专、职高等学校）直接到工厂打工的；而农民工，就是第一代进城打工的农民。而另外一个在深圳打工体验过的同志就不同意这种划分方式，他认为应该按照生产

关系去划分。即：

技术工人，是这些打工者中的上层，有一定技能、有相当的工作经验，是相对的工人贵族。

学生工就是绝大多数打工者。

主要区别是农民工。农民工不一定是年纪比较大的第一代打工者，而是在生产率比较低、机器化程度低，因而生产更强调手工技能，从而工厂里很强调师徒关系的那种类似手工作坊里的工人。这类工人由于这种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关系，因而表现出类似封建时代工人的特点，这与他们的年龄无关，年轻打工者进入这样的工厂打工，一两年也会表现出第一代农民工的特点。譬如有一种生产电动卷闸门的工厂，一般卖给停车场，用遥控器指挥卷闸门的开关，技工就是师傅，收入很高，跟老板关系也好，做几年还可以回到家乡自己开工厂，这是比较典型的农民工。

这是沿海地区的情况，这里的工人，大部分当然是农民子弟去沿海打工，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新工人是城市工人的后代。当然，一般来说，城市工人的后代一般更愿意到父辈的工厂或者周边工厂工作，但是也有少部分，父母的工厂因为改制没有了，家里生活压力较大，也会选择到沿海地区去打工。而他们与农村出来的，几乎没有区别。而内地呢？内地的工厂基本上都已经搬离了城市的中心区，而重新在城市开发区建厂，譬如西安的大型国企就基本上搬到高陵县的泾渭开发区去了，少部分则搬到了毗邻长安区的高新区。这里的工人多来自本省或周边省份，也同样有来自工人家庭和农民家庭。这些工人的劳动报酬，按实际购买率，相较沿海地区，可能会稍微高一些，而劳动条件就绝对比沿海地区好很多了，尤其是国企工厂里。我前阵去武汉，有幸住到武汉某国企的实习公寓内。通过调查，他们的工作环境没有象沿海地区工厂那么压抑，因而工人也没有达到那样完全的原子化。

另外，在所有的新工人当中还有两个很大的群体，一个是实习工，另一个是派遣工。所谓实习工就是指，人事上仍然还属于学校，通过学校跟工厂签订的协议，

以实习的名义进入工厂劳动的工人，他们从事的劳动与正式工没有区别，但是工资却远较正式工低。现在很多工厂，尤其是大厂，都广泛用实习工，因为大厂的生产相对稳定，也比较喜欢树立遵守劳动法规的形象，而使用实习工既廉价又规避了很多劳动冲突。而派遣工，或者灵活的用工方式，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而且不仅是工业生产使用，很多政府部门、警察、城管等都使用大量的派遣工。实际上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改方向就是官、吏分开，以后政府不养那么多做事的人，各类的 NGO 被政府收编、为政府分忧，实际上就是把原本公务员、警察的职能以外包项目形式包出去给 NGO 做，就也是政府主导的政改趋势。

总的来说，新工人实际上涵盖的人群很广，以前常被称作农民工的，他们的第二代，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新工人，而是被新工人包括在内的，而且他们也不仅仅只在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和北京，内地的开发区也有大量的新工人。而新工人当中，还确实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虽然数量不多。而大部分新工人已经几乎与农村的联系已经非常微弱，因为农业生产确实收入太微薄了，当然，他们还是会回到农村参加一种斗争，反抗土地被野蛮强征的斗争，譬如乌坎的斗争中就有相当的 80 后、90 后的成为主力。

2. 新工人的斗争

现在我们来看新工人的斗争。由于本人主要关注的是产业工人的斗争，对服务性行业、建筑行业的工人了解不多，所以主要探讨产业工人的斗争。

新工人当然是由第一代打工者发展出来的，那一代的打工者基本上是进城农民，而且开始还有很多是要在农忙的时候回去的，所以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兼具农民和工人的特点。当然，总的来说，这种游离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群体，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实际上也是大量劳动群众不断无产阶级化的 30 年，一方面是把国企工人的铁饭碗砸掉，变成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奴隶；另一方面就是让

农民进城也成为雇佣奴隶。但是对于第一代打工者，农业收入仍然占很大的比重，而且有不少家里只有男劳力出去打工，妇女仍然从事农业劳动。对于他们来说，可以进城打工，虽然因为户籍政策的原因不能算完全的自由劳动力，但是仍然是一个地位上升的过程，农业收入可以解决基本的家庭温饱，进城打工又能够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所以，他们在意打工机会大于劳动报酬的多少，这就压低了劳动力的价格，同时也更能忍耐残酷的劳动条件。他们对资本家的斗争是较少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越来越衰落、农业收入越来越微薄，他们也就更看重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工人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工厂转来转去，都差不多，老板都一样黑。罢工斗争也只是让自己的收入勉强满足生存，而且没有组织的斗争很难取得预想的成果，这种底线型斗争就是新工人第一个阶段斗争的特点。而一旦工人不再用脚投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定的信任感，可以进行初步的组织之后，他们的斗争就上了一个台阶，我们来看本田工人的斗争。

3. 南海本田工人的斗争

2010 年 5 月 17 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近百名员工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待遇差，停工一天。公司 5 月 24 日公布了对员工停工事宜的解决方案，但员工对公司制定的提薪方案过程提出异议。5 月 30 日，在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强力调节下，工人同意了加薪 366 元的解决方案，同时答应工人改组工会的要求。这就是南海本田工人罢工，同时受这个罢工的影响，中国的日系汽车零配件厂，爆发了多个工厂的罢工，其中一场罢工在战斗性和组织性方面特别引人注目。6 月 19 至 20 日那个周末，电装公司一群接近两百人的工人秘密集会讨论计划。会上，他们决定了“三不原则”：不工作、不提要求、不选代表；且要坚持三天时间。

这场罢工表现出几个特性。

首先，工人变得有组织，因而才能持

续时间长，甚至可以做到能罢工能复工。而之后电装公司的罢工工人，组织水平更高，能够做到“三不”坚持三天。

其次，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远高于底线，罢工是增长型罢工。

另外，工人提出了改选工会，这是开始提出社会要求。虽然，他们头脑中的工会仅仅是一个替代工人自己斗争的组织，并不是真正工人自己组织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

为什么本田工人可以出现这样的斗争特点？这是与本田工厂不同于其他珠三角工厂的工厂环境有关的。

本田丰富汽配公司在平时的生产管理中也鼓励工人的一些参与，如要求工人提交改善提案。工会并不代表工人，但会定期协助公司搞一些集体活动，如年会、旅游、生日聚会等。工人的住宿选择也比较自由，在实习期满后可以在有公司公车接送的社区租房。工人大多都是成批地从学校招聘进来，很多还是本地人，在培训和集体住宿的过程中，他们也进一步地扩大了自己的交往范围。在校期间与同学相处和交往的方式，也进一步在工厂生活中沿袭。业余时间与同事的各种主要以班组为单位的活动都是很频繁的。加之公司和车间部门组织的各种活动，员工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他们的联系途径也通过互联网得以加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QQ群等等。这样的工厂环境，让工人相对比较稳定，原子化不是很厉害，这与我前阵在内地开发区调查的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本田工人虽然是在珠三角地区，斗争也反映了一定的这里工人斗争的特点，但是因为不同的工厂环境，使得他们的组织化水平可以比较高，同时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在我调查的内地工厂工人身上得到了验证，譬如，这些工人也同样并没有通过加班来提高自己收入的意愿，这样他们就有大量的业余时间参加社会交往、进行消费，因而一旦出现斗争就会提出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要求。

而本田工人的斗争，无疑对新工人的斗争是具有启发性的，不仅仅表现在随后的电装公司工人更高的组织水平，去年欧

姆电子的工人也同样提出了工会直选的要求，而今年年初，100多个工人联名要求提高最低工资，这些都是新工人开始主动斗争的标志。一定的组织水平，还意味着，工人不再认为可以通过打工，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把自己的命运比较多的放在了共同的行动上。

本田工人的斗争带来两个结果。

首先是，由于提出了改选工会，政府和老板都会做一些表面工作去落实工会，而不仅仅是一个空壳，当然仍然会是黄色工会，工人会有机会对工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其次，受工潮影响，沿海地区工人的工资普遍提高，加速了工厂之间的竞争，加上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工厂出现了新的动向。小的工厂破产关闭、老板跑路，大的工厂逐步向内地迁移。这就引发了两类斗争。

4.对新工人斗争的展望

工厂破产，工人要求补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沿海地区工人斗争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而且工人慢慢学会了主动，最近深圳石岩的迪威信工厂更是抢在老板搬走所有设备之前就占据了工厂，阻止老板跑路，要求经济补偿。这种斗争实际上与老工人中下岗工人的斗争很相似，都是因为资本的转移而引发的斗争，而新工人也就总结了一些经验：

- 1.工人发现供应商催款，开始停工，守住设备原材料。工人本来就知道工厂经营情况，口耳相传就可以把握工厂的大致经营动向，从而可以事先发现老板可能会跑路，这比事后再求关注厉害；

- 2.分拨上访，但总有人守住工厂；
- 3.除留守工厂外还逼迫当地政府，争取外线主动；

- 4.工人坚决还击抢夺工厂设备；

另一类是内迁的，内迁之前工厂非法解雇原来的工人，到迁移地重新雇佣。针对非法解雇，工人也在斗争。

当然，这些斗争都是一次性的，因此，一旦破产和迁移大致结束，以后工人斗争的中心就会转向内地。那么，根据目前新

工人斗争的状态，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今后工人的斗争。

由于前面所讲的，随着工厂内迁，工人必定也逐渐回到家乡附近打工，就会把之前的斗争经验带回来，所以斗争中心也就必然转到内地，所谓资本转移到哪里，工人的斗争就出现在哪里。由于内地不同于沿海地区的工厂环境，相对购买力较高的工资水平，工人斗争中组织水平，斗争诉求都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加上前面对老工人的分析，新老工人的斗争进行更紧密的结合，老工人成为新工人的联系人和组织者，新工人成为斗争的主力，这是可以想见的情景。

三、总结

总而言之，中国工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斗争虽然并没有很深厚的传统，但是发展非常迅速，这种发展的背后，是工人们一次一次的斗争自我教育的结果。工人有幻想是正常的，不幻想就不会成为被统治阶级，即使斗争了也会有幻想。有幻想，斗争就会失败，失败了幻想也就打破了。所以，斗争失败不可怕，有时反而是好事。幻想打破了，继续斗争，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就是主席总结的人民群众的斗争逻辑。不过，虽然目前工人开始学会主动斗争，但总体来说还是处于防御阶段，而随着工厂内迁完成，新工人的斗争中心转向内地，我个人有一个判断：

09 年通钢事件和 10 年的南海本田罢工，是 08 年危机在工人身上上的表现。那么，由于这个阶段老工人斗争的特点：政治化和更广泛的斗争工人的联系，那我们就可以以此来对他们未来的斗争进行展望。大概 5 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再出现

一次小危机，很可能促使工人的斗争再上一个台阶，会出现多个工厂工人、多个斗争领域的工人联斗争的景象，会出现同盟罢工。因为目前工人的活动为这种规模的斗争提供了可能。首先，他们有共同的认识，认识到彼此之间的敌人是同一个；其次，有组织、联系基础，那么一旦出现合适的斗争机会，就可以瓜熟蒂落。工人的斗争会更加主动，从目前的积极防御就会进入到战略相持。

四、我们能做什么

工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斗争，有些取得了不错的斗争成果，因此也就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我们当然也不能象观察动物一样观察他们，而是一方面要学会、掌握并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把这些经验传播给需要的工人，另外一方面也促进他们的联合。对于前者，做起来是不容易的，需要剔除我们头脑中的理论框框、历史经验，学会站到工人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斗争，才能辨别哪些经验是宝贵的，是工人的创造，是值得传播的。譬如诉苦或者吐槽，其实是能有力的让工人团结起来的方法，当然，这个过程需要长期细致的工作，但是一旦工作做好了，工人行动起来就会非常坚决。而对于后者，尤其是老工人与新工人，特别是 80 后、90 后的工人的联合，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两者成长在不同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年龄上也存在代沟，语言体系都不同，因此是需要桥梁的。我们把这两方面做好了，工人的斗争和组织水平就会成长的更快，工人们一旦团结起来，我们会在他们的力量中得到鼓舞。

中国农民也会终结？

——读《农民的终结》有感



：西乡书生

之前读过法国著名实践派社会学家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一书，该书由中国知名社会学家李培林老先生所译。但对书不少的问题和现象我一直感到十分不解和困惑。

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社会学专业青年学子，我对农村有最起码的了解，再加之以往的四次下乡调查。所以，在读孟德拉斯的著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许多分析论述甚是精彩和到位，其中对于农村的生产变革和农村社区变迁的分析尤其明显。在文本中，孟德拉斯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力量（新生产工具、新植物品种、新耕作方法以及新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种谱系学式的追溯，把农村社会的整个流变作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区别于其他只会做形式推理和玩概念的理论分子，在这点上，孟德拉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是十分称职和接地气的。

在文中，孟德拉斯结合以前的学者杜比的研究分析指出，在加洛林王朝时期，欧洲完全是乡村化的，是一种封建式的地产经济（这不同于我们现在认为的房地产经济）。那时，没有任何城市，只有住满农民的乡村，农民在领主的领地周围组成村庄，领主把他的臣民限制在土地上，供给必要的生活资料和医疗条件。作为回报，臣民要偿付个人劳役，并交纳耕种的贡赋。生产工具非常落后是那个时代的特点，许多生产工具几乎都是农业劳动者自己用木材制作的，加上原始的耕作方式，据说，谷物的收获仅仅是种子的 2-3 倍。对于我们这样的现代人来说，如此低的产量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根据孟德拉斯的论述，由于那时生产工具极其落后，所以对于领

主来说，增加劳动力投入很重要，他们认为唯一的真正财富是开发土地的人。如果臣民越多，那么领地就越容易扩大。而随着领地的扩大，于是就需要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据说查理曼大帝就是基于这种情况让人草拟了《庄园法令》，在孟德拉斯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农学著作，而查理曼大帝也就成了“乡村家庭培训所”的鼻祖。在这个封闭稳定式的农业社会之中，简单的社会图示就是：个人联系，粮食种植，狭小的和自治的集体。

但是，这种社会不是死水一潭，在 11 世纪和 12 世纪，工具、种子和技术都有所改进，例如出现了更多的铁制品劳动工具，水磨也开始普及，轮作制度的确立，翻耕土地次数的提高，施肥方法也更加讲究。于是，10~12 世纪的两个世纪中，农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时期，真正的精巧农业开始逐步形成的，到 14 世纪正式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主导模式。同时，随着农业收益的逐步增加和丰富，原先封闭的乡村社会便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此时，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由于人口不断增多，家庭的份地不断减少，有些农民被迫转移出去，加之农具及牲畜比以往变得更加重要，于是，领主对人口的要求开始减弱，农民之间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拥有较好生产工具的变成固定的耕夫转而缴纳租税，而没有生产工具的则变成临时的受薪散工。不少的散工也由于农业生产对劳动工具的制造需求转而变成手工业者，同时，更加精细的农业管理工作也催生了一批专事管理者和税官。于是，除去封建主和农民外，那个时期的社會中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中间阶层，他们与

教会特权阶级一同享受这个社会更高的地位。这正是剩余产品对社会上层职业出现的推动作用。

此外，剩余产品无疑还对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并提供大量其他的非农职业。由于领地的农业生产规模随着各项创新而不断提高，生产果实不再能够被封建领主和宫殿所“消费”掉，于是就必然会进入市场进行出售，这样就产生了贸易。相当规模的贸易所得使得富人们开始热衷于追求奢侈品及美味佳肴以体现自我身份。这种食物结构丰富化结果同时反过来刺激了专门的肉用养殖行业，依托于这类相似的新副业，出现了屠夫等其他城市新职业。但是，一般来说，畜群属于城市屠宰店老板、批发商或部分领主。基于这种情况，农业和饲养业不再是拘泥于自给自足的行当，转而成为可以盈利的经济活动，而与这种经济活动联系紧密的一群人顺其自然就成为所谓的农业企业家阶层。他们其实往往是大户富裕农民、小乡绅、大领地的管理人和正在兴起的城市资产阶级。这批人其实就是具有市场经济头脑的农民，与孟德拉斯所说的传统农民刚好相反，在孟德拉斯看来，这些与市场打交道的农民企业家才代表着整个农业发展方向，是时代的弄潮儿，这就是孟德拉斯的分析逻辑。

为了证明这一点，在书中，他专门举了杂交玉米这项新技术对于法国旧式农民的终结现象。在第二部分，孟氏更侧重于论述传统农民与农业企业家的思想文化差异，然后再论证他对新式企业家的看好是没错的。

但是，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大范围地发生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要知道，孟德拉斯提的例子毕竟只是一个小国（主要是讲法国的）的情况。法国人口现在才几千万，而且他们国家的工业总体来说是处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能够产生较高的工资水平，加之私有的土地制度，这些才使得法兰西能够比较顺利的完成农业人口的转移，并实现农业的资本化经营。而现在国内很多人（不仅是学者，也有很多不读书的大学生）不顾这些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一味地鼓吹尽快实现土地

私有化，转移掉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让“新型农民”来接管中国农村。要知道这放在一些小发达国家可能问题不大，但要是放到我们国家，那么这就成问题了！这是一种急躁症和时代的狂热症状吧？

按照许多学者的理论，中国农村肯定不会一直留有这样大量小农的存在，未来一定是机械化大生产，其实，我也相信这个基本的论断，但人家的分析是有前提，如果把大前提给搞错了，小前提再完美，那也是会成问题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目前，中国至少有以下几大国情：首先，我们人口数量巨大，并且有超过一半的农业人口要顺利地转移掉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其次，目前中国的工业总体处于产业链下游，附加值有限，若是消灭传统农民，就现在的劳动供给条件下，市场根本无法为工人提供足够在城市生存下去的工资待遇；第三，巨大的人口压力决定我们国家的农业种植结构必然以粮食生产为主，不可能通过改变种植结构就实现农民的增收创富；第四，在村委会提供农业生产公共产品（主要是指水利设施）的前提下，小农的精耕细作单产一般是十分高的，若是撇开新的种子技术革命不说，大规模的机械化不一定会对单产有所提高；最后，在我们国家，土地是集体和国家所有，如果实现土地私有化，也没有办法实现整体农民的富裕，相反，就会催生一批城郊食利阶层（大量的拆二代就是例证，他们是如假包换的食利阶层），这其实就间接地推高了房价，并把巨大的地租压力分配给进城务工人员，这将进一步加剧城乡矛盾和社会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庞大的小农国家，若是工业发展不稳定或者停滞，这会出现农民无退路的情况，那解决起来估计不会是件简单事。所以，要在中国让农民终结，估计是好几辈子的事了！

当前，维持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同时加强村委会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调控能力才是正道。尽管和孟德拉斯一样，我也认为传统农民是保守和顽固的，或者说是非市场化的，但是，出于对整个社会稳定考虑，我是明确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只有等到合适的时候才有资格提私有化方案。

【编者按】绿党在熟悉工业的人的眼中一直是最被厌恶的群体之一。但国际上对很多产业的倾斜和投资却似乎在策应绿党，并因此被很多人认作是对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的遏制与要挟。诚然，不排除包括新能源投资于碳排放交易中存在这类利益纠葛，但仅从这一点显然无法很好的解释现实。

产业转型从来都是痛苦的过程。从各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可以略窥一二：即便占据天时地利如韩国，在美国的高调扶持和力挺下，仍然不得不在历史中留下黑暗的军政府时代及凋敝的民生。新能源的迫切需求将会让世界发生很多微妙的变化，本文作者正力图用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模型来解释这一切。经作者同意，先全文转载：

去工业化的问题


：天祥宋瑞

核心提示：文章里谈的是新大陆和旧大陆的各个工业化国家，请读者看文章脑补时就不要再把诸如哥斯达黎加、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印尼……之类的非主流生产力国家一起联系进来了。

关键词：工业化、制造业、环保主义、民粹

美国的去工业化形式表现和旧大陆各工业国的去工业化形式表现不太一样。美国是在制造业上过度外包，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流失，形成产业空心。逼得多数美国人民只好从金融、第三产业等领域淘金，而大资本圈仍然可以从全球产业链中获得丰厚利润回报。旧大陆欧洲部分的工业国们，则是实实在在的出来一批以环保主义为名的民粹，绑架民意改变政府决策走向，率先从能源工业开刀。加之高福利依赖人群对原有工业科技人口的稀释，也形成产业空心，配套瓦解。两边的遥相呼应，在全球掀起一股去工业化的涌浪。

人类社会在生产方式上经历了采集生产、农业化生产、工业化生产三个大阶段。人工技术干预替代自然演化，全球人口随着生产方式的改进，物质的不断丰富而大大增长。特别是在工业化时代，生产效率的空前提升，技术的空前进步，但在今天

似乎达到了一个人口和地球资源承载力的临界。其实即便在农业化时代，反感人工干预自然的也大有人在，一些古代的知识分子，提出过各种“复古”“返古”的推论，作为大道传播，其逻辑到今天亦有相当的受众，欧洲的环保民粹人群是这种逻辑在当代的显性薪火相传者之一。

欧洲作为现代工业化的发源地，一度在全球竞争中遥遥领先，自己打的不亦乐乎的同时，仍然有富余力量把全世界的旧农业化社会体系一个个干翻，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而新大陆的北美，却充分吸收了工业化的精粹，从零建设，没有包袱，发展成为凌驾于旧大陆之上的全球第一工业化超级大户。旧大陆老牌工业国沦为新大陆势力全球产业链的配套环节之后，其工业化发展处处掣肘，由早期的积极主动渐渐变得消极起来。加之之前的几次工业国间的超级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最后

一次战争人类发明了被认为可以毁灭世界的核武器，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工业国之间没有再度爆发过全面热战，虽然期间政治家嘴炮不断，小动作不断，坑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当炮灰，但真心是史无前例的和平与发展的好时光。工业化时代拥有远超农业时代的生产力，物质的大丰富使民生水准在这段时间里再次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跑步前进。那些拥有相对完善工业化体系的国家们，都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全民福利体制，一时间，发达的工业国家成为幸福的世界。

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的受惠于发达工业国的技术，全球人口快速增长就是这种雨露均沾的直接结果。先进的工业技术也被用于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化肥农药各种农用剂新型种子的使用，让世界农产品产量激增，同时也埋下了耕地退化环境退化的隐患，并在人口进一步失控增长的前提下，产生了严重的现实矛盾。

前面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形式表现和旧大陆各工业国的去工业化形式表现不太一样”。美国在战后全球布局，这大棋下的至今感觉无人能比。北美一度是全世界80%工业制成品的制造国，美元从战后到现在一直是最强势的结算通货，经济领域内一切量化都以美元为单位进行计算。美国拥有最多同时也是平均素质最好的工业科技人口，处在全球产业链市场链无争议的高端。美国资本圈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肆意支配全球资源，安排各级生产，让世界为美国资本打工。外包中低端制造业丝毫不影响美国本土上层资本势力的利益，美国的中产白蓝领们更是顺势从华尔街淘了不少金。很多本来的工业人口更乐衷于泡沫经济带来的一夜暴富机会，丧失了在工资收入基础上量入为出的生活心态。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外流，失业率抬头，华尔街的豪赌也不是次次都赢，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出现后。尽管美国保留了高端制造业体系，但是产业讲究配套，中低制造业的过度外包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

蓝领中产被迫转行于其他产业的趋势，让美国的高端制造业孤岛化了，美国社会人口在就业上也两极分化，要么就是能直接服务于大资本圈的科学家和政客，要么就是在缺乏工业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里打混甚至干脆出局。产业的分裂造成就业人口教育的困惑，高端技术产业投入高教育时间长，一夜暴富的几率低，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耐心和素质。非技术行业领域附庸性很大，和技术型工业生产体系是皮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本来美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裂痕，可美国滥用货币宽松政策使得美国国家信誉度下滑，同时的超发国债更加剧了美国的经济困窘。美国试图用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个不利局面，用机器人技术来填补技术劳动力缺口，同时也搞了一些政策要求资本圈收回外流的制造业。目前未见积极效果，原因也很简单，大资本圈从来不怵白宫，利益一致时合作，不一致时白宫听资本的。外包中低端制造业，本土保留高端的安排本来就不伤及上层资本势力的利益，又何必多此一举拨乱反正呢。至于那些被疏离了的国民，上次华尔街示威时不也没花多大代价就平息了吗，屁民的能量不过如是。产业断裂对美国国家可能是小河没水大河干，而资本可是放眼全球的，外国小河有水，美国资本上层的大河就干不了，于是今天的美国，由那个科技先进、美货倾销、美元覆盖、政治强势、军事凌厉的超级大国变成一个技术瓶颈、负债累累、手黑嘴硬、暴力无赖的超级流氓国家。

说了美国说欧洲，欧洲工业国的工业气质比较保守，优渥的福利保障让各级工业科技人口心态上比较踏实，颇有大锅饭的滋润。工业科技人口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竞争发展积累起来的宝贵劳动力资源，属于核心生产力。要教育，要培训，付代价。笨的个体人还真成不了一个有效的工业科技人口。在高福利的浸淫下，人的惰性是很容易滋生的情绪能量。

和美国外包制造业造成本土工业科技人口被稀释不同，欧洲的工业科技人口是在高福利的温室里选择了退化性发展。上世纪60年代开始席卷全球发达工业国的嬉皮精神风潮，结结实实的给这些工业国的保守社会成员上了一课，生活原来是可以这样子过的。什么国家利益、个人义务、经济发展云云之流，全是政客的阴谋资本家的阴谋以及老朽们的道德说教。工业化带来的丰富物质，价格低廉品质不错的量又足的生活资料，保守父辈们的经济积累，让很多非中上层门第出身的年轻人成了快乐王子快乐公主，思考人生成为第一精神需要，及时行乐不虞物质困乏，内外因相结合。从六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形成了“欧洲的文逼美国的嬉皮日本的宅”这个庞大的世界新玻璃心民粹人群，扎实的人民群众基础。

咨询技术的进步，产生了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全世界玻璃心联合起来从此没有距离感。传媒技术领域早已从早期的无图无真相、有图看不清进步到了高清视频惨烈直指人心如亲临现场般及其震撼的程度。传媒受众也从过去的懵懂文盲变成一帮数量庞大、经过几十年人生意义思考自由主义教育出来的新认知群体。工业化到了现在，深度人工干预和自然演化的矛盾成为最抓眼球的舆论焦点。配合被新媒体技术武装起来的大众传播力量，环保成为千夫所指的第一社会话题。

不得不说欧洲的工业科技人口在以技术为手段改善环保上做出了很大程度的努力，只可惜资本家把这一切搞砸了。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本应该是各个工业国集中讨论，以技术手段推广环保产业，修正前工业化时代造成的世界环境问题的第一次积极合作。但是撞在世界发展差异矛盾这堵墙上。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集体质疑发达工业国环保政策别有用心，欧洲工业国上层资本势力试图通过环保技术形成新一轮产业升级，将发展中国家继续控制在发达工业国的产业体系内打

工。共识难成，大会草草收场。新产业得不到市场支持，旧产业难以维继。但是战后建立起来的福利体系是各个工业国政府真金白银的庞大支出，各国本土高端制造业在中低端制造业萎缩的影响下日益尴尬，和美债一样，欧债危机也是吃人的老虎。

以环保主义为核心以草根民主为组织行动手段的绿党在欧洲甚嚣尘上，登堂入室进入政府决策圈，德法这两个欧洲重量级工业国都对绿党的要求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妥协，主要让步在核能工业领域。虽然法国政治家资本家还在争取，但德国已经率先做出了永久放弃核电的承诺，这只是一个开头。或许再生能源产业能在将来填补核能退出的产业空白，但和美国的振兴制造业计划一样，天文数字的产业转型投资从何而来呢。转型期的劳动力流失、新工业科技人口的再教育再培训、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成本，是目前状况下的欧洲各工业国政府能摆平的吗，欧洲的工业化前景扑朔迷离。

以上大致分析了北美和欧洲的工业化发展走向，美国的去工业化是资本秦桧卖国，欧洲的去工业化更像是民粹自毁长城式的内讧。受到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波及，一些蒸蒸日上的发展中工业国也产生了些许意识形态混乱，比如中国。中国曾经是最成功的农业化时代国家，遭到早期工业国的联合打击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步入科学发展的正轨，产业损失巨大。两次工业革命都没能正常介入同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引进前苏157个工业项目的基础上，恶补两次产业革命期间的欠课，交了高昂的学费，忍受了不一般的白眼。之前的补课尚未形成游刃有余的自主心得，第三次产业革命又铺面而来，好在这次面对时已经不是完全的零分学生，但是长时间的亦步亦趋确实有邯郸学步的危机感和耻辱感。和所有的工业国原始积累阶段一样，工业化的粗暴面带给我们主观感受多于温馨面。当老牌工业国盘坐在全球产业链的

高端，享受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利好。中国自下而上消化吸收了大部分中低端制造业，积累微利润铺垫我们的工业化之路，硬着头皮发展中国的高端技术产业。期待有一天，中国能坐上全球制造业的高点，成为新的产业超级大国，这是所有中国工业科技人口的理想。

发展到现在，中国工业化产能极大提高，跟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八九十年代的日本一样；父辈的积累，现实中的物质丰富，让很多社会成员有机会从生产性的直接劳动中脱离出来。中国古代是非常成功的农业化国家，一个独立的“仕子”阶层是那个时代文化的显性代表，他们当中有人成功的进入朝廷统治体系，成为权倾天下的风云人物；也有人以特立独行的卓尔不群姿态，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影响；或经济或社会地位或两者合一的优越感一直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无论清流显达，这些人的精神世界、行为模式至今为人所称道。尤其是今天，那些或多或少脱离了生产性的直接劳动的人，更是将这类古人捧高到无以复加，从而同步产生了类似的精神共鸣。

六十年代席卷全球的嬉皮精神，欧洲的环保主义民粹思想，在中国工业化平台日臻成熟的阶段，自然也就拥挤了进来。脱离生产性劳动的悠闲生活，信息爆炸的咨询影响，古已有之的超然优越感，都让中国本土的这批新仕子迅速和那股海外民粹势力结合起来。凭着各种传媒平台，表面忧心忡忡内里沾沾自喜地表演环保道德大戏。狙击什邡钼铜项目、狙击沿海 PX 化工项目一次次都显示了他们的裹挟民意，震动政府的能量。至于私底下跟风唱衰工业化发展，一有机会就大谈特谈古代农业社会之美妙现代工业社会之邪恶的民粹喽啰们，更是不枚胜举。

中国的这股去工业化之风，既不是美国大资本势力全球布局不顾本土屁民死活的卖国，也不是欧洲大资本势力寻求产业替代过程中没控制好节奏的自乱阵脚，而是真心实意的要推倒国家工业化进程，只为了实现自我优越感最大化的精神错乱行为。民粹味道最浓，反科学反人类意识相当露骨。

最后举个全球工业化下的特殊例子，北美阿米什人。“阿米什人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阿米什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组成传统、严密的宗教组织，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从军，不接受社会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帮助（百度资料）”。他们至今保持 19 世纪初的生活状态，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体系，古代工艺的手工制成品是其生活工具的全部。由于完全拒绝一切现代生活方式和缺乏跟其他人群的沟通，他们人数不多，不足 20 万。和世界上那些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到变态地步声音巨大的环保主义者不同，他们不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是最默默无闻但的确充分履行了绿色环保生活主张的一群人。中国的环保主义者从来不提他们，因为他们在舆论焦点之外，没有优越感可以共鸣和分享，跟欧洲那批庙堂之上的绿党明星不能同日而语。而且从最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于既没有王师的威慑力也没有金主的诱惑力的阿米什人，实在是不能登环保的大雅之堂啊。

可以想见未来世界的工业化之路并不平坦，机遇和挑战并存，已经成长为工业国的中国也在这个竞争的序列里。不回避，不倒退，能正面解决工业化矛盾的科学社会体系是最后的赢家。

【编者按】“我们今天怎样做子女？”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问题却不停地困扰着无数的青年。在这个经济体制大变迁的时代，家庭也随着现代化进程变得支离破碎。物欲横流的社会是否能容下真诚的感情呢？下文的作者从一个在校大学生的角度，提供了自己的思考。编者看完此文，感到发自内心的感动。因为他是这样真诚地搜索着答案，虽然真正的答案永远不会轻易呈现给任何人。不过只要开始思考了，就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

我们今天怎样做子女



：未完成的乌托邦

翻起旧杂志，一篇小说里如下文字让我有了写本文的念头：

“擦鞋店的生意是越来越好，现在人又懒鞋又多，球鞋都不愿自己洗。附近市一中的学生，课间都设法跑过来，把球鞋、旅游鞋乃至凉鞋，往蜜姐擦鞋店送。像这种著名的重点中学，但凡能够进来读书，家里父母就是把裤带子勒断，也要供孩子花钱。孩子却是没有不撒谎的。孩子们在外面，一个泡网吧一个送洗鞋子，铁定不会对父母说真话，都说是吃不饱买东西吃了，搞的父母还牵肠挂肚。现在中学生的时尚把戏家长是想不到的，男生好名牌，女生更妖精，要红指甲，要偷着穿高跟鞋……”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这些早已不是新鲜事。当然，在打电话张口要钱时，有些同学想起自己在学校的所作所为还是会感到些许愧疚的，但没过两天就又去打 dota 了，或继续淘宝，这种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气氛是个人万难抵御的。

而对于一些人，出于不必言说的原因，这种愧疚是痛彻的，由此引发的责任感会促使他们努力一阵子，或许是很久。笔者

在西电水站兼职时就遇到过几位令人钦佩的朋友。

在我们校 08 级毕业时网上有过一段视频，每人的临别寄语。一个西安本地的女生就要到外地工作了，才发现四年中没有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想到今后见到父母机会很少，不禁流下了眼泪，还说终于理解“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了。

1919 年，鲁迅写下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批判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家庭，主张子女独立，解放。时至今日，虽然还有些家庭由于特殊原因，家长还略有专横暴虐之外，中国家庭大抵已算开明自由。父母也不对儿女过多强求，只希望他们生活得好。鲁迅的理想似是实现得很好了，然而当时的“圣人之徒”们所担心的问题却出现了：父子疏隔，父母一无所有。

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可避免有交流的“代沟”。表面看来，这“得益于信息革命，不如说在于社会发生的飞速变革——它使每个人困惑，迷茫。长辈们对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领域的了解不会比我们多出太多，甚至大大不如我们，也就无从对我们进行心中有数的操纵和指导。在这种客观形势

下，子女的命运从父权掌控下解放便自然而然实现了。父母不再对儿女们颐指气使，反而百般讨好，悉心照料，以维持那越来越脆弱的危桥。

另一方面，不论是修在大学城的感恩广场，还是CCTV的感动中国，似乎都唤不回曾经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空巢老人见不到儿女们的“常回家看看”，反而觉得养生节目的主持人更可爱；空间上的距离已不再是阻隔回乡之路的主要因素，生活方式的差异使曾经最亲的人相对无言；更多的人则心安理得地选择忘记关于家庭的义务；更有甚者，因为经济问题与家里闹翻；即使有孝子真心想陪在双亲身边，每周60个小时的工作也会让他有心无力。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望月思乡。家中还有母亲“夜补衣”，还有碗热腾腾的鸡蛋面，以及童年那些难忘的经历。这些比起上司的冷眼，同事的竞争，劳累的工作，真是温馨的港湾，令人向往的天堂。但这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心情，以家庭为基础的生活在这个时代已接近破灭。

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为什么产生了如此可悲的现象？我们的物质生活丰裕了，精神迷茫却越来越严重。

要解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历史科学中来找答案。

我们首先来考察家庭的起源。家庭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从生产力发展使得人类有了剩余产品进而有了私有制开始，才逐渐产生的。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从对偶婚到专偶婚，到家长制家庭的建立，这一切的产生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或者说出于一个动因：使越来越丰富的剩余产品有固定的人继承。我们翻开现在的《婚姻法》，也还是能发现私有制和家庭的这种紧密联系。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不论是佃户还是小农，大都

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而统治阶级宣扬“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以维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国并没有西方封建时代强大的AIE（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于是家庭便成了AIE的处所：从中国古代特有的繁琐的家庭礼制中不难看出。随着历史发展，家长不仅把子女当做财产的继承人，还把他们当做自己肉体和精神的延续。而在社会相对稳定，缺乏变化的时代，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上帝：父亲；中国也诞生了数不清的“佳话”：哭竹、尝秽、卧冰、割骨……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所批判的，正是这种陈腐、愚昧的“孝道”，提倡子女的独立精神，以实现人类、社会之发展。但鲁迅批判的只是以“恩威、名份、天经、地义”为名的父权，他依然呼唤在当时实属奢侈的“爱”。而我们今天的改变，是群众思想的觉醒，还是为实际生活所迫的无奈？

当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工厂代替了农田，工人宿舍代替了农庄茅屋，杨白劳不再和喜儿一起生活，给黄世仁交租子，而是下了煤矿，和进了纺织厂的女儿天各一方，也许几年才能见一面。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金钱拥有了魔力，只要它愿意，可以把任何和睦家庭内部温情脉脉的面纱撕碎。如果我们愿意假设他们不是我们的父母来客观评价一下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就会发现他们或许善良却并不可爱，和他们的“羁绊”不过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产生的经济关系罢了。

当然，亲情还是确实存在的，好像一只从房顶上跳下来的鸡，在落地前总要拼命扑腾两下翅膀。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持续存在，家庭总构成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对每个亲属，我们都会在心里觉得，我还是应该去爱的。我们总会为“爱”的失落而长吁短叹，只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具有爱的能力。这种境况很可能还会持续不短的时

间，它注定是我们时代的症候。巴尔扎克笔下 19 世纪的法国现在看来是如此亲切熟悉。

正如前文所提到过的，市场经济愈发发达，家庭中非异化劳动的成分就愈弱。洗衣机、电视机可以代替子女，从而使子女彻底“解放”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家庭的异化正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私有制的矛盾在家庭中的发展，私有制孕育的家庭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受到冲击，最终家庭及私有制本身不可避免遭到扬弃，尽管可能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刘慈欣未发表的科幻小说《中国 2185》中描绘了人口老龄化，婚姻自由化，公共托儿所，养老院兴起伴随而来的家庭解体的广阔画面，也许真的需要很久，“亲情”才会随着人的自由、解放而重新变成一个积极的概念，而非逃避残酷现实的迷魂药和我们可怜灵魂的救命稻草。

如果认识不到我们最需要去爱的，并不是远在千里之外，巴望着能和你聊一两个小时的老人（虽然他凝聚着你的回忆，维系着一种虚假的价值），而是在我们身边每天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们，就只能把亲情永远当做一种宗教式的仪式，而失去了爱的能力。只可惜我们身边的人现在看来都还不大可爱，所以并不能治病的鸦片成了我们舒缓疼痛的唯一良药。

有些“思想转变快”的人已经不再傻乎乎地“前现代思维”，但他们永远无法体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另一部分人却在自责、焦虑中煎熬着，“背着因袭的重担”；我们呼唤“新人”，只有他们能“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下一代到光明的地方去”。

注：文章来自某社团的独立文学杂志《白夜》。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编者按】作者所见未必深刻，但也算击中今天的现实。今天各色的——左的右的前的后的——“启蒙”工作，说到底，其实就是将革命话语或反革命话语建立在人们心中。只是革命话语的重建是较之于其余话语为难的。因为革命失败过，反革命的反扑太厉害。也许作者满篇“革命”、“无产阶级”的重复，以及最后口号式的呐喊正反应了这种无奈。然而，编者并不从这样一种消极的角度来理解，编者认为呐喊也是重建革命话语方式之一种，今天我们连呐喊也属稀缺。是焉？非焉？

解构时代的革命话语重建



：迅行

戴锦华在谈到《钢的琴》这部电影时，说：

由于 20 世纪历史创伤与教训，人们反感统一的命名，反感新的暴动与压迫。所有的社会压迫只能以少数人名义。我曾经用了很长时间翻译墨西哥符号学副司令的东西，“工人们，农民们，船员们，学生们……”称呼占一页半，他们没有一个有效的命名，今天被剥夺的是多数，多数却没有一个集合名词，直到占领华尔街爆发，多数之名出现，最多出现的口号是“We are the 99%”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面具，出现了“V 字仇杀队”，电影中的造型成为人们反全球化运动所采取的符号。在二十世纪人们集体反抗的形象，再度出现。

从革命的历史叙述看，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反革命消解革命价值、消解革命话语的表现。“阶级”一词不再被广泛的运用，而代之以羞涩的、和稀泥的、分化的“阶层”一词。阶层所指示的，其实就是“工人们，农民们，船员们，学生们……”，将被剥夺、被压迫的 99% 消解、分化在阶层的、行业的小利益群体之中。固然可以说，这是资

产阶级及其走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耻的理论炮制，以此掩盖 1% 与 99% 的根本性的矛盾，然而，作为 99% 的那部分人，是不是也应该为这种解构负责任呢？或者说，这 99% 是不是也赞同这种解构呢？

也许这 99% 的人不愿意承认，我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阶级”一词，以及整套的革命话语被抛弃与被解构，并不是资产阶级单方面为之的，甚至可以极端的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扼杀掉的。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从主观愿望出发背叛了革命，而应当说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诱骗之下，丧失阶级自觉，从而认同了、支持了、参与了解构的历史的开创。

然而，当今天的现实的斗争，要求 99% 的人再次团结起来的时候，原有的革命话语似乎丧失了号召力与组织力，人们在寻找新的对 99% 的人的说话方式，包括“We are the 99%”在内的新的口号便产生出来。同时，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这些新兴的“革命话语”其实是很虚弱的，它可以激起人们一时的革命热情，却不能持久的指引人们在现实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也不能让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成果与失败教训积累起

来。查问其究竟，我认为，是因为这些新的革命话语背后并没有一整套强有力的理念基础，而仅仅是些登高一呼的革命热情的暂时聚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现实的压迫依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为什么革命理论、革命话语竟如此轻易的便被解构、瓦解了呢？而在这种解构与瓦解之后，重拾的道路却又如此艰难？

这个问题的回答，说来也是简单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真正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应当说，二战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广泛胜利，并不是无产阶级整体作为革命主体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效组织的胜利。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队伍，依然没有从反抗的本能，走向革命的自觉。因此，20世纪末21世纪初，好不容易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打下的红色江山，瞬间崩溃。崩溃之时，我们甚至看不到有规模的无产阶级的自觉反抗，我们看到的几乎全部是欢呼雀跃。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资料的转移、无产阶级队伍的瓦解、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普罗大众无休止的苦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要阶级压迫的现实基础还在，阶级反抗的力量就将不断的酝酿、积累。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但是，哪怕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也在这样一个时代显的茫然了——这是一个蒙娜丽莎忽然长出了两撇胡子的时代。艺术家较之革命者是敏感的，也比革命者轻松，当达利笑嘻嘻的画上那两撇胡子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揭示了接下来的时代的特征：解构。革命者是不善于面对这种状况的，革命者哪怕面临刀山火海，也能有无所畏惧者勇往直前，但是，面对一个革命等于开party，斗争等于瞎胡闹的，游行等于狂欢节的时代，革命者迷茫了。资产阶级敌人并没有凶恶的扑过来，而是对革命不理不睬；革命思想的传播不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而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同盟者忽然都消失了，所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能够联合起同一行业的人，联合同一利益群体的人，似乎已经是很不小的功绩了。然而，这种联合是没有力量的，他们只能诉求压迫者的点滴的施舍。这就是这样一个既不是革命的年代，又不是反革命的年代的悲哀，今天是一个：不革命的年代。

无产阶级作为整体要成为革命的主体，在某些唯心主义者那里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庸俗的人性理论将99%的人污蔑为只懂的吃喝玩乐的群氓，他们认为这99%的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不过是今天“没有面包——要面包”的应急反应。那么，无产者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真正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呢？回望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说：曾经的无产阶级起来过。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上的无产阶级的站立，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卓越工作的成绩。那么，我们希冀的那种无产阶级自觉的起来的情况，是否可能呢？我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如何迈出这第一步呢？

答曰：重建革命话语。

说起来简单，但是，的确如此。丧失革命话语，其实是丧失了另外一种阐释世界的方式，也丧失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的世界只能单一的阐释、单一的理解——无疑，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统统都是在一种阐释方式下诞生的，这比现实的压迫来的更为凶猛，为什么呢？倘若世界的阐释是多方面、多维度的，现实的苦难必将在各种对世界的阐释与理解中寻求出路，以求苦难的消灭。但是，如果其余的路全部堵死，那么，现实的苦难就将永存，一个个没有团结起来的无产者，只能在苦难的相互转嫁中度过一生，一切都将被阐释为：风水轮流转、运气、命……而包裹成团的资产阶级就在教育资源、媒体资源……的绝对垄断中，获得阶级地位的不断牢固。无产者想要打破这种“天命”，唯有团结起来斗争，而这种团结的机制，

首先开始于革命话语的重建。

由于革命年代的苦难，或者说由那一代狂热的革命者造成的苦难被无限夸大后，人们的确是排斥革命话语的。而革命话语的重建只有两条路：一条曰回去；一条曰开创。回去，就是说革命者应当重拾我们曾经的革命话语，逆潮流而动，重新操起革命话语，并积极运用之。资产阶级及其控制的媒体总是避免曾经的革命话语出现，一旦出现马上冠以“文革余孽”的恶名，然后打击之。这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具有鲜明且敏感的阶级自觉，另一方面则说明他们对革命话语、以及革命话语背后所代表的正义的力量是多么的恐惧。革命者完全不需要理会各种嘲笑与污蔑，坚持以革命话语写作，坚持以革命话语解释历史，坚持以革命话语重建当下阐释。

又何谓“开创”呢？开创从来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神启，而是回望历史、面对当下的新的道路的开辟。革命如此，革命

话语亦如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发展，还是解放哲学的新的实践，无不是新的革命话语的重建过程。这当中不可避免的有失败，有误入歧途。但这都不要紧，从大处讲这本来就是一个重建革命话语的时代，从小处讲我们今天的实践也恰恰是参与了大时代的洪流，我们也许也将成为失败者，也许也将成为误入歧途者，但我们将依然背负的是伟大的人类解放的潮流。我们将要走的路是新的路，我们将要说的话——或正在说的话是新的话。唯有在这种无所畏惧的，大踏步的前进中，我们的将要说的话，才能是我们实践的凝聚力量。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

没有革命的话语，便没有实践革命的革命者的联合。

踏着前人的血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12年6月

曼德拉、非国大和南非，几点随想

：侯镡祚



看到新闻，曼德拉病情严重即将去世。此人是世界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斗士。不过仔细考察一下南非历史，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

首先，南非的种族隔离是怎么形成的？是否只是“种族”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否。根据学者的研究，1920年代的南非和同时期的世界其它地区一样，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浪潮中，发生过被南非当局镇压下去的白人工人起义。种族隔离制度，首先就是为了驯化南非的白人工人，亦即把白人工人变成黑人工人头上的“人上人”，把能够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和不那么需要体力的工作留给白人工人。

其次，南非矿业需要进行巨额资本投资，因此南非矿业资本必须通过极力压低

矿工的工资以保证获得利润，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是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黑人永远成为廉价劳动力，南非矿业资本家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这些廉价劳动力，以及由此保证南非资本家尤其是矿业资本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因此南非资本家尤其矿业资本家非常需要黑人工人，并且也只有黑人工人能够充当这样的廉价、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劳动力。事实上，有些南非资本家“反对种族隔离”正是为了使用低工资的黑人工人取代工资较高，福利较好的白人工人。不仅长期执掌南非政权的荷裔白人如此，根据南非学者赫里伯特·亚当（Heribert Adam）的调查，被国内某些自由主义学者捧为“反种族隔离斗士”的南非英裔白人资本家，恰好是出于保证廉价劳动力供应这个目的而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换言之，在南非，种族隔离是资本主义的配套制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反对种族隔离和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问题。只反对种族隔离而不反对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真正改变广大黑人底层群众的命运。而这正是曼德拉和非国大，尤其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后的态度和具体措施。

当然，即使是这样，也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也就是在抗争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种族”变成了抗争的主题，“阶级”被淹没了。但是学者的研究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比如美国学者盖伊·塞德曼（Gay Seidman）研究南非工人运动结果是，在旧南非末期，阶级已经取代种族成了南非黑人抗争的主题。这种抗争不仅包括了要求改变黑人的被隔离地位，而且包括了世界

其它地区工人阶级抗争的一切内容，亦即通过政治的，非市场的手段获得工资以外的，能够使工人满足需要的收入。用塞德曼自己的话说就是“完整的公民权”——也就是除了一般的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之外，还包括了获得各种福利保障的“社会权利”。这种抗争已经不仅是对工人自身劳动条件的抗争，南非黑人在抗争中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处境与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的抗争诉求在抗争过程中，南非黑人工人已经提出了通过非市场的政治手段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诉求。这些诉求很显然远远超出了种族范畴，和新自由主义更加是水火不容。而且，抗争种族隔离的过程中，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Cosatu）结成了政治联盟。这样一种政治联盟的诉求，显然是不可能只停留在一般的市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新自由主义上面的。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些组织已经提出了相应诉求。

南非转型之后的情况又是怎样呢？首先，一旦南非转型成功，获得政权，非国大转向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正是新自由主义。南非转轨刚刚开始的时候，非国大左翼、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推动非国大和曼德拉将这几个组织联合制定的“重建与发展纲领”（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作为新南非政府的基本纲领性文件。这个纲领本身包括了各个方面的内容，既有诸如国有化，各项社会政策等，也有新自由主义的内容，例如财政紧缩、提高国际竞争力、建立“独立”的储备银行。但是，在南非官僚和资本家，以及非国大政客等的联合抵制下，这个纲领中的非新自由主义内容，例如社会

政策和国有化等，完全没有得到执行，其中的新自由主义内容则相反。而且南非政府还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制定了另外一份新自由主义性质的发展计划以取代这个纲领。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已经在智利、美国、欧洲、日本和世界其它地区造成那种状况，亦即社会分化的全面、急剧扩大，在南非也发生了作用。这对于广大黑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其次，结束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共产党，就和南非工会一起反对非国大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不过由于南非共产党仍然坚持和非国大结盟，这种反对软弱无力。因此，真正从南非“转型”中受益的，实际上只是一小撮黑人资本家和非国大权贵。这样一个南非，显然不是当初黑人抗争的目的所在。

不过，公允地说，现在国内一些人诟病的所谓南非“治安问题”，或者其它工业等方面的问题，倒不能说是曼德拉和非国大的问题。因为南非种族隔离下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已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告一段落了——事实上南非的工人抗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 20 多年的沉寂之后重新高涨的。而且南非的相当一部分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本身就是服务于南非在冷战期间作为西方在南部非洲的前哨基地，此外，我想所有人应该都清楚，旧南非那样的只为极少数白人和所谓“国际市场”服务的经济是多么脆弱，事实上早在旧南非末期，南非经济就已经出现危机了。旧南非的经济繁荣本来就只是一个虚幻的表象，种族隔离结束意味着这个表象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这个表象所包括的各种落后与贫困没有得到改善，并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如此而已。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与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右边的基路伯

以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为代表，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德国法西斯的民意基础是中产阶级（的跌落），而非无产阶级。我本人是非常同意这一看法的，但是弗洛姆对于这种民意基础的解释并不透彻，只是泛泛地说，即使在经济危机下，无产阶级也没有什么可再失去的，而中产阶级却接受了较大的损失，其被剥夺的感受反而比无产阶级更强烈。这种解释总让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软弱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于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和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有了一些认识，借此文做一个粗浅的阐述。

一、中产阶级的保守性

中产阶级的保守性不同于资产阶级的保守性。理解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要从两个特点入手，一是中产阶级拥有体面的生活，二是中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依附性地位。仅仅体面的生活并不导致中产阶级式的保守主义，资产阶级当然更加拥有体面的生活，但是资产阶级掌握自己（和别人）的生产资料，拥有变革的主动权，很多时候倾向改变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同时也改变了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以减少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资产阶级热衷于这样的变革，这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中产阶级却总是担忧这样的事情出现，因为他们并不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中产阶级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庸、仆从与打手。

赤裸裸地讲，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是由中产阶级乃是“坐稳了奴才的人”，尽管

社会结构日趋分化为“奴隶”和“奴隶主”（及其管家、打手），但中产阶级安于“奴隶主”的管家、打手的位置，既不想当“奴隶主”（这有风险），也不想颠覆这一社会结构（这更有风险）。

一旦社会出现普遍的危机，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的位置，他们的思想却还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仍然是中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的追求并不是打破“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结构，而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因为他们的追求只是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所以他们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从中产阶级位置排挤下去的人。而造成他们被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

二、“一亿总中流”的现实基础

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建成了所谓“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人口，像日本这样的干脆自称全民中产，即所谓“一亿总中流”（日本总人口也就一亿出头点的样子）。对于这一现象，广泛流传的庸俗说法称这是通过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结果，然而巴菲特一句“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却无情戳穿了这一说法。

发达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印象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问题在于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法国，累进税率只对工资性收入执行，最高可达 45%，资本性收入却执行单

一税率（15%或20%），因此资本家的税率比大部分中产阶级都要低。再加上各种合法避税手段，巴菲特说出“我保姆交的税都比我多”，还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最近就打算对资本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视同仁采用累进税率征税，边际最高达75%。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尿性，相信不久之后，要么这项政策不了了之，要么他被轰下台。

然而，这样一来，所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再分配“劫富济贫”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是资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穷人手中，而是中产阶级的财富转移到了其他人手里。如果我们仍旧在国界线内分析中产阶级，那我们就只能认为这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使得虽然占人口99%的非资产阶级群体只分得20%的社会财富，也足以支撑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

可是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不是自然经济，是为了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生产。商品经济的商品必须卖出去，自然经济的产品堆在仓库中却完全没有问题。商品经济下企业的产品如果卖不出去资本家就会发愁，就会付不出工资，资本就无法循环、增值，就无法实现正常的经济运转，就会经济危机，自然经济下“朱门酒肉臭”却是家大业大财富充盈的表现。

也就是说，奴隶主不需要奴隶的购买力，地主不需要农民的购买力，但资产阶级却需要无产阶级的购买力，这一经济生活中根本性的不同常常被现代社会的人们熟视无睹。

因此，自从产品生产的目的从使用价值变变为交换价值，自从雇佣劳动代替了奴隶劳动、个体劳动，缩小贫富差距就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了，而是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保证。

因此，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如果一个经济体内分配不公，必然会导致购买力不足，使得经济循环停滞，所以资本主义天然有扩张的倾向。在它的早期，他对外输出商品，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反其道而行之，对外输出资本，利用外国更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产品，返销国内，

通过压低商品价格的方式，也变相提高了国民收入，解决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在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情况下，终于建立了中产阶级社会，这也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了对外剥削，尽管分到的只是垄断资本吃剩下的。这样一种不损害资产阶级利益的中产阶级社会，是非常不稳定的。

三、中产阶级社会的瓦解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建成并没有侵犯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对外剥削的方式，分些残羹冷炙给国民。

这其中其实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找个形式给国民发钱，二是如何保证一定能成功对外剥削，并分给国民。前一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就是高度膨胀第三产业，其实我们仅仅从产业链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能解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社会的秘密。第三产业号称广义的服务业，其存在是通过服务第一第二产业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可是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第三产业所服务的对象远远不止本国的第一第二产业。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链总是打破国界线的，在整个产业链条内部，实体经济企业拿小头，虚拟经济企业拿大头，实现了对外剥削，而发达国家给本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发工资的时候，就是在给他们分一杯羹。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要结合各国实力的消长来讨论。在苏联解体前，受到工运和共运的影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要建设福利国家、中产社会，以缓解国内革命的压力，就像俾斯麦曾经说过的那样：

“一个希望得到养老金的人，一般不会好斗，而且易于管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渐进走资，这种共运的压力骤然减小。

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没有沦为西方的经济殖民地，相

反一直保持经济产业的全面性和独立性，这两年在非洲、南美开采资源租田种地，隐隐有了对外资本输出的味道了。也就是说世界体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挤进去了一个庞然大物。殖民地完全不够分了，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能够从国外剥削来的份额逐渐受到挤压。

对外剥削受阻，同时有没有共运的压力，自然首先是削减分给国民的残羹冷炙，而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旧的社会逻辑一下子就失灵了。在老牌发达国家，原先收入差距并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原先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是了；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能源不足原先都不是中产社会的障碍，现在也是了。美国的劳工组织抱怨中国抢了他们的岗位，这种看法太肤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中产社会并不依靠这个或那个工作岗位的存留与否，而是对外吸血能力，工作岗位只是分剩饭给国民的形式而已。中国抢走的是美国的殖民地，抢走的是美国能从殖民地那儿吸来的血，而不是某个具体行业的“岗位”。

四、形左实右的民粹思想

但是既然中产阶级是“坐稳了奴才的人”，那么中产阶级的跌落所带来的本能反应就绝不会是打破不公平的社会体系，而只是追求回到管家和打手的位置上来，所敌视的对象不是“奴隶主”，而是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人。而把他们排挤下中产阶级位置的，有时候是国内部分无产阶级的上升，有时候是外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劳工组织中或许并不是没有看得清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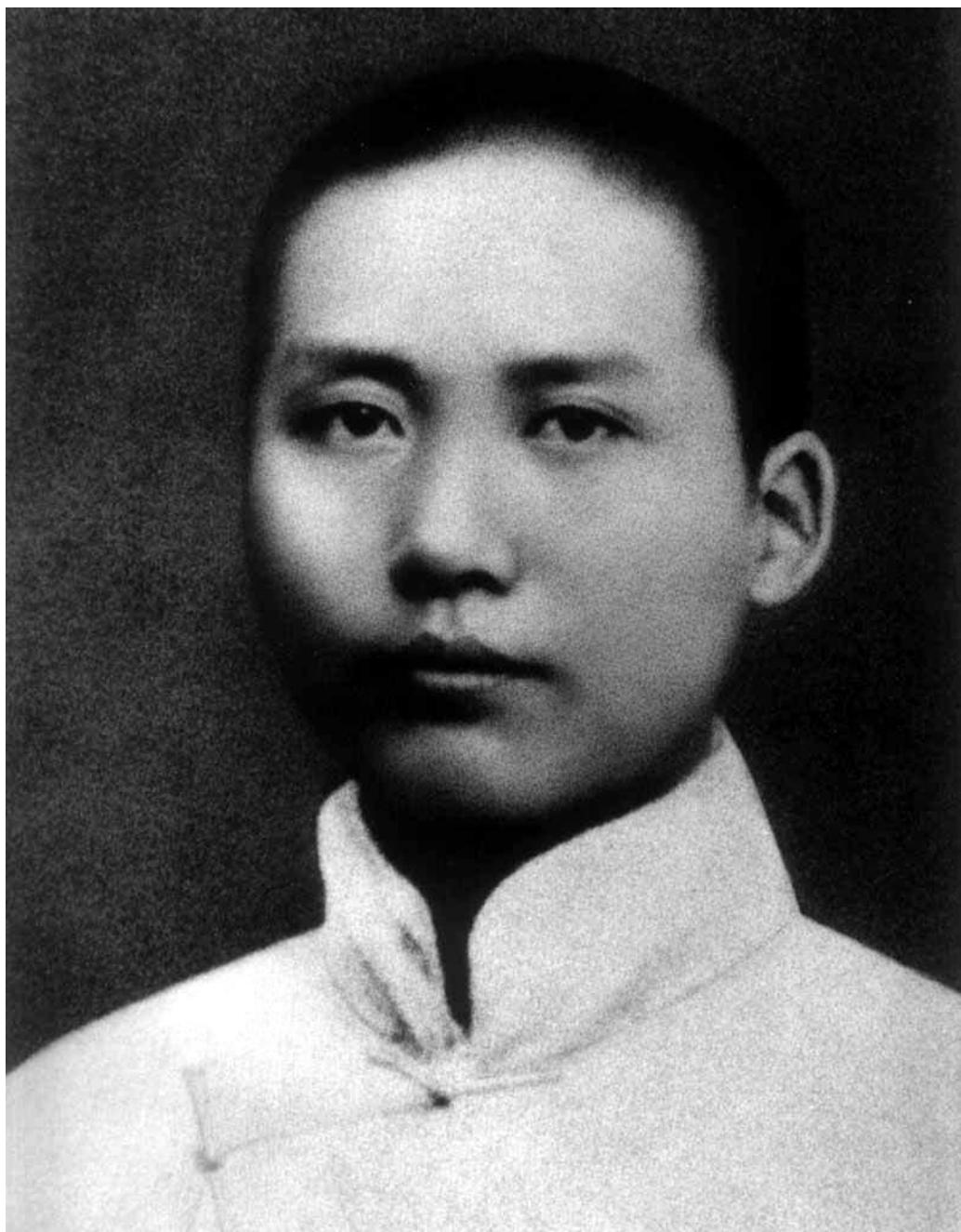
实的人，但中产阶级化的美国劳工也只能将枪口对准中国劳工，而不敢声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

这样一种排斥产业转移、阻挠资本正常流动、甚至反全球化的民粹思想经常被斥为左派幼稚病，但是细究起来，却有着转化为极右思想的倾向。因为这种中产阶级的保守性，而愈发倾向将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表现为民族矛盾，将矛头指向他国的无产阶级，最终支持政府强化对外扩张多给自己分一杯羹，演变为帝国主义的民意基础。

德国中产阶级的跌落，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转化为纳粹的民意基础的。而上海、香港、台湾等地的主体意识甚至独立倾向的增长，也是类似的原因，大中华其他地区逐渐崛起不再成为以上地区的“国内殖民地”，导致本地中产阶级社会逐渐难以维系，而沪港台等地的跌落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将问题的症结认定为外地或大陆的剥夺。

在大陆还很穷，还在做台湾的经济殖民地，提供屌丝被剥削的时候，台湾的独立倾向不成气候，大陆崛起了，矛盾却越来越大。ECFA 签订了，台湾的资产阶级赚得彭满钵满，台湾的普通屌丝却更受冲击，ECFA 反而成为民进党拉拢中下层的助推剂。

同样，港独思潮在大陆崛起后才逐渐强化起来，上海人的主体意识在改革开放后曾经历过一个消融的时期，但是最近十年却又强化起来，在时间表上恰好与国内的产业转移、人为制造的福利高地的破除相吻合。



1919年的毛泽东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恩格斯

让青年们觉得他们是左翼，比让他们觉得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到证券交易所谋个职位要好得多。

——霍布斯鲍姆



罗莎·卢森堡

硝烟后的双眸

——浅论阿尔都塞及其哲学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

1990年10月22日，一艘从尤里姆街起航，在广阔的孤独中漂泊了十年之久的“愚人船”终于触礁沉没。阿尔都塞，这位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巨人，用第二次死亡，宣告了一段伟大历史的终结。

“路易·阿尔都塞穿越了那么多生活——我们的生活，首先是穿越了那么多人的、历史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冒险，以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存方式、言谈方式、教学方式所具有的辐射力和挑战力，改变和影响了那么多话语、行动和存在，给它们打上了印记，以至于就连最形形色色和最矛盾的见证也永远不可能穷竭它们的这个源泉^[1]。”德里达在阿尔都塞的墓前如是说。

然斯人已去，其业犹存。无论是1980

年的符号性死亡，亦或是十年后的生理性死亡，都没能让阿尔都塞主义“沉入茫茫的黑夜之中”；在历经两次浩劫之后，哲学家的幽灵却获得永生——它在每一个沉寂的夜晚里返回，在每一个理论的断裂处现身。

作为一个“以生命为代价来思索”^[2]的思想家，阿尔都塞留给后人太多的疑问与争论。写作本文的目的，在于结合文本，针对阿尔都塞的哲学以及相关理论谈谈自己的看法。姑且以这杯薄酒，来祭奠逝去的英魂。

一、哲学与科学

康德曾经说过：“形而上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一致，反而成了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似乎本来就是完全为着各种力量在战斗游戏中得到操练而设的，在其中还从来没有任何参战者能够赢得哪怕一寸土地、并基于他的胜利建立起某种稳固的占领^[3]”；无独有偶，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大师黑格尔认为“从事哲学犹如陷入伏兵四起的深渊”。这些斯巴达式的宣言似乎在提醒人们，以本体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并非像其自我表述的那般，是作为“整一”的、自为的存在，或作为一切科学之先验基础的“第一哲学”；恰恰相反，哲学是一块硝烟弥漫的战场，是发生在哲学家之间的、用语词打败语词，以概念战胜概念的无穷斗争。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

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4]。”恩格斯的这一论点，长久以来为哲学家们所诟病，他们认为，这是过分地将哲学简单化了。但当我们跃出哲学的话语圈，从而到达哲学的外部的时候（尽管哲学家们认为哲学无所不包，不存在外部），我们就能够看到，哲学的包罗万象只是内在于哲学话语的，也就是说，哲学的丰富是内容的丰富，而非形式，或说立场上的丰富：就如两军对垒，战场会根据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乃至多线作战，但相互厮杀的，也不过是对阵双方而已。

在恩格斯之后，阿尔都塞更是进一步指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内的阶级斗争^[5]。”

显然，这一论点将引起书斋里的那些“人类的公务员（胡塞尔语）”的不满。无论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亦或是叔本华的意志世界——古往今来所有自成一家的哲学流派，都自称以追寻世界的（最终）真理为己任。哲学，似乎就是那道“普照的光”，毫无偏见地照亮了尘世的每一个角落。但遗憾的是，“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6]”。哲学亦不例外。为此，我们不妨将视线从它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移开，穿过历史的走廊，对“卧房里的哲学”作一番考察。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至 1711 年，那一年，逻各斯的统一王国在“休谟问题”的起义之下，分崩离析，进而引发了康德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究其本质，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哲学对于“何谓真理”这一命题所进行的最为彻底的自我反思：世界的内在统一性（其真实与否留待下文讨论）遭到了最为有力的怀疑——因果律被事件发生的线性时间所推翻，科学真理为经验归纳的无效所背叛——休谟的釜底抽薪甚至使得科学的宝座摇摇欲坠。

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自古希腊哲学以降，哲人们都在围绕着本体论，这一兵家必争之地，展开激烈的拉锯战。所谓本体论，即认为在纷繁的表象之下，存在着一个超出经验世界的内在秩序——关于“是（being）”及其衍生范畴的最为普遍的规律、知识——对现象世界加以统一。它可以是绝对精神，可以是逻各斯，囿于客观唯心主义的窠臼之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身处不同时代的哲人而言，他们所接触的表象无疑也是不同的，举一个蹩脚的例子便是，捧着经书的奥古斯丁和抽着雪茄的萨特，他们的感性世界是不可通约的。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论点一：不同时代的哲学是具有各自的时代特点的。

是的，论点一不过是对马克思“哲学是其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庸俗表述，意在说明，所谓“世界的内在统一性”是值得怀疑的。在二十一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看来，信息技术的出现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的一环——毋庸置疑，这对于黑格尔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即便是相同的语词，也因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而承载着不同的内容。而另一方面，主体只能够思维他能够思维的客体，而客体的具体内容，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按照传统哲学的逻辑，本质即是“洞穴”中光影的原型，众多现象的基础，是存在物存在形式的尺度。我们发现，一旦引入历史与社会的维度，形而上学谈论的本质便失去了所指，沦为僵死的字符。

进而我们可以提出论点二：不存在超出具体的历史存在的所谓本质。

论点二的提出，使得另一个问题浮出水面，究竟何为本质？在分析哲学看来，所谓本质，归根结底就是现象：假若形而上学的所谓本质是超出人类的经验世界的，关于它的一切言论都将是无意义的，这已然与先验的假设相悖。正如科恩所说的：“当且仅当对事态的解释证伪了如果人们缺乏这种解释就会自然给予它的描述，

那在现象和实在之间就存在一条鸿沟^[7]。”无疑，这一反本体论的立场是现代科学对于哲学的馈赠。

随之我们可以提出论点三：对人类的认识而言，不存在非现象的本质。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主客统一（而非同一）是无可争议的。没有外部的物质空间，人就无处容身，也就无法存在；没有外在客体，人也就无法作为主体进行思维与言说。鲁迅曾说：“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8]。”先于存在物的所谓“存在”，不过是存在物的抽象，是语词，而非实体。“当我们说出感性的东西时，我们也是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东西来说的”、“（语言）具有这样的神圣性质，即它能够直接地把意谓颠倒过来，使它转变成某种别的东西^[9]。”即是说，任何拥有具体含义的实词本身就带有普遍性的意味。而另一方面，人作为象征的动物，无法脱离语词来表述外部世界。可以说，语言的这种特性，构成了唯心主义语言学上的起源。语言的在场意味着物的缺场——“语言是对物的谋杀（拉康语）”——从而使得概念脱离物质而独成实体，使得脱离经验、依靠纯逻辑推演的形而上学有了栖身之所。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人类意识的发展，是在对物质世界未知虚空的扩荒行动中才得以完成的：从以太到原子、夸克，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人类通过改进观测、生产工具——这些延长的器官——在同物质世界的辩证运动中捕捉到更加丰富的物质现象，加以研究总结，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运用于实践。就在这样的螺旋式“循环”中，现代科学才终于得以从神学与哲学的“沉思冥想”中突围，使得本质论沦为无稽之谈。

此时，我听到了来自 1711 年的哂笑——休谟的问题是：由归纳法得来的“真理”

如何保证一定适用于将来？在我看来，这就像在嘲笑一只青蛙看不到静止的蚊子一样——这种嘲笑本身就是可笑的。为此我想作如下唯物主义式的说明：其一，人类的认知结构决定了未来的不可确知性，现有的一切因而向未来敞开。而休谟们正因此受益，才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其二，对未来的保证与确知，意味着绝对知识的获得与认知的停滞，即思维的消亡，进而意味着人的消亡。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恐非困守于硬盘信息之中的计算机莫属；其三，科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像哲学那样构造（虚构）一个体系，而后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它，从而规避一切批评与质疑。可以夸张地说，科学渴望着被新的论据所推翻，渴望着那第 101 块石头飞向天空，一去不返——科学史上的每一次危机，都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物质领域向人类的意识敞开，借此，科学得以完成了质的飞跃；其四，休谟的问题隐含着科学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也是认知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可以说，科学是在将业已存在于客观世界的规律象征化的行为，而后者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会逐渐向人类显现——通过科学理论向技术，即实践的转移，完成一次螺旋式的循环。

事实上，诚如列宁所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斗将是无休止的，科学的（某种意义上说，唯物主义的）弥赛亚，只有在消灭唯心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之后方能降临。因此，以上论述并不意在说服顽固的唯心论者，而仅仅想要通过唯物主义哲学，这一意识形态的传唤而成为主体，从而占据那个虚空，那个立场，让自己得以言说、得以斗争的立场。

以哲学（形而上学）的方式参与哲学论战的无休止性，其根本源于哲学对象的特殊性——在历经如此繁琐的言说之后，我们终于要请出阿尔都塞了——“在每门科学都有一个实在对象的意义上，哲学并没有一个或一些实在对象可以作为自己的对象^[10]。”

太一，整体，存在，绝对精神，真理……作为哲学对象的上述范畴，最为抽象、最为一般的范畴，一旦跨出了哲学的大门，就不再能够成为其他任何学科的研究对象——经验世界里并不存在这样的对象。对于实证性（即可利用实验手段加以验证的）的研究而言，传统的哲学命题（正如阿尔都塞所说，哲学总是以“独断的”命题形式展现自身）是既无法证明亦无法证伪的。

既如此，我们能够指望从哲学无尽的喧闹中得到些什么呢？阿尔都塞给了我们以启示，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哲学，总是将自己同道德、法律、文学、宗教相区分，从而作为哲学完成自我生产。但是哲学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有别于神话、宗教、道德或政治劝诫，以及审美），其绝对前提是它自己能够提供一种纯粹的理性话语——可以说，这样一种理性话语的模型，哲学只有在现有科学的严格话语中才能找到^{【11】}。

在形而上学看来，自己是作为科学之科学的“第一哲学（亚里士多德）”，而科学对于经验现象的研究不过是雕虫小技。世界的真理需要逻各斯的言说，而哲学，就是真理的布道先知，它代表真理而言说：例如斯多葛学派认为，如果哲学是一块田地，那么逻辑学就是它的围墙，而物理学不过是土壤，伦理学是它的果实；在笛卡尔看来，如果哲学是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它的根，主干是物理学，主干上生长出来的枝干则是其他各门科学……这样的论述，在哲学史上比比皆是，就不多加转述了。

哲学把自己从实在科学及其对象那里严格分离出来，并宣称自己就是一门科学——当然不是作为普通科学（这类科学并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而毋宁是作为最高科学、诸科学的科学、关于人和科学的先天条件的科学、关于那种能够把所有实在科学转化为单纯理智规定性的辩证逻辑的科学，等等。……然而在它自己的话语内部却出现了颠倒：哲学话语一改它对科

学的屈从姿态，而把自己作为“哲学”摆在科学之上，僭取了高于它们的权力^{【12】}。

尼采曾说，“哲学……就是在冰雪之间，在高山之巅自由自在地生活。”他道出了部分真相：有史以来，伟大的哲学家们总是站在科学的山巅之上睥睨世俗的——我们在柏拉图与希腊数学之间，在笛卡尔与伽利略物理学之间，在康德与牛顿力学之间，在胡塞尔与公理学之间，都能够看到这位俄狄浦斯弑父的被压抑的真相。

借用一个地形学的隐喻：哲学总在试图同科学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更确切地说，哲学永远只能在科学的占领地之外夸夸其谈——无论是传统形而上学，还是近现代哲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宇宙论，精神哲学弃哲学而去，而投入物理学、心理学，即诸科学门类麾下。而沦为孤家寡人的形而上学，则戴着自己纸糊的王冠，惴惴不安地将屁股紧贴在镀金的王座上：虚君尚存，根本上是由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成为科学的对象，上文已经论及，此处不多加赘述了。

那么，哲学在科学领地之外的夸夸其谈又意味着什么？

笔者在上文写道：“人类意识的发展，是在对物质世界未知虚空的拓荒行动中才得以完成的。”而每一个未知虚空的开启，都将引来实证科学、诸前科学理论及哲学的激烈争夺。只有当实证科学在相应的领域战胜了其他二者、站稳脚跟时，我们才真正有可能填充这片新的虚空——在巴什拉和阿尔都塞看来，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断裂”。

在这场争夺之中，在哲学与科学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下述的几种情形。

（1）唯物主义的、讲求实证的哲学对科学的辩护

（2）形而上学、唯心主义乃至机械唯物主义、目的论的唯物主义等诸多哲学对科学的盘剥

（3）哲学流派围绕科学采取的不同立

场而展开的对抗

显而易见，哲学是好战的，而那位引发战争的海伦，便是科学本身。正如阿尔都塞说的那样：“如果说科学使人团结，如果说它摒弃分裂而使人团结的话，那么哲学则使人分裂，并且，它只有通过分裂才能使人团结^{【13】}。”在此，“哲学归根结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初现端倪，留待下文展开论述。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因为哲学能够在科学尚未触及的领域夸夸其谈，才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样的哲学先驱，或许是哲学家——就当代而言，主要是科学哲学家——从外部对于科学的灌输，也可能源自科学家的自发哲学，甚至来自一些唯心主义构想所带有的诗意火花）——虽然这种可能在事后看来并不总是合理的。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太多，毕竟，那是一条尚未有人涉足的道路。

就像历史一次次地重演的那样，引领时代者，总难免遭致无谓的曲解与误读，无论是伽利略、爱因斯坦还是马克思，然而真理是富有生命力的——先驱们的学说总是能够在斗争中发展，在阵痛中新生。当然，阿尔都塞亦不例外。

“阿尔都塞并没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类逻辑中挣脱出来，因为他在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时，往往又走上了与人本主义相反的科学主义的极端^{【14】}。”面对张一兵教授的指责，笔者将给出如下的辩护：

其一，科学是无主体的，它的理论成果对于每一个主体而言，都是适用的，不以其社会角色为转移。使得科学成为人类生存之桎梏的，并非是科学本身，而是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劳动者只有在出卖自身的劳动力的前提下才能与生产工具相结合，才能够创造财富，与此同时，社会上荒谬地存在着一大批产业后备军。这意味着，由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然而却是潜在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大框架下并不可能被完全的现实化、具体化——

以防污设施为例，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对防污设施的资金投入严加控制，从而导致了环境的不断恶化。这是科学之罪，还是经济结构的必然？想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张一兵教授的指责很大程度上源于对“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者”的错误定位。将结构主义对于主体的一味消解，对主体能动性的全面否定，强加于阿尔都塞。事实上，对客观事实、外在结构的强调，反过来佐证了人之（认识必然的）能动性，没有主体，也就无所谓真理——在主体的实践中不断前进的真理。而他在《马基雅维利与我们》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奇遇的一般条件，是两个项的相遇：一个是所谓幸运，这是一个非确指领域的形势 X 方面的客观条件；另一个是所谓能力，是同样不确定的个人 Y 方面的主观条件^{【15】}。”一方面，对于客观形势的分析离不开对于过往经验的理论、系统地总结；另一方面，主体需要在对必然性（如上文所述，这种“必然”必然是相对的）有所认识的前提下，对自身的各方面条件加以整合。而主观的能力与客观的幸运的偶然相遇，形成了所谓“事件”——政治事件。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调情”，并未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根基，恰恰相反，它正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一提阿尔都塞理论中被误解最深、被误读最多的 overdetermination 一词，它时常被当作阿尔都塞作为结构主义者的标志，以作为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罪证”。首先，是这个术语的中文翻译问题。笔者倾向于俞吾金教授的看法，将之翻译为“超越（过度）决定”，以反对那些认为阿尔都塞只是简单地从经济一元论走向多元决定论的庸俗看法^{【16】}。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细化——从抽象的层面来说，因果律是我们对日常的经验世界的总结，即是说，任何事情不会凭空发生，而它的发生也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结果。

但需要明确的是，尽管一连串的因果事件的发生遵循线性时间关系，即是说在客观上，原因是先于结果的；但对于认识因果事件的主体而言，恰恰相反，是结果先于原因。拉康说意义是回溯的，而在笔者看来，原因亦是如此。我们只能够尽可能的挖掘出主要的“前事件的事件”，并在一个原因事件的集合中，即具体的、社会的复杂矛盾体中，去把握矛盾总体内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动态转换）的诸矛盾之间、矛盾总体与结果事件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而人类认知的这种特性，说明了我们关于事件原因的所有分析都将是不彻底的（但不意味着毫无裨益），对于原因的言说，都只能是一种“半说”（拉康语）。这就意味着一种激进的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即反对一切形式的、黑格尔主义的庸俗决定论，无论其矛盾中心是绝对精神、经济基础、暴力亦或其他。

超越决定并不只涉及独一无二的、离奇的历史情境（例如德国），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的辩证法从来不在纯粹的状态中起作用；从历史上看，许多例子表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后从来不会谦恭地隐退，也从来不会作为纯粹的历史现象消失在新来临的时代中，以便让经济这个君王沿着辩证法的皇家大道大步前进，其实，在‘归根到底’的层面上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从来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17]。

具体的说来，我们可以引入科恩关于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同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分。前者对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例如宗教、民族主义）的解释无力，使得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陷入困境。而后者，在科恩看来，“只是坚持认为，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的必要限度是阻止精神的东西决定物质的东西^[18]。”而作为社会化产物的宗教、民族主义等等，必然带有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经济特征，但这种特征却并不能作为前者的主要特征而存在，因此，非经济的制度与意识形态

将遵循自身的、非经济的逻辑而运作，而并不完全依照经济因素的性质而发展。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对于事物的唯物主义解释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前者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而后者，却是我们不应妄图触及的彼岸。

上述的简要分析佐证了阿尔都塞过度决定论的正确性。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中，任何（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非经济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推动矛盾体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例如在阿尔都塞的文章中，他甚至将俄国的国土面积广大，从而延缓了联军的进犯速度作为列宁在俄国的革命得以成功的理由）。若谈起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我们只能够从下述两个方面去分析。

其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历时性地、在宏观上改变并规定着人类生存的外在环境，因此人类的实践、言谈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所限定的范围（这是唯物主义的解释，而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

其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9]。”这意味着，即使是出于极端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剑指穆斯林的十字军将士，也需要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逻辑，才能行事。人首先要维持自己生物性的存在，才能够以其它的多样方式而存在。

按照科恩的说法，只有综合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形态的历时性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于社会结构的共时性研究，我们才能够走出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怪圈，才能在同修正主义的、目的论的以及各种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

“哲学归根结底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

争”，既然是斗争，就需要挥戈奋起，直面挑战，而不总是以自己的后脑勺面对敌人。毋庸置疑，阿尔都塞做到了这一点。

二、哲学与政治

在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有趣的现象，自称立场中立（用阿尔都塞的话说，无主体的）的哲学理论，往往会建立起一套与其本体论相适应的伦理学，用以“指导”人们，应该如何去生活：基督教神学教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启蒙主义者宣扬的自由平等，等等。

衍生出伦理规范的哲学，还试图占据价值中立的立场，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位貌似公允的仲裁者的身影之下，意识形态的面庞明灭可见。

意识形态所反映的不是人类同自己生存条件的关系，而是他们体验这种关系的方式。这就等于说，既存在真实的关系，又存在‘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20]。

在这里，阿尔都塞引入了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三界拓扑学理论，对意识形态作了一个粗糙的，但不失为真实的描述。

在拉康看来，人类的精神世界由三大界域构成：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三者通过拓扑式的连结而相互作用，“它们在主体身上共时性地发挥着作用，使主体成为了一个多元决定的东西^[21]。”。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齐泽克认为，以“现实感”名之更为准确），是想象界与象征界共同作用的产物，以同拒绝一切象征、根本上意味着不可能的实在界相区分。

而意识形态正是我们所谓“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想象界中，通过自恋式力比多对于对象的投注，构成了形形色色的镜像（小他者），使得主体完成了想象性的自我认同：“理想自我”在他者场域得以构成，即是说，“我”通过想象中他人的视角形成了“自我”的自恋式形象；而在象征界内，由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结构衍生而出的、外在于所有主体的语言（以同主体所使用的言语相区分）结构构

成了种类繁多的文化、道德律令，即大他者。主体通过响应大他者的“传唤（阿尔都塞）”，通过认同于大他者，在社会的象征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构建起主体的“自我理想”——“自我理想是作为言说者的他人，是与我有一种象征性关系的他人，而这个‘我’……与想象的力比多既相似又不同。象征性交换是把人们相互联系起来的东西，它实际就是语言，它使得主体的认同得以可能^[22]”。

那么，在阿尔都塞的语境中，人同社会的真实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又该如何理解呢？在笔者看来，所谓人同社会的真实关系，指的是人与他人在生产活动中所结成的生产关系，正如科恩所说的那样，生产关系本质上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权利问题，而是权力问题，所谓权力，就意味着对生产资料和他人劳动力有效的占有与支配^[23]。因而阿尔都塞说：“所有意识形态在其必然做出的想象性歪曲中所表述的并不是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其他关系），而首先是个人与生产关系及其派生出来的那些关系的（想象）关系^[24]。”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即想象的、体验的关系，在阿尔都塞看来：“‘人们’在意识形态中‘对自己表述’的并不是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他们的实在世界，相反，在那里首先对他们表述出来的是他们与这些生存条件的关系^[25]。”举一个常见的例子：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掩盖的是统治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真实的剥削关系，而代之以民族自豪感、自我牺牲精神等想象性的内容，从而将“人”传唤为“爱国者”这一主体。但需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虽然是想象、体验性的，但并不总是虚假的：友情、爱情、亲情等等意识形态的存在，对人类而言，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阿尔都塞效仿弗洛伊德说道：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恰好就像无意识一样。

在此，我们可以提出论点四：只有当人们是意识形态化的，他们才能是社会的。

那么，哲学意识形态又是如何的呢？

阿尔都塞接过了马克思、葛兰西与拉康的问题，表述道：“再生产的经济和政治条件是由法律和国家所保障的。而诸意识形态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在于它们参与生产关系，并且参与全部社会关系，在观念或文化层面保障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26]。”

文化霸权，一块始终存在却总被人们所遗忘的古战场，终于得见天日。

社会化的个人在占统治地位的——因而，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唤”下，参与到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之中。而“意识形态—主体”则意味着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它广泛地存在于学校、教会、家庭、媒体等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之中。而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始终暧昧不清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重要一环——在此重申一遍，生产关系本身的再生产。

个人被传唤为（自由的）主体，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服从主体的诫命，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臣服的地位，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全靠自己”做出臣服的表示和行为^[27]。

在柏拉图对于“理想国”的乌托邦幻想中，在黑格尔对于德意志君主宪政的支持中（“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在卢梭、伏尔泰对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普世价值的奔走呼号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哲学作为意识形态而发挥的社会功效——“哲学家试图在他的哲学中从理念的王国‘降到’物质现实，从理论‘降到’实践……^[28]”他们仰望着星辰，身体却从未离开过地面。

我们现在可以提出以下命题：哲学是政治在特定的领域、面对特定的现实、以特定的方式的延续。哲学，更确切地说，哲学伴随科学在理论领域表述政治，反之，哲学伴随从事阶级斗争的阶级，在政治中表述科学性^[29]。

毕竟，哲学家是不能“在冰雪之间，高山之巅自由自在地生活”的，他们同样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阶级

的（同样，科学家没有特权，亦是如此）——他们也需要在人世间生活，承受着人世的离合悲欢、逆顺甘苦。而由于他们的高瞻远瞩，往往会对人类最为重要的公共领域——政治领域，评头论足。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从洛克到卢梭、黑格尔，莫不如此。“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30]。”

因而，哲学家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向世界提出要求——政治的要求。而根据阶级力量的对比，哲学被分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哲学，和诸多被统治阶级的哲学，它们各自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以真理的名义，借用科学的语言，从抽象的王国降至尘世，以向“世界”要求它们的自由，它们的公平，它们的正义——从黑格尔的意义上说，这些普世价值在将自身外化、具体化的过程中，必然发展出一个庞杂的矛盾体系，但遗憾的是，除非共产主义的革命行动消灭了阶级社会这一物质现实，普世价值是不会自发地完成自己的否定之否定的。

套用拉康的句式，我们的结论就是：“‘人’（man）是不存在的”——因为阶级社会的现实。

三、黄昏时分的形而上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自上世纪初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席卷全球，哲学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向：一方面，分析哲学的产生与发展，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言说基础——超验的普遍性语词，这无疑与现代科学的崛起密切相关。分析哲学，毋宁说是逻辑学与语言学，正逐渐挣脱传统哲学的言说方式与理论框架，向科学领域进发。而另一方面，知识界对于宣称掌握真理的哲学流派也不再给予普遍的信任。哲学的言说，除了在科学领域无人理会的喋喋不休之外，也只能存在于科学尚未发展成熟的领域，如人类的

精神领域、政治领域甚至经济学等领域，总而言之，社会（科）学领域。

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维科曾经乐观地说过，对人而言，社会比自然更可理解，因为社会是人的创造物。但我们也又的确看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发展的严重不平衡。

为此，困守于理论孤岛的我们，必须扬帆起航，前往继希腊人的数学大陆与伽利略所开辟的物理学大陆之后，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学大陆——历史唯物主义（其实我们大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正如我们从未听说过物理唯物主义那样，我们需要一个准确的命名）——之上去寻找答案。

我们知道，现代科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兴起的。而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以抽象的交换价值来换取更多的交换价值以维持资本的生命力：“资本是自我扩大的交换价值”^[31]。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现代科学不过是资本增殖的手段，而非目的。但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更确切地说，资本的切实需要，刺激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它的每一项成果，只要有利于资本增殖，都将被资本家们转变为生产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断言说，非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是“保守的”，这与在生产上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形成鲜明对照^[32]。

或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上文的限定条件，“只要有利于资本增殖”。这意味着，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与使用，只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之下方才成立。自然科学对于生产力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就像地质运动般改造了整个地球表层，改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习惯。而社会科学，除了泰勒制等有利于直接改进物质劳动方式、从而提高生产力的理论成果，其他并不具有此类功能的学说是始终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对此，我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1）这类研究往往并不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很难获得丰厚的利润作为投资者的

回报。为此而往往缺乏研究经费。

（2）社会科学——而非自称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或前科学，总在不经意间，用实证的方式，揭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面纱、驱散拜物教的迷雾。这更是在直接地向资本的逻辑宣战。

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科学而言，形势则更加严峻：通过对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研究与人类史的梳理，马克思消灭了“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呓语，并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规律的研究，预言了无产阶级的反抗与资本主义的消亡。也因此招致了资产阶级学者的疯狂反扑、扭曲甚至诬蔑。

或许有人会反问说，科学既然是无主体的，那么就上面的论述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也未免太具意识形态色彩了，还能被称之为科学么？

面对这样的疑问，笔者尝试着做出如下的回应：

（1）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曾出于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良知、对资本主义的愤恨，做出过数次对于经济危机的、事后被证实是错误的预言。在这样的时刻，马克思无疑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历史的发展也证明，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出以自身消亡延长敌人寿命的宏大悲剧——它背叛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却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历史科学。

（2）正如伽利略开创的物理学不能被称为伽利略主义一样，马克思开创的历史科学也不应该被称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如今它仍被不恰当地如此命名）。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科学（唯物主义）的前身，即脱胎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某些经典命题，已经被确认为意识形态命题；与此同时，更加严谨、客观的理论框架正在逐步建立：人们发现，如果脱离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理论，便无法谈论历史——哪位思想史家敢于撇开所有具体的物质的、社会的环境去书写虚无缥缈的思想史呢？那注定是可笑的。

(3) 科学是属人的，因此，没有意识形态，科学就无法作为“科学”而为人所知、所用。无论是科学、法律还是国家，要想发挥自身的社会功效，都无法离开与之相伴随、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性发展的科学，则更是如此。人们会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对之或痛恨，或支持。这更使得这门科学看上去具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们并非是由科学本身带来的，而是由科学的实践者即意识形态的背负者所带来的。

面对身处无产阶级对立面的、反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呓语，马克思主义无疑也需要创制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场斗争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们于是委托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以不断削弱意识形态幻想的威胁，而为了赋予哲学这个任务，我们把哲学当作纯粹是科学的意识。它从文字到实质归根结底完全是科学，但只是简单地被颠倒了过来，为作为科学的明确和外在的意识而存在，而它走到科学的外部，正是为了消除这一外部。这样一来，哲学也就寿终正寝了，因为哲学的主体和客体完全同科学混合在一起；然而，在哲学用科学的实证本质打退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以前，在它把对方的意识形态幻想消灭以前，它依然作为科学的正在消亡中的批判意识而存在；只是在这以后，它才恢复原来的地位，重新找回自己的意识形态幻想^{【33】}。

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正在消亡中的批判意识”，就要求它不以对立面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反意识形态。它不止需要跃出科学，来到科学的外部，更需要通过历史科学的武装，迂回到对方的意识形态背后，去阐释对立面话语产生的背景与原因，从而将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连根拔起。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毋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理论。正

如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34】}。这种哲学实践，意在以反哲学的方式从事哲学。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消灭对立面的哲学意识形态幻想的方式消灭自身。阿尔都塞晚年，为了同一切号称唯物、实则唯心的目的论（经济决定论）的哲学划清界限、为了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更是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发现了“相遇的唯物主义”潜流的存在。它意味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上是一种反哲学、非哲学。

在 1976 年 3 月的一次演讲中，阿尔都塞赋予了相遇的唯物主义另一名称：哲学的改造。它的主题是一种“新的哲学实践”，相对于“国家政党”的提法。国家政党的哲学实践诉诸一种虚假的统一性，将社会实践活动范围内的所有内容都统摄在某种霸权性真理的名义之下。它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君临于被统治者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之上。为了提示出这种官方哲学在哲学传统中的支配性地位，阿尔都塞直截了当称其为“哲学”。仿效恩格斯将无产阶级国家描述为“非国家”，他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成为“非哲学”，将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看作无产阶级“非哲学”^{【35】}。

自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11 条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6】}的时候，他不仅仅在强调革命实践的重要性；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是：马克思同样在强调，我们必须意识到解释世界的重要性，但不能以哲学意识形态的方式去这么做。时至今日，在齐泽克对于这句名言的颠倒中，我们看到了双重误解的出现，这不能不说令人遗憾的。

阿尔都塞的这一结论无疑是颠覆性的，它宣布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所谓实践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等等）的探讨统统是意识形态的——这源于对“本体论”这一西方哲学术语的

无知，更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知：以哲学的方式谈论哲学，意味着跳进陷阱中去同已经就范的猛兽搏斗，这不是勇敢，而是愚蠢。事实上，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自己的本体论，并且恰恰是反本体论的^{【37】}。这体现在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继承中，更体现在恩格斯对自称为“真理”代言的杜林的嘲笑中，也体现在列宁的哲学实践中。

黑格尔说哲学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最终并没有错：那时，黎明时诞生的科学已生活了漫长的一整天时间。所以，科学引起了最初的哲学形式的诞生和哲学革命的新生，而哲学却总要落后于科学漫长的一整天，这一整天可能会持续几年、几十年、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38】}。

因此，自费尔巴哈提纲第 11 条的出现，到《反杜林论》中谈论哲学的相关章节的“偶然事件”，马克思主义历经了长达 30 年的哲学上的沉默，“这中间只有新科学在说话”^{【39】}。正因为哲学总是落后于科学的，所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列宁，都未能创制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形态：这直接导致了列宁被迫使用敌人的武器来回敬敌人。为此，阿尔都塞说道：

“根本原因是时机尚未成熟，黄昏尚未到来，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恩格斯、列宁都还不能写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欠缺的伟大哲学著作。如果说他们的确是在这种著作所依赖的科学之后才到来的，那么对哲学来说，他们无论如何都还是来得太早了；哲学是必需的，但没有必要地落后，它也不可能诞生^{【40】}。”

黄昏已然来到，在形而上学日薄西山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张开了双翅，等待着，同茫茫黑夜进行漫长的斗争。“白

天总是漫长的，但幸运的是，它已经太长了，看吧：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起飞了”^{【41】}。

活在后阿尔都塞时代的我们，无疑是幸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飞过了近半个世纪，并将一直翱翔下去。

——尽管我们飞得越高，在他人眼中就越渺小。

四、结语

活在后阿尔都塞时代的我们，亦是不幸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丧失了一颗最为智慧的头脑。

那些当年在黑板上写满“结构不上街”、“阿尔都塞不是人”的大学生，如今都已垂垂老去；全球资本主义在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愈发捉襟见肘；与此同时，世界左翼运动在一次次的低潮与迷茫后，仍在不断寻求着通往信仰的道路。

二十一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将导向何方？查韦斯的去世，使得拉美、乃至世界的局势更加扑朔迷离。未来的一切都将是否定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阿尔都塞和我们，都不会放弃，正如他用最后的笔触所书写的最为悲情的宣言那般。

来日方长。

理论，从来就不是任何人自恋式的自言自语，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不断的争论中，才能不固化为僵死的教条，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自身。本文意在抛砖引玉，引发大家进一步的思考与争论，以使左翼理论在争论中得以去伪存真，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由于笔者能力有限，文中若有讹误，还望不吝赐教。

异端突围

2013 年 3 月 26 日

注释：

【1】 德里达：《在路易·阿尔都塞葬礼上的致辞》 吉林人民出版社《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2003 年版，P510，陈越编。

- 【2】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P267-268
- 【3】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见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P14，邓晓芒译。
- 【4】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 P27
- 【5】阿尔都塞：《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同上书，P174
-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P592
- 【7】科恩《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 P445
- 【8】鲁迅《叶紫作<丰收>序》，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 【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P66、73
- 【10】阿尔都塞《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P11
- 【11】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P223
- 【12】同上，P223
- 【13】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P130
- 【14】张一兵《走向感性现实：被遮蔽的劳动者之声》
- 【15】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P467
- 【16】俞吾金《究竟如何理解并翻译阿尔都塞的重要术语 overdetermination》
- 【17】L.Althusser: For Marx, Unwin Brothers limited, The Gresham Press, 1977 P113
- 【1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P531
- 【19】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十四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P413
- 【20】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P202
- 【21】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二卷 P390
- 【22】同上，P438 英文原文见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 Freud's Papers on Technique 1953-1954, P140
- 【23】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八章《基础和上层建筑，权力与权利》P249-284
- 【24】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P355
- 【25】同上，P354-355
- 【26】阿尔都塞《哲学的改造》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P237
- 【27】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P372
- 【28】阿尔都塞《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P10
- 【29】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见《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 P166-167
- 【30】毛泽东《实践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83
- 【31】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 P222
- 【32】同上，P200 原文可参阅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P533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 年》，《马恩全集》第 46 卷（下） P105
- 【33】阿尔都塞《序言：今天》顾良译 见《保卫马克思》 P10
- 【34】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 P169
- 【35】戈什格瑞恩《相遇的哲学：阿尔都塞晚期作品集导言》（上）
- 【36】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P506
- 【37】详见 余孟宣《马克思主义对本体论的批判》，见《本体论研究》第四章 P100-130
- 【38】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 P144
- 【39】同上，P143
- 【40】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见《政治与哲学——阿尔都塞读本》 P146
- 【41】同上，P145

关于科学的几点思考

：陈福



摘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关于科学的界定似乎越来越模糊化，科学究竟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呢，抑或是一种组织结构呢？本人将简要梳理关于科学的几种观点并作简要评述。

关键词：科学 非科学 技术 逻辑实证主义

要给科学下一个简明而精确的定义，或者给科学程序一个充分必要的条件，或者界定科学的恰当的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当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因为科学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在历史上变化多端，而且还有一般而言的科学在特定境况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的区别。林德伯格说：要给科学下一个人人人满意的定义，是十分令人头疼的问题^[1]。但是，广泛持有的一种信念是，科学及其方法是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有着特殊的含义。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哲学家或科学家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相关探索和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将科学看成是一种知识体系

关于科学和非科学的界定问题，是现代科学哲学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有一种说法认为，科学是知识。从词源上来看，“科学”源于拉丁文 *scientia*，即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科学都是知识，但是，一切知识却不都是科学。科学是一种怎样的知识呢？

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指出，首先应该理清什么知识不是科学。他答道：“科学这个术语显然不能用来称作骗术、伪造及系统化的迷信。”^[2]因为这些都是“根据某些想象的力量或存在物所做出的解释”^[3]。这就是说，科学知识与神学知识不同。科学知识是关于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知识：“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4]。”

那么，是不是可以把科学定义为关于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呢？著名科学哲学家弗兰克说：“当我们讲到科学的时候，我

们总是在论述或者抽象这两个水平上来讲的。第一个是日常常识经验的水平，比如我们观察一个黑点相对于别的某些黑点在移动着，这就是直接观察的水平。第二个水平，是科学普遍原理水平。这个水平完全不同于常识经验的水平，后者是一切人所共有的。科学在本质上是由这些普遍原理组成，仅仅是一些关于跳动的点的这类陈述的集合，不算是科学^[5]。从这里可以看出，科学与经验或感性知识根本不同。经验或感性的知识是关于事物的现象、偶然性、特殊性的知识。与此相反，科学则是理性知识，是关于事物本质、规律、必然性、普遍性的知识。丹皮尔说：“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关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的理性研究^[6]。”

一般人们都承认科学是关于规律、普遍性的知识体系，而往往忽略科学是关于本质、必然性的知识体系。凡是普遍的东西都是感官感觉不到的事物的内在属性，因而也就是所谓的“本质”，另一方面，普遍性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体现出必然性。在这里，是否可以把科学定义为关于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本质、规律、必然性、普遍性的理性知识？这种说法不够准确，比方说“人都是要死的”这一个判断，便是关于“每个人”这种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本质、规律、必然性、普遍性的理性知识。但是，很明显不能说这一个判断就是科学。正如科学家瓦托夫斯基说：“科学是一种用普遍的定律和原理建构的有组织的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7]。”准确的说，科学是关于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本质、规律、必然性、普遍性的理性的知识体系。

在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如果科学是

关于实际存在事物的普遍性的真理知识体系，那么，任何一种理性知识体系——只要它研究的是实际存在的事物便都是科学。例如，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康德的《纯粹的理性批判》便都可以称之为科学。事实上，在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任何一门科学，对于它的对象的研究都存在着一种由部分到全部、由错误到真理的发展过程。在它的发展的历程中，必然存在着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它所研究的只是这门科学的一部分对象，而不是这门科学的全部对象；因而，对这些对象的说明和论证不能不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围绕着这门科学的基本问题或难题势必形成各种不同乃至互相矛盾的学说。第二个阶段的特征是：它所研究的乃是这门科学的全部对象，而不再是这门科学的部分对象；它对这些对象的说明和论证是清晰明白的，解决了专门科学的基本问题。前者的论述是部分的、片面的，可以称之为“学科”，后者是全面的、真理的科学即称之为“科学”。

那么，有人会问，在这里还是没有明确区分科学和其他学科即非科学的标准是什么。关于科学与非科学的界定有证实和证伪之争。施太格缪勒说：“一切在科学上可以接受的陈述都必须或者是只从逻辑上就能论证的，或者是依据经验被证明为可能得^[8]。”这就是说，只可能被证实——逻辑证实和经验证实的知识，才是科学的知识，否则便是非科学的陈述。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

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波普尔反驳道：“科学理论不可能被经验证实，而只可能被证伪。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一种全称的、普遍的判断，因而它所概括的经验事实都是无穷的，可是，我们所能进行的经验检验的次数和事实去只能是有限的。于是，波普尔由此推断说，科学理论虽然是从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却不可能被经验事实证实。不过，科学理论，全称判断虽然不可能被经验事实的单称判断证实，却可以被这种单称判断证伪。“我的理论基于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源于全称陈述的逻辑形式，因为全称陈述绝不能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来，却能够和单称陈述相矛盾。因此，通过纯粹的演绎推理，便可能从单称陈述之

真推出全称陈述之伪^[9]。”由此，波普尔得出结论说，只可能被经验证伪，而不是被证实的知识，便是非科学的陈述。换句话说：我并不要求一个科学体系能够在肯定的意义上被一劳永逸的找到；我要求它具有这样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使它能再否定的意义上，通过经验的检验而被找到；一个检验科学体系必须有可能被反驳^[10]。

波普尔的证伪原则确实我们关于科学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方向，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观点就是全面的、正确的。很显然，科学不是为了找到谬误，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不是为了证伪一种理论，相反是为了证实一种理论。例如，哥白尼变革不是为了证伪地心说，而是通过证伪地心说来找到和证实日心说。如果科学理论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它岂不成了只能找到错误而不能找到真理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的话，科学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其实，科学理论即可以被证伪又可以被证实。诚然，科学理论虽然都是全称的、普遍的判断，而它所概括的经验事实是无穷的，因而不可能被经验事实完全证实。但是，经验事实的每一次证实，都是对科学理论的部分证实，因而随着检验次数的增加，便越来越接近完全证实科学理论。就像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一样，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组成，相对真理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真理是不可穷尽的、有条件的。在一定的条件范围之下它具有必然性，在这个角度来说它又是绝对的。无数的相对真理构成了绝对真理。所以，证伪和证实原则是检验科学真理的两种方法。

二、科学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的整体

不同于部分科学家将科学看作于一种知识体系，以拉卡托斯和库恩为代表的一部分科学家学者认为：将科学看作一种知识体系忽略掉了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理论的复杂性。比较恰当的作法是把理论当作某种有结构的整体来描绘的图景。这种把理论看作为一个结构的一个理由是起源于对科学史的研究，历史研究揭示，重要科学的演化和发展显示出一种为归纳主义和证伪主义所忽略的结构。下面将重点介绍拉卡托斯和库恩的结构理论。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是一个既可以正面又可以从反面来推导未来研究的结构。纲领的反面启示法，包括关于不得摈弃或修改这个纲领所依据的基本假定即其硬核的规定。这个硬核部分由辅助假说和初始条件等构成的保护带加以保护，不被证伪。这个硬核，可以由于“它的创立者在方法上的决定”而成为不可证伪的。即使在一个得到明确表达的研究纲领和观察所得资料之间的任何匹配不当，都不是归咎于构成其硬核的那些假定，而是归咎于理论结构的其他某一部分。正面启发法包括那些指出研究纲领可以如何发展的概略的指导方针，这种发展包括为了说明以往已知的现象和预见新现象而以附加假定去补充硬核。研究纲领是进步的或是退步的，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的导致或是持续的不能导致新现象的发现。一个纲领的反面启发法是不得在这个纲领发展过程中修改触动其硬核的要求。正面启发法的做法却更含糊些，一个研究纲领中向科学家们指出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不应该做什么的方面。其对于硬核应该如何补充才足以使它能够解释并预见实在的现象。在这里，查尔默斯指出拉卡托斯为阐明正面启发法的观念，引用了牛顿早期发展的故事。研究纲领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来评价，首先，一个研究纲领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严谨性，从而有可能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一个确定的纲领。其次，一个研究纲领应该导致新颖现象的发现，至少是偶尔地。这是研究纲领成为合格的可持续研究纲领的两个条件。

研究纲领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在单个研究纲领内所做的工作有关，另一方面和对立研究纲领之间的价值比较有关。拉卡托斯认为，对一个研究纲领的保护带所做的增加或者修改必须是可以加以独立检验的，个别的或是形成集团的科学家都完全可以用他们所选择的方式去发展保护带，只要他们的作法能为新的检验提供机会，从而使新的发现成为可能。同时，有两种作法拉卡托斯是禁止的，一是特设性假说，不能加以独立检验的假说，是不许可的；另一种做法是那种侵犯硬核的行动。

一个研究纲领内对立假说的相对价值可以用比较直截了当的方式加以确定，但

是对立的研究纲领之间的比较却要麻烦一些。查尔默斯认为：“研究纲领相对价值的确定依赖于它们进步或退化所达到的程度。退化的纲领将让位于进步的纲领，就像托勒密天文学最后让位于哥白尼理论一样。”^[11]在这里，接受或摈弃研究纲领遇到一个主要困难是时间问题。即得经过多少时间才能确定一个纲领已经严重退化到不能导致新现象的发现。因此，拉卡托斯认为，两个纲领之间的相对价值，只能以“事后明白”的方式来加以确定。所以拉卡托斯未能为摈弃一个严谨的研究纲领或是为在两个对立的纲领之间做出抉择提供明确的标准。这也是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存在的致命缺陷。或许可以说，拉卡托斯用关于进步和退化的研究纲领的概念所做的事，是对科学的目的这类事情提供某种说明。

关于科学是复杂结构的第二种代表性观点是库恩的范式理论。他认为应该使科学理论和他所理解的历史情况更加符合一致，强调科学进步的革命性质，这里的革命指的是放弃一种理论结构并代之以另一种不相容的理论结构；另外一个特征是，科学团体的社会学特征在其理论中起着重要作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方法有一些共同点，即两人都特别要求他们的哲学论述能够经受得住以科学史为根据的批判。库恩和波普尔、拉卡托斯二者之间的分歧在于，前者强调社会学因素。库恩关于科学如何进步的图景可以概括为下面的开放图示：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一门成熟的科学是由单一的一种规范所支配的，规范为在它所支配的科学合理的工作规定标准。规范指的是，某一特定科学团体所采纳的、一般性的理论假定和应用这些假定的定律和技术。库恩也认为一个能够维持常规科学传统的规范的存在，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特征。规范包括把基本定律应用到各种不同类型情况中去的标准方法，比如牛顿的规范将包括把牛顿的各种定律应用到行星运行、钟摆、台球冲撞以及诸如此类的现象上去的方法。其次，规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有一些非常一般的形而上学原则组成。最后，所有的规范都包含着一些非常一般的方法论规定。

库恩认为规范所包含的要比能够以明确的规则和指示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的东西更多。即使不存在完整的明确的特征描述，个别科学家仍然可以通过他们的科学教育获得某一规范的知识。危机不会因为某一规范内存在着未解决的难题，因为规范总是会遇到困难的，只有在一系列特殊的条件下，那些反常才会发展到动摇人们对规范的信心。一旦某一规范已经被削弱和动摇到它的支持者对它失去了信心的地步，革命的时机就成熟了。通常，引起一场科学革命的，不是个别科学家，而是作为整体的有关的科学团体，放弃某一规范和采纳另一新规范。库恩认为对立规范的支持者之间的论证和讨论的目的应该是说服而不是强迫，这也正是库恩关于对立的规范是“不可比拟”的这一论断的含义。库恩科学观的某些方面表明他的立场是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即这样一种立场认为，不能在客观的意义上说一种科学理论或规范比另一种“更好”。但是，在争论科学能不能被说成是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观点时，库恩认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回答

是肯定的。库恩承认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科学是在进步，但他又否认这种进步是朝着某个目的前进的，尤其是他想要否认科学在朝着真理前进。即否认通过不断演替的规范，归属于世界的一些实体和性质，正越来越接近的符合“实际上是”什么和“实际上象”什么。

如果把库恩对科学性质的论述看成是描述性的，那就犯了经验的错误了。库恩坚持认为他的论述是一种关于科学的理论，因为它包括对科学各组成部分的功能所作的解释，常规科学和革命都是为着必要的功能服务的。革命的功能是：科学应该在其本身内部含有足以突破一种规范进入另一种更好的规范的手段。

综上所述，关于科学的观点众说纷纭，但是可以基本确定的是，从科学的发展看来，在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环境下，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体系，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科学实践的产物是组成一门科学的那些理论的复杂综合体。随着科学的成长和发展，这个复杂体的细节会经常变化。

参考文献

- 【1】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一版，第1页。
- 【2】M. W. Wartofsk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Limited, London, 1968, 44.
- 【3】M. W. Wartofsk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Limited, London, 1968, 46.
-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45页。
- 【5】弗兰克.科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 【6】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页。
- 【7】M. W. Wartofsky.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Limited, London, 1968, 23.
- 【8】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66页。
- 【9】Sir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arper Torchbooks Harper&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59, 41.
- 【10】Sir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Harper Torchbooks Harper&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59, 44.
- 【11】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7页。

评萨缪尔森—张忠任转型模型及正确的转型表达式



：柳知秋

萨缪尔森 1970、1971 年的两篇论文^[1]运用“实物矩阵法”（投入产出法的另一种形式）建立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商品价值模型和生产价格模型。在他的模型中“价值系统和价格系统是各自独立决定的，是可替代但是不可调和的两个系统。所谓转型，不过是如下步骤：第一写下价值关系，第二用橡皮把它擦掉，第三写下价格关系。如此而已。”他认为价值模型在理论上是多余的，主张用奥卡姆剃刀将劳动价值论从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割除。

萨缪尔森的论文造成很大影响，经济学界普遍接受了剔除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反批判，可惜没有抓住要害，没有能够从萨氏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找到其谬误产生的源头，缺乏说服力。

一、萨缪尔森模型批判

萨缪尔森的价值方程式

$$\pi = a_0 + \pi * a \dots \dots \textcircled{1}$$

π 表示 n 种商品的价值向量

$$\pi = [\pi_i] = (\pi_1, \pi_2, \dots, \pi_n)$$

a_0 为活劳动消耗系数向量：

$$a_0 = [a_{0j}] = (a_{01}, a_{02}, \dots, a_{0n})$$

j 表示产品 $i=j$ 的生产部门。 a_{0j} 为此生产消耗的劳动量（即创造的价值）。需要注意

意的是，这里复杂劳动已经化为多倍的简单劳动，不再考虑其质的区别而以数值表示其量的区别。

a 为物质消耗系数矩阵：

$$a = [a_{ij}] = \begin{bmatrix} a_{11} & a_{12} & \cdots & a_{1n} \\ a_{21} & a_{22} & \cdots & a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a_{n1} & a_{n2} & \cdots & a_{nn} \end{bmatrix}$$

a_{ij} 表示生产部门 j 消耗的产品 i 的数量。

引进工资率 w_π 为一个小于 1 的系数，表示：劳动力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则价值方程式写为

$$\pi = \pi * a + w_\pi * a_0 + (1 - w_\pi)a_0 \dots \dots \textcircled{2}$$

这个形式与马克思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相当。

萨缪尔森用简单精确的表达式表示价值，但在这里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这里的等号是什么意思？等号左边是价值，右边是价值的来源，即生产过程。而生产有不可逆转的时间先后顺序。等号在这里应当是像化学方程式一样表示反应物和产物，而不是数学上可以左右任意交换的等于。

那么 π 既在等式左边，又写在等式右边，是什么意思呢？不变资本是上一轮生产的产品，因此它表示：本轮生产和上一轮生产价值向量完全相同。如果这仅对个别生产过程成立，那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对所有生产过程成立，就表示：商品的价值永恒不变。显然是不可能的。

萨缪尔森的生产价格方程

$$P = (1 + r)(w_p * a_0 + P * a) \dots \dots (3)$$

P 表示生产价格向量

$$P = [P_i] = (P_1, P_2, \dots, P_n)$$

r 为竞争导致的一般利润率

w_p 为生产价格下的工资率

(注：萨缪尔森原文中没有区别价值和生产价格下的工资率 w_π 和 w_p ，都标记为 w)

这里有和上面一样的错误： P 既写在等式左边，又写在等式右边。表示：不仅本轮生产和上一轮生产价值向量完全相同，而且转型导致的偏离完全相同（或二者影响恰好相互抵消，这更无道理）。这样转型就成了完全静止的。

萨缪尔森接下来提出了实物工资向量

$$m = [m_i] = (m_1, m_2, \dots, m_n)$$

表示一组消费品构成的单位劳动的实物工资。有

$$m * P = w_p \dots \dots (4)$$

但是所有单位劳动对应完全一样的实物工资，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何况这里已经将复杂劳动化为多倍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需要教育和训练，更不可能有一样的 m 。

萨缪尔森将③式化为

$$P = w_p * a_0 (1 + r) [I - a(1 + r)]^{-1} \dots \dots (5)$$

I 为单位矩阵

④⑤式导出

$$a_0 (1 + r) [I - a(1 + r)]^{-1} m = 1$$

可以解出 r ，带入方程组解出 P 。

这意味着，利润率 r 在以上方程组有其独立的含意，可以从方程中推导出来，而与马克思给出的平均利润率公式无关。

但是，除了对所有单位劳动统一的 m 不存在，⑤式也根本不能成立。因为③式等号两边的 P 不一样，不能做此变形。

二、张忠任模型批判

用马克思的符号表示价值：

$$C + V + M = S$$

张忠任在这里提出，不变资本分布矩阵 $C = [c_{ij}]$ ， c_{ij} 表示 j 产品生产中消耗的 i 产品数量

写成方程组的形式

$$\sum_{i=1}^n c_{ij} + v_j + m_j = s_j$$

v_j 为 j 产品生产消耗的劳动力

m_j 为 j 产品生产的剩余价值

张忠任的转型表达

$$(1 + r) \left(\sum_{i=1}^n c_{ij} x_i + v_j y \right) = s_j x_j$$

x_i 表示 i 产品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离率，通过不变资本分布矩阵 C 渗透到各种生产中去

y 为可变资本的偏离

$s_j x_j$ 为产品价值乘以偏离率即生产价格

可以看出，张忠任模型是萨缪尔森模型的变形。

和萨缪尔森的概念对应:

$$c_{ij}x_i = P_i * a_{ij}, \quad y = w_p / w_\pi,$$

$$v_j y = w_p a_{0j}$$

这里张忠任因为用了马克思的符号而躲开了萨缪尔森的第一个错误，但是他仍然把 x_i 写在等式两边。但 x_i 是不变资本生产价格偏离率，按生产价格购买不变资本在生产之前已经发生了，价值转型不会再干扰不变资本的生产价格。因此不变资本的生产价格偏离率，并不和本轮生产的转型挂钩。

上式应适当改写为

$$(1+r)(\sum_{i=1}^n c_{ij}b_i + v_jy) = s_jx_j \dots \dots \textcircled{6}$$

对本轮生产来说，不变资本的生产价格是一个既定条件，是一个已知数，用 b_i 表示。

不变资本分布矩阵 C 可能由于产业链分合而变化。前一轮生产的转型和本轮生产转型会有所不同。即便所有产品价值无变化， $i=j$ 时 b_i 和 x_j 仍可能不相等。

张忠任接下来写下了

$$\sum_{j=1}^n s_jx_j = \sum_{j=1}^n s_j$$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市场上同时出售的商品的总生产价格等于其总价值”。这就是所谓“总量二相等”命题其中一条。但这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么？

我们知道价值转型是价值按照利润率规律分配，但不变资本的利润在生产开始前已经形成了，生产开始后没有利润再转入或转出生产不变资本的部门。不变资本的生产价格在生产之初就确定了，是不会

因转型改变的。转型是“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在“当前”的各部门间分配。

正确的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表达式应为：

$$\begin{aligned} & \sum_{j=1}^n [r \sum_{i=1}^n c_{ij}b_i + (1+r)v_jy] \\ &= \sum_{j=1}^n (v_j + m_j) \dots \dots \textcircled{7} \end{aligned}$$

与原式相比，左边相差 $\sum_{i=1}^n c_{ij}b_i$ ，右边相差 $\sum_{i=1}^n c_{ij}$ 显然 b_i 不恒等于 1，因此

$$\sum_{j=1}^n s_jx_j \neq \sum_{j=1}^n s_j$$

即市场上同时出售的商品，总生产价格 \neq 总价值。

问题还没有结束，上两式联立，有 x_1, x_2, \dots, x_n, y 和 r 共 $n+2$ 个未知数，但只有 $n+1$ 个方程。无唯一解，必须引入 r 的定义式，才能得到生产价格体系。即生产价格必须由价值和剩余价值得出：

$$\begin{cases} (1+r)(\sum_{i=1}^n c_{ij}b_i + v_jy) = s_jx_j \\ \sum_{j=1}^n [r \sum_{i=1}^n c_{ij}b_i + (1+r)v_jy] = \sum_{j=1}^n (v_j + m_j) \\ r = \frac{\sum_{j=1}^n m_j}{\sum_{j=1}^n (\sum_{i=1}^n c_{ij} + v_j)} \end{cases}$$

⑥⑦与 r 的定义式，三式联立即为完整的转型表达式。

三、动态的平衡和动态的不平衡

在价值转型模型中使用了所有部门统一的利润率 r ，这与现实是有差别的。各个

部门的利润是会变化的，经常出现超额利润。竞争导致利润率平均化，指的是从长期看，各个部门利润率交替涨跌相互抵消形成动态平衡。这需要两个假设：1.资本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2.从长期看各部门均衡发展。

但现实中资本流动存在障碍，不仅有高差（极差地租）也有阻力（产业转移成本）。并且现实中各部门也不是均衡发展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增加。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扩张有两个主要方向：

1.技术进步导致原先高价值的产品变得廉价，消费量增加；

2.新行业和新产品，这同样是由于技术进步。

可以看出，各个部门交替涨跌动态不平衡。超额利润总是出现在能利用技术进步的部门，从长期看这些部门的利润率和其他部门并不平均。

因此“平均利润率”这个词并不准确，

宜改为“一般利润率”表示不考虑该部门的技术性质。

四、复杂劳动在其中的意义

需要注意：张忠任把劳动力生产价格与劳动力价值的比设为 y ，即假设了所有劳动力以相同的比值转型。本文沿用了这一假设，但需要注意与事实不符之处：由于复杂劳动预先付出教育和训练，在生产时已经是过去的劳动的成果，即死劳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购买复杂劳动力的可认为不单纯是可变资本，而包含了一定量的不变资本。资本构成不同，价值转型时的比例也不同，复杂劳动构成较高，其生产价格有可能超过劳动力价值，即获得他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认识所谓“知识分子”或“按劳分配也是资产阶级权利”有所帮助。

注释

【1】：两篇文章为：“从马克思的价值到竞争价格的转形：一个剥离和重置的过程”（P. A. Samuelso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rxian “Values” to Competitive “Prices” : a Process of Rejection and Replacement,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70, Vol. 67, No. 1, pp.423-425. ）；“马克思剥削概念的理解：所谓的转形问题之总结”（P. A. Samuelson, Understanding the Marxian Nation of Exploitation: A Summary of the So-Called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etween Marxian Values and Competitive Price,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71, Vol. 49(1). pp. 11-18. ）。

【编者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就是不断从历史中学习。不仅要从胜利中学习，还要从失败，从灾难中学习。因此，当前理论研究和意识形态宣传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不带感情色彩地清理上一次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客观地分析大跃退的制度根源。这篇文章通过秦汉和苏联的对比，切面式地探讨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文化革命的看法。这种讨论对有相同理论困惑的同志深入思考大有裨益。文章的不足之处是，未能深入展开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托派经典文本《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关于社会权利关系 及其变革规律的常识性讨论



：熊猫卷落刀

本文使用的主要问题是关注这个问题的网友早就知道的常识，和一些大家都能看到的现象（因为我也只知道这些），还有在别人的文里看到的历史论述之类的；有些是猜测。本文分析的出发点是权利的来源、经济基础的核心和每一个人进行决策的条件，希望可以为一些问题提供思路。

最初是为了回复从乌有之乡收到的一封邮件。当时对左派的信息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感觉到左派的分化。除了研究理论的，实际在做事的左派好像是有三部分，协助维权的部分、以组建合作社等方式做经济的部分和直接针对国家政策的在网上声音和影响力比较大的部分。可能是我看的太少（现在看来不是这个原因），第三部分的左派没有表现出和其他左派足够的协作和联系，我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因为自己也想把问题搞清楚，所以开始写。由于边想边写写了好久，前后的深度和重点会不太一样，可能会出现后面纠正前面的情况，所以重在思路。

结果全是一些常识性讨论。要说有什

么贡献，就是杜绝末日情结，把浮躁的心沉静下来，区分现实和受到他人影响的想象，把关注的重心从平民只能打酱油的领域，转移到一向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争取权利的方式和组织技术。

一、经济基础的核心，“成长” 和“权利”的概念和一些简单推论。

左派和右派使用的各种理论，如果不能具体到对每一类人的分析，就会忽略力量的来源，忽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不只是财富分配、生活水平这些，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每天要做和能做的事的最直接的要求，也就是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人满足各种规则的要求、得到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利、实现各种愿望（也包括改变规则这样的愿望）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必须满足的各种规则的要求，这些才是经济基础的核心。简单的说，就是了解规则、得到权利、实现愿望——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做或经历的，是价值

判断和行动标准的形成过程，所以也是各种保守和变革力量的来源。

自有社会分工以来，人为了实现各自的愿望总是要进行交换或合作，一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其他人的某些要求，同时也能给其他人提出要求。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关系，保证要求被实现的权利也就是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利，也就是政治权利和“钱”。可见调动社会资源的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其他一切权利都是它的特殊形式），它是指向人的而不是指向物的，最根本的效果是决定自己和其他每一个人在什么时候花多少时间做什么事（要）得到什么结果，权利的大小在于能以多大的效果参与到多少人的行动决策之中。

任何以改变社会权利结构和经济秩序为目标的变革必定面对着两个问题：第一是，变革影响的人越多，需要的权利就越大，那么如何得到进行变革所需的权利；第二是，改变社会权利结构和经济秩序意味着各群体得到的社会资源的量和质都要发生变化，怎样变革才能使各群体的权利相应地发生变化以使他们（恰好）能调动这些社会资源。即，进行变革的主体的权利问题，以及变革后各群体如何得到并保持新权利的问题。

当进行变革的主体和变革后权利最大的群体是同一群人时，这两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并且也得到了解决的方法，就是，这一群体的生存、成长和发展。

我用上面这些观点粗略的考察了一下历史，认为“成长”和“权利”确实是很重要的概念。权利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体现，而“钱”可以说是一种特化的（政治）权利。“钱”用政治经济学的说法是“价值”，是社会属性的东西，劳动价值论用时间作为度量价值的重要标准，这种倾向和政治权利平等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权利决定行动，而这些权利只能用自己或自己能影响的行动交换得到，因此人的时间是最基本的度量标准，在这一点上“钱”和政治权利完全一样。

从意志到权利表达有一定的过程，即得到权利和使用权利，这些只能在一定的

社会组织或社会系统（比如市场和货币系统）内进行——这里说的是权利系统而不是名义上的组织。在一个组织（或系统）内只能得到对这个组织内的人的权利，对另一个组织内的未必有效；但是一个人同时在多个组织中，通过恰当的方法可以协调多个组织。

人所有的行动都需要其他（人）行动的支持（这体现了人的相互依赖）也就是需要权利，所以要用自己或自己能影响的人的行动来获得权利（这是他人对自己的依赖），用权利来决定或影响（自己和）他人的行动（这是自己对他人的依赖）：权利的一种存在形式——被依赖。同时人所有的行动都需要其他（人）行动的不反对，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才能确保得到预计的权利，选择是否反对、是否改变和破坏（对别人来说很重要的）社会组织的权利是权利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威慑（其中也包括武力）。

能威慑或能被依赖的人才能自己争取权利。依赖和威慑关系的宏观反映就是社会的权利结构和上层建筑。

二、变革需要关注什么，成功和失败的变革有哪些特征。

通常成功的变革：

特征：新的生产工具，新的产品和服务，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的提高、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的提高，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管理和协调方式——这些（对某些群体）意味着更好的产品、服务和生产效率，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但是（对另一些群体）也可能是兵器，财源，更多的成长和发展的可能性，新的社会权利组织或系统，甚至是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权衡自己能控制的有限的资源用于自身的长远发展还是某些能更快得到的利益。显然自身的长远发展也包括某些与自己相依赖的群体和新的生产组织关系的成长，在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下，上层的人必须权衡花多少资源用于支持或控制下层的人在各种意义

上的成长，下层的人也要考虑给未来投入的方向及是否要换个环境（如果能换的话）之类的。上层的竞争和下层的竞争在任何时候都使得社会更容易处于某种新的或既有的平衡状态，超过自身能力的想法和陈旧的价值观都会被淘汰或约束，变与不变的界线则在于是否有能带来新的竞争优势（在得到利益和吸引人加入或支持方面）的新事物，也就是是否能形成新的依赖或威慑关系。而这种新事物，绝对不是什么追求自由或理想的精神，精神一直都有。

通常失败的变革：

第一类特征——变革的诉求的表达，既不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也没有以进入或接触权力机关为直接目的；变革者本身不是政权组织，却希望越过政权组织直接领导国家机器（虽然在表达诉求的时候想象了一个最高领导人或团体的对象）。变革者忽略了几件事：第一，表达各种诉求的人和群体是非常之多，而且从价值取向到具体的理论和解决手段都有相互矛盾的，政权组织和国家机器必须判断哪些问题更重要或更紧迫，哪些具体理论和解决手段更切实有效；变革者花了很多时间也只是看到了最浅显的问题，而且还能理解这些问题为什么至今没有解决，仿佛政府有无限的能力而且经常不使用一般。第二，变革者自己在政权组织之外，但是其他人和群体很可能是进入了政权组织的，变革者对政权和国家的运行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别人在关注什么、需要什么、根据什么作出决策，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影响别人的决策。第三，当这样的一群天真任性之人聚集起来发出声音时，其实相当于企图建立新的政权组织形式，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既无相应的权利和能力，也没打算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二类特征——变革的主体选择换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但（这些变化必定引起依赖关系的变化，由于这里说的是失败的变革，）这个社会“试验”并不在其他权利更大的群体的允许范围之内，变革主体的选择使得他们原来能提供给其他群体的利益大大减小，其他群体对变革主体的依赖性也大大减小。可能还有别的缺点，比如

占用资源、破坏原来的社会权利组织、妨碍其他群体的正常生产生活和“正当”权利，于是在其他群体的眼里，共同利益已经大大消失，进入了敌我分明的状态（显然已经出现了政权之争）。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两拨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阻绝了，只有自然关系，所以陷入像动物一般野蛮的战争中）。此时，如果变革主体没有武力保障安全，将会非常危险（历史上多次发生，因为变革主体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有什么影响，所以也不知道会被针对）。至于变革者自以为的目的是拯救世界还是落草为寇，对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成果被窃取”的变革与历史的反复；被欺骗或背叛的变革——对名义上的变革者来说是失败了，因为他们并不是主导变革的第一实践主体，可能都不算是实践主体。他们以为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得到了其他群体的支持，但其他群体只是需要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只行动，但不要求权利。变革者不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局限在哪，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和主张对别人有什么意义，才会犯这种错误。失败的变革者的两类特征使得他们很容易为（长远目标不同的）其他群体打头阵，同时又对其他群体有很强的依赖性。

远离权利系统的高层的人和群体，很难了解政权组织的运行状态，不知道某些浅显的问题背后是什么，不知道别人的决策是如何决定的，所以既不能进行预测也没有足够的权利。同时也不懂得争取权利，以为权利天然就有，大小只在于说话之人的地位、诚意和人数，像求神拜佛一样。但其实（政治）权利就像“钱”一样是需要在特定的社会系统里赚的，一样需要生产和营销技术，而且一样会花掉。

三、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种种变化，权利结构由什么决定。

共产党领导的可以算作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生产组织无法切实到达的地方，或者经济被破坏到原来的国家机器和生产组织难以维持的地方。在特定的历史环境

里，社会主义在统合资源方面体现了自己的先进性，但是在权利结构上则没有表现出先进的地方。即使有廉洁的政府和凝聚力强的军队，也同样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国家机器的原则只是“效率”，政权组织才能决定什么是“正确”，虽然很多实践主体（比如官僚系统）都依附于国家机器，但毕竟是不同的东西，国家机器（一时）的表现与权利结构无关。而且限于艰难的战争时期的生产力水平也没有多少需要特殊化成专属于某个阶级的东西。结果是，当时从国家机器的表现上，难以区分人民是否普遍得到最大权利。比如在苏联，之后苏联改革和解体的过程就充分说明了苏联的无产阶级是根本没有进入权利系统的高层：不了解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了解其规律，不了解外交内政，不了解顶层设计的目的，看到端倪后也无法阻止。

任何制度如果在建立过程中忽视了真实的权利，就会难以维持。人是会死的，有形的物质财富甚至知识可以很容易的传递下去，也可以很容易的赠送或剥夺，法律法规也可以暂时强制维持或改变，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继承和改变却必须通过人的成长。当时的共产党没有改变权利结构，也没有培养无产阶级自己去改变，在制度中保留的资本主义职能一定会反映到人的成长和发展中而且一定会被充分使用。

这里牵涉到社会权利关系的核心。先单从“钱”来看，在社会化大生产下，生产单位是为其成员争取权利的组织，生产单位创造的物质文化财富（符合别人的要求）使得他们可以被依赖，得到的权利则用于要求其他生产单位创造出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产品。“价值”是个人为生产单位全体创造的权利，而“钱”是实际得到的权利，只有在结构最扁平的情况下才会和“价值”一致。阶级理论（从本文的分析角度来看）实际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产品（和服务，甚至包括销售过程）在刚生产出来时都属于资本家，必须通过资本家的工作才能换成别的，所以资本家的要求能优先被满足，劳动者则对资本家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把货币过程省略，

经济的中心就是为生产单位作决策的人之间的谈判，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家之间的谈判，显然每一个资本家都必须优先照顾其他资本家的要求，然后才是劳动者，利润即资本家的消费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动力。市场开发部门的人最接近资本家的职能，所以位于产业链的高端（也最有可能晋升为资本家），但是能决定一个生产单位的大小、经营范围甚至存续能力的只有资本家。

把“钱”一般化成（政治）权利，上面的讨论依然适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人物的权利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他的支持者的权利的提高，他的支持者的热情也未必能帮助他；作为参与多个政治势力之间的协调和管理的人，他的权利并不单单来自他所属的政治势力，而且还来自势力之间的关系，只是因为势力之间的关系常常表现为利益对抗才会有那样的错觉。）

提高整个劳动者群体的权利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劳动者普遍有效地进入生产组织的上层，不可能靠简单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或改变所有制法律来实现，即使强行取消掉货币也一样（货币的消失，不论是自动还是强制，不论用何种计量方式代替，一定是“钱”还原成一般权利），也不可能靠简单的提高劳动者（的代表）在权力机关的比例来实现。只要作为整体的劳动者在每一个单位里都远离决策，他们就不可能提出能有效指导全国生产单位达到他们的目标的方法（因为连目标都不一样），只能借助于国家强制力。

但是生产组织的上层（包括生产单位的协调和管理）位于政权组织的核心（生产组织的运行包含了一切依赖关系）。国家机器虽然有维持和改变重要规则的职能，但基本上也是为生产组织服务，掌握生产组织的人谈判的结果就是国家机器（包括权力机关）的人收到的命令（虽然有些谈判在国家机器中进行）。在生产组织中原则上做不到的事，即使有国家机器的支持也一定会失败，把生产组织中的争论延续到国家机器中只是把问题向后推了。如果生产组织的上层不重视某些事，即使是政府

部门也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资源去做。法律对国家机器（包括权力机关）的规定、对所有制的规定和保护属于上层建筑，社会福利也是上层建筑，不管他们在宏观调控和维持稳定上有多少大的作用，都不能代替经济基础。

上面的讨论对民族资产阶级也适用。即使是最先进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也只能配合新事物的到来，而不能自己创造新事物。

从国家机器的诞生和演变看，生产组织的地位确实在国家机器之上，国家机器其实是从生产组织的中上层特化出来的机构。现代国家机器承担着大量的责任，但是相应的权利却在生产组织。连接国家机器的责任和生产组织的权利的社会活动，就是政治势力的权利来源。

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处境与苏联类似，工农兵代表在 1975 年之前的人大占了多大比重我没查到，但是在 1975 年是占了大部分，如果在之前也是这样，显然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推动文革的严重的社会矛盾是常年积累下来的，可见当时的劳动者并没有真的进入政权组织的上层。我不知道现在党内的（姑且这么称呼掌握政权的人）左派和右派是怎么诞生和演变的，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也不知道邓小平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斯大林呢？如果没有斯大林，苏联会在什么时候解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劳动者和民营资本一直远离政权组织的核心，权利最大的群体只能是来自官僚资本。民间的左派和右派都很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每一个进入国家机器的人都或多或少的与某些生产单位有关系，尤其进入权力机关的人就是他们推举出来的，即使以最善意的角度分析，党内的左派和右派为了支持民间的左派和右派，也一定需要官僚资本的协助。

（目前国内的实践主体主要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左派和右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农，也就是党内和民间的左派和右派，他们的组织技术、权利大小、利益来源，以及群体和个人的可能的成长路线都有很大的区别。最强的两拨势力之间的真实的争斗与他们表面上宣传的不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某些特征一样，这点和美国类似。社

会在左右极端中摇摆失望愤怒动荡循环什么的，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每一个人都是在已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争取发展和权利。）

四、秦汉，历史上和现在的扁平化，生产单位与国家机器，权利组织，割据与反割据，“现代”国家的特点，国家主权，普世价值。

历史上为了把权利结构变的扁平的尝试，我看到的有三种。

扁平化的第一种尝试：在中国古代王朝，家族之间相互制约。这些家族包括小家族、大家族和皇族，同时是生产单位和政治势力，遍布全国且数量庞大。由于当时的经济特征，在宏观上很容易形成大小割据势力，微观上个人日常的需求都能在家族和邻近的家族中实现，较少需要通过陌生人，家族内部与各家族之间的权利关系比较明朗（当然他们用的不是“权利关系”这个词，而是“道”和“助”）。

从东周到汉，技术进步和大规模平民战争推动世袭等级制的崩坏，贵族系统逐渐被新生的官僚系统取代，平民得到土地，形成中小家族，个人和中小家族的权利上升；原先平民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制度消失，家族被秦制打散成小家庭，个人利益得到注重甚至利己主义泛滥，为了约束利己主义出现了严峻的法律；起义推翻了秦朝并再次形成家族——因此到了汉初，皇族和政府面对的是，经过了全面利益对抗的、数量和权利都很庞大的、非常了解自己利益所在的家族（可以想象，其他朝代和政府初期很可能是类似的局面，这对政府和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很关键）；在重新建立的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也存在着社会管理方面的要求。

秦朝将贵族的权利大量转移到民间之后，以新生的官僚系统为主体的政府，一方面大量行政权力集中到中央，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民间之间缺乏有效的权利组织，生产组织的权利和国家机器的责任之间第一次出现了分割（在奴隶社会和严格

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不存在这个问题) (《孟子》经常大段大段的说不要妨碍平民)。分割的影响非常巨大，在政府方面，秦朝政府用武力控制经济秩序的尝试失败了(因此整个国家的职能都坏掉了)，之后的政府要加强中央集权和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以及避免割据，只能更多的使用超越利益集团的经济政策、人事制度和国防计划等(这些都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既是统一的优势，也是促进统一的力量);在民间，家族作为整体不能允许国家机器违背他们的利益，但是每一个家族都希望影响国家机器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和民间共同促成了(通过儒家)规范家族内部的规则并推广到社会。政府需要秩序、形象和权威，民间需要进行基层自治，需要在政府面前保持家族的地位。最终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有两个特征：个体的利益性和政权的超利益性，即每一个个人和群体都可以通过国家机器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国家机器却不能偏袒任何一个。如果社会管理失败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贫民会有变革的要求，而豪族也可能形成割据势力。

经过多个朝代的尝试，据说在宋朝，已经出现了一种方法，通过限制各级官僚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可能同时限制到官僚系统和大家族利用国家机器的渠道；这样的制度下的官僚系统一定会反过来限制皇族——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皇族和其他家族允许这种局面出现，就说明利用腐败官员取得财富已经成为非常规手段，他们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在长期的博弈中已经形成了动态平衡并固化成制度。宋朝究竟做到了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总之，但是，王朝的这个尝试没有最终完成。很可能因为短期内创新太多，没有完善的方法和秩序，缺点一大堆，反而使得军事力量处于虚弱期，被尚处于奴隶制的蒙古打败什么的，这些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从权利的角度上讲，在古代扁平化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哪些是关键的？

在奴隶社会和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生产组织的上层就是国家机器的直接建立者和领导者，甚至就是国家机器的主

要成员，财富和国家都属于他们，这时候可以很清晰的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者的经济活动全都在其他地方通过议会或市场之类的东西进行，被统治者基本没有自主的经济活动，所以国家唯一的作用就是用强制力协助统治者，而没有特殊的经济职能。统治者内部的扁平化也是扁平化，但不是本文关心的东西。

王朝的第一个突破，是在生产单位这一基础层次上改变了权利结构，家族的形式成为了生产单位的主流。从贵族到家族有很多变化，对于国家机器来说，由于家族的数量很多，而且家族内部的结构比较扁平，它的直接领导者已经不是生产组织的上层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部分，大部分生产单位的日常运行和协调管理都不需要国家的直接领导者的参与，而且大部分生产单位也不属于他们——这是非常重大的变化，在之前的社会，国家的开支直接来自统治者，命令也直接来自统治者，由于是统治者处理自己的事，这些命令一定是“正确”的，而且简单具体直接；现在不同了，国家机器需要财政来维持自身的运行，皇族和民间都需要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和影响他人决策的经济政策，并且进行这些活动只能靠专业化的官僚系统——这时的国家机器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经济职能，被赋予了新的社会责任，并且成为各个势力的必争之地。

在王朝的尝试中可以看到，改变生产单位是改变社会的第一步。国家机器一定要为生产单位服务，生产单位一定会去掌握国家机器，秦朝皇族不知道自己在交出生产单位的同时就把权利交出去了，虽然一直在限制家庭规模，但是在如何协调管理别人的生产单位上完全没有经验。

变革者必须清楚，生产单位是争取权利的组织，而现代国家是一个协调管理别人的生产单位的途径。生产组织的上层，也就是为生产单位作决策的人，是政权组织的核心，因此生产单位的权利结构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的权利结构。掌握生产单位的人能接触到权利关系最关键的东西，所以他们一定会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所以很多事的关键不是

国家机器应该怎么做，甚至不是怎么让国家机器这么做，而是如何使生产单位要求国家机器这么做。谁最能控制生产单位，谁就是第一实践主体。

怎么知道谁最能控制生产单位？不知道如何做最符合自己利益的人，一定不是控制生产单位的人。

(这里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1.划分社会形态：从生产单位的常规结构、国家的直接领导者在生产组织的分布情况、已经形成法律和制度的国家责任和职能这三者结合的角度。2.把国家的直接领导者掌握的生产单位和民间的生产单位一样放到国家机器之外，从两个角度分析政权组织：生产单位掌握国家；国家协调管理生产单位。)

扁平化的第二种尝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企业之间相互制约。西方没有经历中国古代王朝的“现代”农业社会，而是直接从等级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在科技和组织技术上，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简称为现代社会，有很多不同，这些不同造成的结果归纳起来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生产单位内部的规则和权利结构——直接关系到下层的人如何争取权利。与家族相比，以拥有者的目的为第一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结构显然不够扁平，很多企业也没打算或很难承担类似于家族的责任。在“现代”农业社会，打工不是基本的生活手段，虽然打工者不是主家的人，但是家族的规则也能保护他们的权利，因为主家和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主家内部的关系都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主家的人如何对待依附于他们的人，对主家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或人情世故，或市场环境）。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企业成为争取权利的普遍组织，找工作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果企业的规则没有包含为员工争取足够权利的内容，不管劳动者在企业之外通过什么方法争取权利，都会形成明显的阶级关系。一切缓和阶级关系的尝试都是希望劳动者只通过所在的生产单位争取权利。

第二个方面：生产单位之间的规则和

权利结构——政权组织、割据、反割据和国界。在等级社会基本没有割据问题，自己领地里的事自己管。在“现代”农业社会，资源的个体积累和垄断经常以土地兼并的形式出现。正常情况下，土地兼并的规模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严重和普遍的兼并会扩大贫富差距而且形成明显的阶级关系，过程和结果都不符合家族的规则（土地兼并的过程很可能比较黑暗；失去土地的人需要依附于兼并土地的人，经过大兼并后的生产单位不再是简单的家族，而是家族企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前面有说到，“现代”国家出现初期，由于直接掌握大部分生产单位的人与直接掌握国家机器的人不是同一群人，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必须建立与等级社会不同的权利组织。“现代”生产单位会自动形成生产组织（因为需要相互协调），加上可能存在的依附于其的暴力组织，就是地方（和跨地域的）权利组织，具体方式和其作用要看科技水平和组织技术。在王朝，所谓建立中间权利组织就是把地方权利组织和中央政府连接起来，中央通过它参与地方生产单位的协调管理活动，地方也通过它影响中央。

这里有一个问题，政权必须是最强大的势力，政权组织只能是最强大的势力的权利组织（包括与其他势力的关系），国家直接领导者为了防止政权被取代，就要避免强于自己的势力出现。等级社会是贵族分封天下，皇族只需平衡少量的几个势力并确保自己有能力与个别势力进行全面对抗就能维持自己的地位，“现代”国家由于直接领导者的权利较小，为了政权不被颠覆就必须增强自己或使其他单个势力的权利更小。因此汉初的皇族和政府必须考虑：1.民间的生产单位一定会约束国家政策和财政收入，强行控制经济秩序需要军事和经济力量，而这些又都需要国家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大的权利需要多的收入，多的收入又需要大的权利，只要民间的生产单位卡住经济利益不放，皇权和中央贫弱的现象就会持续存在。要使民间放弃一部分直接利益，政策必须符合他们的长远利益，也就是，不能特别用于增加皇族和官僚的

私产。2.大兼并将使得地方权利组织的结构变得尖锐，首先会诞生强大的家族企业，其次少量的贫民不可能对抗地方豪强，只能依附于豪族或跨地区汇聚成暴力组织，而暴力组织也可能依附于豪强，总之都会动摇政权；处理这些又会遇到上面的矛盾。3.要通过官僚系统（而非直接由皇族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防止严重的兼并出现，需要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区别于等级社会）来规范生产单位的活动。当时生产单位的常规形式有家族、家族企业和小家庭，新推出的标准要能对一切生产单位进行引导或约束，同时也不能过多限制皇族（由于家族企业是最强的类型，皇族一定是家族企业）和政府获取财政收入、控制经济命脉的途径。

最后归结到两点：大量的中小型生产单位，并依靠这些较小的生产单位制约（民间）大型生产单位。最终，汉朝皇族和政府选择通过特定的国家政策和国营企业来实现国家的经济职能，而不是通过皇族企业，同时规范家族的规则作为当时的普世价值，鼓励形成大家族，皇企和国企自身则把权利结构扁平化，在上下两方面约束民间的家族企业。扁平化的家族企业难以集中足够挑战政权的权利，皇族放弃一部分直接利益（反正也无法得到），依靠较公正的官僚系统反而能维持自己的地位。皇族和政府不需要得到与整个民间进行全面对抗的能力，也不可能得到这个能力。

我应该把上一节说的话改一下，汉初的皇族和政府不仅面对着家族，还面对着随时可能变成割据势力的家族企业和贫民，这样更现实一些（之后每朝的情况和经验积累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即使是皇族也没有进行全面对抗的实力，皇族和民间的大型家族企业都需要把平民拉进自己的阵营，通过规范生产单位的规则恰好能达到平衡。我以前把古人想的太简单了，

“以仁孝治天下”和“名正言顺”有很多的内涵和现实意义。看来中国的领导人没那么好骗啊。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外交上也是如此，王朝的汉人会向其他民族传播完整的家族规则，帮助少数民族建立符合他们自身经济条件和文化但是更先进的——

同时是更接近汉人的生产单位，再进行平等的经济文化交往确立利益一致的关系（所以汉人的文化容易得到认可和传播）。但是在面对自身很难扁平化的民族时，这种外交手段就遭遇了重大挫折。

总之，由于国家的直接领导者的权利远低于等级社会，所以“现代”国家会使非军事的国家政策进行反割据，而反割据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人民长远利益”和“扁平化”，鼓励大量的较扁平的中小型生产单位，以国家的直接领导者所直接掌握的大型生产单位为榜样，在法律法规和各种市场（包括人才市场）上对民间的大型生产单位形成压力，要求他们承担社会责任，这样国企和各种政策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前提是，较扁平的中小型生产单位能够普遍存在，而且国家的直接领导者的权利较小，但恰好能掌握国家。

与农业社会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很多等级社会没有的东西，某些能在实质上建立政权组织的活动还没有得到公认，相应的某些挑战政权的活动也没有成为明显的违法行为（我后来才想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特征其实是等级社会的--）。生产组织结构尖锐，同时高层普遍的既不是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也不参与基层自治，所以不承担社会责任，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国家机器的责任和生产组织的权利的第二种分割状态，相应的会有第二种“地方”权利组织和中间权利组织，即资本控制政府。等级社会用武力维持政权组织，也可以用武力推翻或监督，现在则更多的靠非武力的力量进行统治或领导，要监督还是替代政权都不能靠武力（单凭武力能带来的社会进步从未存在过）。现代社会军事是后援，经济是前线；后援是前提，但是不能替代前线。

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主义的权利问题变得更麻烦，传统国界圈定权利范围的作用丧失，新的国界（也就是国家主权）观念及其职能还没有成型。大国可以把塔基扩展到其他国家，既不平等也不吞并，在不进行扁平化的前提下也能使本国下层的人单单通过生产单位就能取得足够的权利，而弱小的国家又没有自主的外交内政，

在侵略和反侵略的力量达到平衡、侵略空间压缩到极致之前，很难真的发生扁平化。所以各国的大部分平民都只能选择爱国。

现代资本主义的尝试才开始不久，正处在建立现代社会的关键时期，很多思想涌现但还没有成型（也许只是不公开）。自由主义者就像汉初的儒家学者一样，不停地强调民间生产单位相对于政府的地位，认为应该以企业的实际发展需要制定法律，这是他们唯一的进步之处，但是之后要怎样他们是完全没有想法，而他们提出的“普世价值”缺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距离完整的企业规则还差得远，不可能有效规范经济和政治活动。以结构尖锐的生产单位的不完整的规则为依据设计的制度，会让权利关系变得更不明朗，让下层的人离政权组织的核心更远，所以接受“普世价值”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整个国家不能从全球的下层进入上层（其实现在宣传的“普世价值”的前提之一是统一全球而不是不统一状态下的全球化），国内也会反扁平化。如果资本主义发展顺利，以后总会出现包含资本主义企业完整规则的普世价值理论。

扁平化的第三种尝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公有制的生产单位相互制约。现在普通人对公有制的反感在于：个人什么都没有，很多事不能做，又找不到要变革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总觉得被压迫却找不到反抗的具体对象，只要框架留着，永远也没有光明；总之，“有关部门”和“国家规定”这些东西，永远都那么遥远——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专制统治哪有这么容易。没有什么是突然发生的，社会一直在变化，具体规定，不管是牵涉到数字的规定还是其他法律法规和政策，是一直要改变的，改变要有依据，这些依据就是各方势力的活动舞台。较现实的是：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比较有起色后，有了经济实力带来的各种可能性就会有严重的分歧，各群体都开始反抗国家权威，而如果其他争取权利的渠道很少又没效果，生产单位为其成员（包括不同群体）争取权利的职能就会更突出。

各社会主义国家初期都使用了国家资

本主义来主导经济，这种方法可以在短期内集中起足够的权利。其特征是：生产单位本身的结构尖锐，直接掌握大部分甚至全部生产单位的人也直接掌握国家，但是国家职能又有缩小贫富差距甚至进行权利扁平化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有的，责任和权利的第三种分割状态。与此对应的是，第三种“地方”权利组织和中间权利组织，也就是实际掌握政府和生产单位的官僚架空名义上的权力机关的职能，乃至反抗国家法律。所以国家资本主义是个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天生有向官僚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根据在乌有之乡（他们对此不是很重视）和一些博客上看到的归纳出来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常运行后到改革开放前，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农村，基层生产单位要求提高地位和自主性与政府对其的管理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在国企，长时间模仿苏联的旧体制和新出现的扁平化改革之间的矛盾。与苏联不同，在中国前面几十年，国家资本应该没有切实进入农村，而且农村生产单位的权利结构比较扁平，农村的诉求使政府面对着秦朝政府曾经面对过的尴尬局面，而国企改革则是要完全消灭官僚资本的生存空间。

所以当时存在着两个方向的变革，一个是官僚系统主导的，想要维持尖锐的权利结构，一个是平民主导的，目标是提高农村（也许还有城里的？）基层较扁平的生产单位的权利和国企的扁平化。

事实是这次扁平化变革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前面说到历史上已有的扁平化的前提是“较扁平的中小型生产单位能够普遍存在，而且国家的直接领导者的权利较小，但恰好能掌握国家”。在领导者的权利较小时，中小型生产单位形成符合其特征的政权组织形式的趋势，和领导者反割据的需求一拍即合，但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系统的权利很大，他们有反割据需求吗？

但是是怎么实现的？太笼统的解释可不行，看上去最简单的发展趋势也要靠每一个人的行动来实现。当时每一个群体是

怎么想的，这么多人的个人行动如何决定整个社会的变革轨迹，为什么不同的历史环境会发生很不同的事？文革后保留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既不像苏联那样变为完全的官僚资本主义，也不像秦汉那样确立民间生产单位的地位和政权组织形式，之后的改革开放还有现代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些相同和不同具体是因为什么？常规生产单位（结构与劳资构成），生产力水平（各种生产单位能做什么），组织技术（形成社会关系的方式和特征），国际环境（出于外部压力必须做的），法律政策（行动和改变需要的依据），意识形态（日常交流和舆论战常见的应对方法），力量对比（科技和组织技术，人口，密度，地理分布，势力范围，对经济的干涉能力），人员构成（人事制度，民间与政府基层的思考方式），各群体可能的成长路线（权利来源，自身目的所在和倾向于作出的选择），等等，原因只能从这些里面找。

最好是能知道各个时代各个社会的人的真实想法、具体措施、实际效果，但我看的资料少，很多时候只知道有这么些人大概做了这么些事得到这么个结果，只能根据零散的信息（可能还有谣传和偏见在里面）比如上段说的那些，推测他们需要想些什么，能想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归结到各实践主体，就是要弄清这两方面是如何实现的：1.各人对自己、所在单位和社会前途进行判断，选择该有的态度，并由此去做一些事；2.各群体形成政权组织并抵制其他有冲突的政权组织——先不管相同政权组织形式的派系斗争，只看直接关系到社会权利结构变革的不同政权组织形式之间的竞争。

这两方面的实现过程，对政权组织来说，就是秦朝的“一民”（使什么为“一”）——使人只做对该政权组织发展有利的事，也就是政权/权利组织的发展。根据《商君书》的理论和建议（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秦朝政府把人从其他非生产性又高收入的行业赶到农业生产和军事即“农战”上，并让各种阶层的人都只能从农战获利。

当时有一个细节是，实行统一标准的法治并鼓励平民和地方官吏自己做出决断，虽然自行决断的不太可能是些很大的事，但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决策都包含在内，考虑到当时经济情况的简单（“一民”政策使经济更简单）和秦朝政府粗暴的政策，平民和基层官僚也能通过详细的法律和日常得到的信息对整个国家的情况有大致的了解，这样的社会和基层依附于上级并以上级为第一信息来源的社会有很大不同。

可以想象当时某些非生产性又高收入的行业——应该叫做第三产业或高端产品市场的，比如门客、说客、学者之类，还有娱乐业和奢侈品行业，这些行业的人姑且叫做中产者——可能和现在某些行业一样充满了各种合法或非法的腐败和黑幕，经秦朝之后要么消失要么规范化；腐败行业寄生于强权并且本身也是维护强权的工具，其自由发展下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其受压制下的政权组织形式有很大的不同。而“农战”是什么，是以武力得到和维持权利的政权组织的权利来源。

所以战国可能存在着三种权利组织形式（虽然只有领导者建立了政权），分别代表三类人的利益。军国高层领导者的利益在于版图、人口、生产技术，简单地说就是税赋，权利来源于他们所掌握的军事力量、自身的产业和通过贵族、官僚、中产者对经济的管控（通过权利得到利益）。中产者（包括他们所依附的旧贵族）的利益和权利来源在第三产业和其控制的生产性经济，其中也包括“纵横”这种行业（政客是商人的一种），中产者的武力（侠客之类）可能是原始的黑社会。平民的利益和权利来源在一般产品的生产和交易，他们也需要国家提供的安定环境和中产者提供的文化产品，但是大部分领导者和中产者都不以满足平民的需求为第一目标（可以想象当时儒家的生存状态），领导者的愿望是统治天下，中产者的愿望是统治领导者或与其共生。领导者和中产者支持的权利结构是尖锐的，平民则是较扁平的。

秦朝政府的政策在经济上消灭了旧的中产者，在政治和组织技术上用法治和专业化的官僚系统和新的平民自治关系取代

了旧中产者和旧贵族。生产水平、政府效率和军事实力大幅提高，最高领导者得到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平民的自主权得到承认，他们中的大部分本来就很难参与的第三产业和高端产业受到压制，平民控制的生产单位则得到增强，以此为基础的民间权利组织形式得到发展，虽然还没有建立政权组织（在后面全面对抗时期逐步建立的）。被迫上山下乡的中产者及其后人需要寻找新的前途，依附于新的政权组织形式，想必在秦末汉初也做了不少事。

这节写的像小说一样。。。两千年前第三产业和高端产业发生相对产能过剩，从人力、资源、产权、价值观各方面妨碍到基层经济正常运行，然后领导者、官僚和平民瓜分了旧中产者和旧贵族占据的权利空间，中产者理想的政权组织形式破灭，但是领导者和官僚只得到了暂时的财富和产能，对生产单位的实际控制权大量转移到民间。《商君书》里到处都在说如何削弱百姓，但所有的方法都是把旧中产者和旧贵族赶到“农战”，对最底层平民的经济权利不仅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反而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并且支持经济运行的规范化和扁平化。当这些改革完成，旧中产者和旧贵族的权利空间瓜分干净后，政府对底层平民的“压迫”绝大部分只能在经济协调管理活动之外，通过武力进行。

秦朝政府的国策本来是要一民，却为了得到强大的国家机器消灭了旧中产者和旧贵族结构尖锐、依附性强的权利组织，反而培养了平民强大、扁平、独立性强的权利组织，而且自己没有适应这种变化（可能牵涉到领导者内部的斗争）。这种强一不成反被一的故事太有戏剧性了（其他历史时空是否发生过类似的事？）。所谓历史的局限大概就是这个了。作为个人，权利是得到利益的能力，是利益的一种，但利益未必是权利，也许只会消耗权利；作为有特定社会关系的群体，可能得到了利益，甚至权利，好像一直以来的措施都是正确的，但如果政权组织形式被卖掉，就不会长久地产生出权利。

为什么平民能忍受暴政这么长时间？为什么那时会第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

义？为什么发展如此迅速？为什么不是更早或更晚？一个可能的解释，不是秦朝政府的武力统治有多成功，而是旧中产者和旧贵族留下的和生产水平进步带来的蛋糕太大了，领导者切蛋糕的刀还没有砍到平民的头上；在秦改革之前，百姓的生活已经很艰难（毕竟是战国），贫富差距已经很巨大，但是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没有新的政权组织形式，他们自己也只能通过旧的权利组织形式生活，反抗也只是换一群领导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领导者的更换一直都在发生。当平民随着秦制建立起新的权利组织形式，缓冲的利益空间也终于被领导者花掉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行动，而秦朝也就结束了。反抗是被逼的，不反抗也是被逼的，只是条件改变了，行为才改变。所以古代真正以平民起义建国的只有汉和明，他们推翻的是以武治国、经济单一的秦和以民族压迫恢复了部分等级制的元，用一种差别很大的政权组织形式替代另一种。

秦朝的故事告诉我们：1.权利组织形式就像不变资本，其实是权利（可以通过它得到利益，可以争取，可以消耗，可以卖掉）的一种，但是包含了比个人权利更丰富、具体、完整的社会关系，是各群体权利关系在组织技术上的反映，通常不能被个人所掌握——权利组织形式，就是群体的权利。2.与其他小范围的权利组织不同，政权组织的不同形式会相互冲突，但是，如果在生产领域（包括第三产业）普遍需要新的生产能力，而新的生产能力又需要新的组织技术——两者加在一起就是生产单位及其生产方式——那么先进生产单位替代落后生产单位带来的各种意义上的利益，可能会使新的组织技术有时间建立和发展新的权利组织形式，并且得到超过原政权组织形式的政治力量。3.除非武力悬殊到能用自然关系进行统治，就像人类统治某些动物那样，使用社会关系进行专制统治的唯一方法是：保证最普遍生产单位的尖锐结构，宁可增强自己的适应力、允许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允许不同的群体进入金字塔的上层甚至超越自己，也绝不能违背这一点——相应的，变革者出于

任何目的改变政权的唯一方法是，使普遍使用符合其特征的生产方式成为领导者维持自身地位的唯一途径。六国皆为秦所灭，而秦至少还有自觉变为汉的可能；旧中产者和旧贵族如果反应快，就该趁着改革的浪潮确立由他们掌控的新权利组织形式，也许他们已经这么做了，但是只能等到秦朝灭亡才走上前台。

我好像一直在写秦汉。。。东周到汉确实发生了不少变化，而且现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舆论、各种群体的生存状态，都能在那个时代找到既视感。如果我们穿越到以前，却除了歪歪什么也不能改变，那凭什么认为自己是现代人呢？难道古人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能超过现代人？这怎么可能？诸子百家除了腐败行业（以尖锐的社会结构为必须的生存条件并维护这种结构的），其他优秀的一部分也做了很多事，帮了或救了很多人，他们显然也研究过生产单位和生产组织，但是最终改变世界的却不是有理想化的理论的中产者群体，而是其他对社会权利关系更加敏感的实践主体。比古人更了解社会关系演化的规律，就是现代人的优势。

五、秦汉与苏联，政权/权利组织的发展，群体权利，专制统治的方法和限制，官僚系统与资本。

与秦朝相比，苏联是专制统治典型的成功案例。苏联后面几十年除了所有制和官方常用语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也就是生产单位的实际控制权、各群体争取权利的手段）完全是官僚资本主义，连国家资本主义都不是；虽然是计划经济，经过改革后各单位已经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居然连“在商店里买不到器皿、餐刀、餐叉、毛巾、小五金和其他大量需求的商品”（因为这些利润太低）和裁员加班这种事，平民都组织不起任何像样的行动来改变——这说明平民既不是主要购买者也不是真的销售者，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平民之间没有任何能形成群体权利的联系，不要说政权组织，他们连生产单位都控制不了，在他们能参与的一切社会活动中，几乎没有

包含进行生产决策的内容；在苏联统治者把集体农庄变为官僚资本时也非常顺利，后面苏联解体的过程完全在官僚资本的控制中，而这导致一场经济危机，平民（包括很多普通官僚）的利益被卖掉。由此可见前面几十年也好不到哪去（单就权利关系，不看生活水平）。原来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指能演化出这种现象的社会形态？难道他们的对方辩友说的也是指这个？

从苏联后期往回看，俄国人历史上没有经历过现代社会，全是等级社会（虽然沙皇时代废除了封建农奴制，但只是出于对劳动力流动性和通过内需进行资本周转流动的需要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似乎还伴随着封建领地的权贵私有化，而且时间很短，几十年后就是十月革命），苏联是俄国人第一次以平民起义建国，没有现成的现代权利组织形式可以使用。既然能导致后面的结果，想必苏联建立前期也没有进行足够的扁平化。根据网上的信息，俄国革命确实缺少新的生产方式和权利组织形式，依然用的是“古代”工业生产方式；俄国人推翻沙皇政府、击败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用的主要是罢工、游行、武装建立政权和军事对抗之类的方法，这些无论是直接针对政权的，还是针对所在单位的，都是在生产单位之外争取权利的途径，只能在社会矛盾严重、平民利益完全一致、不需要细致的要求的时候有效。俄国人追求自由的心是真的，但是在苏联建立时沿用沙皇时代等级制的生产单位，在解体时又沿用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单位，既然在这些生产单位中，平民都没有足够的决策权，那他们参与社会协调管理的权利从哪来呢？在秦汉这是政府担心的事，而在苏联，这是每一个平民都要面对的实际问题。苏联的官僚则很小心地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维护等级社会的制度遗产，在每一个生产单位里都严格的区分上下层，不同的群体做完全不同的事，进入完全不同的市场，参与完全不同的社会活动，平民的福利得到保证但是只能做不得不做的事，缺少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永远处于被驱赶的状态。

每个人都根据所在生产单位（包括第三产业的，比如媒体）的经营目标和结构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生产单位的结构决定着各群体有多少时间参与社会的协调管理；对上层的人来说，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而下层的人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利就没有多少时间在生产单位之外做这些事，甚至都没有时间接触这些。苏联的平民得到了高福利，但实际权利依然由少部分人掌握，不需要特别的阴谋，也没有什么笼罩社会的神秘力量，只要每个人都充分利用环境条件，就能确定后面演变的大致方向。虽然后期的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但平民既不是主要购买者也不是真的销售者，类似于有私有财产的奴隶，和秦朝相反，当社会生产水平上升，特权的空间不是缩小而是变大——所以会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只能用于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社会；所以自由主义者说社会主义是用福利换取对人的统治，必将走向奴役。

苏联作为反面教材很好的说明了在没有新的生产单位（及其生产方式）的情况下用现在常见的“民运”和“洗牌”改变社会的想法是多么天真（但是第一次革命得到了高福利是事实，只更换了最高层的组织）。苏联腐败和解体的过程完美的诠释了专制统治的方法：在生产单位内部限制下层的人争取权利的途径，在生产单位外部给以一定的利益“贿赂”，并把他们有限的注意力引导向不能为他们自己有效争取权利的方向——统治者找了一系列既符合平民的心理需要又符合自己实际工作需要的理论（有各国统治者们的合作），等前期准备一步步地完成，社会矛盾也达到可以激发的状态，平民、学者、媒体的工作人员甚至普通公务员都觉得丑恶的专制统治将结束好日子就要来了，即使没那么快也不会变得更糟，虽然我很怀疑他们有多少信心，但在每一阶段一点反对的动力都没有；事实是平民的个人权利不断被消耗，群体上也没有形成自己主导的权利组织形式，官僚资本的权利组织则运转良好，需要的制度设计都已完成；平民的生活稳定而安逸，远离政权的核心，再配合舆论控

制，于是苏联的整个腐败、解体和经济危机过程，就是官僚资本稳扎稳打闷声发大财——一切有可能使平民接触到权利关系核心的活动都尽量娱乐化和肤浅化，享受生活和应付工作之外皆是八卦（各种意义上的），虽然一只眼盯着政治，但尝试过“反对”的人不认为自己能改变什么，没尝试过的人也得不到任何经验积累，所有能理解能做到的可能性都在控制范围内。“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已经成为各国统治者的常识，而我们的学者到现在还在批判秦朝政府不让人唱歌这种表面现象，难道平民是靠唱歌推翻了秦朝？

（与苏联类似的是全球原来作为殖民地的国家，即使在独立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遗产——经济高度依赖进出口，等级制，文化低，民族矛盾等——虽然他们废除奴隶制好像比宗主国更快——也使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人很难开发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的生产单位和权利组织形式，极大地扼杀了他们在国际争取权利和国内扁平化变革的可能性，宗主国们依然统治着殖民地。相比之下，俄国人还算幸运的。）

但是专制统治的某些限制也在苏联解体后暴露出来。苏联统治者选择用一场经济危机作掩护掠夺国民财富，由官僚资本转变为（真正私有的）寡头垄断资本，这个过程根据刘军洛的信息是通过大量出口石油和粮食和控制金融人为制造恶性通货膨胀（有钱买不到东西）、通货紧缩（使还未被权贵得到的生产单位破产）和汇率变化（可以走私美元廉价收购国内资本）来实现——在官僚资本统治全国的权利组织运转良好时突然崩溃掉基层经济，对大量人口而言生产单位为其成员争取权利的作用突然丧失，新的寡头资本统治全国的权利组织形式尚未成型——这是权贵资本一辈子利润率最高却最弱的时候，他们当然会尽可能控制住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政府已经成为平民（包括普通官僚）争取权利的第一途径，领导者要（各种意义上）稳定基层也只能通过政府，权贵资本自己把国家机器和官僚系统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培养出了强大的竞争对手。

这里暴露出来的专制统治的限制是：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别人往下赶，但是却很难往上赶。为什么这会成为限制？根据前面的分析，1.权利组织形式发展的方法是把人从其他权利组织形式赶到或吸引到本权利组织形式，让人只能或更想从这里争取权利。2.以第一条为基础，专制统治的方法是以尖锐的结构把人从上往下赶，但是不能违反第一条。无论一国内部还是国际，常用的方法是（很自然的用价格等）制造两个割裂的市场货币循环，在生产要素和消费市场区分统治者和平民，但是要保证基层经济的循环。3.（实际创造财富的各种意义上的）生产单位是人争取权利的最普遍最常规的途径，而且生产单位某种程度上的正常运行是必需的，恰好生产单位也有各种可能的结构。从个体户的发展规划，到国际资本的全球产业布局，一切生产单位的正常运行，都会很自然的形成权利组织形式的发展和社会权利结构的塑造。而如果最普遍生产单位的结构是尖锐的，他们的正常运行就会很自然的把大量人口赶到社会中下层，这个过程即使导致社会基层经济崩溃也很正常（生产组织的上层真的会为了自身利益破坏生产单位），因为，为不是其成员的人争取权利不在生产单位的常规目标中，而对于相当部分的生产单位来说，社会中下层既不是其主要目标客户，也不是其所必需的成员。

但是，社会中下层的人必须争取权利，对别人没有利益的结果是别人也不再需要你。在不能用自然关系进行统治的时候，生产单位的尖锐结构的常规运行会成为整个权利组织形式的短板，新的权利组织形式会乘虚而入，上层也必须做出一些改变防止对自己不利的权利组织得到机会，总之社会一定会做出一些机制来监控基层经济的状态。资本主义（高流动性，只在需要的时候将人的创造力和劳动力最强的黄金时间纳入生产单位）可能使这一短板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奴隶社会，解决这一矛盾不可能靠它的常规运行，只能改变生产单位或在高层创设新的社会部门。监控基层经济的新的社会部门的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种：1.通过国家机器，即给国家机器赋

予新的职能。如社会基本福利（对个人），政府购买、政府投资（对生产单位），修订法律，军事管制之类的。2.通过金融机构的协助，非政府非营利机构的慈善（对个人）和资金（对生产单位）支持，商业保险、养老金（对个人）之类的。这两种方法的基本组织技术特征不同，但是资金来源、机构设计、人才选拔、决策制定、日常运行、权利结构可以做到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可以由相同的群体主导，而且都做着大规模资金的运作，可以同时实现别的目标，比如控制产业方向、政策倾斜之类的——这些别的目标不是新的。

在剧烈的经济危机下，能对基层经济起稳定作用（一方面保护平民的利益底线，另一方面主导政权）的方法似乎只有国家机器能做到，因为只有国家机器能强制进行再分配。由资本主导的经济手段，除非把机构变得和国家机器一样，设立中央权力机关，或者有强大的阴谋组织，否则很难以资本家个人意志对抗资本组织技术挽狂澜于未倒，即使在前殖民地国家，为避免平民倒向其他权利组织形式也使用了“钱”以外的力量。但官僚系统一样有资本的种种权利关系特征，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原来我还没有分析这个。。。）

一般大公司从职业经理人到一线人员之间的机构都是官僚制，从公司官僚和股东的特征和关系，从公司和政府的差别，可以看出（政府）官僚系统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特征、区别和联系：1.争取权利的方式，行为和价值倾向。资本家的权利来自对资产的直接控制，所以要通过增加自己的资产争取权利，而普通官僚不掌握资本，完全靠行为表现（有利于他人）争取权利系统内他人的承认和依赖。相应的在各种合作关系中需要考虑的因素也不太一样，大资本家的过往表现，如以前合作中给别人造成的损害通常不被纳入考虑，越是寡头垄断的状态越是如此，而普通官僚时时存在因造成他人损害而被替代的可能。官僚资本有两者结合的特征。（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契约型与关系型？）（这里不考虑军阀和全面战争，假设暴力组织主要的作用是威慑，不实际破坏人身财产安全。）2.由于

争取权利的方式不同，希望或能接受的权利组织形式的范围也不同。资本是生产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建立者和拥有者，资本家关心的是本群体对经济活动的主导和生产组织的权利结构，会消耗权利以维持某些特别的状态；官僚系统在任何现代国家都能运行，注重对社会各群体的诉求和实力对比的观察，依据社会权利关系变化进行灵活应对，并从中取得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利益。官僚系统的权利来源不受限于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只是通过这些东西观察社会需求和权利关系（某些“稳定”和各种政治八卦舆论导向可能是针对官僚系统的，而不是被政府放出针对平民）。符合掌握强大权利的群体的要求是官僚系统的原则之一。3.由于官僚系统和私人垄断资本的上述特性，资本想造成尖锐结构并进入上层，长期来看却很容易被（各种群体通过官僚系统）针对，在官僚系统内的更是如此（因为受到更多的监督，还有被替代的可能；在经济危机中协助多而穷的人抗衡少而富的人并从中获取权利应该是官僚系统常用的方法）。所以资本（官僚或私人都）有个矛盾，单纯用于消费的财富（权利）和用于控制经济的权利不能长期同时达到很高的量，于是专制统治就失败了。

如果上面的分析正确，今天国内外结构异常尖锐的充满腐败的社会形态就必定是短暂的。从等级制破灭开始，两种权利——单纯用于消费的权利和用于控制经济的权利——的获得方式变得不太一致，奴隶社会通过后者得到前者，而在现代社会，由于官僚系统的人力来源和成长路径，由于人不能再区分成两个等级，由于政府的经济职能，官僚系统的原则变成平衡，居然成为扁平化的力量。相比于统治者，资本更愿意成为低调的割据势力，在能赚的时候多赚，不能赚的时候做个良民。（所以改朝换代时的进步，并不是对旧政权的反抗，而是新政权在当时社会上最强群体——那些灭亡了前朝的群体——的支持下建立，并找出一些既能平衡权利又符合民间政权组织形式的方法。平民为了自己的扁平化目标，还是得在生产单位上下功夫，

这是官僚系统做不了的。）

事实上，官僚资本或私人垄断资本对国家彻底的统治从来都没有在完整的社会里实现过。苏联解体后剧烈的经济危机中，权贵资本获得了长久巨大的财富而把大量实际权利交还给官僚系统——这是预计中的吗？也许对于没有强大阴谋的统治者群体而言，这么大尺度的事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已经很满足了。当苏联统治者的友邦人士引导他们用经济危机的方法时，是否想到了这些？他们的目的应该就是培养一个经济糟糕、政局动荡、容易控制的寡头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控制不了也比之前要好得多。自秦汉以来，除了被等级制入侵，每一次朝代更迭，新的领导者和官僚系统都会看到一些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并做出改变以避免被国内的矛盾颠覆。某些时代的，比如明末的豪族很可能故意（也是通过经济危机和权贵资本）推动了明朝的灭亡，但是明末的他们没有培养自己的新政权（也许是没来得及），大部分时候这无所谓，新政权总需要豪族的支持。当他们得到清军（奴隶社会）入关的消息时，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但是明在元之后，宋朝的官僚系统和世家大族也会犯这种错误吗？我很好奇。

现在仅存的等级制以国界为区分，只在前殖民地和前宗主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看起来像是资本在统治（虽然说“只在”，已经包含了大部分国家--）。西方国家的私人垄断资本表现出的并不是商业智慧，他们以产业链为代表的现代商业竞争的方法是大殖民时代积累的经验，这些极有大局观的策略能够长久使用，是以全球前殖民地国家的继续被统治为基础，以前宗主国的继续经济侵略政策为传承，只是实行这些策略的由国企逐渐变为私人垄断资本，但是依然把前殖民地国家当成自己治下的资产，根本不是商业策略，而是经济政策。

（据说公司的原意是指军队开道的国企，所以才翻译成“公司”。西方国家的企业用传承数百年的侵略策略举全球之力才造成中国今天的畸形经济，并非中国商人不行啊。）中国官僚资本在国内的布局和国际资本全球布局如出一辙——垄断的金融和产

业资本，产业链高端，分散其他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其他群体的意志和国家政策，还有各种过路费、保护费、黑社会。唯一不同的是国际上还是等级制，一国政府不必为他国平民负责，虽然他国可能是没有内政的弱小国家。这种全球权利系统的维持需要取得大国国家机器的支持，即大国资本和官僚系统利益一致，并不是资本独立完成的。如果这个权利组织形式伤害到大国平民的利益，大国政府就会开始压迫资本空间，对此国际资本如何避免或应对，才真是考验他们的智慧。如果以后中国较扁平的生产组织形式（附带某个新版本的普世价值）成规模输出，还会加快这一进程。

六、利益集团，平民需要关注什么、如何辨别，对文革和改开的分析。

正好看到猴王为被极端势力舆论影响的学生作急，我也就这个问题吐一些槽。其实本文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各位同学所纠结的，其实是“维持”自己日常生活和“改变”社会的矛盾，以及自己是否真能参与政治，现在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变革，如果晚一步会怎么样之类的。现在为了生存之类做的事对长远目标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人生还有没有价值？比如赚钱是自己帮别人做事再花钱让别人帮自己做事，但是有些事只能自己做，赚钱就成了浪费时间。除了赚钱，其他事也一样，你的目标中自己做的部分需要培养自己本身的能力，需要别人帮忙的部分就得培养自己寻求别人帮忙的能力和别人自己的能力，如果这两方面的能力都没培养起来就南辕北辙了。那如何培养？

本文刚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担心乌有之乡对重庆的支持会不会把薄熙来给支持死了，还不如低调一点做些实在的事支持民间公有制经济生产单位和维权组织在当地的发展，最好能固化成制度而不是什么都靠具体官员，免得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现在看来貌似在这个村也没这个店）。后来六月份要求结束一党专政的同学和左派

支持重庆犯的错误是一样的——你们真的了解你们所支持的人或群体吗？他们和你们是一样的吗？

个人很容易被针对，而且只通过媒体舆论根本没办法确定某个人身上到底放生了什么，别说如何支持，要不要支持都是个问题。数量足够庞大、有特定权利来源的群体则可以很快反应出究竟是偶然个案还是针对社会群体和权利结构的政治事件，并可以很快做出应对。所以推进政治变革不能靠个别人，只能靠群体，而且这些群体只能用权利来源来界定。如果你在这样的群体中，就会知道如何获取信息、应该持怎样的态度，而不必听从可能被其他群体影响的媒体舆论。这样的群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可能是一派官僚，也可能是一脉资本，也可能是什么什么集团。在标志性人物背后，在组织民运的单位背后，都有这样的利益集团。

所以民间的任何派，要推进政治变革首先得创造出符合自己目标的利益集团，也就是要（普遍）创造出符合自己目标的生产单位。生产单位的资本进入资本系统，生产单位的原成员或成员的关系人进入官僚系统，生产单位的发展状况影响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和其他利益，生产单位日常运行的规则和要求影响到官僚系统能写进法律法规的价值观和其他行业（比如律师和其他高端产品和服务）对目标市场的选择，这些都是利益集团的权利来源和形成原因。如果是选举制，生产单位每一个成员都有一张票，在他们进入其他单位之前，难道还能违背本单位的利益？大部分有关经济政策的选票不就是这么圈定的吗？某些同学之所以纠结，在你们眼里其他人的“觉悟”之所以低，改变世界之所以艰难，不就是因为人难以违抗所在单位吗？为什么对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反而想越过生产单位？如果你不是平民，也许还有别的方法，但是作为平民，这是唯一的方法。

不可能以个人意志对抗组织技术，变革最终要落实到生产单位上。如何支持新的生产单位及其组织形式使平民成为最大

的利益集团，如果做不到要如何在现有框架下维护平民的利益，如果一定要依靠其他利益集团要如何保证实现你们自己的目标，这些都是既符合你们理想又很现实的问题，而且每一个认真工作的平民都在解决这些问题。同学们可以通过某些人或群体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分辨他们的最终目标和可以合作的程度。

某些同学担心自己学到的知识只能用于民运，其实生产单位是争取权利最普遍的途径，而民运并不是目标，只要你能为平民争取权利，即使既不会生产也没有商业经验，总有办法进入生产单位的（如果你做不到，即使发生了变革你也不能保证以后会如何）。因为你能为别人争取权利，你自己就有了利益空间，你创立的新组织就能有现金流，能“维持”，能影响他们原来的生产组织，然后如果能普遍化，就能

“改变”。那些新兴产业，慈善机构，公民社会，黑社会（不是用抢的，而是用非法生意赚钱），新的政府部门，以前的金融业，工会，农村根据地，还有现在那些没有自主外交内政的弱小国家的高层，都是这么做的，只是有的可以普遍化，有的不能。用右派的说法这是无形的手，用左派的说法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这里要说一件令我淡定不能的事。在一本研究生教学用书（我不是研究生）的开头几章看到，马克思自己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改成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闻所未闻，但是很眼熟，难道我写这么多只是给这句话做了个注解？——而且该书认为马克思给经济学界定的研究对象为“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有谁见过这样的说法吗。。。如果真是这样（怎么看怎么像= =），就说明从小学到本科的课本包括考研和考公务员的资料全歪了。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快一百年了？我绝对不愿意相信这两句话能改变历史。在现代国家，官方价值观，也就是最强群体认可的某个版本的普世价值，是具体的法律法规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原则，对此左右派应该都很清楚。两句话的差别，

反映到经济政策、观察指标、官员考核、教育、舆论、学术研究上是非常巨大的。左派和右派的舆论导向在政治变革上都避开生产单位，我严重认为他们有妨碍平民（包括没什么背景的民间资本）势力成长的嫌疑。乌有之乡的各位老师，你们是专业的，你们怎么看？韩老师因为纠结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为了反对唯生产力论，连“意识主导物质”都说出来了（虽然不一定是他发的；这个“决定”和“主导”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要直接在意识形态领域决胜负，你们怎么看？封住了生产单位的可能性，你们打算怎么改变别人的想法？你们打算怎么改变利益集团？你们打算怎么改变社会结构？左派和右派都用这种阉割版的普世价值，“高喊人人平等的不是傻子就是骗子”也就成了事实。

本文最初的标题是“关于了解实践主体、转移工作重心的建议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希望左右派的同学都能杜绝末世情结，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某一次单靠“民心”发动的变革上。社会一直都在被改变，如果看不到这些变化又如何主导变革？变革何必期望乱世，不能治世的英雄都是土匪。

对于中国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这样的言论，其实阴谋论有个特征，就是只有利益分析没有权利分析，假想一个权利巨大的群体而且对手都很小白，但是这个群体如何获得这样的权利，他们就不管了。可能大部分人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都是这么思考，所以会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其实你们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一切能通过内部手段灭亡或压迫一个国家的方法一定会牵涉到国家主权，在中国这样经验丰富的现代大国，国家主权的行使和监控是个灵敏而庞大的系统，而能通过卖国获得巨大利益的人永远是极少数（否则世界早乱了；因为国家要保护生产单位，不管是用来卖还是什么，国家的权利最终都来自这些生产单位，“生产单位日常运行的规则和要求影响到官僚系统能写进法律法规的价值观”），“不可能以个人意志对抗组织技术”，这极少数人要卖掉系统内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容易，没有各种压倒性的强是做不

到你们想象的那些事的，而把这极少数人反卖掉就简单得多。如果分析问题时，除了结果利益也考虑到促成结果的权利，就能尽可能的把一切有关的群体或组织考虑进去，了解他们真实的需要和必须遵守的规则，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和必然性更强的推测。同学们，你们需要加深对中国和世界的理解，光靠政治八卦是远远不够的。不管做什么，“缺点”是没用的。

于是，终于回到对文革的分析。

前面说“所以当时存在着两个方向的变革，一个是官僚系统主导的，想要维持尖锐的权利结构，一个是平民主导的，目标是提高农村（也许还有城里的？）基层较扁平的生产单位的权利和国企的扁平化。”后来发现这个说法不对，应该把官僚资本从官僚系统中特别划出来。引发文革的是官僚资本和平民权利组织形式的冲突，这么说应该可以。

他们的冲突体现在哪里？由于经济发展给生产单位带来的可能性，生产单位，包括国企和农村民间生产单位，首先反对的是当时的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的具体内容。平民也要求减小对生产单位具体经营活动的限制，这是某些左派不承认的，至于这种要求是不是市场化？那官僚资本这边呢？右派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意识形态导致的内斗，后来改革开放纠正了这一错误；其内斗的双方是谁，如何爆发？改开初期在经济上的政策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削弱平民（通过改变农村生产单位；国企恢复苏联的旧体制是否也算一个？或者那是官僚系统内的？），右派不认为有削弱平民的存在。但是，文革时期某些地方确实爆发了极为严重的全面对抗，这些全面对抗必定发生在权利和数量都相当的群体之间，而且有现实经济基础，也就是发生在两个最强群体之间的有经济基础的剧烈政治斗争；显然这两大群体就是平民和官僚资本，“黑五类”纯粹躺枪。文革的结果是什么？谁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和解了？文革之后，出现了小岗村事件，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奇怪的是，小岗村事件的时间。如果小岗村事件是平民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反抗，那它应该成为文革

的导火索，而不是文革的句号；在文革最激烈的时间和地点，应该涌现大量的小岗村，并出现针对小岗村的镇压，后来改革开放时应该追溯到这些人，并纪念他们“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最低限度，右派也应该指出这些黑历史；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所以小岗村事件体现的不是平民反抗计划经济体制的群体意志，顶多是个个案；之后小岗村的模式却被推广到全国，这是为什么？既然不是小岗村引发了文革，那是什么引发了文革？

综合各方的信息，因为文革时期出现了不可忽略的全面对抗，平民对经济体制的反抗没理由拖延到文革结束，而是在文革之前就长期存在；所以文革后农村的大规模变动并非出于他们本身的意志；所以官僚资本是文革的胜利者，而他们在改开前后对经济体制的态度有矛盾的地方，否则不能解释文革为何会发生。所以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官僚资本和平民的分歧在于对经济的主导权，如果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官僚资本将难以压制平民，所以在平民势力被削弱之前，他们绝不会支持市场化——在改开之前，在国企还属于国家资本（物）的时候，官僚资本（人和势力）以什么形式存在？以控制国企的官僚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决策层的形式存在；这样也能解释官僚资本在文革结束后才改变经济体制的行为。

当时国企模仿苏联的旧体制（一长制之类的；中共前期长时间在农村发展，工业上难免会有这样的缺陷），而苏联的官僚资本（人）通过表面计划经济实质官僚主导的市场经济把国家资本变为官僚资本（物），中国文革之前的官僚资本很可能也想这么办。苏联的部分平民也反抗过，但是被很简单的镇压了，而两千年前就破除了等级制、近期发展了农村根据地的中国平民势力比那些不久前还是农奴的人要强大很多。

官僚资本和平民对现实经济的态度首先反映在他们对法律法规和具体经济政策的要求上，相应的也反映在两大群体在（普通）官僚系统中的人身上，这造成官僚系统内部的价值观冲突和（比如城乡？）政

府权力冲突。官僚系统内部冲突的表现之一可能就是文革之前翻来覆去的什么什么错误之类的。平民势力的想法可能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决策层的结构，以给平民主导的生产单位更大的活动空间，虽然未必是针对整个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因为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决策机制，已经有市场化的因素在里面。要求更多活动空间是和官僚资本一样的，但是牵涉到整个官僚系统的权力布置和官僚资本对国企的掌控，所以遭到官僚资本的反抗和打压。如果农村生产单位在保持原有公有制形态的基础上还能实行至少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其相应价值观在官僚系统中得到统一承认，即使国企获得活动空间，也会以农村为参照进行扁平化，官僚资本势力不能将其导向对自己成员有力的方向，对国企的强权也会失去现实基础。

所以在文革前夕，平民势力在官僚系统中可能已经出现膨胀的态势；也不是说这些官僚符合平民的利益，但是取得了一致。平民势力中的不同群体（部分知青、农村干部、农民、国企的工人、普通官僚等）虽然在实行计划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上还有分歧，但是在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决策层的结构这一点上可以达成一致。官僚资本的不同群体（部分直接管理国企的、其他计划经济体制的决策层的官僚等）在具体经济体制上也有分歧，但是在抵制平民势力上也可以达成一致。于是各方都发现经济走到这一步必须进行政改，全国的矛盾已经由经济进入政治领域；官僚系统的官方价值观需要统一，国家权利重心分两头的架构需要改变（这种架构最终爆发了文革），文革前后出现的各种经济政治理论都以此为目标。

现在往回看，两个重心的结构可能在确立模仿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官僚资本和平民势力都太强大，国企官僚靠近计划经济体制决策层且同属官僚系统，地方基层普通官僚靠近平民势力，工业与农业生产单位权利结构又完全不同，官僚系统没有办法解决两大群体的矛盾——所以官僚系统技术不足也是一个原因，而恰恰是旧体

制阻碍了官僚系统技术的进步——而且普通官僚系统的原则之一是遵从系统外的强大群体，如果平民势力能把他们的权利组织形式发展到能在大范围替代计划经济系统的程度，还有取胜的可能；他们一定尝试过，但是受到计划经济系统的压制，结果矛盾逐步积累到爆发全面对抗，这一点可能性也被扼杀。总之，无法在经济领域决胜负，官僚系统中可能也势均力敌，但是全面对抗一爆发，这一问题就解决了一一不能一直乱下去——还存在第三大势力？

我没法想象当时的场景，只是根据粗糙的理论模型应是这样。之后改开初期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农村生产单位组织形式改变，平民被削弱，但是同时又保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官僚资本依然不能普遍进入农村；国企先恢复旧体制再进行其他改革，由国家资本变为官僚资本；各群体在人大的比例改变；腐败现象严重；和文革之前一样频繁出现反左反右运动，后来爆发学潮，但是工农退出运动；在沿海地区开始经济改革试点，用国际贸易促进；调整人事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发展经济、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统一官方价值观，等等。注意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比中国古代和俄国，可以作出如下猜测：

确实存在第三大势力（以权利来源界定）——显然是中共核心层。中共以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起家，既然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府官僚机构尚未成熟，在基本经济制度以外的部分也就比较灵活。但是建国后才真正开始发展的官僚资本就没有这种灵活性。从中共核心层的视角，改开第一阶段的实质是以实现外交方针和发展经济为第一目标，在此大义之下：1. 放弃已经失败的国企扁平化改革和农村生产单位及其权利组织形式，争取一个由中共统一官僚系统的机会，分化削弱官僚资本势力；2. 使生产单位和官僚系统相互脱离，改变官僚系统在经济领域的组织技术，使普通官僚权利不依赖于特定形式的生产单位，避免以后再出现经济领域的变革会导致政治危机的情况，官僚系统和生产单位可以分别发展（这是不是所谓的去利益集团

化？）。

在这个过程中，平民势力的削弱和分散可以通过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来均衡。官僚资本势力的两部分，即通过国企控制资源和通过经济政策控制资源的势力，在至少一方一定能赚钱的新环境下需要寻找新的合作方法，和单干的方法。中共核心层要统一官僚系统，本身也有可能发生一些改变，官僚资本的两方也都会拉拢中共核心层（也就是改变其权利来源，然后是价值倾向；在之前也有）。工农退出运动说明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限于官僚系统内而不包括平民，既然改开了，国际势力也会参与；根据上面猜测的第一阶段目标，维护平民基本利益、把官僚资本内部的竞争推到官方核心价值观之外变为纯粹利益之争就是这一时期的基本国策；所以普通官僚会渐渐接触不到高层政治斗争的核心，普通官僚系统会变成真正的国家机器，而不是其他大型利益集团的一部分，或控制其他社会力量的大型利益集团（现在能达到这个程度吗？）。

削弱平民后，官僚资本在经济领域的壮大和其所获得的财富的增长就是必然的，但是这不妨碍削弱官僚资本的权利来源。经济体制的改变，相应的官僚系统和相关政府机构组织技术的变化，使官僚资本势力的核心层更容易被针对——这是真实的吗？写这篇文时经常要想想是真的有现实基础，还是听到的或瞎猜的。如果改开的实质真是上面所猜测的，那就说明，三十年前的官僚资本势力比现在还要强大得多，并且那时的官僚系统内充满了意识形态冲突。那个时代好像真的是这样，而文革和改开都没有造成全面内战、解体和俄国那样严重的经济危机，改开初期某些事件的时机，现在官僚系统的组织技术，包括官方价值观、一切与国企和宏观调控等经济职能有关的部分，也符合上面的猜测和推论，而且确实存在利用极左极右的群体，所以这个猜测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中国的历史和当年的农村根据地奠定了这一策略的基础。中共培养平民的势力，平民支持中共，所以绝对不能乱的时候中

共可以暂时牺牲平民的利益用倾向于官僚资本利益的方法对抗官僚资本势力（正好也是这些权贵资本一辈子最强却最穷的时候）。（对比之下，俄罗斯民族太年轻了，或者说太老旧了，苏共也没有经过必要的成长，在经济平稳时没有区别于官僚资本的独立的权利来源，也没有可以腾挪的政治空间。）在平民势力和“民心”被消耗殆尽之前确立领导地位，将控制官僚系统的官僚资本转变为受官僚系统约束的权贵垄断资本，束缚在产业链、金融系统和某些政府部门高端，并按其权利属性分割以极左极右的形式出现。以前他们能代表至少一大半的官僚系统，但现在已经不行。经过官僚系统、生产单位、经济体制在组织技术上的去意识形态化（是这个词吗？其实应该叫做抵制有冲突的意识形态），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不会妨碍到基层经济正常运行，也不会牵涉到普通官僚的直接利益，普通官僚系统自成一体，一定不介意在必要的时候卖掉他们官僚资本的顶头上司——即使官僚资本注意到经济利益以外的部分，还能如何？中共又如何变化？这些具体情况要看更详细的信息。

如果这些推测都正确，那么自建国到改开的历史就是：农村根据地经验推广到全国，大体接受国民政府的国家组织架构，学习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两种模式出现权利冲突，摩擦升级，爆发文革；用直接经济利益换取权利，在保证安定的国内外环境的同时逐步改变官僚系统组织技术和经济结构，造成官僚资本不能以国为质的局面，中共取得对国家机器和经济的实际控制。所以作为文革之后稳定全国的关键人物才是邓小平多次打而不倒的原因，其实毛泽东和邓小平是对好朋友？

（对比一下，左右派给出的图景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都选取了利于他们理论的部分。右派不认为文革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存在平民对旧经济体制的普遍反抗，认为改开之前各种恶劣现象都是整人运动和民族劣根；左派认为文革差一点就成功了，文革的失败纯粹是政治原因而没有经济原因，并且认为改开纯粹是走资派政策的延续——你们是这么想的吧。基于现实的谎

言，就只有这种程度了。只要认真分析那个时代，后面的发展脉络也会铺陈开来，实践主体和他们大方向的策略都难以掩盖。)

本来平衡的状态，某些群体权利出现超乎预料的膨胀；以群体或势力的成员个人直接利益换取群体权利（权利组织形式），最终削弱其权利来源——在中外历史上，这种事貌似经常发生。开国者和支持者会商议好权利关系，但是随着经济恢复

和发展，或者新的天灾外患出现，领导者必须做些改变，或者被新的原因颠覆；继承前朝体制的下一个开国者再和支持者商议新的方法，平衡各方势力。如果仔细分析，每一朝的开国者、支持者和具体的组织技术都不同（顺便说一句前几天看到的，貌似重农抑商的实质是限制产业链高端而不是限制商业）。

近期接触的主要参考信息：

《盐铁论》和《盐铁之争始末》

刘仰

猴王

《商君书》

《魔幻世界的经济问题》

神州风雨非浮云

消灭知识产权

：刘知远

前言

进入 21 世纪之后，“知识产权”这个词汇的温度一直保持着高温水平，持久地作为热点新闻，停留在媒体的首页。从微软打击盗版系统，到专家教授涉嫌抄袭论文，再到近来吸引公众关注的“IPAD”商标权争议，很好地诠释了这新世纪的十年来，“知识产权”这个概念逐步进入公众的脑海，成为法律界所称公民社会的法治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纷乱的事件中，法学专家、商品经营者、制造者，甚至侵权者，在阐述己方立场过程中，会引经据典，宣扬诸多法理依据、法条根据，以及公序良俗等，然而繁杂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真的会在精英阶层描绘的“法治观念深入”或“相关制度日臻完善”等情形中，逐步清晰起来吗？为了不浪费精英们的一片热忱，本人尝试对知识产权的结构作一简单解构，让前者能偶完整地观摩其灭亡过程。

1、表现形态

有些理论家喜欢用“历史渊源”来证明西方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传统悠久，以此来解释西方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强势，呼吁我国在法治层面上加强对知识产权“全方位的保护”。本人认为，法学家们单纯地夸大中西之间的差异，用纯粹立法技术的眼光看待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站在我们的角度，应该首先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在古今沿革历史脉络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把握清楚。

1.1 古典形态

“知识产权”并不是可以用现代概念

去向古代类似事物去“追根溯源”来臆造它的“历史悠久”，与此相反，知识产权是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一个过程。通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知识产权萌芽，都发端于同一个事物——特权赐予。

下面就知识产权的三个古代萌芽形态来简述：

1.1.1 专营特权

业务专营，在汉语中被简称为“专利”，此概念不同于现代知识产权下的专利概念，但是核心含义相同，即特定主体从特定的独占业务中，排他地、稳定地获取利益。

在我国古代，有盐铁国营的传统，然而古代中国政权的性质，是皇家和官僚的政治联合体，因此所谓的国营也就是特定职位上的官员获得了皇家授权的“官僚经营权”，这种官僚，便以权力为依托，自主经营或者“有条件”授权特定人群予以经营，从中攫取多数利益。

除了官僚和特权商人外，百姓也有极少的专营机会。例如皇帝钦点的贡品，如贡酒、贡果等，皇家需要在特定地点采购这些产品，这给了该地点的生产者长期面对皇家的专卖机会。

在罗马共和国的奴隶制社会中，贩卖奴隶同样是一项隐形的专营特权。罗马法律规定，敌军俘虏和无力偿还债务的欠债者降为奴隶，这便是国家机器中的奴隶主阶层核心统治集团授权给军人、商人从贩卖奴隶中获利的一种合法形式。

1.1.2 技术发明权

随着技术的进步，特权不仅赐予贩卖商品的获利渠道，还关系到了商品生产的技术问题。

因生产商品的技术可以给商品增添可

观的附加价值，因此生产者的生产技术成为了盈利的根本，而面对强势的中层统治群体——基层官僚、低阶贵族在盈利空间上的掠夺，生产者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保住自己的生产技术不被泄露给同行竞争者，在等级森严的特权社会里，能够保证这一点的，只能是高阶贵族或皇权的特殊许可。

例如英王爱德华三世曾授予佛兰德的工艺师约翰·卡姆比在缝纫与染织技术方面“独专其利”，再到中国古代被皇家御赐名号的兵器铺，便是君主特许保密的首肯。

1.1.3 翻印特权

当人类懂得广泛应用各种媒介（羊皮卷、竹简直至后来的纸张）传播信息后，古典意义上的出版即抄录，以及后来的雕版和活版印书便进入了社会历史，然而作为思想流传的重要手段，翻印权在西方与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特权阶级的打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日耳曼人攻破罗马尽毁书卷，无数人类历史上的思想表达——无论精华与糟粕一并被付之一炬，从此可以得知，特权阶级在本质上是害怕思想的传播，动摇自己的统治。

古代社会中，各民族的作者出书的目的，均与现代人醉心商业盈利不同，他们的目的是著书立说，阐述政见或者哲学发现，在较为闭塞的社会中博取大范围知名度，取得政治上的晋身资格；而出版该书的印书人，受困于古代经济规模以及民众的购买力限制和知识接受水平，能够从市场中获得的利润比起今天微乎其微，还要承担禁书后的政治风险。因此在著书过程中，如果能够以巧妙文辞规避特权阶级的敏感神经，或者部分价值观与统治者的理念相吻合，那么此类书籍便可以获得统治集团的特殊许可，得以安全地大规模翻印，由此可见，这种权利的使用性质比起今天的出版行业来说，相差甚远。

1.2 现代形态

进入近代社会后，西方世界的封建贵族阶层，以及中国的皇权阶层被社会变革的浪潮打得粉碎，古典型态的社会秩序崩溃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秩序

得以确立，古典社会中的知识产权萌芽挣脱了特权权力的监管，进入到了相对自由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很多新的权利诞生了出来。

1.2.1 著作权

作者、印书人开始遵循市场规律，主动地寻找获利渠道，例如作者会根据社会主流思潮动向，针对特定读者撰写他们喜闻乐见的书稿来扩大受众基础，印书人则开始想尽办法对即将出版的新书做商业宣传，甚至开始了与作者争夺日趋壮大的利益份额，逐渐发展成专职的出版商。由于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出版商位于最后一个环节，因此具备强势的经济地位，作者如果不通过出版商，就难以用其他的方法大规模翻印著作并使之面向读者，因此在近代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著作权对版权（翻印权）日趋依赖，逐渐沦为附庸，而作为书籍这一智力成果的创造者——作者群体不甘心自己的劳动成果被鲸吞，也开始了和出版商的利益争斗，取得了民商法律赋予的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以及保护作品完整权。在这种争斗下，著作权和版权从此阶段开始分离并对立起来。到了当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出现了音像、网络等新平台，著作权的范围也因此扩大，著作权也继而区分为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作者获得了复制、广播、展览、表演、网络信息传播等新权利，让作者看到了扩大自己合法利益范围的曙光。

1.2.2 商业秘密权

古典意义上的商号，如中国的百年老店以及地中海区域的家族作坊，为了适应残酷的市场竞争，不得不放弃严格的族内传授制度，纷纷将技术传给能够长期雇用的外人，并保证他们严守生产技术秘密，这种雇主的意识发展到现代社会，面临着巨大挑战——雇员的流动性空前加大，因此现代企业为防止人员流动将自身的秘密（不限于生产技术秘密）带走，逐渐形成了企业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的传统，这种保密协议的诞生，意味着民事主体对属于商业秘密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商业秘密权由此独立出来。

1.2.3 商标权

古代商号在民众心目中的“口碑”，是商业信誉的萌芽形态，古代商品生产者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正面的风评，则可以保证自己的生意在该地理范围内经久不衰，因此在古代有心术不正者挖空心思盗用他人商号、字号，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连鼎鼎大名的同仁堂，也难逃此劫。在清代，同仁堂作为皇家御用药品的供应人，独享丰厚利润。外地的一些商人也将自家药店纷纷改名“同仁堂”，为此在咸丰、同治年间，官府特地下告示，声称对冒同仁堂之名开办药店者一律治罪。也确实有药店因此事被查封，店主被游街示众三天。到了现代社会，商业信誉更加成为了企业的无形资产，是能够争取先机的重要软实力，商号、字号在时代的变迁中，从小范围民众的自然认知、特权庇护，发展成了受民商法律保护的企业名称和商品识别工具，为现代企业更好地树立自己的形象，维护商机，提供了重要保障，商业名称权和商标权便应运而生了（虽然在我国目前的管理制度之中，把商业名称权归属于行政意义上的企业名称管理机制，没有归入知识产权的范畴，然而这并不能割裂企业与产品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

1.2.4 专利权

古代社会中的专营特权，从纯粹的权钱交易，逐步发展为一种创造技术性智力成果的脑力劳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进入到近现代以来，冲破了固化社会束缚的技术专利改变了特性，从一个纯粹的闭门造车的权利，转化为一个二元形态——生产技术上保密，但是销售范围大为开放，在新时代，优秀的产品不再为贵族专享。西方一些著名的法学家从不同角度肯定了专利权的性质转变。如边沁的功利说，肯定了专利人从专利中肚子获利的正当性；注重公共利益的卢梭则阐扬社会公益论，认为专利人发明了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固然应当从中获取利益，然而技术终究是要为全社会所用，因此对技术人不能过分保护，形成技术垄断，因此，专利的管理办法在诸多价值观中寻求了平衡，这个平衡的结果就是确立了专利权的“短期

保护制度”。我国的《专利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专利权成为了众多知识产权的分支当中，最开放、最广泛也是最倾向于无限膨胀的一个权利品种，不仅仅体现在商品的实用性和装饰性的分离，更体现在附着在商品之上的权利日益与商品这一母体相脱离。

如今的知识产权，全方位地呈现出了权利膨胀泛滥，权利商品化的趋势，这种脱离物质载体、脱离实用性的现象，悖离了知识产权号称的技术进步路线，缔造了无数游走在法律灰色空间的经济链条，严重束缚了智力成果的进一步创造。当然，对于这种社会现象超出学阀解释范围的情形，我们喜闻乐见。

2、恶意应用

由于知识产权具备“授权许可性”，因此未得到授权私自使用，便称之为“侵权”。享有各型知识产权的产权所有人，有权利要求侵权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然而一些“深谙市场规律”的“精明人”们，意识到这同样是一个利润产生的优质场所，因此他们利用法律的空白区域和民众相对滞后的法治观念，开始了一系列针对侵权问题的“技巧性应用”。

在当今社会之中，比较典型的应用模式有如下几种。

2.1 跑马圈地

满洲人入关后，满洲奴隶主贵族为了适应中原的生活和经济发展模式，将部众的生产任务由狩猎转为农耕，他们根据军功排序，让满洲骑兵围绕着荒田绕圈奔驰，在一炷香燃尽的时间内圈得的土地，便归于自己所有。此种模式被成功地引入知识产权领域，多见于专利，尤其是外观设计的专利。它的应用原理是，利用某一新专业领域鉴定标准的粗糙和模糊，来炮制大量的、常见的、不具备绝对独创性的，且存在极大后人暗合概率的标的物，以此将任何后人创造的雷同标的物，纳入自身的专利范围之内控告侵权，以塑造一种领域

霸权。

例如字体设计公司设计的各种美工字体，或者如凉席的塑料袋包装上的各种造型，都可以成为一种专利。此类公司的职员们，每天的工作项目，便是运用“善于发现问题的敏锐目光”，去搜索任何与自己的专利相类似的他人产品并挑起诉讼。在我律所的过往业务中，曾经接到一封某字体设计公司的“商洽函”，措辞强硬地指责我律所的顾问单位“冒用了他们的字体”，建议我方与其接洽，协商购买字体授权事宜。经肉眼观察，众多律师第一反应是“确实挺相像”，但经本人对问题字体进行放大、翻转和投影予以仔细甄别，发现所谓的涉嫌侵权字体的形状、结构比例以及艺术特征，均与对方公司的原版字体相去甚远。而假如受敲诈的一方抗压性较差，便会选择“息事宁人”以“降低运营风险”。

2.2 遍地撒网

如果说跑马圈地模式带有“理论泛滥”、“保护范围泛滥”的高超技术性，运作难度较大，那么还有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如果一个猎人不能挖出一个巨大的陷阱，那么就挖出数量繁多的小陷阱，总会有收获。一个企业为了防止有其他企业恶意使用与自己产品商标类似的名称，通常会一次性注册大量雷同名称，如著名的“大白兔”奶糖，他不仅注册了“大白兔”，还注册了“大黑兔”、“小白兔”、“小灰兔”等相似名称。然而这种做法，没有明确的限制，因此公司在注册名称之时的这种“不时之需”，本身也存在着损害后续同类公司同产品商标权的可能。例如一种美发产品，商标注册了“美丽”、“美丽 MEILI”、“美丽空间”、“魅力”的商标，假如“美丽 ABC”商标成了驰名商标，那么“魅力 ABC”这种常见且音似的词汇组合也会被认定为触犯“核心判别标志”，那么会有众多同地域、同种类商品的制造商由于前者这种遍地撒网的手段，而无法使用“美丽”、“魅力”或者“MEILI”这种简明易懂的词汇，即便带上其他名词后缀，也无法百分之百规避诉讼风险。因此这某种程度上，广泛注册常用词商标名称，为商家以合法手段形

成对遣词造句的控制，提供了可能性。

2.3 守株待兔

如果认为前两种方式涉及范围太广，操作难度仍然较高，那么缩小圈占范围，实行“精确打击”，将一个未来极有利益预期的事物名称占为己有，收获长远利益，便是这第三种运作模式。

去年，NBA 一位名叫林书豪的华裔球星横空出世，他凭借着在纽约尼克斯队的短期出色表现成为了整个篮球新闻界的焦点人物。而此君一定不会想到，他的名字在自己金光四射的第一时间就已经被大陆商人抢注成了商标。

最早发现“林书豪”这三个字价值的人是无锡人虞敏洁。据相关媒体报道，虞敏洁是无锡锡山区东港镇东升工业园内一家体育用品企业的老板。这家企业成立于2002年，主要生产篮球、足球、排球等体育用品。201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虞敏洁在电视里发现了一个出色的华人球员林书豪（当时属于打酱油状态）。虞敏洁凭着经验判断，林书豪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继姚明之后另一个闪耀世界的华人NBA 球星。

于是本着先下手为强的思维，这家体育公司申请的商标“Jeremy S.H.L 林书豪”，申请了25和28两大类。其中，第25类主要是服装、鞋，帽等，28类指运动球类、游戏机、玩具等等，专用权限为2011年8月7日到2021年8月6日。

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如果以后林书豪本人要前往中国大陆地区发展商业，想在中国使用“Jeremy S.H.L 林书豪”商标的话，他必须得到这家无锡企业的授权。

众所周知，体育名人用自己的姓名做商标，这是国际惯例，例如“李宁”等，这通常是将自己的个人形象与体育用品的品牌捆绑在一起，有利于迅速树立品牌概念，拓展市场，然而这种好运到林书豪这里，恐怕要休止了。虞老板这种“慧眼识珠”，却逼迫林某人这位“本尊”如果在将来到中国大陆拓展业务，则不得不经过虞老板的“特别授权”才能使用“本尊”自己的姓名作为商标，这种“李鬼斩李逵”

的模式，必将刺激诸多人士群起效仿，NBA 总共 30 支球队，每支球队注册球员最多 15 名，也就是说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 NBA，每年注册球员加起来不超过 450 人，相信不久的将来，如果有市场需求，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就都会被哄抢一空。

2.4 愿者上钩

著名网络小说网站——XD 文学（因后文涉及到该公司的商业机密，姑隐去该网真实名称）状告百度文库的官司也曾经甚嚣一时。案由是 XD 文学认为百度文库中出现了大量 XD 文学专有版权的书籍内容，百度则辩称“文库是一个开放性平台，是由网友自行上传，每天上传量数以万计，让百度完全尽审查义务明显超出了百度的工作能力，属于超出义务界限。”

对于这个回应，XD 公司不满意，网络写手同样群情激奋表示“情感遭受了伤害”，网络写手和网站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选择了一致的立场，要求百度文库删除侵权内容。

事件最终以百度文库删除涉嫌侵权的文章作为结束，但是这场侵权的来龙去脉，则有必要阐述清楚。

以 XD 文学为代表的网络小说网站，通常采取 VIP 章节收费方法。例如一部小说长达 500 章，那么前 200 章读者可以免费浏览，而后 300 章定为 VIP 章节，需要付费阅读。这种收费方法的灵感来源于古代说书人常用的伎俩——拴扣，当他说到底精彩的情节之时，突然惊堂木一拍“且听下回分解！”以此来吊听众的胃口，让他们明天继续前来光顾，持续收入便有了保障。对于网络小说这种文体来讲，虽然文学质量有待商榷，然而题材和视角非常迎合市民的心理需要，例如历史战争、后宫情感、未来科幻等不一而足，情节描写异常通俗而引人入胜，但当读者读到情节即将更上一层楼之时，面对收费提示，通常会有一种“被钓鱼”的心理，然而又纠结于剧情发展，想继续往下读，因此两面为难。近来网络上有些“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将 VIP 章节截图，甚至是直接将手抄稿扫描上传至网络，以这种激烈的手段破

坏 VIP 收费制度，大部分读者自然乐见其成，不遗余力地搜索这些“解密”部分继续免费阅读。长此以往，不但小说网中的 VIP 章节无人点击，最后连整个网站的点击量都出现了大幅下滑。

这种版权使用方式可以说在当代貌似是独辟蹊径，实则是一种对悠久历史传统的一种继承，是一种企图通过绑定写手、扼杀其他小说网站，达到小说独家发布来钓鱼盈利的方式，然而由于经营不善，以及没能协调好网络写手的著作权和自身版权之间的利益平衡，目前看来，效果差强人意。

除了上述种种花样翻新的手段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运作模式，受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纵观各种运作手段，可以总结出的共性就是，占有相关知识产权人抱有一种猎杀心态，将“侵权”作为一种戕害同行的陷阱，以合法的手段掩盖含有部分或者全部恶意的目的，最终酿成种种杯具。

3、核心本质

透过现象，本人认为应当解析知识产权的本质。

当代知识产权的概念，粗糙地说是一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以保障智力成果不被侵犯，得以来用获取营利的法律权利。

从思想上说是一种以功利主义作为出发点，先利己后利人为逻辑过程的权利保护意识。这种性质，注定难以处理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冲突时的价值取向，更不能抵挡市场经济的残酷性和引诱性的双重作用，最终在趋利性和自发性的强大引力下，走向畸形。

某些知识产权所有人对“侵权”事件的运作，从法律原理上说，他们不是在更好地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生产营利环境，而是逆向利用了法律，通过粗糙的法律解释和巧妙的商业手法，无限扩大自己的合法权限范围，增大其他不特定人群的“侵权概率”，完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一种权利的滥用。

从经济原理上讲，把本该用来保护知识产权盈利可能性的法律权利，幻想成了

可以直接用来盈利的工具，将作为产品附着物的“权利”从“产品”身上割裂开来，把它炮制为一种新的“产品”，妄图用“法庭”这个臆想中的卖场，让自己的“权利”直接产生经济利益。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一个卖盒饭(产品)的小贩(知识产权所有人)，他在一座楼下卖盒饭的过程中，时常遇到到低素质居民从楼上泼脏水(侵权行为)的，盒饭经常被污染无法卖出，因此，公权力机关授予他一把伞(知识产权)，使得他的盒饭免受污水袭击得以顺利卖出，公权力机关还表示，如果小贩的伞被污水侵染，则有权利向泼污水的居民要求赔偿(侵权索赔)，小贩拿到了伞，起初他还对索赔的权利半信半疑，后来一桶污水泼到了他的伞上，他从肇事者身上获得了赔偿。尝到了甜头的他，回家开始按照这把伞的形制、颜色进行复制，第二天，他带了100把同版样式的伞，来到这个楼下支摊，把100把伞整齐地排列在居民楼前的空地上，这样一来，就保证无论哪个窗口泼下脏水，都能将任何一把伞打湿，小贩只需拿着那把被打湿的伞理直气壮地登门要求赔偿就可以了。

简言之，就是将控告侵权索赔作为设计创造的主要目的，而被日益滥用的“知识产权”，在这个过程中脱离了原先附着的商品并独立成为了一种新兴的“商品”。

4、泛滥恶果

有了上述对权利膨胀本质的尝试探索，我们得知，有这样的核心本质，必然导致权利的恶性膨胀，于是便带来了下列后果。

4.1 扼杀技术进步

如果这种权利的恶性膨胀不能被制止，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在知识产权拥有者所从事的产品生产过程中，产品性能的提升任务会被日趋置后，而制造侵权可能性、滥用法律武器的任务则与日俱增，最终导致知识产权与产品几乎完全脱离，严重干扰了他人在同一领域的劳动创造性，扼杀了他人在制造同类产品时在产品性能

提升方面的努力，最终削减整个行业的劳动创造性，增加升级技术的成本，给技术进步套上沉重的枷锁。

4.2 侵吞劳动权利

从知识产权的原理来看，注重保护的是智力成果的创造者的合法权益，那么在知识产权的应用领域，智力成果创造者理应成为最大受益者。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往往身处缺乏雄厚资本的阶层，因此为了换取新发明(再生产)所需资金，他们往往不得不将自己的智力成果廉价让渡给出资方。

4.2.1 网络著作权案例

以前文提到的 XD 文学网为例，在网络写手与该网站签合作协议时，会有三个作品授权级别选项：

A 级：驻站作品：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合法人，我同意“XD 文学网”及“XD 文学网”所属合作的网站和媒体发表此稿件，并承诺主动在 XD 文学网站上进行作品更新。未经 XD 文学网或本人同意，其他媒体一律不得转载。

B 级：授权作品：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合法人，此作品授权“XD 文学网”及“XD 文学网”所属合作的网站、平台和媒体交流发表，未经作者本人同意，XD 文学网不可向其他出版媒体推荐，其它出版媒体也一律不得转载。

C 级别：专属作品：我谨保证我是此作品的著作权合法人，保证此稿件系首发于“XD 文学网”及“XD 文学网”所属合作的网站和媒体，同意起点作为此稿件版权的独家发布人。在撤销本委托之前，保证不再将此稿件投给其他出版社媒体，有关此稿件发表和转载等任何事宜，由 XD 文学网全权代理，向其他出版媒体推荐作品。

读者不必仔细去品读三个等级的具体区别，只需把握一个核心重点：“授权”。

如果写手在纸质协议上或者电子版协议上选择了任意一个授权等级，就意味着同意将版权出让给网站，而等级的不同，仅仅在于言辞上表述的传播范围不同，例如 A 等级是允许 XD 文学网将文章转载给合作网站，而 C 级别则作者保证不再将文

稿投给其他网站，保证在 XD 网上“独家发布”，然而在 C 条款中的最后一句话，我们看到“由 XD 文学网全权代理，向其他出版媒体推荐作品。”这就等于表明，网站只要求作者单方面承诺在 XD 上独家发布，然而 XD 网站仍然具备向其他网站传播的权利，只不过把“复制权”给替换成另一个美妙的词汇——“推荐”，让写手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地位优越感中，稀里糊涂地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版权。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明白的写手拒绝给予网站授权，然而授权是合作协议必签的一步，不给予授权，就意味着协议无法签订，等同于完全没有收入。而有一些愿意与网站合作的写手，在网站极力要求 C 级授权时，写手坚持 A 级授权，那么网站同样会对写手进行阴暗的报复。

合作协议规定，写满 5000 字可以将新书挂靠在网站上，收入采取浮动奖金制，增减幅度完全取决于“人气排行榜”，前一百名的作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固定数额奖金和论字数的灵活奖金，第一百零一名到第五百名可以获得小额的字数灵活奖金，第五百名至第两千名只能获得象征性的奖金，而两千名开外则没有任何奖金收入。

所谓的“人气排行榜”，不过就是后台可以随意篡改的一组数据，如果网站想捧红一位“美女作家”，那么他们只需输入一个大得吓人的点击数，一本火热的新书就诞生了，如果写手“不时趣”，照样可以给他输入一个低得离谱的点击数，让他这辈子和奖金无缘。

通过网络写作这一行业，我们得知，在著作权和版权领域，不仅仅作者一如既往像历史表现的那样基本不具备版权，连可以让著作权与相版权对抗的著作财产权，也受到了全方位的剥夺，只剩下著作人身权这种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不疼不痒的权利被出版方嘲弄似的予以保留。

比过往历史表现形态更加残酷的是，作者和版权拥有者之间，不仅仅是著作权和版权的依附关系，更加成为了变相的雇佣关系，而且协议内容还可以保证网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不给付报酬，网络写手的生存危机指数，基本上可以和保险推销员持平了。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作为未来平台的发展前沿——网络平台，出现了如此与法学理论家们所称著作权、版权的确立目的——即促进创新的目的相背离的危险状况，着实令人深思。

4.2.2 专利权的法律实施现状

作为知识产权的另一模块，专利权同样面临着窘境。正如前文所述，少数拥有聪明才智的发明家们为了“可持续发明”，只能处心积虑地“将专利卖个好价钱”。当人们已经逐渐习惯这种模式的时候，当代的发明专利权人出现了一种新思潮——贷款投产。他们看到了出资方在购买了发明专利权后所享受到的巨大后续利润，不甘心只赚第一桶金，也想从市场经营中独占利润。因此，立法者制造了一个新的法律领域——专利质押。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权质押登记办法》正式实施，在这部规定下，专利质押的操作模式是，专利权人向出资人质押自己的发明专利权，得到贷款，运用贷款将标的物投入生产，赚取利润偿还贷款，将专利权赎回。这是一个看似给了专利权人捞取丰厚利润的机会，然而从利益与风险的对比度上看，对于出质人来说，产品经营成功自然一好百好，但如果失败，则失去发明专利权；而对出资人来说，如果出质人产品经营成功，那么将收回一大笔贷款利润，而如果出质人产品经营失败，则可以直接将专利发明权拿走。按照商人的职业特性，他们通常不会一次性拿出使风险远远高于收益的资金来投资，因此，从总体上看，这部法规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巩固出资人的利益和地位、隐形地进一步削夺发明专利权人的利益额度，增加其经营风险。

总而言之，通过资本和脑力劳动的不等价置换，智力成果的创造者距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目标渐行渐远。

4.2.3 “职务行为”的法律本质

除了上述“假合作真雇佣”及“质押”的途径外，市场强势者还可以运用劳动关系来名正言顺地掠夺劳动者的发明成果。简言之，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现代企业（统称“单位”），均有权压榨劳动者的智力活

动，完全占有发明人的发明创造。

我国的具体情形是，1985年颁布、并经由2008修订的《中华XX共和国专利法》有以下明文规定，本人略作批注，以示个人观点：

第六条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批注：在资本与生产技术日趋垄断的今天，很难想象世上有几个人的发明不属于“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主要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呢？根据“依法治国、有法必依”的法治精神，这些发明全数属于单位。】

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批注：本条内容无可指摘，但是将非职务发明创造作为本条的第二款，在法条逻辑上属于“刨除第一款的其他情况”，足见立法者对哪一种发明的保护更加重视。】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批注：合同精神是现代法治的精髓，因为合同号称是双方平等自愿签订的，只要不存在标的违法或欺诈胁迫情形，简言之，只要你不是贩卖毒品、枪支、妇女儿童，或者协议执行安乐死等，那么一经签订便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是为力量对比悬殊的双方创造出的竞技场，作为强势一方的单位，会有多少概率愿意和发明人签订一个承认发明人有专利权的合同版本呢？如果有，那么如此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单位恐怕在市场中也坚持不了多久。】

第七条 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批注：本条针对单位与发明人对发明属性有争议的情况，即该发明到底是不是职务发明的问题。读了这一令人哑然失笑的法条叙述，好比你进入一家餐厅，一面一个横幅上写着“关爱生命，提高卫生水平；狠抓服务，禁止打骂顾客”。立法者把单位的智商想象得太低，单位可以用

是否继续保留发明人的工作机会作为交换发明专利的条件，发明人如果拒绝，可以利用一年的失业时间和公司打打官司，权当从紧张的工作解脱出来换换脑子。】

第七十二条 侵夺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权和本法规定的其他权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批注：衷心感谢立法者针对第七条做了如此保护发明人的补充性规定，这条金光灿灿的规定说，如果公司董事长A试图侵夺其公司员工B的非职务发明，那么A董应该依法给自己记一个公司纪律处分，当然他可以选择随即再利用董事长权限撤销这个处分。有人说这么做有什么意义？说明你不懂专家的心，按照他们“法言法语”的描述，A给自己处分的行为叫遵纪守法诚信经营，撤销处分的行为叫做充分行使经营自主权，总之就是无需为其“侵夺”行为负任何责任。】

4.3 制造现代迷信

人类对于自己的未知领域，本能地充满恐惧和崇拜，而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处世态度，有助于缓解和克服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负面情绪，促进社会的思想解放。然而在当代社会，由于教育日趋产业化、功利化，对人们的科学意识培养出现了大倒退，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对未知领域的盲目崇拜，正在重新蔓延开来。

“高科技”就是这样一个让小资产阶级追捧到发狂的热概念，尤其是生活资料一端的数码产品，如“苹果系列”，社会人群无论阶层高低（尤其是地铁车厢内的），几乎到了人手一个，“没有就等同于落伍”的地步。

你看这部手机，典雅精致、大屏幕、触屏操作，操作系统中充满了魔幻般的视觉效果，还能加载各种网络程序，真是一部智能机器，是你通向未来的必需品，“如果你没有IPHONE，你就真的没有IPHONE！”

这种针对社会思潮，并成功调动买家心理的营销广告，真的成功地渗入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骨髓，当乔布斯先生去世的那一天，铺天盖地的新闻宣称苹果将发布

IPHONE4S 纪念版的时候，绝大多数刚刚入手 IPHONE4 的人，仍然排长队前去认购，当被提问：“为什么你有了一部 IPHONE4 之后，你还要去买一部 IPHONE4S？”他们会高举着“点燃悼念蜡烛”画面的 IHPONE4 或者 IPAD，泪流满面深情地说“我们感谢乔布斯，因为他改变了整个世界！”【实际上 IPHONE4S 在苹果官方口径中不是所谓的“iPhone for Steve”的“纪念版”，而是一个独立的新版本。苹果 CEO 库克于 2012 年 5 月 30 日在参加 D10 大会时和外界分享了苹果新产品命名的思路：在 iPhone 上，数字的迭代增加是指的工业设计的升级，iPhone 3GS 的 S 涵义是“Speed”，iPhone 4S 的 S 涵义则是“Siri”——苹果公司收购的第三方智能语音助手程序。但是苹果官方为何是在乔布斯去世大半年后而不是第一时间站出来澄清事实呢？显然企业不会主动去封禁一个有利于增加产品销售的谣言。】

若乔公泉下有知，一定会再次对自己的营销策略感到志得意满的。因为根据各种三星与苹果的争端显示，苹果公司研发硬件和软件的时间，与三星公司研发同质硬件和软件，几乎处于同一时间段，也就是说，只是因为苹果公司的产品研制速度快一些，面市环节做得雷厉风行一些，因此利用了人们先入为主的心理，率先制造了一种“知识产权首创”的错误概念。从三星和苹果的诉讼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公司在产品上拥有很多独创的技术，例如以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作为发展方向，保证多线程任务不卡机，这与苹果手机系统专心服务于一个程序保证单程序展现质量，一旦开启多线程必然导致卡机的特性比起来，具备一定的技术独特性。而近几年概念炒得风风火火的 Siri 语义解析技术，是苹果公司出资收购的第三方软件，并非由其原创开发，该程序更是源自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局所公布的 CALO 计划所衍生的民用版，而我国某公司的某款语音机器人程序在 2004 年取得专利，该程序能够实现大部分 Siri 目前的演示功能（例如你发问“某火车站怎么走？”“明天天气如何？”“某某人是谁？”都会有智能搜索程序给出答案，并用语音

告知），于是该公司熟练地运用了前述“守株待兔”的战法，妄图在 2012 年 7 月试图从苹果身上捞一桶金，最终以该软件进入了 AppStore 的行列作为结束。前述的这些技术元素事实，彻底推翻了苹果和乔先生们“知识产权首创者”的光环，然而却成为了苹果拥趸们攻击三星等其他公司剽窃“人类伟大精神遗产”的“罪证”。由此可见，被这种知识产权光环所欺骗的人们，对其光环下的商品已经痴迷到了一种恋物癖的地步，而这种恋物情结又源自缺乏社会地位感和“经济自由”而引发的对现代企业家的个人崇拜，在这种思潮下，一些社会成员对人的崇拜和对物的崇拜在其头脑里合二为一，宣告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和“物”在货币的媒介下可以划等号，就如同原始部落的部众既崇拜部落图腾，又崇拜酋长，只因为迷信酋长在神力的加持下成为了图腾的化身。

因此可以定义，“高科技”是一种人为炮制的伪概念，因为科技是可以被人研究并掌握的，科技在进步的过程中，总会有现阶段大量可以使用的技术推广给社会，而接下来进一步研究这条科技树上后续的研究项目。因此根据这一原理，能够被社会大多数人所应用的，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高科技”，在现实中，你绝对不会把那个可以调配温度的空调称为高科技，也不会把你面前能够呈现 3D 画面，能够兼容各种网络程序的电脑称为高科技，同样，作为智能数码产品，无非就是科技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应用方案，跟航天载人或深海探底技术比起来，岂能配得上“高”字？

“山寨机”的例子同样够得上挑战，首先严正声明，本人说的“山寨机”，并非是那种恶意冒充知名商标的假货，而是有自己的正式商标的正规产品，只不过没有响亮的知名度，它们所有的只是低廉的价格和结实的外壳。本人经过亲身实践，发现现在市面上很多“山寨机”都拥有类似安卓系统的主机系统，有一小部分的手机的流畅度可以让本人很满意。这证明这部分手机的硬件与软件的兼容技术已经炉火纯青，再加上强大功率的电池，可以保证待机两个星期，而本人没有记错的话，苹果拥趸们对苹果手机抱怨最多的就是耗电

量太大，待机时间太短。

当然，这山寨品中也有小巫见大巫。还有一款近来风头正劲的“GA”手机（为防止诉讼风险，特将名称隐去），一切外壳和内部的配件制作原理，完全与 IPHONE 不同，然而可以取得与 IPHONE 一样华丽的外观效果。该宣传视频还播放了一组更让人惊诧的镜头，只见工作人员将 GA 手机的屏幕卸载下来，安装到 IPHONE 手机的主机上时，GA 的屏幕居然亮了起来，并显示了苹果手机内的程序内容。本人身边的不少围观群众在看到这一刻惊呆了，大家认为这一现象这说明 IPHONE 手机的硬件防伪识别技术仍然存在很大缺陷。后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热心读者指出，像 IPHONE 这样的智能手机，其硬件兼容性很强，并不存在刻意的硬件伪装，GA 手机只是借此镜头来宣扬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技术优势”，借以提升本产品的形象，并迎合山寨主义者们的口味。不得不承认，GA 手机同样利用了其与消费者间技术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又塑造了“国产也有高科技”这一个小神话。【到本人修订本文之时，该手机的宣传人员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实验——用 GA 手机做切菜案板，只见刀光飞舞，黄瓜被整齐地切片，而该手机的屏幕却没有任何划伤的痕迹。如有读者具备确切证据能够将本实验连带证伪，本文将予以跟踪补充。】

上述的几个例子，只为打破高科技神话，并无任何商业竞争、宣传之目的。只想说明一个简单朴素的道理，如果一个 A 公司的产品，科技水平独步天下，那么即便完全开放信息，其他企业短时间内无论如何也学不会，那么知识产权无论存在与否，均不影响 A 公司从产品中获利；而反之，如果技术信息不存在泄漏的情况下，其他企业开发出了同样性质的产品并与 A 公司一较高下，那么便证明 A 公司手握的所谓技术秘密不具备任何保护的必要性。

所以，在所谓“高科技产品”领域，对知识产权概念和形象的无限美化，是打着科技的旗号在扭曲科技的含义，用科学崇拜来消灭科学思维，因此，这种知识产权的神秘主义话语权，当然应该被剥夺。

4.4 法律资源虚耗

法律资源，一般来讲指的是一切从事法律活动的人与其用于法律活动的物与时间的集合。自发性权利的膨胀，造就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法律资源的虚耗，如果知识产权的恶性膨胀不加以制止的话，顺着“发展高科技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我们很有可能在未来看到知识产权纠纷将成为法院工作中最忙碌的那一部分，无数的法官、书记员每天都泡在电路技术图纸、芯片设计标准单据的纸海里苦苦挣扎，而各种技术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眉开眼笑，财源滚滚来。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法官的人数是有限的，单个法官的精力和时间同样是有限的，其他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也是一样，代理律师也是一样，当事人更是一样。因此，在法律资源总是处于相对饱和的情况下，知识产权的诉讼数量剧增，那么毫无疑问将耽误法院的审判工作、律师的应诉工作，甚至是当事人自己的生产经营安全。

例如，在专利局的档案中，静静地躺着一些使人忍俊不禁的“发明专利”，比如说有人在香皂中间钻了个孔，上面栓了一根绳子，号称这叫“防滑香皂”，目的是解决人们在洗澡的过程中香皂容易失手掉落的问题。但是很显然，这个项目没能打动天使投资人。有的人在雨伞上加了个刷子，是为了解决擦天花板时灰尘掉落到身上，但是这个工具显然也没有获得青睐。诸如此类还有很多，难以列举详尽。

这些貌似有效实则无效的诸多专利，占用专利局的储存空间，增加专利局人员的工作量，使得一些真正具有实用效果的发明专利的登记和日常保管程序被迫顺延，加大了它的保管风险，因此，这种门槛低、标准低的发明专利，不仅仅是耗费人力物力，更是对其他同类权利的一种无形排挤。

4.5 扼杀言论自由

互联网是人类目前已知最为广阔和自由的交流平台，每天有如此繁多的信息通过这个巨大的平台交互传递着，人们由于其虚拟的身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信息、

传递自己中意的程序。然而，无孔不入的“知识产权保护”阴影，在侵吞着充满活力的虚拟空间。玩家用自己的合法所得购买了一款电子游戏或者应用软件，乐意将其免费分享给其他网友，然而当他刚刚把分享按钮按下的时候，他的行为就已经被一双黑暗中的眼睛盯上了。他的行为被认定为非法复制、侵犯版权，这种逻辑让本人惊诧万分。本人买了一本书，朋友也看上了这本书，但是本人囊中羞涩，不想再去买一本。因此，本人抱着勤练书法的目的手抄数本，然后见到朋友一人分发一本，请问本人此种行为算不算作非法复制？若说本人非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不算做侵权，那么玩家在网络空间中上传游戏程序，同样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何就被认定为非法复制呢？

当你看着满屏幕的“该文件已被删除”、“该页面无法显示”或“该文件未上传权利证明不得下载”以及漫天飞舞的防盗版提示窗口，你就应该明白，他们在极力剥夺民众浏览网络信息的自由，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奇特逻辑，并没有被“讲道理的人们”识破真身，它还在继续展现着自己的魔力，试图让更多的人认同并自觉地维护他的存在。

不过现在他们面临一个异常强大的挑战团伙——反版权海盗署组织。该组织的宣言如下：

“言论自由是我们建立的基石，但是它不容易做到。你可能听说过伏尔泰(Voltaire)的一句话“我并不赞成你所说的话，但是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来保护你说那些话的权利。”言论自由就是就那么简单。虽然比起那些更恶心的论调，民主听起来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它并没有好到让我们需要放弃表述自己想法的权利。”

反版权海盗署组织，其开设的 BT 下载网站名为“海盗湾”，曾经是欧洲点击量第一的网站，网友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毫无约束地上传、下载任何程序、视频和音频，相互可以毫无限制地进行交流。

可以想见，有多少“抓只蛤蟆就能挤出脑白金”的能人们对此口诛笔伐，甚至不惜在“知识产权纪念日”当天破口大骂，对海盗湾组织的负责人进行生命恐吓。

瑞典政府摆出了正义的姿态，他们派出的警察于 2006 年 5 月突袭搜查海盗湾的数据中心，没收了大量服务器，这些服务器向 100 多个网站提供服务。然而，突袭并未对“海盗湾”造成很大影响，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海盗湾”又重新开张，并且由于全世界的媒体回应而产生了大批新用户。此后该网站一直正常运行，未出现任何重大中断，针对“海盗湾”创始人提起的诉讼案至今仍悬而未决。

国际唱片协会（IFPI）因忘记给域名续费，使得他们不慎失去了 IFPI 的域名使用权。海盗湾成员随即以合法的方式，购买了该域名，并将其所有收集的唱片音频上传至 IFPI 域名的网站上。国际唱片协会为收回域名，多次提起诉讼，甚至以海盗湾涉嫌黑客入侵的名义报警。在 2009 年 4 月 17 日，斯德哥尔摩地方法庭认定海盗湾成员帮助用户传播盗版音频，将以 Neij 为首的四名成员宣判有罪，并判决其向国际唱片协会赔偿 367 万美元，当然，Neij 等人根本拿不出这笔巨款，最终作罢。判决结束后，国际唱片协会第一时间向国际知识产权组织求助，用强制变更域名使用权的方式，将海盗湾合法取得的域名夺了回来，还公然宣称：“这是所有知识原创者的福音，是正义和良知的胜利。”域名是知识产权范畴内的事物，使用者首先应当是合法取得，国际唱片协会以诬告、诉讼和走后门的方式，将属于他人的合法域名夺为己有的行为，同样也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以本人实在不知道他们的正义和良知是个什么标准。

2010 年，海盗湾组织关闭了被全世界各国政府封锁的 Tracker 服务器，一时间正派人士春风得意，认为这个“毒瘤”已死。但海盗湾组织突然宣布 magnet 网络协议开发成功，可以穿越世界上绝大多数数据屏蔽，他们宣称：“我就是你们的天网。你们想用那些可笑的伎俩控制互联网，做梦去吧！”

此后一段时间，在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嗡嗡作响的、带有蓝牙传输发射器的小型飞行器，在街头上下翻飞；而在他们后面，则是一群拿着网兜去抓这些飞行器的警察们，其狼狈的样子难以用语

言形容。

据最新消息，海盗湾组织宣称，他们正在进行太空低轨网络信号传输测试，如果获得成功，他们将尝试把服务器送入太空。

知识产权概念和制度的诞生，据称是因势利导，鼓励人们表达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信息、发展前卫的技术，但是当私权膨胀，利益垄断压制整个社会规则的时候，起初因利益需求激发的表达自由，同样也会被利益需求打压下去。海盗湾组织的这种争取表达自由、自主创新、促进共享并推动技术进步的行为，不愧为一个合适的存在，尽管他们没有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也不懂得如何根本上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但是就其专项领域来说，干得相当漂亮。

5、约束方式

对恶性膨胀的知识产权，要使用两种约束方式，即思想约束和制度约束两方面。

5.1 思想约束

所谓思想约束，是一种社会学原理的回归，让人们找回理性和利他性，改良社会氛围。在我们肯定了知识产权作为个人智力成果所发挥的正面作用后，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劳动成果，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并非是天才个人的灵光偶现，而是扎根于社会基础，包括物质条件和整体技术水平，人们只能顺应社会规律，尽可能少走弯路，加速社会的发展，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意义上超越一个时代，甚至“改变了世界”，就如同诸葛亮可以发明诸葛弩，却造不出原子弹。反之，如果社会发展停滞，那么任凭任何天才，也挽救不了社会的衰颓。因此，法律也好，政策也罢，知识领域的第一要务，都应该是保障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技术进步，因此知识产权在经历烈火暴风的涤荡后，必将从私权的灰烬中飘散出社会公权的青烟。

有反对意见认为：“如果过分强调公益，就会削弱知识产权所有人获取私权和利润的积极性，这会阻挠到进一步的发明

创造，从而扼杀社会的活力。”

这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功利论思维方式。首先，公益是所有人都能获取的利益的联合，它不是以消灭个人实质的私利而存在，而是以整合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私利，使私利与私利之间不相互冲突的公正交换与合作平台，是更好地解决社会个体成员之间权利争端的绝佳场所；其次，认为没有了利润刺激，人们就没有了发明创造的欲望，这种观念对于货币产生以前的发明创造例如“弓箭的发明”是无法解释的。一般认为，发明物拥有两大特性，一是实用性，即能够解决目前的物质需要或精神需要，二是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后浸染的商品性，即可以用来与其他人进行交换并营利。从逻辑上来说，之所以发明物可以当做商品被交换出去，是因为有人看到了他的实用性，以及实用性所带来的市场前景，因此发明物的商品性是依附于实用性的，因此实用性是第一性，而商品性是第二性。

在日本，有一些喜欢异想天开的人们经常组织发明“珍道具”（奇形怪状的实用工具）的活动，例如在眼睛旁边加个电风扇，用作切洋葱时保护眼睛的工具。虽然他们有些无聊，但也没有无聊到像前述往肥皂上钻孔就号称有发明专利的那种程度，而是公益无偿地推广给左邻右舍们使用。一个叫做 PARADOX 的瑞典游戏公司，在他的系列游戏中，使用了开放性源代码，即懂得编程的玩家可以使用代码编辑器，将原有的游戏世界重新建造，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己制作一款基于原游戏结构代码的新游戏，而 PARADOX 公司很乐意与玩家相互分享创意，并从中汲取营养，作为开发下一步游戏的精神养料，形成了源代码游戏和新代码游戏和谐共存的局面，给无数的玩家增添了无穷的游戏快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发明创造不一定必须与获取货币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的创造性是一种务实的天性，这种天性在适合的氛围下永远不会被资本社会强加的兽性——丛林意识遮盖，当摆脱了资本链条的束缚，在思想领域排除了经济绑架带来的后遗症，这种创造性会被更大限度地激发出来。

5.2 制度约束

本人认为，单纯地在法律条文上消除对知识产权的塑造只是“破”的层面，既然从历史连贯地发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终将被消灭，其遗骸必然成为一种社会公权，那么，应当就创造性的知识信息由劳动者的大脑传导至整个社会的路径搭建科学的传导链条——知识产权的升华制度，即解决好“立”的问题。立足于历史过渡时期的特殊阶段，既要一定程度上尊重发明人的发明创造，即令其能够一定程度上从自身的发明创造中获利，另一方面保证不形成技术垄断壁垒造成社会技术信息板结，更不能将技术信息的传递所产生的营利情形交由市场去处理，以防资本制度死灰复燃。因此应当从下列传导链条的每一层级中做出宏观的原则设定：

(1) 在劳动者-单位层级的环节中，应当由劳动者享有发明推广权和经济待遇，除许可本单位使用外，还可以自主将技术推广，国家对主动推广技术者实施额外奖励。劳动者该权利的期限依据具体发明的价值而定，原则上最长不超过5年，即鼓励劳动者最多在5年内尽可能将自己的技术推广至全社会，以获得更多的奖励。为保障这一意图的顺利实施，相关配套的劳动法律中应当明文禁绝各种类型的技术保密协议对劳动者的约束。

(2) 在单位-全社会层级的环节中，各单位应当定期做技术交流或由相关社会组织举办技术竞赛或技术招投标活动，单位可以举办技术培训活动培养任何有入行兴趣的非本单位劳动者，应极力避免该单位直接向其他单位收取培训费的操作模式，改为国家财政或社会组织的公用基金予以奖励。为防止单位利用培训、交流名义骗取奖励，任何该类活动均应由有关机构、社会组织及同行业单位技术人员或劳动者参与、旁听并监督。

(3) 在劳动者-全社会层级的环节中，技术性社会组织应积极吸纳各类技术性劳动者，充分赋予其社会活动的保障，从而令其在单位、社会两层级内，均能贡献智力成果，防止出现单位、社会层级的隔阂。

(4) 在全社会-各单位层级的环节中，国家或社会组织，应当定期整合全世界技术发展成果的技术或情报，向各单位发布，并派遣成员协助单位明晰其技术改进方向，提高生产力。

(5) 在全社会-个人层级的环节中，教育机构、媒体和社会组织主要负责将新技术、新信息推广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大脑，具体操作环节在此不展开论述。

后记

知识产权依托于“知识”——这是一种为掩护资本的真面目而为其披上的精神元素外衣，是市场经济某一生产链条的驱动力。知识产权的分类则依托于“知识的专业性”，这是资本家追求市场经济规则下的利润最大化、生产提速而对自身的生产领域进行细化和分工的必然结果。在未来，如果我们能够无情地撕下了这件外衣，那便是建立科学的公有制经济体系，消灭自利型经济模式，消灭经济垄断，实现彻底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时候；知识会在社会各领域内交互传播，使有关联性的不同技术领域间得以从容串联，从而破除“知识”的“领域独特性”和“专业性”。从新社会土壤中冒出的新新人类将具有“融会贯通”的基本思维模式，养成了“拥有知识即分享”、“拥有信息即表达”的习惯，那么全社会的信息和技术将实现无缝对接，到了那时，一切前专家、学阀们绝望的嚎叫均化为无用功。作为新新人类一员的我们，便可以狞笑着将失去经济基础、丧失强制力保护而全身赤裸的知识产权制度一脚踹入历史的坟墓。

初稿完成于2012年3月11日
修订于2013年5月15日

为什么读柄谷行人

：发条草子

1、楔子：几个关键词的解说

1.1 日本新左翼



日本新左翼历程有其特殊性，也有可能被消解在“68革命”中的部分。战后经济恢复期间，日本社会在“近代的超克”的阴影下重新倒向西方，开始了加藤周一说的那种明治维新后的“第二次开国”（参见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説』）。其时，日本也出现某种保守（或和平主义）倾向。1960年作为日本新左翼先声的安保斗争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催生出来的。它没有呈现出后来的大部分新左翼运动那样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说，甚至是民族主义

的（当然，在这里，战后日美两国的特殊关系必须被考虑进去）。但到60年代末，当日本经济已基本赶上西欧各国水平，全学连的构成也大多是未经历过二战的“团块世代”时，日本新左翼开始带有了同时代欧美学运的性格，呈现出某种暴力颠覆国家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尝试无疑失败了。一方面，或许诚如丸山真男所言，近代以来的日本其实从未有任何一个时期真正拥有过那种超集团/超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参见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这一点也可与竹内好的日本近代化批评相比照）；另一方面，这也是国际共运的共同失败。

但作为知识或思潮的日本新左翼运动到底留下一批遗产，50年代末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ブント）的柄谷行人的思想就是革命血污中的婴儿。柄谷自70年代从事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批评开始，不仅没有在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像许多新左翼活动家和知识分子那样随着“55体制”的崩塌而右转，反而进一步完善了其“超越资本—民族—国家”（資本=ネーション=国家を超えて）的知识结构。与此同时，柄谷对纯粹的学院左翼也是警惕的。在统合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如何使左翼批评不至于沦为资本主义自我解构的消费，或变成为发达国家自由主义的多元化神话提供证据的“撒娇派”，在这里，葛兰西对知识分子“地下战”的定位显然不能宽慰柄谷的焦虑。虽然NAM组织在成立三年后就因过分激进而解散（这里问题十分复杂，涉及到柄谷对马克思的整个理解框架，大纲部分还会详述），但无论如何，这是作为知识

分子的柄谷希望给自己的理论找到历史/现实对应物的一次勇敢的尝试。

1.2“跨越性批判”、后现代和解构主义批评



柄谷的“新左翼”身份可以确定，然而其不证自明的“后现代”或“解构主义”批评，在这里倒可以暂时悬搁。不过我们不必像对待日本新左翼那样，从查尔斯·金克斯或其他什么人那里开始梳理后现代主义的“体系”，因为事实上，后现代之所以为后现代，正在于它的不可通约性。诚然，柄谷的批评活动与欧美学界后现代主义保持着一定的共时性，其研究方法也对福柯、维特根斯坦等众所周知的后现代理论家多有借鉴。然而柄谷对这一标签的态度是暧昧的。他在利奥塔那种“永恒的斗争姿态”的层面承认自己的“后现代性”（参见柄谷行人：『闘争のエチカ』），但在若干年后与汪晖等人的对谈中，他又否认曾从后现代主义那里继承过些什么（参见《读书》，2008年第02期）。这一现象在赵京华那里被大致地概括为柄谷行人前期到后期的“转向”，也就是说，伴随着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70年代学院化的柄谷开始意识到日本解构主义批评缺乏某种“临场感”和“时效性”，从而对这种身份产生警惕，并转向世俗化批评，伦理批评，甚至从事社会活动（参见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这种说法自然有理，但在过于合乎逻辑的普遍化论述下，似乎又遗漏了什么。譬如说，果真存在一个“前期柄谷”和“后期柄谷”那样戏剧化的区分吗？

或许可以从柄谷行人90年代末期提出

的批评方法——“跨越性批判”（Transcritic）简单考察这一问题。Critic无疑出自康德；至于前缀 Trans，则有“超越”（transcendental）和“横断”（transversal）两义（参见柄谷行人：『マルクスの現在』）。值得注意的是，柄谷并非在2001年写作《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トランスクリティック——カントとマルクス）时才开始用这种批评方式。可以说，纵向的“超越式批判”（强调结构）和横向的“横断式批判”（强调解构）一直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柄谷的批评，即便在各个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事实上，即便有所谓的“早期柄谷”，那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解构主义者。

当然，本来也没有什么纯粹的解构主义。如果说结构主义注重体系，解构主义注重从体系中遣散出来的个体，及无法构成体系的他者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认同，任何解构都必须在承认结构的前提下进行，解构即便不是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结构运动的过程。但不同的解构主义批评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态度是不同的。巴特就更倾向于纯粹的文本狂欢，譬如无视德国浪漫派的创作语境，在理想主义者维特身上读出卑猥无聊的后现代气质（参见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柄谷则不是这样。比如，在其较早期的著作，1978年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マルクスその可能性の中心）中，一方面，这无疑是注入了浓厚的后现代批评野心的文本，柄谷在序章便开宗明义：他所谓的“可能性”，就是那种移除了哲学/思想体系预设的“文本先行”的解读方式，换言之，他是要把“马克思文本”从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但另一方面也很容易发现，在柄谷对马克思被淹没的符号意义的打捞中，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死掉”，反而自始至终保持着某种在场性。这种诉求甚至外化为，柄谷试图通过马克思1858年书简和《资本论》等文本，证明他这种解读马克思的方法，正是从马克思本人身上继承的传统——换言之，马克思召唤他“不得不”这样解读。这就使柄谷的批评，与后现代主义一贯的反宏大叙事发生了蒙田式的矛盾。柄谷着迷于这种矛盾。

因此，他也“不得不”在一开始就去关注漱石的矛盾。

柄谷本人也不欣赏“转向”或“跳跃”这类说法。他认为毋宁改为“移动”，前者太过轻易，磨平了种种“一次性”的隐喻。柄谷也正是在这种结构与解构，超越与横断之间痛苦地来回移动。可以说，在他那里，后现代语境中游离的个体，与现代/前现代的中心体系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可见或不可见的谈判机制。因此，不必在柄谷的“主义”问题上急于定性。或者可以学他本人在《走向世界共和国》（世界共和国へ）里那样，在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这三个乔姆斯基构想的“未来国家”之外再打一个问号——柄谷用这个问号代替原本那第四个“无政府社会主义”，他不愿将这个无政府状态简单地等同于普鲁东主义或托洛茨基派，也认为与原教旨的《共产党宣言》有所区别，故留成问号，使之成为一个漂浮起来的最彻底的可能性。柄谷本人也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其实从这一层面上说，将柄谷归类进“后现代”，倒还真是十分合适的。

2、“反文学论”——对“起源”问题的思考

2.1 存在、结构与解构之间

如前所述，我提及不存在一个“前期柄谷”和“后期柄谷”的戏剧化的差别，也就是说，柄谷没有转向，而是一直在移动和游离。诚然，其在不同时期的批评的确侧重不同，但有一种“矛盾的处境”始终贯穿一致。这种处境也为后来的柄谷出现在“超越”和“有限”之间那种在通常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最不可能的矛盾打下了基础。

6、70年代柄谷的文学批评之所以受到关注，其理由就在于那些迟到的存在主义者们还在纠缠于自我（=主体）和世界（=客体）的二分对抗时，柄谷已经感到了“他者”的威胁。使柄谷困惑的，不仅是所谓“真正的自我”与“外部规定的自我”之差异（参见柄谷行人：『意識と自然』），还在于这种规定背后的制度性和任意性。关于漱石出

身的那场残酷的游戏被他一再引入；三角关系、替换、拖延等概念的介入使柄谷的批评带上解构主义色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使他发现“结构的不存在”的，却正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比如“我来自哪方？”（参见柄谷行人：『文学について』）换言之，尽管柄谷在“来自”的起源发现了一个可以随意变化的能指，并在后来的工作中深化了对这个起源的思考，刺激他产生这种想法的，无非还是对“有一个实存的自我”的坚信。

柄谷的游离不止在结构与解构之间，甚至在存在与解构之间。“分裂”成为那一时期的关键词。较之后来的“移动”，“分裂”虽不是二分，却比较绝对，而且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精神/意识的分泌物。因此，那一时期的柄谷虽看似内在于解构主义批评的脉络里，却是极其混乱的，甚至会出现某种倒向结构主义的反复。例如他在一篇哀悼武田泰淳的文章中，认为死亡的本质就是从生者的结构中被抽出（参见柄谷行人：『歴史について』）。这一思考是明显的结构主义式的。

2.2 何为起源



60年代末的柄谷从漱石对养父母的体会那里看到了“源头”的非自然。迄今为止，其在日本国内外学界引起关注最多的文学批评，1980年出版的《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写就的。在这里，柄谷揭露了作为制度的文学与近代民族国家之兴起的关系。“发现”（発見）和“颠倒”（転倒）是《起源》的中心词汇。柄谷的意思，举例简言之，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风景”并非一贯存在于那里的风景/自然，而是经过某种认识论机制过滤后的产物。换言之，在

这里，认识是第一性的，风景/自然作为生产物是第二性的。无论怎么试图把风景还原为“真实”的风景（如国木田独步在《难忘的人们》中回忆起那些平时不会被记住的最“平凡”的人），它的出现都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了这种主体论的颠倒之上。

如果仅止于此，那无非是一个类似卢卡契的第一和第二自然，甚至康德的物自体和现象界式的认识上。柄谷的问题意识在于，不止风景，内心、自由、疾病、儿童、宗教等一切可以构建出一种完整史观的范畴，都建立在这种颠倒之上。譬如说，近代文学中那个迫切需要暴露“内心”、“隐私”甚至“自我”，原本都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基督教构建出了一个“需要忏悔的主体”，那些东西才得以出现。换言之，所有的“不合法”恰恰由权力提供了合法性，而当他们重新得以“合法化”时，那些使它们变得不合法的源头却被遗忘了。林少阳指出，日本后现代知识界中，如果说小森阳一的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和文本层面的，柄谷的文学批评则是文学史层面的（参见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不过，《起源》中追溯的起源，毋宁说正是为了揭示那种历史主义的“起源”是颠倒的——根本没有什么起源。一切处于描述中的普遍意义上的起源，无非是出于民族/历史/自我身份认同需要而出现的“权宜之计”。

正如漱石在《文学论》（文学論）中对“文学”这一不证自明的前提产生怀疑，柄谷 70 年代的文学批评大抵都在拷问这种前提。大部分这一时期的批评被集结成册，名为《反文学论》（反文学論），这个带有戏仿意味的标题对漱石的疑惑作出了某种回应。值得一提的是，在柄谷的“后现代知识考古”中，与其说他有意识地借鉴了福柯的系谱学，不如说那上头还弥漫着更隐秘却更强有力的尼采的幽灵。也就是说，柄谷对历史事件（event）在历史体系中的还原，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历史就是历史的过程本身（即力就是力的作用本身，参见尼采：《道德的谱系》）。这一思路至少延续到了他在 1998 年撰写的关于坂口安吾的评论中（参见柄谷行人：『仏教とファシズム』）。

3、柄谷行人，“其可能性的中心”——“超越”与“横断”之间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强烈批判建立在“我思”（cogito）之上的现代主义，而他们籍以批判的资源之一，就是作为创作手法的寓言（Allegory）。现代派惯用的象征（Symbol）所相信的“普遍意义”，无论是它本来固有的，还是被解构派作为对立面构建出来的，总之，后现代主义用寓言手法争夺的，正是他们认为象征手法无法表达的那个“碎片”。不用说，柄谷也是寓言阵营中的一员。然而与保罗·德曼等人不同的是，在柄谷那里，寓言手法承载着一种复杂的“超越性”。这一倾向起初只是若有若无，但在其 1989 年发表于《海燕》的一系列文学批评中，则变得十分明显了。

苏联解体对柄谷无疑是个不小的冲击，他开始思考历史与反复的问题。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万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被发掘出来的。那时的柄谷虽然宣称可以“科学地”证明近代世界史是以 60 年为一个周期的反复结构（参见柄谷行人：『ルイ・ボナパルトのブリュメール十八日』），但这无非是一种隐喻，机械地理解就中了圈套。譬如，《足球队》中的鹰四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组织的足球队（=暴动事件），虽然看似是万延元年（1860 年）农民起义的一种重叠，但正是在这种戏仿（parody）的寓言参照系中，“真实的历史事件”中那种不可重复、不可化约却被遗忘的复杂性得以暴露出来，这部作品也因此获得了某种救赎的意味。由此似乎可以推断，事实上，首先，柄谷的历史反复论并不是简单的“去历史”，而恰恰是认为一般意义上（专有名词指涉中）的历史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其次，他也并非要制造出一个“螺旋不上升”的虚无主义史观，甚至可以说，历史仍旧是发展的，反复的不仅不是事件，也未必是柄谷自己说的“结构”，而更像是某种“逻辑”。这种逻辑的反复使历史发展主义有了可以商榷的裂隙，但柄谷并没有推翻（=destruction）它——他只是离开（=deconstruction）它。

有意味的是，在柄谷那里，村上春树反而不能被后现代地解读。诚然，村上笔下的主人公是十足“碎片化”的。他们已经碎片到了，看到1960年这个意象，绝不会联想到安保斗争这么“超越性”，这么“集体化”的东西，而只能想到女友直子干了什么，歌星鲍比唱了什么。问题就出在这儿。



▲死亡した東大生桙美智子 全学連の国会突入に加わりデモ中に死亡した桙をいたみ、学生たちは抗議集会を開いた。

村上那种不断把对象物内在化、私人化的做法，恰恰构建了一个不可推翻，随时自足的主体；他的“堕落”并非遭到他者的凝视、打击、掠夺后的堕落，那也配不上称为堕落，顶多只是现代主义过剩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复制。因此，与其说《1973年的弹子球》（1973年のピンボール）是对《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一次失败的戏仿，毋宁说只是模仿（Pastiche）。如果大江的主人公在历史的外部那里一败涂地，村上的主人公则是“永远不败”的：他们没有外部，只有自己。

村上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大江身上反倒有这种可能性，甚至是，一贯被认为与大江相反的三岛由纪夫，通过他对乃木将军殉死的认真戏仿，柄谷也读到了他（非他不可）与大江共享的某些东西。我在前文所说的“超越性”，正存在于柄谷自己严格遴选的后现代主义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柄谷来说，后现代非但不是去除历史，反而是过分历史的。非但不是“无所不可”（Anything Goes），反而带有明显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出问题的并“超越”，而是“超越”和“我思”的结合，即超越论的个体/自我经验化，“风景之发现”里的“发现”，正是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虚假的超越”在二元结构的近代世界中，遮蔽了超越的本意。因此，80年代之

后的柄谷即便看似转向了超越论，那个超越也绝不是曾经被他否定过的“起源”。不过，柄谷试图追溯或还原的那个“真实的超越”，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过分落实。那个超越不是福柯式的去除主体后的“我思”，也不是尼采的永恒回归（Ewige Wiederkunft），也不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柄谷不会满意这种答案。显然，那个超越如果不是一个巧妙的问号，就必将是类似于虚无的东西。

90年代以来的柄谷重新投身社会运动，或许正是为了反抗这种虚无。在这个提供多元化幻觉的消费时代，柄谷必须不断提起那种来自真正的“外部”的挫败感，那才是提供可能性的东西，尽管它让人痛苦。甚至可以说，以运动（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以运动（NAM）结束的柄谷的一生，正是这样一个充满隐喻的同一性的圆环。在2004年的校订中，柄谷修改了80年代末那篇村上批评的结尾。这是一个更为显豁，足以让所有自称的后现代主义者都目瞪口呆的悲天悯人的结尾：“其实没有必要佯装无知。知道1960年意味着什么的人，已经太少了。”

4、“走向世界共和国”——对话中国新左翼

目前中国学界的柄谷行人研究，大多是将其放置在日本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去处理。除去不多的几部译著外，对柄谷比较集中的介绍当推赵京华和林少阳二人。赵对柄谷的理论批评做过相对完整的梳理，但视野稍欠；林更深入，也更有问题意识，但立足点仅在对“文”的处理上，基本没有延伸出去。事实上，如果将柄谷放在日本新左翼知识分子脉络中与中国新左翼知识分子进行比照，会发现不少有趣的问题。

4.1 新左翼的文风问题

新左翼，尤其是中国新左翼的文风晦涩，构成阅读障碍，一直是个大问题。这恐怕要与社会主义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挫折联系起来考察。自由主义话语在20世纪

已经提出一系列核心概念，如“自由”、“民主”等，在消费主义的今天，这些口号式话语无疑具有很强的煽动性。新左翼则在一个失败的语境中，中国新左翼更是处于一个名义上的左翼政党国家，同时需要指认多个敌人，构成了言说的挑战。当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被纳入一套有限的语言结构时，新左翼的复义（hybrid）通常有赖于在一个段落甚至一个句子中保持多个共时性，导致歧义丛生。老左翼如约翰·伯格等，诚然，他们文笔流畅，极富感染力，但作为代价的是问题的化约——“资本”通常成为他们唯一的批判对象。在消费已不可逆转的今天，这种抵抗姿态基本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的补充。

柄谷则是另一个问题。在曾经的法西斯，现在的右翼国家，柄谷的新左翼处境相对中国新左翼要“单纯”些。即便最无概念的读者，似乎也可以总结出“左翼=反法西斯=反政府=反国家”这样的公式。不过，虽然他操着一套较为平易的语言，过多哲学背景的介入仍旧使得他的批评难以进入。当然，他也因此获得了和世界左翼知识界对话的台阶。更值得肯定的是，柄谷的批评在高度集中的概念化表述里，仍旧可以保持一种不可思议的感人力——我们可以说柄谷难读，但决不能说他教条。这种饱满的“感情”，正是被中国新左翼批评逐渐从“知识”中二分出去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4.2 新左翼的“审美”问题

林少阳把柄谷放在“美学”范围内考察的时候曾发现一个吊诡的问题：柄谷在面对 40 年代的近代超克论时，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明确否定，美学上的含糊肯定”。柄谷似乎的确有这个问题，这也不单是柄谷的问题。正如日本新左翼知识分子恐怕很难全盘推翻浪漫派一样，如果拿到国际共运里来说，阶级斗争时期带有一定“资产阶级性”的文学（如法共对普鲁斯特的批评，意共对卡夫卡的批评），是否真的没有合法性？是否真的可以以人民大众的名义，宣布“高级文化”作为统治阶级文化的死亡？如果“后革命时期”的新左翼在美学/知识层

面承认了这些作品，是否意味着新左翼与老左翼，知识与实践的断裂？如何弥合这种断裂？知识左翼如何能够有效地“扬弃”美学，成为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4.3 中国新左翼的国家主义问题

中国新左翼的国家主义问题被诟病已久，甚至造成这样的误解：中国的左右与外国的左右是相反的。诚然，在原教旨的左翼那里，反政府（=权力）是不言自明的，建立在丰厚的帝国遗产之上的近代民族国家，也无疑为资本的流通提供了种种法律、契约、私有财产、货币安全等制度框架上的保障。然而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描述。近年欧共体的挫折不断提醒我们：“想象的共同体”仍旧有效，“后冷战”、“全球化”时期并未真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发起像柄谷那样过于彻底的运动（“颠覆资本同时颠覆民族国家”，参考柄谷行人：『NAM 原理』），子安宣邦等人从工具论的角度暂时承认国家的合法性的“九条会”，反而获得了更好的效果和更长久的生命力。

揭露可见的权力的虚伪，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子安的《国家与祭祀》（国家と祭祀），高桥哲哉的《国家与牺牲》（国家と犠牲）、《靖国问题》（靖国問題）等，已经充分图解了类似靖国神社的机构如何将权力转化为人格/神格从而唤起民众的崇拜。但高桥同时又认为，中国和韩国的“纪念碑”仍然有搭救出民众性的解放和抵抗契机的可能（参考高橋哲哉：『哲学は抵抗たりうるか』）。高桥的想法在大方向上是不错的。然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宏大叙事”究竟能搭救出什么，怎么搭救，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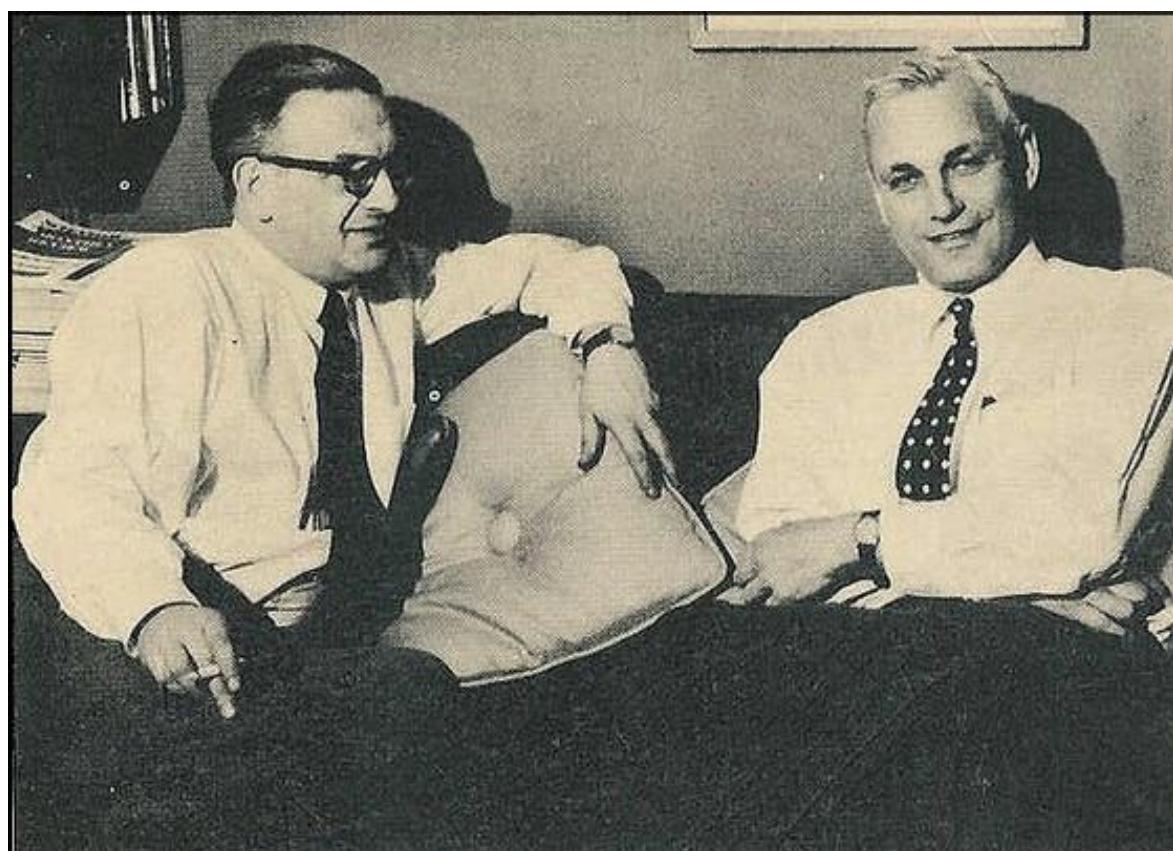
4.4 中国新左翼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可能性

介于上述种种限制，可以说，目前中国左翼知识界不存在后现代主义批评。新左翼行文的那种紧张性还处在一个明显的“结构自身”阶段，不用说解构马克思主义，甚至无法解构自由主义。这使得中国新左翼在世界知识界中，即便获得关注，也通

常停留在中国/东亚的“内部”视野里，无法进一步探讨。而老左翼知识分子或行动左翼的问题在于，他们之中有一种知识民粹主义倾向，对民众运动的自发性和多元性的崇拜，对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和解放效应的迷恋（如毛泽东主义），以至于满足于比一般大众水平略高一点甚至平齐的文化形式，而这套东西放在革命失败的今天，无论如何活泼易懂，恐怕都无法有效地被纳入世界意识形态战场。

在这个问题上，我既反对存在一个随时可以拿来使用的绝对主义的“中国经验”，也不认为非要学习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言说方式。或许可以这样提问：后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柄谷 1975 年在美国讲学

时，一方面被迫从西方的视角勘测日本不证自明的“现代性”，一方面又对东方主义的西洋视角产生抵触，这种痛苦迫使他非得站在一个模糊不清的位置考虑问题，换言之，解构主义不是柄谷强加于文本的，也不是他的批评方式，而就是他本身。如果我们将解构主义灵活处理成对既成结构的“离开”，在这个基础上保持距离，去观望，去怀疑，去挑战，去完善，去——如果有可能的话，构建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在这种基础上，“去意义”与“意义”未必是截然对立的也说不定。在柄谷的矛盾和游离中，或许存在着中国新左翼后现代批评的可能性。



保罗·斯威齐（右）和保罗·巴兰（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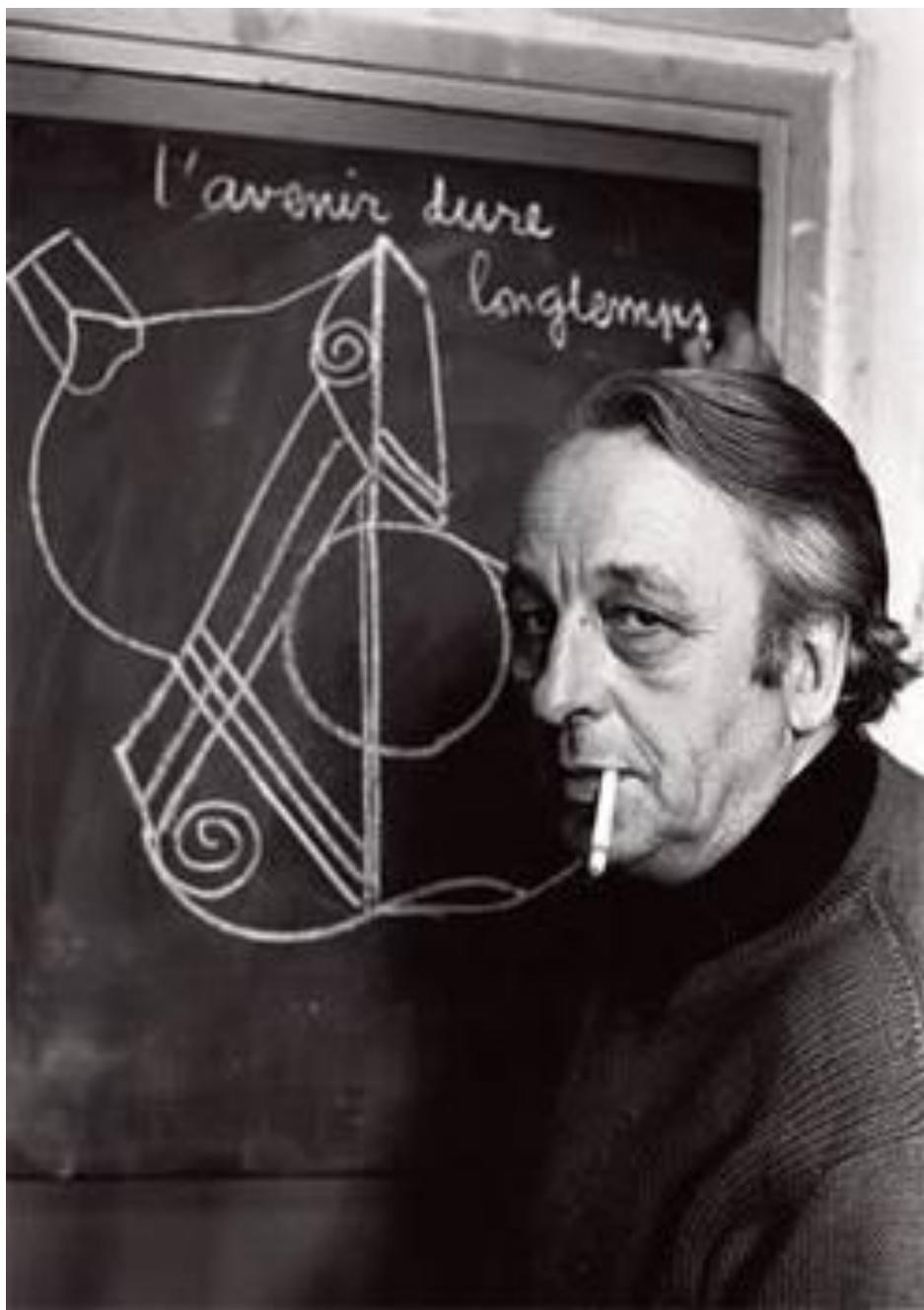


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
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列宁

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鲁迅



阿尔都塞

工业时代的铁与花


老邪

听说成都搞了个类似北京 798 艺术区的音乐公园，找到一个机会就跑去看看。

音乐公园的某道大门处，有几张很大的广告，其中一张上面印着一篇大约可以称为文章的短文，或者可以说是一段冗长的广告，直接抄录于下：

成都东区—东郊的记忆 1958-2012

“成都东区”，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方位名词，它曾经代表的意义是一个进行式的“工业区”从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激情和光荣，到上世纪末的失落和衰败，再到现在的新重新崛起和先锋实验，一部新中国产业史，浓缩于此。

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国营红光电子管厂为代表的一批工厂“空降”成都东郊，让这片田野成为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产业模式的代表，甚至是理想生活的代表——每天早晨，穿着统一工作服的几万工人，浩浩荡荡，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涌入工厂——这样的风景，对成都这座地处西南一隅的城市来说，魔幻得让人热血沸腾。

然而，当时代巨变，雄壮歌声下统一步伐的场景，被每个人都带着自己耳机，不走寻常路的时代潮流所代替时，“工业区”的身份不仅荣光不在，还变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

这不是只有成都，或是其他拥有“老基地”的中国城市才面临的伤痛，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工业遗址的再利用”就成为一个世界性命题。而东区的再次崛起也许能给予这个命题一个充满希望的答案。

拍的一组小资产阶级文艺小清新片，也直接发布于此。表示小资产阶级的“肛门

style”，俺们也是可以玩儿的。废话多了，直入正题：

上面那篇短文或广告语中所说：“时代巨变”。我们也必须承认，时代的确变了，变得我们认为，我们的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认为我们的世界就是最好的世界，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就是“从来如此”的真理，是不能拒绝的。“从来如此，便对么？”（肛门 style 们肯定不知道这句话是哪儿来的名言。）

我们是否这样追问过？没有。所以，我们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制造出来的幻觉之中，这种幻觉的终极表达就是所谓“美国梦”，但是，这个“美国梦”不是可以得到实现的遥远目标，而是，维持资本主义世界安全运行的欲望的永动机，带动着世界不停的运转，并无声的杀灭敢于突破这种运转的一切力量，而在成都东区音乐公园，俺能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无声的杀灭。

杀灭的对象就是千百万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无产阶级兄弟。

那短文堂而皇之的说：“它曾经代表的意义是一个进行式的‘工业区’从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激情和光荣，到上世纪末的失落和衰败，再到现在的新重新崛起和先锋实验，一部新中国产业史，浓缩于此。”

胡说八道，通通都是胡说八道。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哪里仅仅是所谓激情与光荣？更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创造的活生生的新世界的伟大历程。因为他们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一个新世界，因此，他们才充满激情，他们才感到光荣。无耻的叙述，永远都在试图把伟大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描述为歇斯底里的疯子，这是完全的欺骗。

“上世纪末的失落和衰败”，虽说只能说这是一种小清新文艺的表述，然而，这

种表述轻轻抹去的不仅仅是一段沉重的记忆，更是千百万中国无产阶级在改革浪潮中的血与泪，而这也并不是一段什么遥远的记忆，它所造成的后果，在今天依然在时不时的显现出来，只是文艺小清新们根本不懂得体味罢了。

最后这句：“再到底的重新崛起和先锋实验，一部新中国产业史，浓缩于此。”更是莫名其妙。整个音乐公园，除了保留改造了一批厂房，保留了几个机床、高炉、一个火车头，还有什么？不就是那些在任何商业街区都可以看到的东西吗？这算是所谓的重新崛起？这算是所谓的先锋实验？这样就浓缩了一部新中国产业史？依俺之见，倒不是什么产业史，而是资本主义暂时性的战胜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后，徘徊在尸首、残骸前的嘲弄与狂欢，并取得所谓胜利者的荣光。

当社会主义的原则与精神不被现在的人接受时，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包装出社会主义的残骸，供人鉴赏，那么，它其实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了，它就是残骸，就是遗迹。因此，它也绝不是所谓“一种尴尬的存在”，它是一种必须存在的谈资。那些青年人不正需要它么？

所谓的“工业遗址的再利用”并不是工业区的再兴起，而是，社会主义老工业基地的最彻底的沦陷，从物质到精神的彻底沦陷，以至被羞辱。不过，当俺在公园里面晃荡的时候，恍惚之间，它似乎在向我昭示着它曾经在这里存活。它并不是说它死了，而是，它换了地方，换了载体，然而，它自己却是一以贯之的。它依然在呐喊、在奋斗、在拼杀。多少人倒下了，又有多少人继续向前。

于是，想起一首歌《工业区》，歌词这

样写道：

一列火车把我扔在广州
南方的天空不下雪
经过了夜，经过了梦
最终到达的是拥挤的工业区
一个工厂接着另一个工厂
到处都是机器的轰鸣声
面对一张张招工的广告
哪个地方能把我收留
每个早晨我被操纵着起床
我的生活已是一条定时的流水线
车间里面没有白天和黑夜
只有苍白的灯光和疲惫的脸
我把老板的欲望已看清楚
我把工友们的泪水写成了乡愁
我把我们的希望、失望和绝望
一起捏成一个结实的拳头
啦——这里不下雪
啦——拥挤的工业区
啦——已经看清楚
啦——一个结实的拳头

这个工业区已经不是那个沦陷的老工业区，但是，它继承了一切工业区的真精神，在这样的工业区而不是公园的地方，真正的音乐是凝聚力量的武器，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震骇一时的牺牲， 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读鲁迅演讲杂文《娜拉走后怎样》



：瑰行琦意

这篇文章是鲁迅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演上发言的演讲稿。

《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著名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终于看清楚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郑重的宣称“我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至少我要学着做一个人”之后，毅然决然的走出家门。

1879年《玩偶之家》在欧洲首演，“娜拉离家出走时的摔门声”惊动了整个的欧洲，亦在后来惊醒了“五四”之后积极探索中国命运和出路的知识分子们。至此，娜拉“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人物”也成了当时激进女性的效仿对象。

人们高呼着“自由”、“解放”，为娜拉的出走欢呼雀跃，以为毅然的走出家门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可是在别人看来问题解决的地方，在鲁迅看来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出现。于是，他发出旷世的一个质问：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的回答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除此之外那就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饿死，但是既然已经死了，那便是离开了生活，也就无所谓路可言了。

鲁迅有一个比喻，譬如说有一只小鸟，在笼子里面关着当然不自由，但是如果外

面很危险，有鹰又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你出去之后有着生命之虞，又找不到食物，那你还得回到笼子里来，笼子里虽然没有自由，但是也没有这些危险和担心。如果娜拉真的不愿意回来，又没有谋生的手段，那就只有堕落，沦为妓女或者别的什么。

到这里，鲁迅已经用短短的几段文字很清晰深刻的揭示了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但是他没有立刻的给出他的解决办法。而是又转到“梦”的论述中。

他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活很美满富足，但是现在梦醒后猛地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一只玩弄于丈夫手中的玩偶，一直关在笼中的小雀。可是梦醒了又该怎么办呢？倘若寻不到出路，鲁迅说倒还不如继续做梦的好，因为做梦的人毕竟还是幸福的。你叫醒了他们，又不能给他们指出一条改变现实的出路，无非也是让他们更加痛苦的感受到自己的现状罢了。但是做梦也只能做现在的梦，不能做将来的梦，因为为了将来的梦想，必将唤醒千千万万的人起来受苦，你把美好的黄金世界都许给子孙后代了，那你那什么东西给自己呢？那就只有将来的希望了，但是这代价也太大了，为了将来的希望，你让那么多人更加敏感而深切的感到了自己现在的痛苦，就像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

尸骸一样。所以，鲁迅以一种博大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说：“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是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在《〈呐喊〉自序》里面的那段经典比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娜拉既然梦醒了，就不容易回去了，总的想出解决的办法。

鲁迅写到，其实一个娜拉出走还好，她也许不会碰到什么困难，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很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但是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如果一百个一千个娜拉出走呢？那便连同情和帮助也会减少，倘若有更多的娜拉出走，那就感到厌恶了。所以妇女出走家门“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妇女拥有经济权，说白了，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因为你出走家门获取的自由固然不是钱能买来的，但是你这自由迟早会为了钱而重新卖掉。人类常常要饥饿，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你才能谈自由，平等，妇女解放之类的东西。那些认为谈钱就很俗的人，往往是当下衣食无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如果饿他们个几天，他们的看法肯定就要发生变化。

如果要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那就必须要使得妇女拥有经济权，第一：在家应该获得男女平均的经济权力，第二，在社会上应该是男女获得相等的势力。

可是这种权利在男女之间的平等分配如何才能实现呢？鲁迅说他也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要坚持战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深刻的，也是坦诚的。他从不会简简单的给人指出一条路：革命去吧！然后就有了鲜花，有了面包。不是这样的，这样就成不了鲁迅了。他只是告诉了你问题所在，但并没有告诉你解决的办法。

钱理群说鲁迅从来就不是一个导师，从古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导师”和“国师”情节，但是鲁迅对这种导师情节是持质疑和挑战态度的。鲁迅从不自我标榜为导师，他自己也在探路呢！他怎么能就随随便便的跟人指路呢？最好的办法是让鲁迅教我们更加深刻的去认识现实，让他的思想给我们以启迪，和我们一起去“寻路”，而不是把他的话当做“行动的指南”，这才是真正的鲁迅。

至于对待革命，鲁迅本身也是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他这种怀疑和批判，绝不是简简单单的赞成或者反对，鲁迅是早早的跳出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而是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和缠绕的分析的态度。你看不是明明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都赶跑皇帝改天换地了吗，但是革命阵营里面又混进了黎元洪这种封建旧官僚和阿Q这样的愚昧国民，中华民国就果真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了吗？中国经历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五四运动，但就真的改变了北洋政府暗无天日的统治了吗？没有！有人问鲁迅，革命胜利后他可能去做啥？他回答道可能去穿着黄马甲去扫大街。看来鲁迅对革命也是不抱有太多希望和幻想的。起起伏伏，潮涨潮落，他见的太多了。但是正是这样一种于一切有中看到无的近乎绝望的态度，才使得他始终清醒的不被各种琳琅的所谓的希望蒙蔽双眼，才使得他是永远深刻和彻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才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导师”。

鲁迅没有告诉你如何去获得妇女的经历权力，但是却充分的估计到了其中的困难程度。

他很辩证的指出，天下事尽有小作为

比大作为更烦难的。他打了一个比喻，比如：

现在是冬天，我只有一件棉袄，有一个没有衣服穿快要冻死的苦人在我面前，我是把这件棉袄脱给他穿让自己冻死呢，还是自己穿着这件棉袄去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呢？救一个人和普度一切人类，大小实在想去太远，但是叫我来选，我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免得脱下这件唯一的棉袄把自己给冻杀了。

什么都不做的冥想家和只会光喊未来的口号不懂得分析现状的空想家都是容易做的，但是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苦工”却是千难万难的。在鲁迅看来，获得经济权就好比是就一个快要冻死的人这样的“小作为”，获得参政权以及争取女性的解放就好比是普度众生这样的“大作为”，可“小作为”却比“大作为”要难得多。

然而鲁迅进一步提出，如果妇女获得了经济权力就得到了自由了么，就不是傀儡了么。你掌握了经济权力，那你被奴役的可能性就小了，但是你还可以去奴役他人。在这个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为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做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可见妇女的自由和解放不是仅仅获得经济权力这么简单的就完了。有不平等的政治权力，那就总会导致有被压迫者，有压迫者，有主人和傀儡。但是生存总是很急切的第一步，人们总不能饿着肚子等待理想世界的到来。

但是他始终认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便这第一步也很困难，难就难在中国人太难改变了。群众是这样的麻木，很难觉醒，很难动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

他们就看了滑稽剧。”看了仁人志士的牺牲，其中的给他们带来的益处也无非像看杀羊宰牛一样获得暂时的愉快，况且这种愉快也很快的忘记了。所以对待这样群众，最好是让他们无戏可看。

所以在中国，要做成什么事情是困难的，获得经济权力也好，获得政治权力也好，获得妇女解放也好，莫不如此，鲁迅充分的估计到了其中的复杂性。因此，面对这样的群众，鲁迅最后提出“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鲁迅永远是怀疑的，他的批判是永远指向自身的，因而也是彻底的。别人的结论是他怀疑的起点，他自己的结论又成为他自我批判的起点，永不满足。

当大家都为娜拉出走欢呼的时候，他冷静的提出娜拉出走之后结果会怎么样？——不是堕落就是回去。所以出走绝不是一个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不用出走，自己掌握着经济权力，但是即使是妇女有了经济权力，那果真就会有自由了么，果真就不在当“玩偶”和傀儡了么？没那么简单。

但是这也是很值得争取的，这毕竟是较为急切的，是妇女自由解放的第一步。然而就是这第一步也是极其困难的，难就难在一群的愚弱的、只会充当看客的群众。因为任何的社会变革总需要群众的参与，否则便是一小群先知先觉的志士们做无谓的牺牲。

我们需要的不单是经济革命，平等分配经济权，也要进行政治革命，使得不再有压迫和傀儡，还需要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愚弱麻木的精神。何其艰巨，何其复杂！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当然不需要志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做这种震骇一时的牺牲，倒不如深沉的坚韧的战斗下去。

讲故事的政治



在进入文学这个在当代略显严肃的话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回忆一部商业电影。

在看完《中国合伙人》之后，有个朋友批评说，这是一部没有高潮的电影。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合伙人》的前半部分有着成功的人物塑造，在有限的篇幅内，导演利用精巧的剪裁，将三个“合伙人”各自的出身和性格，各自的爱情和奋斗，都表现得足够丰满。而电影的中心矛盾——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同作为整体的美国的矛盾——一直都是以独特的方式由差异性的个体经验所分担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所面对的，都是具体的各不相同的生活困境，而非统一的宏观命题。

然而，电影最终却恰恰以一种宏观的叙事结束。三个人团结在一起，打赢了一场官司，“买”下了一个实验室，取得了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胜利。可是，他们的个人困境却被忽略了，甚至是被背叛了：他们曾经梦想做一个美国人，最终却成为了美国的敌人；他们曾经真诚地追随爱情，最终却选择了平静放弃；以及最重要的，这三个披着友情的高贵外衣出场的“合伙人”，最终也未能真正挽回友情的破裂，仅仅是在商业利益的需要下才重新团结在一起。

那些严肃的观众感觉自己受了欺骗。他们原本期待着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甚至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故事，到头来却发现，电影讲述的原来是一个《教父》式的典型的美国梦（《中国合伙人》有一个巧妙的英文名字：American Dream in China）——因此，当主人公用金钱为自己买到了社会地位的时候，这部电影其实就已经高潮了，坐在大都市电影院里的观众们也已经高潮了。

不过，在此之前所有的“欺骗”也是不可或缺的，它们为最后的高潮提供了合法性来源。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尽管个人主义的发财致富早已成为了现实中心照不宣的（或许还是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但在艺术作品中，这样的叙事仍然是一种禁忌（而禁忌往往有着更强大的力量）。

想想《教父》是怎样讲故事的吧：一个英俊正直的、有浪漫爱情的年轻人，在一个苦难的充满敌人的世界上，承担起保护家庭（在《中国合伙人》中则是友情）的责任——谁还能指责他是一个杀人恶魔，而他的成功又怎能不让我们为之欢呼？

在莫言的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同样的叙事方式。

如同在现实中一样，在他构建高密东北乡世界的过程中，莫言总是对政治表现出一种暧昧的态度。

在早期的《红高粱家族》中，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大土匪。这个土匪生活在日伪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支力量的夹缝之中，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感，与任何一方都曾发生激烈冲突。而在较近的《生死疲劳》中，主人公换成了一个在土改中被枪毙的地主，以及继承了这个地主房子的长工（这两个人物其实是一体的）。

这是两个非常典型的人物身份——他们是在中国革命中被压抑的一类人。因此，当莫言把这一类人作为正面形象来描写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感觉到，他是站在了那段历史的对立面上。

但暧昧之处在于，莫言的全部叙述又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在土匪余占鳌看来，他所有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抗日救亡，而“单干户”蓝脸则总是声明，

是毛主席给了他单干的权力。

实现这一奇妙效果的奥秘在于其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也就是说，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只有一个发言人，只有一种现实。因此，当余占鳌指责共产党军队见了鬼子就跑的时候，当地主西门闹声称自己是被共产党冤杀的时候，这就是唯一的事实。

当然，抱有成见的读者会提醒自己，第一人称叙述是不可靠的，从而拒绝简单地接受这一种的事实。不过接下来，这些读者却也无法更进一步，指出另一种更可靠的事实。于是，作者的目的最终达到了——他不想要告诉读者一个事实，而是直接取消了事实的判断标准。小说中的世界，由此成为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情感体验成为了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样一来，我们在前述电影中所看到的“讲故事”再一次展现了威力——这也正是莫言对自己的评价：讲故事的人。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去政治化的讲述方式，故事中实际上却体现出了另一种政治。

莫言说，自己的创作是受到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启发，但在国内 80 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中，这一类的创作也并不罕见，例如一度蔚为壮观的文化寻根。一切文学叙述都是对当下经验的叙述，莫言作品中所采取的“讲故事”的方式也正体现了某种时代精神。

我愿意相信，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绝不是瑞典文学院突然感觉到需要给中国一个交代，而是中国文学的确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以莫言为代表的这一代中国作家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不仅在于对贫困、压抑的个人化讲述，更在于那种兼具隐匿而又坚定的讲述方式。

在经典文学中，作家的故事总是要依附于某种对世界的解释，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世界变得完全无法解释。但在莫言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两者的奇怪混合：他一方面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取消了解释世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树立了一条判断合法性的绝对标准——为被压抑者代言。

我们可以注意到，莫言并非像《教父》和《中国合伙人》那样用一个光鲜亮丽的形象来实现合法性的确立。他所描绘的人物形象更加平凡，而且，尤其是在已经被我们的历史深刻地塑造过的语义场中，往往是有严重（个人的或政治的）缺陷的。

作者并没有试图去洗刷这些缺陷。他只是把人物放置在一个被压抑的地位上，勾引起读者的同情。这就是“寻根”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以知识分子的双手举起一面彻底的平民主义大旗，而苦难和同情就是平民主义的合法性来源。

这样的时代精神不是凭空出现的，尽管当代人很愿意同过去划清界限，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创作风格是对五四以来的左翼文学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的继承。

在新中国的革命文学传统中，被压迫的大多数首次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的生活方式，斗争方式，以至于他们身上的某些质朴的缺点，都成为了歌颂的对象。莫言等新一代作家其实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本质性的区别在于，被压迫的变成了少数人——被压迫的大多数以革命的名义对压迫过他们的人进行了反压迫。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莫言在高度评价毛泽东《延安谈话》“为人民”的立场的同时，又在文学创作中不时体现出对“人民”历史的抵制。

我们看到了一种曾被用来维护意识形态的文学形式是如何站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上——不是通过理论的斗争，而是通过遮遮掩掩的经验性描述改变了原有形式所容纳的内容。在意识形态混乱的时代里，个体经验成为了最好的武器。

这就是莫言对我们的启示之一：新中国文学的开创者们曾经认为旧时代的形式必然会带来旧时代的内容，从而试图抛弃“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用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学形式取而代之。但莫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例子，吸收旧形式的精华，并将其纳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之下。

而在革命话语失去昔日号召力的今天，莫言对纯粹经验性“故事”的执着，也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可资借鉴之处。

镜中碎脸

——从日本现当代文化看异化问题

：涵與

从其本质上来看，虚无主义毋宁说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不过还可能引起世界灾难。虚无主义乃是被拉入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民族的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因此之故，虚无主义不只是当代的一个现象，也不只是 19 世纪的产物……也不仅是个别民族的产物，即便这些民族的思想家和作家专门谈论了虚无主义。那些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虚无主义的人们，也许最深刻的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展开。这个最可怕的客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也不能说出自己的来源。

——海德格尔《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对国人来说，日本是一个最熟悉不过但又最陌生的邻居。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文化上，日本都处在一个奇特的位置上。不能说它离我们很近。但更不可能说，日本是远离我们的。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位置，日本文化对当代中国才有这一种无法忽视的影响。

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指出，“探讨”在德文中（erörterin）首先意味着指示位置(ort)，然后意味着留意位置，这两者乃是“探讨”的准备步骤。他是一个德国人，我们是中国人，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日本的文化。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相当糟糕的开始，因为在今天，却是这样的一种状况：欧洲人的社会文化并不是希腊-罗马的，日本的文化并不是日本的，中国也并没有“中国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是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

尽管表面上是以一种西化的形式，即，看起来西方文化似乎统治了世界。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和当年的海德格尔一样，对日本文化做一番探问。但日本是一个特例，日本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或许这样说更好——即日本根本不是一个西方国家，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地理上、政治上）。但对于现代性弊端，日本社会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这是为什么呢？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对其进行一些探讨，而在刚才我们提到了，首先在于指示和留言位置。那么我们该从哪里开始，去考察这一问题？

一个时代问题的考察必然是历史性的，而一个历史性的考察则务必要会聚无数个精神和意见——当然这是因为要面对无数种现实。黑格尔的辩证法曾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近代历史学，那是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核心既不在于矛盾，也不在于正题-反题-合题的斗争（马克思的哲学同样也是，但列宁却持不同的意见。对此可参看列宁的《哲学笔记》），而在于对立两者的“之间”，即那些对立的精神和它们背后的现实共同构成的空间。但是首先，我们还必须看看那些对立的精神和对立的现实。于是，我们必须考察日本社会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限于篇幅和能力，笔者在此文中将不会对日本近代以前的历史文化做探讨。可能的话，这将是下一步的工作。）

从近代开始，日本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开始面临了全球化-市场化的天命。黑船事件标志着日本进入了西方人扩张的视野。1854 年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1855 年

日俄签订《下田条约》，1864 年四国舰队炮击下关。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西式国家的近代化道路，通过发展经济和技术、武力扩张和资本输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就是在此背景下日本诞生了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等启蒙学者。然而随着在二战中被美国击败，日本沦为战败国，受到了盟军的审判和占领、改造。让日本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

顺着上面的历史进程，日本社会和西方文化的接触越来越多，看起来越来越深入。而日本社会似乎也在顺着以上的进路发展、前进。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做是资本的全球化发展和深化的过程，而随着为此服务的各种技术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也随之缩短，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发生了众多的接触。这当然会带动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但我今天说的却是另一回事。即全球化和资本化的深入、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另一面。

海德格尔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曾经这样和日本友人谈到：

海：您在这里触着了我与九鬼伯爵经常探讨的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对东亚人来说，去追求欧洲的概念系统，这是否有必要，并且是否恰当。

日：看起来似乎不再有什么退路，因为现代的技术化和工业化已经席卷了全球。

海：您说得很小心，你说：“似乎……”

日：对。因为从我们东亚人的此在（Dasein）看来，总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那个把我们一并卷入其中的技术世界必定是限制于表皮的，并且……

海：……这样一来，尽管有种种通话和混合，但一种与欧洲人的此在真正交往却并没有发生。

日：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海德格尔和他的日本友人谈论的是关于在无法避免的全球化-现代化-资本化-技

术化进程中日本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他们认为日本和西方的真正交流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人将日本文明对象化了，日本对于西方人说是什么呢？一个广大的市场？一个资源地？一个同属发达国家阵营的贸易伙伴？一个位于太平洋版块和亚欧版块之间的岛国？这些都不是错误的答案，但却都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在这段对话的最后，日本学者和海德格尔说出了他们的看法：“或许与欧洲人此在的真正交往并没有发生。”

但是随着现代性进程，总有一些东西发生了。那么在同化和混合之中，发生的到底是什么？

下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日本文化在现代性进程中面临着什么？又发生了什么？现在的日本文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现代性进程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是密切的，随着资本化的深入，文化产业出现了、文化和艺术成为了批量生产的商品。按照人们的喜好来（或者说，消费需求）决定其价值。按照法兰克福学派西奥·阿多诺的说法，文化工业所操纵的文化活动的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单面性、操纵性、强制性成为了现代性进程中工业社会文化艺术的根本性特征。现代化进程还带来了所谓的虚拟文化，比如迪士尼乐园，这当然会满足人们所谓的“文化消费需求”，然而索绪尔早在 19 世纪就看到了虚拟对于现实的危险，德里达等人也认为虚拟有通过替补取代现实的危险，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布希亚（Jean Baudrillard）就曾说过：“虚拟的迪士尼乐园可以掩盖那虚拟不了的现实洛杉矶。”但无论是索绪尔、德里达还是鲍德里亚都认为，这种替补可能最终取消现实。而日本的现代性进程中无疑也受到了以上影响。

然而对于日本文化社会的现状来说，影响不只来自于现代性，还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的交流和对立。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让我们看看海德格尔和他日本友人之后的对话：

日：我是敢下此断言的最后一个人了，

要不我就不会来德国。但我总是感到某种危险，显然，九鬼伯爵也没有克服掉这个危险。

海：您指的是何种危险呢？

日：那就是我们收到欧洲语言精神所具有的丰富概念诱惑而走岔了路，我们的此在所要求的东西贬低为某种不确定的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海：可是还有一种远为巨大的危险呢。这种危险牵涉到我们双方。它越是不显眼，就越具有威胁性。

海德格尔是一位对日本文化的追问者，然而今天我们的此在却早以不同于他那时的此在。在我们今天的历史境域中，原有的纠缠和幽灵更多了。虽然技术使得我们能够了解更多的关于日本文化的资料和文献，但被技术量化的知识却早已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正如今天的日本一样。他的日本朋友在对话中提到了“一种危险”，那是一种在和欧洲的文化照面中才会出现的危险，由于对象化和资源化，日本的社会文化在和欧洲人照面的时候，只是成为了为欧洲人所用、所理解的对象和资源。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这种对日本文化的贬低和歪曲进行的越来越猛烈——尽管是以一种看起来“贴近日本”的方式。

继续来看对话：

海：我们的对话不是什么学究式的，专门开办的讨论会。在举行这类讨论会时，譬如在研究班上，九鬼伯爵总是默默无语的。我所说的对话是在我家里搞的，犹如一种自然而然的消遣游戏。九鬼伯爵偶尔也带他的夫人一道来，他夫人往往着一套华丽的日本和服。东亚世界于是愈加熠熠生辉，而我们的对话的危险也变得更显赫了。

日：我还是不懂您的意思。

海：我们的对话的危险隐藏在语言本身中，而不在于我们深入讨论的内容中，也不在我们所作的讨论方式中。

日：可九鬼伯爵是精通德文的，他的

法文和英文也是非常好的。

海：不错。他确实能用欧洲语言来表达所探讨的事情。但我们探讨的是“粹”。那时候，日本的语言精神对我是完全封闭的；而且今天也还是这样。

日：这种对话的语言把所谈的一切都欧化了。

海：然而对话却试图道说东亚艺术和诗歌的本质。

在此我们看到了几种异化：

- 日本和西方的异化
- 资本和技术造成的异化
- 虚拟和现实的异化

话中他们说“对话的危险隐藏在语言本身中”。是的，日本和西方的交流的危险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日本文化本身和西方文化的差异。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这种差异被取消了。或者说，被强行取消了。日本所谓的成功现代化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的？是在美国军队的占领下开始的！正如近代化的开始是枪炮和商品打开了日本的国门，现代化的进程就通过商品化和技术化，加上在此过程中强加给日本人的西方符号概念、语言逻辑、文化艺术等等无孔不入地深入了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奈良立起的高楼挡住了古建筑群的阳光和生机，而能剧的表演交给了投影屏和机器。

所以，在对话的最后，日本人对海德格尔道出了那个真正的危险——

“这种对话的语言把所谈的一切都欧化了。然而对话却试图道说东亚艺术和诗歌的本质。”

在全球化无法避免的时代，西方的文化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即使我们谈“尊重日本文化”，这个所谓的日本文化也不过是欧洲人的一个对象罢了。就像提到东京，大多数人想到的是高楼大厦和繁华的商业街，以及作为陪衬的小木屋。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异化。即：日本的社会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下和自己分离，然而这不代表着日本就是一个西方化

的国家了，事实上通过这种纠缠在一起却始终不能进入对方的交流，日本的状况就好像德里达笔下的幽灵一样，通过亡者产生（故去的日本、故去的西方），不能摆脱，无法直视，但又始终挥之不去。

西方在现代性进程中也发生了同西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分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经济和技术的纽带缩短了空间距离和文化距离。和日本人打交道的并不是真正的西方，正如西方所接触到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日本。商品化和技术思维的深入导致了量产的文化艺术产品获得统治地位，而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这种分离进一步加剧了。而且这还会导致逐步取消“真正的日本”的可能，让日本只是成为荧幕上的对象、商品上的标签、或者一个生物学和地理学或者地缘政治的名词。现在我们在现代性进程中看到了几种分离：西方人自身的异化、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异化、日本文化在现代性下的异化。

“异化”的德文词 *entfremdung* 是英文词 *alienation* 的翻译，而 *alienation* 又源于拉丁文 *alienatio*。在神学和经院哲学中，拉丁文 *alienatio* 主要揭示两层意思：（a）指人在默祷中使精神脱离肉体，而与上帝合一；（b）指圣灵在肉体化时，由于顾全人性而使神性丧失以及罪人与上帝疏远。格劳秀斯、霍布斯和洛克也有类似的概念，但真正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两重关系上深化此概念的是卢梭。卢梭认为文明使人腐败；背离自然使人堕落；人变成了自己制造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资本-技术式的劳动方式造成了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分离，因此认为这种劳动方式是一种异化。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不可能对异化做过多的探讨，在文中异化暂且可以简略的理解为和自身的分离。

在这个时代，日本和东亚文化的异化却绝对不只是日本和东亚的问题。无法避免的现代性和全球化让这个问题不只成为日本的天命，而还是整个欧洲和美国甚至人类的天命。海德格尔当年作为一个看到了这种危险的追问者，进行了对日本的真正交流的尝试。虽然我们今天的位置和环境都不一样了，而时代更是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但是作为追问者，我们必须要和日本文明展开真正的对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看到那个被遮蔽的危险。而真正的交流就需要我们用日本人的方式去考察日本，当然，作为一个考察者，我们还必须保留一种我们的目光和角度。虽然相互冲突，但在这两者的深层交流“之间”（*δια*）才能发生一种真正的交流。虽然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道路也是困难和隐而不显的。但无论如何，本文的目的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日本文化的现实层面。

“现实层面”，当然，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对日本现实社会和文化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却明显的会引入虚拟的层面。我们先暂时停下来，因为对虚拟文化的讨论的需求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迫切，而这样一种问题也从来没有距离我们如此之近。在日本现代，虚拟文化成了商品化时代下的成功者。以 ACG（*Anime*、*Comic*、*Game*）为代表的虚拟文化每年给日本带来了大量的产值，还作为一种流行潮流，对东亚、西欧、美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影响。（关于这种影响，请参见本人的《富士山上的浮云——浅析现当代日本社会现象与 ACG 文化》）

“虚拟是现实的替补”，索绪尔早在 19 世纪就这样指出。但一种替补是什么？德里达在《文字学》中解释道：“没有本质性恰恰是替补的奇特本质：它本不可能发生，而且，它确实没有发生——它决不可能随时出现。如果它随时出现，它就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不会成为取代他物并占据他物地位的替补。……它不过是虚无，但从效果判断，它远非虚无。替补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席。存在论（本体论）不能思考它的作用。”替补不是虚无，虚拟也远非虚无。作为替补的货币本身是缺少使用价值的，而且“作为货币”他甚至可以说是使用价值。但它确实取代了——几乎一切。尤其在这个一切都成为商品的时代，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宗教信仰、心理需求。但是被人们忽视的虚拟技术，或者说虚拟-世界，是一个比货币和资本更可怕的替补。因为货币和资本只是通过这种

替补取代了劳动产品和资源，而虚拟世界，替补的是——现实世界。

德里达说“它不可能随时出现”。当然，资本本身是没有使用价值的。我们明显不能用“钱本身”来做任何事，而且资本的本质也决定了这一点，要是用它当卫生纸——它当然就不是作为货币和资本了，而只是作为纸张。但资本确实通过这种替补中介取代了商品社会的一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补和中介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谢林关注存在的根据和根据的存在，黑格尔则用对立的诸精神构建了一个历史空间，而德里达被幽灵所吸引。

在日本，虚拟文化渗透进了各个角度。日本的历史和伟人们成为了虚拟文化的对象。让·鲍德里亚认为“并不是荧幕成为了世界的对象，而是世界成为了荧幕的对象。”一旦陷入一直脱离历史性和时间性境域的虚拟空间，现实的东西在那一刹就都被取消了。银幕上的形象和历史再生动和逼真，也不能改变他们无历史的本质。但人们关注于虚拟难道不是因为现实出了问题，人们可以津津乐道的观看一部电视剧，而剧中的人看起来却比现实中的人真实。人们可以对现实生活中周边的事情轻易产生质疑，但对媒体的宣传和引导——既包括直接的还包括间接的，都毫无抗拒能力。而媒体却可以凭藉技术随时随地地介入生活。既然一种脱离现实的生活被看作是真实的，那么还指望我们的生活剩下些什么

呢？或许就像德里达说的，只剩下幽灵。亦即只剩下那种替补，和我们被异化的不真实的生活。

而日本的虚拟文化的发展又是特殊的——即它不是以简单现实为对象来进行一种虚拟，而是虚拟的手段本身也是虚拟性的。比如动画的主角、背景往往都只是架空的。在屏幕上则看不到任何现实。任何一部动漫和游戏作品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而这种文化需求的替补导致了日本现实文化的取消。虚拟生活方式成为了现实生活的一部份，以至于人们无法割裂。问题在于，为什么日本成为本来属于西方的异化最大的受害者，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又是何种关系？克服一种现代性的异化可能吗？而现在的状况和位置又究竟是什么？

这就需要一种对日本-东亚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对技术本质的深思、对虚拟概念和现实概念的把握。而这些庞大的任务都是本文无法完成的。本文的目的在于，做一番准备工作。

华美的乐音终究离开了人们的居所
被囚于墙上的挂钟 机械地行走
而太阳则停留在地平线上
人们终究远离了大地
去往那另一方

涵與

作于 2011 年春末
改于 2012 年夏末

“女性”的建构 与“男性”的邪典电影

——为何邪典电影中没有“女性”的存在？



：金宝或者李小红

由我导师黄卓越先生举办的2010BLCU gender and media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就女性在电影、电视连续剧、真人秀、动漫产品、网络等媒介中的现状做出了精彩的发言。这次会议，结合我正在撰写的有关邪典电影社会学的博士论文，引发了我的思考：为什么邪典电影没有女性导演？邪典电影游离于“主流”之外甚至反抗主流，但从性别研究层面，它不仅不是更为自由的，而恰恰是更为男性专属的文化资本。拉康指出，女性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实中的女性都是男人想象中的女性，与作为“自在的女性”（female-in-herself）毫无关系。男性只能感知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对他们来说，女性既是欲望的对象，也是危险的存在。对邪典电影来说，不管是早期哥特电影中女巫和修女等宗教背景下的女性、西部电影中供男性抢夺的战利品女性、“剥削”电影或意大利铅黄电影中色欲和被屠宰的女性，还是坎普电影中性别不明的女性（或男性），都显然不会是女性主义者喜闻乐见的形象。这与邪典电影几乎全部由男性制作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些全部由男性制作的电影“成为”了邪典电影？为什么是它们拥有了经久不衰的狂热cult受众？这些影片究竟切合了受众的何种意识形态需求（无法实现的父权制想象，男性中心主义）？在可期待的未来，女性导演

的出现，是否可以丰富邪典电影的样态及观影格局？

一、邪典电影：定义的焦虑

什么是cult film？简单说，它指的是一些与众不同的、极度风格化的电影，在中国被翻为“邪典电影”（《环球银幕画刊》2003年第6期）。对于它的铁杆影迷，这一名词基本上等同于“跟你们不一样”；对于主流电影爱好者，则至少意味着“怪异”，“恐怖”，“疯癫”，“反常变态”或“恶心下流”。Bartłomiej Paszyłk在2009年出版的《邪典恐怖片的快感与痛感：史的研究》（The Pleasure and Pain of Cult Horror Films, an Historical Survey）中，归纳出邪典电影的三个特点：首先，它肯定不属于主流电影；然后，它吸引我们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抵制它，因为它“拒绝生产多数人喜爱的那种愉悦”；最后，邪典电影不是生而邪典的，是观众将一部电影变成了邪典电影——一部电影在其发行之前不可能宣称自己是“邪典电影”，因为它必须吸引到一大批死忠的cult影迷，被他们持续不断的观影二次建构后，才能“变成”cult movie。

所有拥有大批狂热cult粉丝的cult films从其文本本身来讲有什么共同之处？在出版于2003年的论文集《定义邪典电影：一种对抗性品味的文化政治》（Defining cult movi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oppositional taste）一书的导论中，作者

以“拒绝定义”的方式探讨了邪典电影的社会学意义。他强调“产生概念和区分的‘过程’才是邪典电影文化政治的核心所在”。全书的重点不是“妄下绝对的标准，而是提供一个关于定义与意义的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和沟通。”他引用 Jeff Sconce 的话，指出“‘邪典电影’这个概念可以将很多看起来根本不挨着的电影门类包括进去：血块电影 (splatterpunk)，意大利残酷实录 (mondo films)，意大利历史宗教史诗片 (sword and sandal epic 刀剑与草鞋电影，又叫 peplum 高腰短围裙电影，热播于 1958-1965 年代的意大利，后被“通心粉西部片”取代。——这些戏谑的名称来自西方影评人，笔者按)，猫王表演 (Elvis flicks)，政府卫生保健片，日本怪兽电影，沙滩派对歌舞片，以及历史上所有从青少年犯罪记录到软性色情的剥削电影。”因此，“比起试图找出能够定义邪典电影的基本要素，我们不如首先设想邪典电影本质上就是个五花八门的东西。”

而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邪典电影的关键点肯定是某类人自得其乐的亚文化实践；是越轨分子之间秘密的相互认同；是对日常生活丧失激情后对“非正常”、“非本来”的需要；是“一种节日的保留节目，是一种运动。”（英文维基百科）——与一般的电影不同，它不仅是被观看的影像，还是一种创造“看与被看”的革命行为的行动；其所引发的观影奇观、年度拜物教狂欢、小型政治暴动、“不健全人士”大游行……都显示了某种“电影原始主义”，某种与生俱来的迷狂，某种社会学意义上“仪式”的局限性。如此说来，邪典电影的制作和接受应该是最自由奔放、最无性别隔阂的，而事实上，情况却恰恰相反。

二、女性的失声：单性别的邪典电影

已经有很多人探讨过女性在电影中被置于“男性凝视”下的复杂地位；Laura Mulvey 认为，女性身体的建构，是为了男性观众的观影快感服务的；是父权制体系

社会化再生产的工具。女性很难在电影中发现积极的，具有力量的身份认同；同时，女性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将感到自己更加无能；女性角色在电影中似乎只是个善于尖叫着求助或呻吟着色诱的形象，仅承担着激起“男性欲望”的作用。这一状况在今天仍广泛存在；在几乎所有好莱坞大片中，不管美丽的女主角如何聪颖、机智、善于搏斗，在关键的一刻仍必须被男主角带有浪漫情怀地解救，正如这些影片中的朋友或邻居一样，必须通过自己热忱的帮助、悲惨的死亡促成主角最终成功。这一切都充分满足了观众，且是男性观众的身份想象。邪典电影的观影模式与主流大片截然不同；但情况是，邪典影迷们的观影实践事实上更将女性排除在外；Angela McRobbie 在专门探讨亚文化群体的论文集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中，研究了女孩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女孩在亚文化群体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她们要么是帮会老大的女友，要么就得“去性别化”，比男人表现得更粗野、更强壮。作为某种亚文化资本，邪典电影在这方面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它从导演、编剧、摄影，到影片所展示出的意识形态（女性角色的设置、镜头的角度、画面的色彩等），到其发行后的 cult 受众，几乎都是男性的。季广茂在《对恐怖电影的精神分析及再分析》中写道，“解构主义的精神分析批评声称，恐怖电影丑化、贬低了女性。恐怖是以女性性别对于父权的畏惧为基础的。女性最终被刻画成了怪物，她们破坏社会秩序，因而必须加以残酷打击、无情镇压。”“恐怖叙事之所以能够带来快乐，是因为它满足了男人的欲望：亲眼目睹爱恨交加的女性被征服，或者女性因为性行为受到男性怪物的惩罚。这时，除非愿意听命于他们的父权制权威，不然她们是无法获得拯救的。”因此，“恐怖本质上是父权制的。此外，恐怖首先也是由男性生产和消费的。”当然，如前所述，邪典电影并不等于恐怖电影，虽然恐怖、惊悚、怪诞的情节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Hollows 通过对《泰坦尼克》的研究指出：《泰坦尼克》（作为经典好莱坞大片）虽然拥有大量 cult 追随者，但对于自命不凡的、“中眉”的、讲究“品质”的“影迷”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泰坦尼克》的 cult 人群中包括大量女性观众与“庸俗的”观众；影片体现出的主导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令邪典影迷将其排斥为“女性电影”。在《定义邪典》一书中，作者着力研究了邪典影迷的构成；他认为，邪典电影的影迷以男性中产阶级为主。尽管他们“……感到自己与费斯克口中‘多数的、正常的观众’不一样”，而是拥有“对抗性的品味”（oppositional taste），但事实上“这一‘对立性’恰恰重申了，而不是挑战了中产阶级的趣味及男性地位。”邪典影迷与主流影迷间的矛盾，“不是边缘阶层与中产阶级的冲

突，而是中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在这场斗争中，邪典影迷被扯进了‘文化的中产阶级’对‘经济的中产阶级’权威的挑战中，……下层中产阶级成了替罪羊，巩固了中上层中产阶级的权威。”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下层中产阶级“被他者化”、“被女性化”了；所以《泰坦尼克》被他们斥为是“流俗的”或“女性的”电影便不足为奇。对于女性邪典影迷或主流大片的女性 cult 粉丝来说，她们无疑被抛弃了、隔离了。

下面的列表，或许更能说明一些问题：我手头有一本美国电影批评家丹尼·皮瑞（Danny Peary）的《邪典电影》（The Cult Movies: the classics, the sleepers, the weird and the wonderful）（1981），在这本颇具权威性和指导性的书中，所列举和评论的影片全部是由男性导演执导的：

Aguirre, the Wrath of God(1972)	Land of the Pharaohs(1955)
All About Eve(1950)	Laura (1944)
Andy Warhol's Bad (1977)	The Little Shop of Horrors (1960)
Badlands (1973)	Lola Montès (1955)
Beauty and the Beast (1946)	The Long Goodbye (1973)
Bedtime for Bonzo (1951)	Mad Max (1979)
Behind the Green Door (1972)	The Maltese Falcon (1941)
Beyond the Valley of the Dolls (1970)	Man of the West (1958)
Billy Jack (1971)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1968)
Black Sunday (1960)	The Nutty Professor (1963)
The Brood (1979)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1968)
Burn! (1969)	Out of the Past (1947)
Caged Heat (1974)	Outrageous! (1977)
Casablanca (1941)	Pandora's Box (1929)
Citizen Kane (1941)	Peeping Tom (1960)
The Conqueror Worm (1968)	Performance (1970)
Dance, Girl, Dance (1940)	Petulia (1968)
Deep End (1971)	Pink Flamingos (1973)
Detour (1946)	Plan 9 from Outer Space (1956)
Duck Soup (1933)	Pretty Poison (1968)
El Topo (1971)	The Producers (1968)
Emmanuelle (1974)	The Rain People (1969)

Enter the Dragon (1973)	Rebel Without a Cause (1955)
Eraserhead (1977)	The Red Shoes (1948)
Fantasia (1940)	Reefer Madness (1936)
Forbidden Planet (1956)	Rio Bravo (1959)
Force of Evil (1948)	Rock 'n' Roll High School (1979)
42nd Street (1933)	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1975)
Freaks (1932)	The Scarlet Empress (1934)
The Girl Can't Help It (1956)	The Searchers (1956)
Greetings (1968)	Shock Corridor (1963)
Gun Crazy (1949)	The Shooting (1967)
Halloween (1978)	Singin' in the Rain (1952)
A Hard Day's Night (1964)	Sunset Boulevard (1950)
The Harder They Come (1973)	Sylvia Scarlett (1936)
Harold and Maude (1971)	The Tall T (1957) Targets (1968)
The Honeymoon Killers (1970)	Tarzan and His Mate (1934)
House of Wax (1953)	The Texas Chain Saw Massacre (1974)
I Married a Monster from Outer Space (1958)	Top Hat (1935)
I Walked With a Zombie (1943)	Trash (1970)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1956)	Two for the Road (1967)
It's a Gift (1934)	Two-Lane Blacktop (1971)
It's a Wonderful Life (1946)	2001: A Space Odyssey (1968)
Jason and the Argonauts (1963)	Up in Smoke (1978)
Johnny Guitar (1954)	Vertigo (1958)
The Killing (1956)	The Warriors (1979)
King Kong (1933)	Where's Poppa? (1970)
King of Hearts (1967)	The Wild Bunch (1969)
Kiss Me Deadly (1955)	The Wizard of Oz (1939)
La Cage aux Folles (1979)	

事实上，在这本书 1998 年的再版后记里，丹尼·皮瑞又为这个列表增添了约三百五十多部电影，增补了大量 1988-1998 年间的新作，并添加了一些拍摄于该书第一版出版前的影片，(the Cult Movies,394) 而这份名单中也没有女性导演的身影。

三、中国的情况

华语电影的邪典之作多出自港片。香港国际电影节近些年来都会设立“我爱午夜长”环节，旨在专门放映恐怖怪奇、感官

刺激的“午夜元素”影片。不仅如此，香港邪典电影其实早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在西方掀起观影热潮，不少学者“认为香港电影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癫狂、最自由奔放的电影制作。”比起欧陆邪典充满宗教隐喻的沉重古老、日本邪典源自生活的压抑扭曲、韩国邪典抓人眼球的暴力情色，香港邪典片更接近美式邪典亚文化式的粗鄙胡闹，并以其“狂欢话语”、“游戏心态”展示出更加百无禁忌的娱乐精神，是最具有跨文化思维的邪典影片，也是与后现代消费主义最紧密结合的邪典影片。

那么，中国大陆的情况如何？邪典电影虽然生发于欧美，但其特有的亚文化属性，决定了势必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邪典景观，所以西方邪典电影的标准从文化的层面并不能界定中国的情况。事实上，拍摄于1989年的《黑楼孤魂》（梁鹏、穆德远，深圳影业公司），就是一部成本极低、独立制作、充满探索性和批判性的地道的本土邪典电影。

除此之外，同样拍摄于1989年的《凶宅美人头》（刘邑川，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于1992年的《毒吻》（陈兴中，西安电影制片厂）及拍摄于1994年的《飞天蜈蚣》（吴清国，长春电影制片厂）等，也都以超前、怪异、魔幻的风格和某种政治性的隐喻，而成为影迷心目中的“中式邪典”经典之作。然而这股自由的浪潮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90年代中期电影业陷入困境而销声匿迹了。

近年来，中国电影业重放生机，此间上映的几部颇具邪典意味的电影，立刻让期待已久的影迷打了鸡血般亢奋起来，对“中式邪典”的拳拳期盼重又燃起火焰。《疯狂的石头》系列、《大电影》系列都引起了热烈讨论，而《刀见笑》和《让子弹飞》则干脆被迫不及待的影评人认作“中式邪典”的回归之作。一些影迷则在小组中大声疾呼“给华语新邪典一个机会”，对《刀见笑》跨文化、跨媒介、跨类型的表现形式大加赞赏。《让子弹飞》则引起了更多的热议；但现实的状况是，电影分级制的缺失，主流意识形态的操控，对商业利润的疯狂追逐，对独立影人发展空间的限制等等原因，使得多数“中式邪典”电影，仅只一股脑从“恶搞经典”、“戏仿”、“反讽”入手，从拍摄手法、表现方式等技术层面为自己涂抹上鲜艳的邪典色彩，试图搭上“邪典电影”狂放不羁的昭彰恶名，制造话题吸引追求个性的后现代消费主义观众群。

而对于中国大陆的女性导演来说，尽管还没有引起cult狂热的作品出现，但近年来，她们无疑也为市场带来许多了“委婉”，“感性”，“温暖”的佳作。有人总结她

们的电影贴近现实、充满人文关怀、追求唯美的艺术、尝试挑战商业化市场，这些都是可喜的现象；在西方邪典电影文化日趋没落衰败的今天，新的媒介传播技术将为邪典电影的制作和接受提供更多模式与渠道。中国电影业的崛起，肯定将会促成世界邪典电影的新格局；而其中，中国的女性导演也将占领一席之地；或许还将打破男性的凝视与建构，创作出“女性的”或“无性别的”电影。

四、女性导演、女性电影与女性的邪典电影

首先，女导演电影是否就等于女性电影？angela mcrobbie 曾质疑苏珊桑塔格对女性主义漠不关心，而桑塔格则回应，一个女性的学者并不意味着她就必须是女性主义者；作为“非女性主义者”的桑塔格事实上为女性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显然，女性导演拍出的电影肯定不等同于女性电影。男性导演可以创作出一部真正的女性电影（阿尔莫多瓦《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而一个女导演恰恰可能拍出一部带有相当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影片。今天，女性主义已经走过第一波（feminine）、第二波（feminist）和第三波（female）的革命，进入了“后女性主义时代”。这应该是女性自我身份认同全面觉醒的时代；正因如此，“女性主义”这一标签化的定义恰恰不需要再一味强调了。妇女得到真正解放和平等地位时，就将不会有“女性主义”这一学科的存在，正如一直以来并没有“男性主义”或“男权主义”这样的学科出现一样。当然，这样的一个前景还需要我们共同期待。那么，“女性的”邪典电影又是何种样态，更值得我们进一步企盼。



小林多喜二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

——葛兰西

资本主义是魔鬼行径和剥削行为。如果你真想通过耶稣的眼镜看世界，那么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创造一个真正的社会。耶稣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

——查韦斯



鲁 迅

【译者按】印度共产主义者的斗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打击不仅撼动了印度社会，还通过资产阶级媒体，以令人惊骇的方式警示着世界各地的剥削者。当代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由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实际上，由于中国媒体时常报道印共（毛）和政府军的战斗，比如各大媒体最近就报道了毛派对国大党车队的袭击。所以关注时事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左翼，对他们并不十分陌生。不过，资产阶级媒体总是带着偏见去报道新闻的。中国媒体尤其如此，他们之所以报道毛派斗争无非是因为这一斗争发生在外国，而且毛主义的旗号令人称奇，颇具新闻价值。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称奇的阶段。对于一个与中国毗邻的人口大国正发生着的如此深刻的斗争，是必须要深入地了解研究，并向群众宣传的。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译者翻译了如下这篇印共（毛）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巴萨瓦拉吉同志在去年八月为《黎明》杂志做的访谈。巴同志在访谈中详细阐述了印共（毛）对人民战争的理解和印共（毛）对“绿色搜捕”行动的应对，介绍了近十年来人民军队的建设成果和战绩，还对印共（毛）九大提出的“发展人民解放游击队为人民解放军的展望”做了解释。全文内容丰富，颇值得一读。由于原文没有注释，这就使得不熟悉印度情况的同志读起来会有些困难，所以译者特地增加了不少注释和扩展阅读的链接，希望能够帮助大家相对全面地了解情况。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被印度毛派和革命群众的斗争深深地震撼了。一方面，印度共产主义者的牺牲精神让我们感到惭愧。尽管同样都号称是为理想而奋斗着，但我们在咖啡馆喝茶在网络上聊天抱怨生活无聊的时候，他们——印度的毛派战士们——却在丛林里浴血奋战，每一次行动都有可能会失去生命。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能为运动做些什么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惊叹印度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和革命勇气。不断壮大的群众组织和人民军队鼓舞了处于低潮期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限力量。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军“中国支队”的战友，让我们衷心祝愿印共（毛）的同志们能早日完成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解放全印度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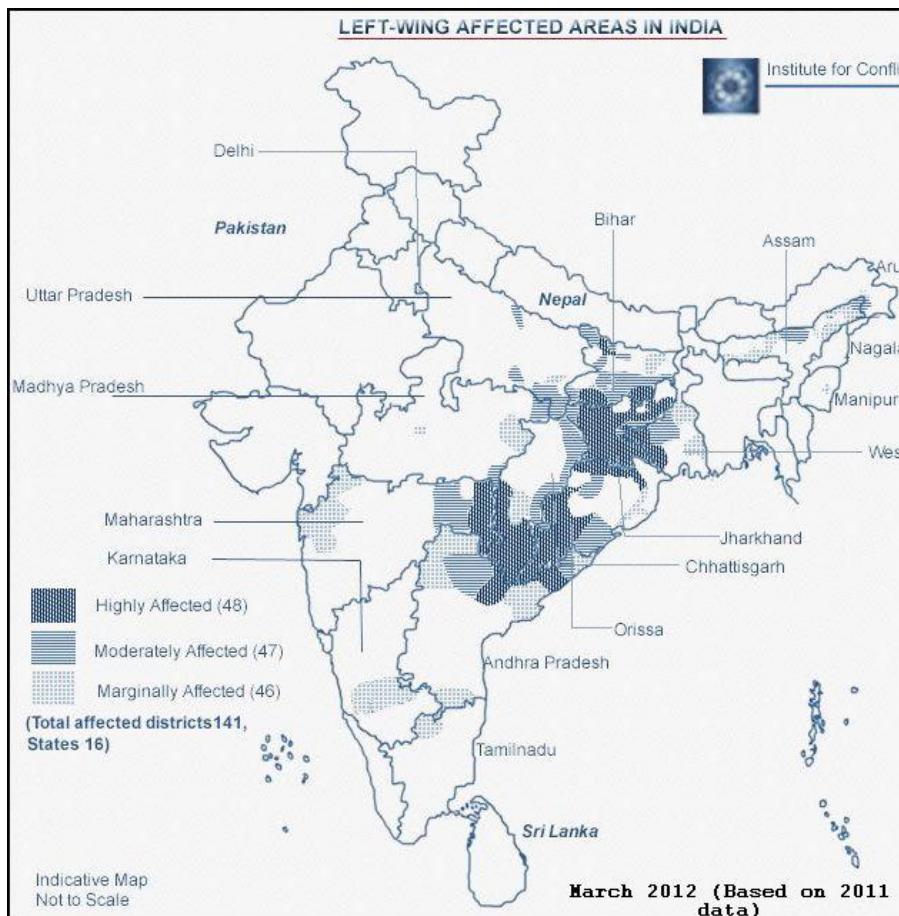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 巴萨瓦拉吉同志访谈



：黑夜里的牛 翻译

*巴萨瓦拉吉(Basavaraj) 为印共毛中央委员南巴拉·克萨瓦·拉奥 (Namballa Kesava Rao) 的化名，负责军队工作

* 《黎明》(Pahat, Dawn, 印共毛马哈拉施特拉邦委员会机关报) 进行了此次访谈



毛派影响的区域（2011年数据）

问题1：曼莫汉（即印度总理辛格——译者注）说毛主义者是国家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毛主义者则说他们在发动人民战争。你如何定义人民战争呢？

BR：一些民主人士已经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们要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就必须探究曼莫汗·辛格总理宣称毛主义者是国家最大威胁的原因。毛主义者为了我国工人和农民等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为了一个民主的经济体系，为了保证人口的80%能拥有政治权利和自力更生，为了国家主权和保护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而战斗，怎么能把毛主义者称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呢？

2006年，他第一次宣布左翼极端主义者为国家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就在这之前不久的2004年9月21日，印度共产党(马

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派共产主义中心（MCCI，全称 Maoist Communist Center of India——译者注）这两个在印度革命运动中长期独立行动的革命政党汇流了。于是出现了印度共产党（毛泽东主义）。人民游击队和人民解放游击队合并为新的“人民解放游击队”。而在那时，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奥里萨邦、西孟加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等一些邦的邦政府已经跟若干公司签订了备忘录，让这些属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的公司在阿德瓦西人（Adivasi，印度的一个土著民族——译者注）地区掠夺矿藏和自然资源。像塔塔、埃萨、京德勒、韦丹塔、Jayaswal Neco这样的公司迅速渗透到这一地区。而由国民大会党领导的统一进步联盟，人民党、印共和印共（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这样的买办统治阶级政党，以及其他地方性政党对这些公司唯命是从。为了换得价值数千万卢比的回扣，他们毫不犹豫地

把国家财富，甚至是国家主权抵押出去。

2008年以来，全世界都爆发了严重经济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在落后国家开采自然资源的剧烈竞争开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都宣称这次的危机非常深刻，超过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因此，帝国主义者和公司都试图更猖獗地掠夺我国的自然资源。但是印度人民反对这种掠夺，因为允许这种彻底的剥削，会使水-森林-土地（Jal-Jungle-Zameen，英文为water, forest, land，是纳萨尔派使用的战斗口号——译者注）受到破坏，让数百万人遭到拆迁，却绝不会造成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们所宣称的“发展”。我们要求水-森林-土地（Jal-Jungle-Zameen）必须属于阿德瓦西人。印共（毛）站在抵抗斗争的最前线。结果，价值数万亿卢比的备忘录未能得以实施。在一些地方，采矿陷入停顿。人民在驱逐矿业黑手党。一些重工业也停止了运转。数个大坝的建设停止了。而正因为如此，企业公司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就怒了。

因此一方面，反对剥削统治阶级的虚伪发展的人民，和党领导的包括丹达卡冉亚（属于恰蒂斯加尔邦——译者注）和比哈尔-恰尔肯德等革命运动较强的邦在内的我国各地区革命群众，正在组织初级水平的革命民主政治机构。革命人民委员会（PRC）提出的替代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由被压迫群众建设，通过摧毁封建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力量，正给封建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前的政治权力带来了严重挑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2004年到2008年，印度买办统治阶级试图猛烈地清除革命运动，在贾坎德邦通过像Sendra和Nagrik Suraksha Samiti这样的反革命宣传、组织和私人武装，在比哈尔邦通过各种封建武装和反革命组织，在丹达卡冉亚通过Salwa Judum（此为邦政府支持和训练的民兵组织——译者注），在西孟加拉邦通过的Harmad Bahini（印共马专门为镇压毛派而组建的民兵组织，意为雇佣打手——译者注）^[1]和属于崔纳木国大党^[2]（作为国大党同盟的民粹主义政党——译者注）

的Bhairav Bahini（崔纳木国大党组织的右翼民兵组织——译者注），而在Narayanapatna（奥里萨邦的一个区——译者注）地区通过Santi委员会。

自2009年起，他们发动了绿色狩猎（Green Hunt，这一术语是印度媒体使用的，指的是印度政府在红色走廊使用准军事部队对毛派的进攻——译者注）行动。这一行动目前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了。这一反革命行动日益激烈，而且采取了最残忍的法西斯主义形式。2003年，13个革命积极分子被屠杀于贾坎德邦东新奔（East Singhbhum）县^[3]的隆哥（Longo）村；在2005年到2008年的Salwa Judum白色恐怖时期，近千阿德瓦西人遭到屠杀，664个村子被夷为平地，丹德瓦达（Dantewada）、比拉斯布尔（Bijapur）和巴斯塔（Bastar）三个县有共六万阿德瓦西人被拆迁（正是这一组织的残忍行为导致了今年五月毛派对国大党军队的伏击，该组织的领导人享德拉·卡玛也被当场打死^[4]。——译者注）；若干秘密的谋杀，包括2005年二月在北特伦甘纳（North Telangana）的尼扎马巴德（Nizamabad）县的Manala秘密行动中杀害的十名革命积极分子，2006年11月在安得拉邦的Badwel秘密行动中杀害了9名革命积极分子；2008年2月在贾坎德邦的东新奔县的Bhitar Amda秘密行动中对九名革命积极分子进行的屠杀；2010年3月在Kanchal（丹达卡冉亚的比贾布尔县）秘密行动屠杀了十八名革命积极分子；作为2009年发动的绿色狩猎行动（OGH）的一部分——在比卡内尔（Lalgarh）地区屠杀了近130名阿德瓦西人；在丹达卡冉亚屠杀超过250名阿德瓦西人；2010年1月在Phulwaria Kodasi（扎穆伊县，比哈尔邦）屠杀了八名革命积极分子；九月在同一个县的恒河岸边有十名革命积极分子遭到屠杀和毒害；2012年6月28日在恰蒂斯加尔邦的比贾布尔县的“Basaguda-Sarkinguda”发生了最近的一次二十人屠杀——所有这数十起屠杀都是印度统治阶级以清除内部威胁的名义，对人民发动战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值得大家注意的情况是，绿色狩猎行

动（OGH）并不是只限制在毛主义运动的地区。任何证明对公司企业劫掠构成障碍的人和组织，都将被视为这一行动的敌人。其目的是把由西孟加拉邦、贾肯德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恰蒂斯加尔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构成的广大区域，从所谓的“红色走廊”转变为“公司走廊”，并且抹掉所有被认为是障碍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一些民主人士把绿色狩猎行动（OGH）说成是“对人民的战争”。很明显，人民战争就是对绿色狩猎行动或者“对人民的战争”的回应。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协调争取人民政治权利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的关系，使人民懂得人民战争只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才发动的，让人民展示出自己的创造力和勇气，以此给出回应。只有通过人民战争才有可能阻止和击败绿色狩猎行动（OGH），别无他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人民战争定义为所有那些被 OGH 作为打击目标的阶级和人群，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战斗，反对公司企业，以及对这些公司唯命是从的封建和官僚买办资产统治阶级。如果人民战争要达成其目标，毛主义者的原则主张，“‘武装斗争’是斗争的首要形式，而人民军队是组织的首要形式。”所以，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在游击区发动的游击战争和战略地区的红色抵抗区在人民战争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如果没强大的群众基础，要发动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唤醒那些在帝国主义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脚下被碾碎了的被压迫群众，建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构成的统一战线。我们采取合法-非法，武装-非武装的群众斗争，就日常问题，政治和权利问题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开展斗争。被压迫群众正以各种方式开展斗争。我们党致力于确保所有这些斗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而发动，并协调其与通过推翻剥削统治阶级统治以获得政治权力的军事斗争之间的关系。

问题 2：政府正运用低烈度冲突（LIC）策略来打击毛主义者的起

义。对于政府的这一策略，您的回答是什么？

BR：印度统治阶级正使用美帝国主义传授的低烈度冲突（Low Intensity Conflict）的策略，集中全部国家机器来清除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是事实。所有正在反抗着国家暴力的民主人士都知道这个事实。低烈度冲突（LIC）不过是封建政治法则的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形式，它宣称所有的敌人都必须用各种办法——深思熟虑、诱惑、分割和黏着——加以摧毁。在这之中，毫无正义可言。它的目标就是清除敌人（对统治阶级来说，敌人就意味着毛主义者，即那些代表工人农民、中间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美帝国主义制定的低烈度冲突策略是当前镇压反叛的理论。

低烈度冲突是帝国主义制定并运用的反革命理论，特别被美帝国主义用来反对二战后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群众的斗争。二战后，帝国主义从抵抗革命所遭受的失败中取得了教训——法国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马来西亚；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特别是在越南——于是就制定了反革命作战方法，比如低烈度冲突策略，以对抗长期的人民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一策略把人民从取得政治动员和在革命组织的领导之下的团结，发动武装斗争的方向引开。换句话说，低烈度冲突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正义的革命斗争，镇压作为革命战争基础和支持者的人民，让他们投降。这一策略正公开地和秘密地；直接地和间接的，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方法，以欺骗性的方式在政治、意识形态、组织、军事、军事以及文化领域实施，而且有着中期和长期计划。帝国主义和作为其忠实听差的印度统治阶级是不会停止阴谋诡计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最骗人、反革命、残暴和破坏性的政策。

在二战中，帝国主义相当程度地虚弱了。对殖民地非直接的统治取代了直接的统治，新殖民主义取代殖民主义，成为了

普遍的特征。甚至在半殖民地完成反封建民主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之前，那些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作为他们的忠实走狗，披着民族独立的外衣攫取了权力的地方大地主和官僚买办们执行着独裁统治，作为新殖民主义剥削的基础尽责尽责。同时，毛主义和长期人民战争分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道路取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的认同。随着苏联解体并从半超级大国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美国就成为世界警察和被压迫民族、人民和革命运动的头号敌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继续面临危机，而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内的所有措施都失败了，资本主义就陷入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剧烈危机。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独立、主权和民主就暴露出其虚假性，而这些国家统治者也暴露为一群帝国主义的买办和傀儡，暴露为人民的压迫者，暴露为民主、进步、自由、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大敌，暴露为所有群众运动的主要障碍。很久之前，一些国家的毛主义政党就采取长期人民战争（Protracted People's War）的道路，建设人民军队，发动游击战争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低烈度冲突（LIC）才制定出来，作为帝国主义继续他们新自由主义剥削和压服任何类型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反抗的多管齐下的策略。

战争是美国经济的基础。只有靠着卖武器、军事相关的科技、战机、无人机和战争物资，美国经济才能存活。只要战争一停止，美国经济就垮了。在所有实施 LIC 策略的国家，帝国主义正在迅速地把经济、政治、文化、公民、管理、法律和军事部门和机构转变为法西斯主义的机构。作为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的统治阶级正迅速地大规模地组织特警，准军事部队和军事部队，其邪恶意图是要瓦解我们国家的人民战争，克什米尔和东北部地区的正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并使人民屈服。他们正在中央和各个州都建设特殊情报部门。整个市政一军事部门都集中于中央控制之下。他们正大规模地实施心理战，将人民从基本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革

命运动方面引开，把他们推向虚假的发展和和平。他们使用特殊的力量，以镇压叛乱行动的名义，实施不人道的屠杀和破坏。心理战也同样猛烈地执行着。当这些战争和行动正在广泛和猛烈地进行的时候，国内独裁和帝国主义的控制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增长着。由此，对被压迫民族和群众的剥削压迫也就在同样的程度上增长着。另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激化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正动摇着我国的各个方面。我们国家正日益落入帝国主义之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地恶化。由于印度统治阶级从 1991 年以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帝国主义机构结构借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我们国家的经济正临近崩溃。正因为这个原因，印尼、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和秘鲁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债务危机，由于中小工业的破产、失业、购买力的下降和物价上升而崩溃。我们国家重复这一经历。尽管知道这一点，我国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者的智库们却正在宣传印度将在 2030 年成为超级大国。他们正试图让我国成为中国的初级竞争对手。帝国主义者的数十亿美金滚滚而来，就为了让心理学家建立心控术手册，对人民发动心理战，和谐他们的心智，比如说，让他们相信一个正陷入危机的国家会发展成为超级大国。实际上，除了亿万富翁百万富翁，普通群众都受到剧烈经济危机带来的强烈影响。由此，所有的社会矛盾和主要的基础性的矛盾一起，都激化了。与帝国主义和买办统治者对 LIC 策略的期望相反，我们印共（毛）领导的人民战争正曲折地发展着，其发展方式证明 LIC 策略一定最终会被击败，而人民的胜利却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民族运动也正面临曲折，但他们也一直在发展。所有这些都在证明，通过长期人民战争击败 LIC 是可能的。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详细地讨论过帝国主义的 LIC 策略，并在 2008 年 12 月制定了反击并最终击败它的策略。我们相信，如那个策略中提到的，通过专注于意识形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军事事务，我们是能够击败它的。

为此起见，我们在党的政治路线和军

事策略的问题上是坚定的，因为这一路线和策略会让我们的革命运动在长期人民战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策略问题上，我们又是灵活的。我们努力在阶级斗争中广泛地发动被压迫群众，传授马列毛主义，好让亿万劳动人民在人民战争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强化反对改良主义、经济主义、修正主义、甘地和平、后现代、虚假民族和独立等被证明是这一过程障碍的思想的斗争，并说服人民接受我们的理解。



纳萨尔派指挥官在土著部落群众集会上讲话

我们正努力发展和巩固我们的群众基础。我们坚定地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努力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使他们参加到人民战争中来。我们努力通过动员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群众，建设一个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通过扩张和加强战争以扩展人民战争到全国各地，我们使用这样的观点工作着。我们党努力通过革命宣传来回击剥削统治阶级的大规模心理战和鼓舞的宣传。而这种心理战和宣传正是试图摧毁毛主义人民战争的 LIC 的一部分。关于革命运动的事实不时地会摆在人民面前。

问题 3：政府拥有现代科技。政府有卫星，无人驾驶飞机，卫星定位系统，现代电信和通讯控制作战室，在不远的将来，还会使用机器人。你们会怎样反击这些高科技敌人呢？

BR：1956 年 7 月 14 日，毛泽东同志在他与两名拉丁美洲公共人士（危地马拉

前总统阿本斯夫妇——译者注）谈话中说：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

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我们从伟大导师毛泽东 (the great teacher Mao) 的上述话语中能懂得些什么呢？我们懂得，不是现代科学技术决定战争结果，人的意识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敌人多么强大，只要他们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当他们把非正义的战争强加到人民头上而面对着人民的怒火的时候，他们在政治上就会变得非常虚弱。人民反对敌人，其中的 90% 会联合起来，团结力量，击败敌人。显然，印度政府拥有非常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且他的牙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日俱增。他们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和援助。所以我们也懂得，推翻印度政府是不容易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思考为什么当时拥有高科技的美国，却也在数次侵略战争中面临失败。1965-1970 年，美国在越南战争遭到致命打击。然而，那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在五十年代以前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后来又得到中国的帮助，一直到 1976 年。尽管现在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阿拉伯人民反对专制统治的潮流，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发展着的工人阶级斗争，还有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游击队反对英美这样的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却让帝国

主义不能安眠。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领导的北约部队不得不从伊拉克撤出。他们还准备在未来两年内从阿富汗撤军。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因为他们违背人民的意志诉诸侵略战争，实施屠杀，通过剥削压迫把人民推向街道。所以，尽管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大好革命形势也正在全世界发展。如果我可以灵巧地利用这一形势，革命力量会有充足的机会胜利地发展。

只要印度统治阶级继续对人民的战争，进行剥削压迫和对无辜的人民实施屠杀，他们就不可能在战争中获胜，无论他们多强大，无论他们拥有多少现代武器。他们不可能把人民争取到他们那边。然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忘记，就战争中的手段来说敌人是强大的。我们党把这一事实，以及其他类似的事实铭记在心，走长期人民战争的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印度赢得革命的胜利。我们沿着长期人民战争这条最终会推翻敌人的道路，一点一点破坏，在解放乡村之后包围城市，并最终推翻敌人。事实上，GPS系统，无人驾驶飞机，直升机、强大的扫描机和其他现代科技并不像敌人所宣传的那样强大。借此机会我们要指出的另一个事情，那就是任何武器都有对抗它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教会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在剑术中，盾是为了防御剑而创造出来的。在拳击中，为了防御击打，才发明了抵挡防守术。防御行动是为了防守敌人的进攻行动才制定出来的。发明鱼雷是为了摧毁战列舰。为了打击战机和直升机，高射炮才被引入战场。美国军事专家最近自己都声称，现在被称为非常强大的无人驾驶飞机，有可能被“电子欺骗技术”引得偏移航道。最近，伊朗情报人员就使用这种技术，让美国一架监视无人驾驶飞机降落在他们的国土上并俘获了它。任何学过军事科学的人都不会害怕武器。毛泽东思想作为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而闻名，而特别地，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所以从不会害怕。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对于反动派使用的任何策略，人民都有能力使用反制措施。当二战中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

占领苏俄的时候，苏联人民团结一致，通过革命群众和共产主义者的牺牲，赶走了希特勒的军队。对自己拥有最现代的原子弹感到傲慢的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在击败希特勒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人民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敌人的现代技术或者在人民的洪流中被摧毁，或者被化解。当人民带着革命精神参与到人民战争中，工农和其他被压迫群众会在党的领导下使用现代科技，创造性地制定新策略，令人惊叹地对付敌人。他们会有能力反击敌人使用的反动手段，保卫革命运动并击败敌人。

人民解放游击队已经坚定地执行毛主义游击战原则（秘密、速度和决心），来反击帝国主义和他们走狗所拥有的现代技术。人民解放游击队必须一直运动，以敌人最难以想象的方式运动，让他们的现代技术失效。最近，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增加了对无人驾驶飞机的使用。尽管他们宣称美国总统奥巴马自己监督其在阿富汗的行动，但数百普通人仍在这些攻击中死去，人们通过这一事实就能懂得这场战争到底是向谁发动的。需要发动群众运动来反对在我国也使用无人机。通过在政治上团结人民，我们有信心能够打败强大的敌人。

问题4：去年，人民解放游击队的第十个年头结束了。请讲解下人民解放在这十年见所取得的成功。

BR：到2010年12月2日，人民解放游击队已经完成了其十年的形成期。在这十年里，人民解放军的成立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印度历史上从未建立过这样的人民军队。在这一时期，依靠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游击队发展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红军的一个支队，印共（毛）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队正努力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这十年中人民解放游击队取得了许

多胜利，也逐渐发展着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所需要的能力。人民解放游击军所取得的成就如下：

- 成立了中央,邦/特别地区/特别区军事委员会,分区/师/区,地区级指挥部;潘查雅特和地区级的人民民兵指挥部

- 人民解放游击军形成了三级结构,由主力部队、辅助部队和基层部队三支以相互依赖的方式运作的部队构成。

- 作为人民解放游击军新兵长期来源的民兵组织的发展。

- 协调人民战争与群众斗争的关系。人民解放游击军支持群众斗争和群众运动。比如,人民解放游击军支持西孟加拉邦的辛古(Singur)^[5],南迪格莱姆(Nandigram)^[6]和比卡内尔(Lalgarh)^[7]的斗争;奥里萨邦的Narayanapatna^[8]、卡林加纳加(Kalinganagar)^[9]和其他的斗争;安得拉邦的反对铝土矿(开采)的斗争^[10];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苏姜格阿尔(Surjagarh)的反对开矿的斗争;恰尔肯德邦的各种反开矿斗争;蒂斯格尔邦的罗汉迪古答(Lohandiguda)^[11]、Raoghat^[12]、Pallemadi和Bodhghat等地的反拆迁斗争。

- 人民解放游击军在1992年12月2日成立的时候还处于萌芽状态,慢慢地扩张发展到了连和营级。教育、医疗、技术、通信、补给、情报、指导团队和警卫单位也随着人民解放游击军一起扩大。人民解放游击军正在向着人民解放军(正规军队)发展。

- 进行了数十次战役,像 Kalimela^[13],Srisailam-Sundipenta, Garhwa, Jagpura,Balagunj,Yellamanda,Uppalada,Bara h,Ladipur-Sahugunj,Chandrapura,Saranda-1,Japla,Koraput,Saranda-2,Giridih,Jehanabad,R.Udayagiri,NMDC,Ranibodili,Bokaro,Kiriburu,Goelkera,Nayagarh,Jhajha,Lakhisarai,Upalmetta,Tadimetla-1,Tonguda,Battiguda,M arkanar,Tavvetola,Madanveda,Laheri,Mukaram-Tadimetla-2,Kongera,Kajara,Mamayil,Saranda 抵抗(2010),这些战役是数百次战术反攻的一部分——敌人的一些战役性进攻被击败了。并且消灭了2000士兵,俘获2500件武器以及超过十万套弹药。数以百

计的地主、民贼、反动分子、敌特、告密者和各种私人军队^[14]如 Salwa Judum^[15], Sendra, Nagrik Suraksha Samiti, Bhumi Sena^[16]等,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Harmad Vahihi(对“印共马的干部”的侮辱性说法——译者注), Santi Sena 反徒,流氓头子和各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政党的残酷政治领导人都被消灭了。

- 在敌人的政治权力已经被摧毁的战略地区,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建设潘查雅特、地区级和区级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法宝。

- 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完成政治、组织、宣传、防御和生产任务的首要机构。

- 印度的红军支队——人民解放游击军是我国和全世界被压迫镇压群众和民族的一线希望。

- 唤醒了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政治、组织、军事、文化和其他领域发展她们,使她们能够在斗争中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劳动阶级妇女取得自立。



革命武装力量

问题5：如果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未能成功回击毛派，政府准备部署军队。你们会如何反击军队呢？

BR：我们会如何反击军队,这取决于印度军队部署到我们的地区来的目的。实际上,国家机器由军事力量(军队,准军事部队,特殊和警察部队)、司法系统、监狱、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僚机构构成。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它的军事武

装力量。所以，军队属于国家。世界上没有不属于国家的军队。但是是哪种国家呢？当前的印度国家机器作为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官僚买办和大地主统治阶级的机构，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工具。因此，印度军队作为英帝国主义留给了印度买办政府的遗产，也同样是反革命的。

根据印度宪法，印度军队的主要任务保卫国家边境，防御其他国家侵略，以及在发生自然灾害时为人民服务。但印度政府却多次怂恿自己的军队对付自己的人民。一名军方官员曾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军队参与的边境战斗仅仅 143 天。以所谓内部安全的名义，军队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以“从尼扎姆(Nizam, 1793—1950 年间统治印度海得拉巴的土邦君主的称号—译者注)统治下解放”为托词，第一次对特伦甘纳(Telangana)人民反动了战争（从 1948 年九月到 1951 年 10 月）^[17]。后来，军队占领了东北部邦和克什米尔。在 1971 年七月，军队对邦比尔普姆(Birbhum)革命群众展开镇压性攻击。类似地，在 1991 年，他们完全使用印度军队，以训练为名来对抗旁遮普(Punjab)人民的意愿。在这些残酷的镇压战役中——在东北部有三万人，在克什米尔有八万人，在旁遮普有一万人，在特伦甘纳武装反抗(1946-51)中有五万人，以及在邦比尔普姆有 200 名群众和活动家遭到屠杀。如果我们加上自纳萨尔巴里(Naxalbari)和维兹亚那格兰(Srikakulam)至今遭到准军事部队、警察和别动队屠杀的 13000 人，那就有超过十数万人遭到政府武装力量的杀戮。数十万群众遭到虐待，被关进了监狱。人民价值数千万卢布的财产被抢劫和摧毁。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失踪。所有这些暴行表明什么呢？难道还没有证明军队、准军事部队和警察部队为了这些卖国的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了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毫不犹豫地屠杀人民吗？难道他们没有执行政府宣布的残忍、暴力和杀人不眨眼的政策吗？这些部队永远都不会放弃这些政策。

最近，为了清除毛主义运动，印度军队在 2011 年年末就以训练的名义，逐步进入到毛派运动强大的丹达卡冉亚的一些地

区。我们可以想象结果会如何。把有丰富自然财富的 Maad 山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者和企业公司，特别是要占领世界上最古老的阿德瓦西(Adivasi)社区——马瑞亚阿德瓦西(the Mariya Adivasis)——居住的面积达 750 平方公里的 Maad 山区，目标就是要把他们拆迁走。我们党在丹达卡冉亚地区沿着革命路线发展各种阿德瓦西社区。所以除此之外，消灭我们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员也是背后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因此，印度就不仅仅反人民，而且还是反动派。毛泽东主义向我们阐明了，甚至这样一个反动的印度军队，都可以通过长期人民战争击败。在这方面，中国和越南人民战争的历史是毫无争议的例子。

敌人正实施进攻，目标是要在 3 到 7 年内消灭革命运动。我们的目标是要尽量延长这一过程，由此把印度军队拖入一场以任何方式都无法胜利的长期战争。印度军队还没有从对东北部和克什米尔民族斗争的镇压行动中抽出身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镇压行动已经陷入战争很长时间了。我们要加强各个游击区的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游击区，把印度军队推向无法集中力量的境地。通过把人民日常斗争，政治经济权利运动与游击战争结合起来，以武装和非武装的战斗方式开展这些斗争，我们要把游击战发展为一场敌人不可能消灭的不可战胜的战争。

对人民来说，拆迁目前是一件重要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人民正在与印度剥削统治阶级的拆迁政策做斗争。我们党，人民解放游击队、革命群众组织，革命 Janatana Sarkars^[18]和人民民兵组织必须与这些人进一步结合。他们必须像鱼和水一样结合。一开始就必须把这些斗争转变为军事斗争，他们才能强力地反击来镇压反抗的军队和警察部队。

武装部队特殊权力法案 (AFSPA，可以理解为反恐法案或者镇压法案—译者注)^[19]一经生效，部署军队就随之被部署，并在扫荡措施如屠杀平民，失踪、逮捕、对妇女施暴、夷平村庄，掠夺人民财产，破坏，假遭遇战致死等中增加使用，在军队的历史中自始至终都可以见到这一结

果。所以，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动员群众反对 AFSPA。我们必须动员所有可以集合在“印度军队回去”这一口号下的力量，形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敌人。必须广泛地动员群众去反对假遭遇战，以及要求把死者的实体移交给其家属。必须开始群众的抵抗斗争。必须开展争取公民权的人民运动。只有当我们把人民运动发展为军事抵抗斗争的时候，才能给人民战争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按照作为低烈度冲突政策一部分的“赢得人心”的战术，敌人在实施作为“发展活动-警察行动”一部分的“融合行动计划（Integrated Action Plan）”。他们给予建设道路、电力和通讯，而不是灌溉这样的必需品以更多的的重要性。准军事部队官员，甚至军队官员最近到丹达卡冉亚来，在村里实施非军事行动计划。他们跟人民开会。为了欺骗人民，军队史无前例地做义务劳动。他们以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授爱国课程为名，口吐反毛毒液。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人民中分出一个群人，让他们转变为村子里的一个阶层，然后把他们当做镇压运动的主要手段来使用。我们必须在人民中揭露这些改革的虚伪性。我们必须让人民懂得，他们的基本问题不会通过这些改革所解决，只有推翻这个剥削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才是解决办法。

毛泽东同志反复教导我们说，只有“以群众为基础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在革命政党和人民军队的鼓舞下，人民不再忍受统治阶级及其雇佣军的剥削、压迫和镇压，大规模地加入反抗战争中，这在俄国、中国、越南的革命运动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都可以见到。人民的反抗是人民军队力量的持续来源。如果人民军队要扩大到数千数万的成员，那就必须大规模发展人民反抗斗争。比卡内尔（Lalgarh）和 Narayanapatna 这样的斗争已经在我们面前树立了理想的典范。

要打败印度军队，首要的是要研究它政治上的虚弱。

显然，印度军队打的所有这些仗都无非是为了印度剥削阶级的剥削、镇压和统治利益的战争。它的反人民的本性已经通

过战争暴露出来。所以，它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他政治上的主要虚弱之处。

虽然印度军队所有的士兵都是从人民中招募的，但一个巨大的矛盾是，他们为剥削阶级而不是为他们自己阶级利益效力。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为一个自己不属于的阶级服务。由于这一矛盾，他们的本性就是雇佣性的，而不是带着献身精神工作。这就是部队中发生自杀和逃跑的原因。类似的，各个进步运动、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会一直打击他们。军队中一直存在着起义的可能，就像个俄国和中国所发生过的那样；当意识到他们的压迫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压迫和镇压之后，他们会加入到革命人民军队和民族解放军队中来。这是印度军队最大的弱点，虽然印度统治阶级宣称军队强大。由于其雇佣军的性质，军队会策略性地不愿勇敢作战。他们不能应付为了人民利益而战的人民军队和赢得战略胜利。

印度军队没有多少游击战和反游击战经验。他们从游击战争，从作为镇压民族斗争，旁遮普人民斗争以及支持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的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的反游击战中得到的经验很有限。在泰米尔独立猛虎解放组织的战争中，印度军队遭受了致命打击。

印度军队对其在猛虎解放组织战争中所遭到的失败进行了反思，结果是认为原因是由于没有强有力的情报系统。实际上，一支诉诸于对人民发动进攻的军队，比如反人民军队，是很难建立强大的人力情报系统的。

我们必须向警察、准军事部队和军队解释印度军队中官兵矛盾的实际原因；解释各种军事组织之间和军队与警察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他们解释，他们不能向雇佣杀手一样为剥削阶级效力。我们必须号召年轻人不要加入剥削政府军，号召他们抵制敌人的征兵宣传，鼓动人民过有尊严的生活。必须广泛的宣传这一号召。

敌人在游击区以外使我们的领导层遭遇损失之后，就一直努力进行基于情报的攻势，试图在运动地区消灭党从最高层到

村级的领导力量。他们等待机会，甚至部署了无人驾驶飞机。所以保护党的领导层就变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为此，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实践中就必须注意要一直应用各种反制措施。人民的情报机关从人民抵抗斗争中得到加强。我们务必要保证关于革命运动领导层的信息不会落入敌人之手，而党、人民解放游击军、各群众组织和人民能得到敌人的信息。必须给敌人各种误导性的信息。每天传播各种谣言。我们要推动人民积极参与这一事情。我们必须通过推动各种政治努力使人民加深对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解，来应付敌人的谍报网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与击败印度军队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通过处理人民的日常问题，建立争取人民生存权的强大的人民抵抗战争，我们才能驱逐印度军队，并击败他们。

问题 6：党提出的“让我们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含义是什么呢？

BR：我们需要三件法宝来实现革命胜利——党、军队和统一战线。名叫“党”的战士手握着人民军队和统一战线这两件武器。这两件武器是革命胜利所特别需要的。我们党九大把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发展游击战为运动战，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以使丹达卡冉亚（DK, Dandakaranya）和比哈尔-恰尔肯德（Bihar-Jharkhand）成为解放区”——交给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革命群众组织、革命人民委员会(RPCs/Krantikari Janatana

Sarkars, 英文全称为 Revolutionary People’s Committee——译者注)。如果我们要建立解放区，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正规军队才能把游击战发展为运动战。

在过去五年中，由于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努力，游击战在各游击区都加强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实施的一些行动已经带有运动战的性质。比如，Mukaram-Tadimetla 伏击战^[20]、“空中索道行动（Operation Ropeway）”——那亚加尔（Nayagarh）行动、Kajara 和洛哈达伽（Lohardagga）等。人民解放游击军又进行过几次行动。这就意味着人民解放游击军正逐渐通过发动战争增强自己。类似地，我们必须通过提过群众斗争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武装人民使之成为人民战争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扩大人民解放游击军编队，加上一步步地发展征兵进程，就能够发展营和团。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把握好地形，观察敌人的弱点，根据时间空间，创造性应用游击战策略，并一直要自己掌握主动。人民解放游击军必须要获得人民积极的支持，尽可能地消灭敌人，获得武器，武装新兵和人民并不断前进。我们必须努力有计划地提高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战斗力，以便在其中建立更高水平的纪律，和主要通过攻击敌军的方式增加武器数量，以及逐渐发展指挥战争所必须的辅助机构。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党九大赋予的中心、首要和紧迫的任务。这就是“发展人民解放游击军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口号的含义。

注释：

(注释都是译者为方便读者理解而添加，原文无注释)

- 【1】 马克思主义者的私人军队（The Marxists’ Private Army）
- 【2】 要了解崔纳木国大党的政治观点，可以参考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印度的财政预算，难以平衡》
- 【3】 印度资源公司将投资 2,000 万澳元重启 SURDA 铜矿
- 【4】 印度恰蒂斯加尔邦国大党领导人车队遭袭 25 人死亡，印度恰蒂斯加尔袭击：幸存者说毛

主义者在杀害卡玛之后在他尸体上跳舞 (Chhattisgarh attack: Maoists danced on Karma's body after killing him, say survivors)

- 【5】印度西孟加拉辛古尔的农民斗争 (Peasants' Struggle in Singur, West Bengal, India)
- 【6】大卫·皮尤：南迪格莱姆和印度反强制拆迁的斗争 (Dave Pugh: Nandigram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Forced Displacement in India)
- 【7】比卡内尔大起义(The Great Lalgarh Revolt)
- 【8】Narayanpatna 无法扑灭的火焰: Dandapani Mohanty 访谈 (The Invincible Flame of Narayanpatna: An Interview with Dandapani Mohanty)
- 【9】卡林加纳加部落誓言继续挑起反拆迁斗争(Kalinganagar tribals vow to continue stir against displacement)
- 【10】鼓动反铝土矿开矿者，警察决一雌雄(Anti-bauxite mining agitators, cops slug it out)
- 【11】土地征用：为什么它增强了纳萨尔运动 (Land acquisition: How it fuels the Naxal movement)
- 【12】比莱钢铁厂在毛主义活动带修建工棚 (Bhilai Steel Plant building barracks in Maoist belt)
- 【13】毛主义者枪杀部落警官 (Maoists gun down tribal police officer)
- 【14】私人军队的形成(Formation of private armies)
- 【15】Salwa Judum 是什么？一个腐烂血腥的反应 (What is Salwa Judum? A tainted and bloody reaction)
- 【16】比哈尔的死人种姓武装 (Private caste armies in Bihar)
- 【17】互动百科 特伦甘纳农民起义
- 【18】Janatana Sarkars 是阿迪瓦西人政治和经济的集体组织形式，他们在毛主义者的领导下组织了起来。
- 【19】关于此法案，维基百科中有如下说明：The 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 (AFSPA), was passed on September 11, 1958, by the Parliament of India. It grants special powers to the armed forces in what the act terms as “disturbed areas” in the states of Arunachal Pradesh, Assam, Manipur, Meghalaya, Mizoram, Nagaland and Tripura. It was later extended to Jammu and Kashmir as The Armed Forces (Jammu and Kashmir) Special Powers Act, 1990 in July 1990. 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ed_Forces_\(Special_Powers\)_Act,_1958](http://en.wikipedia.org/wiki/Armed_Forces_(Special_Powers)_Act,_1958)
- 【20】印军队遭毛派武装伏击 75 死 双方正激战

原文链接：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dia/CPI-Maoist-Docs/Statements-2012/120813-BR-Pahat-Eng.doc>

1990 年代初以来希腊共产党的经验

罗莎·卢森堡大会 阿莱卡·帕帕莉卡

柏林 2008 年 1 月 12 日

 : Swang_1 翻译

希腊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从自身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就像大家或许知道的那样，希腊共产党将在 2008 年庆祝自己在希腊存在和活动、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员 90 周年。我们正在全国各地组织活动。我们希望这次周年纪念能够促进党的思想理论的成熟，提高党融合于人民群众并在力量对比的运动、发展、建构、激烈重组以及变化中发挥先锋作用的能力。这既是为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承担更多责任的一年，也是对欧洲、巴尔干、中东以及国际的运动做出更多贡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将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1980 年代以来，我们一直在执行党关于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的决定。我们已经出版了党史的第一卷，这卷一直写到了希腊民主军英雄的三年斗争结束的 1949 年。现在，我们正在酝酿涵盖 1949—1974 年历史的第二卷。同时，多年来，我们还不时发表包括机关决议和其他文件在内的我们党的官方文本。这使得历史学家和对此感兴趣的各方认识能够利用它们。2007 年以来，我们在哈利劳斯·弗洛拉基斯 (Χαροκόπειος Φλωράκης) 捐献给党的哈利劳斯·弗洛拉基斯小屋里建立了一家数字图书馆和历史档案馆，并且不断更新。

这家档案馆使得学习、研究党和运动的历史的青年、学者以及学生能够接触到历史记录。

在每一期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评论》(Κομμουνιστικό Επιθεωρητικό) 及其特刊上，都会刊载以前不为公众所知的党的历史文件。

我们相信，对一个共产党来说，经过一段时间后，结合历史背景研究并考察自己的历史、主要历史事件并结合这些事件所发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这一历史情境赋予了这些事件以新的意义）对之进行检视，是很重要的。此外，时间愈久，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结果就能愈加清楚地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能够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

在我们看来，当从党的战略立场出发来对党的行动以及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和态度进行自我批评式的考察时，更加深入的研究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1989-91 至今党的经验及其战略的形成

我相信，在今天的发言里谈谈 1991 年至今党的经验、选择以及它所制定并丰富的战略，是有所助益的。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在所谓“全球化”的旗帜下

配合着帝国主义制定的现实战略，重返苏联和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帝国主义的战略不是 1990 年代发生的力量对比的变化的产物，它首先是帝国主义内部的需求、矛盾和冲突的结果。仅仅是由于遇到了比过去更小的阻力，它才能够铺开。当然，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利益而反抗和推翻帝国主义战略是需要国家（一国、一部分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力量对比的转变。

在 1990 年代初，希腊共产党克服了自己的内部危机。那时，希腊资产阶级势力积极干预我党事务。他们公开支持那些要求解散希腊共产党并使之成为一个左翼合作的组织（以此庆祝社会主义力量的失败）的干部。通过边缘化或者解散希腊共产党，“社会主义是乌托邦，因此主要和基本的任务是使资本主义人道化”这样的观点就有可能流行开来。从那时起，我们在希腊就经常能够听到关于极权主义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极端资本主义以及自己的野蛮性败坏自身的资本主义的言谈。而这并不意外。再没有比回到资本主义黎明时期更大的空想了。由于历史的发展，法国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在很早以前就过时了。当然，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药方，也不能给人民的关键问题、给军事化和帝国主义战争提供解药。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规律和趋势是不可能被忽视的。唯有通过向社会主义前进才能找到解药，而社会主义也需要吸收 20 世纪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并且必须首先对之进行客观，科学的考察和批判。

党内的分裂不过是右翼机会主义和在国际形势变化下继续坚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必要性的党内力量的对抗。

1991 年，希腊共产党不得不表明立场，反对肆无忌惮的反共主义，反对带有政治阴谋的攻击。在自身力量衰退的情况下，党有责任站稳自己的立场、毫不迟疑地实现通过工人和群众运动组织反抗私有化的第一波浪潮的需要、消除新民主党政府的收获、回应巴尔干爆发的战争。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希腊的社民主主义政党“泛希社运”努力使自己遵循帝国主义世界的秩序。于是，希腊的社会民主主义觉得自己可以从过去使用过的反帝反垄断口号（它们尤其是在 1970 年代使用这种口号，并在随后的年月里时不时地使用它，虽然这些口号理所当然地没有反映社民主义政府的实践中）中完全解脱出来了。

1989-91 年的变化发生后，我们充分意识到，如果不能回答“反革命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否使得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能力和现实可能性得到质疑”这个大问题，希腊共产党将无法继续活动。我们必须回答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否必然、或者它是否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的一部分，并且考察哪里发生了消极的变化以及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必须驳斥这种不断增长并广为流传的理论：资本主义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逐渐意识到，引用经典作家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进行具体、客观的研究，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也不会让自己撇清关系，说这不是我们的错误，因为我们还不曾成为执政党。

同时，为了制定我们解决日常问题所必需的党的新纲领，我们不得不愈加深入地研究希腊、欧洲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在召开我们第 15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1996 年，就新的形势对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进行了重新组织。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行动集合于工人运动中尖锐的问题，并且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同时开始理论研究并组织意识形态的反击。

我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党的战略是由力量对比来决定并随之变化的，或者说，联盟政策是要紧盯投票箱的。联盟必须被用来壮大、巩固并释放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使之建筑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基础之上，并且服务于党的战略。

尽管经历了不足和困难，我们仍然认为 1991—1996 年决定了党的未来发展。我们制定了自己的新纲领，与运动的斗争目

标、集合力量组成斗争的基本战线以及联盟息息相关的框架。我们举行全国范围的大会，并在其间对资本主义复辟问题作出了第一个结论。在这段时期里，我们奠定了走出衰退转而反击、在运动中发展我们的观点以及政治领域的基础。

在此期间，阶级敌人和政治对手调整了对付党的战术。它承认自己没能边缘化、瓦解并在人民中孤立希腊共产党。它们继续公开打击党，同时结合间接隐蔽的攻击，并常常支持各种（最好是机会主义的）对党的侵蚀，以防人民的思想激进起来。

事实证明，令这些人烦恼的不是希腊共产党的名称或者镰刀锤子，而主要是它的战略方向、革命的战略以及革命的乐观主义。

我们创建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将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在工人运动、积极的进程以及政治势力的重新洗牌中扮演更加积极和有效的角色。

每年，我们都在群众运动中扩大我们的作用和影响。今天，由于现代技术的运用，我们面对着更加广泛的劳动、住房、休息时间、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主、环境以及移民问题。我们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此外，我们的地方组织已部分成功地发展了对各方面问题进行干预的更加全面的纲领，这个纲领以“第四社区支持框架”(the fourth Community Support Framework) 和私人冒险中的地方投资方案为中心考量了区域和地方干预。今天，人们愈来愈需要对事件进行科学的研究并为斗争提出存档的反提案。这些会由中央委员会的相关部门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完成。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建设并进一步壮大党的主要平台有二：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以及我们在青年当中的活动。当下，尤其是在妇女、经济以及政治移民问题上，他们尤其受到混乱的思想的祸害和攻击。

希腊共产党的发展不是面子问题，它所关系的是夯实基础以及理想远景，并远离小资产阶级的急躁和精神上的沾沾自喜。

我们如何克服主观困难

一些被正确培养的年轻干部缺乏经验，我们的老同志仍然受制于已被历史发展所抛弃的过去阶段的立场和经验，这些使我们对现时代要求的适应困难犹存。

我们必须对付帝国主义在现时代的决策。而且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期里，希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融入到欧盟中。

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的希腊政府，通过去国有化、破坏劳动关系、加强过去未曾有过剧烈垄断的新部门中的垄断系统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重建。工人阶级中富有经验的老一辈成员或是已经失业或是已经退休人员。曾在运动的兴起中发挥作用的传统产业部门萎缩了，而新形式的劳动关系已经出现，并且还有毫无工会经历的年轻工人和雇员组成的新兴行业以及新兴职业。它们已在社会和阶级结构中得到发展。希腊共产党有责任在要求全新的经验和技能的新领域中进行活动，并且在新的环境下正确地运用过去的经过检验的经验。

我们党面临这样的问题：优先处理党的领导事务、使政策符合于战略。使政策脱离于战略是一种疾病，并且我们认为，它存在于许多共产党中，之所以会这样要么是因为思想的偏差、要么因为思想和理论的薄弱、要么是由于迫害的压力、要么由于被禁止进行合法活动。

必须对这种疾病一直保持警惕，以使自己在忙于当下事务时不会受它影响。然而，主要的问题是，党的理论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要求。并且在我们看来，这个现象是不仅限于希腊，它甚至还不仅限于当代。

我们的工作的基础是反对垄断反帝国主义的共同行动，它围绕着为满足人民现时代的需求而进行的斗争所提出的目的和要求。这条斗争路线会产生，使得更严厉的反人民的措施得以避免，甚至赢得了一些暂时的收获。同时，这条斗争路线有助于产生这样的意识：为了解决政权问题，必须斗争和结盟。

希腊共产党的政治纲领

希腊共产党所提出的共同联盟和斗争的路线包含了这样的考虑：联盟的基础不是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共识。我们并不要求在我们中间要对社会主义、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以及等等问题保持一致。我们认为，共识的基础是反帝反垄断的社会力量的共同利益，即城乡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与这条路线针锋相对的是同化到对现行体制的管理中去，失败和撤退，以及社会、政治和民主问题愈加尖锐。

我们提出的反帝反垄断联盟旨在政权层面、在使人民掌握政权并由此创造和组织人民经济方面取得胜利。人民掌权的政府，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以及具有怎样的内容，都是与中右和中左的合作形式毫无关系的。我们谈论的是阶级，而不仅仅是政权层面的党派变化。

它的主要特点将是：经济基础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在集体化还未圆满完成之前的合作生产、对各部门以及各地区的全国计划、劳动和人力的控制、以及新的人民政权机构；废除阻碍人民的国际承诺；希腊退出帝国主义运动，退出占领军。而中央计划经济将包含以互利为基础的国际合作。

同时，我们也不能等到社会主义下人民完全掌握政权采取找寻所有这些问题的解药。我们当然坚信，群众运动可以在日常斗争中取得某些胜利和成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民在今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由垄断的政权（以及更广泛来讲，资本的政权）来加以解决。力量对比的改善可以缓解问题，除非现有政权被推翻，否则这将是暂时且有争议的。,

研究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党内展开了对一个新文本的讨论。这个文本总结了 1995 年以来的那场讨论，并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特别是苏维埃的角色做出了新的评价和思考。我们认为，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只是在 1917 年伴随着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才开始的。我

们尤其注意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夯实后变得更加紧迫的新的理论问题。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可能预见到这些问题，他们主要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甚至列宁也未能预见到这些问题，他所致力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特殊时期（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这一研究使我们又一次不得不考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践表现。我们系统性地集中历史材料，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基于真实事件的，并且总而言之，我们试图研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所有官方的和重要的讨论。因为没有建立一种新制度的完整的历史经验，我们努力研究各种观点和争论。这次内部讨论结束后，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党员的意见得到倾听，我们将继续在公共场合搜集所有坚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现实性的人士的观点，无论他们持有怎样的批评意见。

我们正在研究社会主义的问题，并远离简单的虚无主义以及美化、理想化的思想。

我们捍卫我们所知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和作用，这些贡献和作用不能被抹去。同样的，导致反革命复辟的曾犯的错误和不足也不能被抹除。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不是人类历史上一段插曲。1989-91 年的发展猛然产生的痛苦和幻灭不应该成为结束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原因或借口；这不仅适用于共产党人，还适用于那些从资本主义那里只能期望到痛苦、战争、饥饿、暴力、犯罪和悲惨的人民。资本主义能给的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给了。

我们的时代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中间的社会制度。

一个人有必要认识到输掉了一场战斗；但是这完全不同于放弃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因为只有通过总结教训才能够将失败转化为新的胜利的因素。

对于我们来说，将会在一国和多国再

次听到宣布黎明的炮声。我们正在努力做到的是为全世界的斗争做贡献、在我们国家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这既是判断我们的标尺也是我们的根本指责所在。

希腊共产党的国际主义行动

这些年里，我们并没有屈从于只在本国活动的诱惑。1991年以来，我们已经在新形势下与超过80—90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了双边及多边关系，其中既有老党也有刚成立的新党。我们已经和运动以及行动团体建立了新的联系；我们同各大陆的共产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保持联络并建立了全方位的联系；同时，我们还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区域以及国际会议。希腊已经承办了许多国际会议。

当下的国际主义行动变得更富挑战和复杂；它需要更多的工作和时间。我们党从自己多年的活动经验中得出了这样结论：我们致力于具有实质内容并且通过对话和争论来进行的国际关系，但这不应该变成为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

我们对各国大量的访问旨在研究该国的发展以及那里的共产党的经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理论探讨和对话，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共同研究与共产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运动息息相关的问题，以及帝国主义在各地区的一般政策，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和对立过程。

希腊的选后发展

由于希腊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和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第二大党的社会民主政党的轮流执政——经历了一些挫败，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去围绕另一种对于政权的政治方案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和对话。两党都承受了政治上的损失，尽管由于人民暂时并不认为需要在政府层面上推翻政权，他们仍然保留重要的选举力量。替代方案的内容尚未明朗，因为和1990年代初相比形势虽然有所改善，但资本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复辟

的进程仍然产生着负面的影响。

需要斗争的时候，一些人会表现出畏惧。他们当然受着主流意识形态、压迫机制、贿赂以及权力贩子的影响。还有帝国主义的领土军事行动以及欧盟培养出的这样的恐惧：谁反对我，谁将被摧毁。同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对所有改良主义以及机会主义观点提供了非常精心细致的支持，也就是说只要不是致命的观点都不被视作严肃的威胁。

最近，希腊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它的中坚力量，觉得他们必须为对政治舞台进行的“不流血”的变更铺平道路，并正在研究欧洲通过联合政府引导群众运动的经验。美帝国主义公开宣布，从民众的感觉来看，希腊在欧洲是最反帝的国家。

资产阶级两党偏好一党政府，对联合政府有所保留；然而，在两党的一些干部中，联合政府的想法已然成熟，尽管只是作为经典的两党轮替得以恢复之前的插曲。

几年前，曾经新兴的政党最终没能留在议会或成为未来联合政府的伙伴。在相当公开的讨论中，一些人担心一个中左或是中右联盟可能无法获得最大的群众支持，最终可能导致关键数量的群众转向共产党。因为，否则的话，反人民的政策和对人民权利的攻击将继续增加。

目前，正试图使左翼生态联盟成为补充力量，以促成一个新的中左型政治图景，并挽回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信誉”。同时，人民东正教联盟——在最近首次进入议会的一个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小党——被用来作为一张百搭卡，以便或者转移新民主党的一些力量，给泛希社运加分，或者利用恐外情绪从泛希社运或者穷苦阶层中分离出一些力量，以给新民主党加分。

我们将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中做出自己的回答，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人民明白，如果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武器，他们便能够影响局势的发展。在上层发生的政治体制的变更图景并不会使我们担心或害怕。

【编者按】日本共产党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大的共产党。日共成立于 1922 年，在其九十年的斗争历史中，一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日本的客观实际相结合。二战期间反对战争，许多领袖和党员被捕入狱，还有不少党员热情地投身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日共坚持独立自主，既不愿受苏共摆布，也不希望被中国党控制。客观的说，正是这一路线保证了日共防止了左倾，明确提出当前斗争的目标是实现“民主主义”，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政府，并逐步使它发展为“革命政府”，然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才得以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存活下来，发展群众，建立基层组织。客观地讲，日本的社会矛盾还远远不足以造成革命的形势，即便日共这种“修正主义”的社会变革，也难以真正实施。

少年中国评论曾发表过名为《在困境中战斗，在堡垒中坚守——荐<赤旗飘扬——和日共在一起>》的文章，其中推荐了赵忆宁老师的调查报告并表明了我们对日共的看法。为了让读者们进一步介绍日本共产党，YCA 翻译团队的 lostinkatakana 同志将日共领袖不破哲三同志在日共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译出。不破哲三在讲演中回顾了日共的历史，包括政治斗争史和理论历史，特别是其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思，尤其引人注意。此外，还展望了日共中近期的斗争，其任务是要“完成日本道路的 21 世纪转换”，“开辟日本社会历史的崭新一页”。推荐关注日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斗争情况的同志，认真阅读下文。

不破哲三：回首日共九十年



: lostinkatakana 翻译



(摄影) 演讲时的不破哲三社研所长

会场的诸位、全国的诸位、晚上好。

今天天气炎热，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日本共产党 90 周年的纪念集会，非常感谢。(鼓掌) 在这个纪念日，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思考党的历史，感到非常高兴。

诸位：

日本共产党的 90 年，以国民的利益、和平和民主主义，以及日本社会的进步为目标，对于障碍损害这些目标的势力，不管它多么强大，日本共产党都毫不畏惧、挺身而出。我们自然而然会回忆起历史上的三场斗争。

一、对抗天皇制国家

何谓天皇制国家？

党自创立伊始，必须要对抗的就是天皇制国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在今天的日本生活的诸位是无法想象的。这个国家高举神的名号，挥舞“天皇绝对”的旗帜，军部无法无天的战争国家。并且，在这样的体制下，国民必须无条件服从国

家的命令，反抗的人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重罪威胁。

党的纲领方针、理论支撑

日本共产党从1922年创立伊始，就勇敢高举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为了国家的变革而努力。在这个方针的基础上形成的纲领性的文件表现，就是所谓“27年决议”、“32年决议”。这是由当时我们加盟的共产国际，经过日本党代表的参加和讨论后得出的结论。但是在这里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决议诞生之前，日本党的理论家们依靠自己对日本社会的分析，得出了和决议基本一致的结论。最近，因为“赤旗”的访谈有了回顾这些事情的机会，在这些理论家们中间，有在30年代的大镇压中作为再建党中央的先驱，被捕3个月后结束了33岁生涯的年轻理论家——野吕荣太郎。请铭记这个人。（鼓掌）

三项国民经验

党在这场斗争中被贴上了“卖国贼”的标签，受到了各种镇压和迫害。渡边政之辅、上田茂树、岩田义道、小林多喜二、国领五一郎、市川正一等等，无数的先辈牺牲了生命，还有以原议长宫本显治为首的干部和活动家，在战时的狱中度过了十多年的岁月。

但是，诸位，共产党的这场斗争对国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明确给出答案的，难道不正是持续了十五年之久的战争体验吗？

那场战争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害的侵略战争。同时对日本的国民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应该回忆起日本国民所经历的三项经验。

第一。被这场战争动员的军人、军队的命运。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上阵亡二百数十万人。但是，其中大部分并不是战死的，半数以上即一百数十万人是饿死的。这是没有粮食补给计划就这样轻易将几万、几十万的军队送上前线的结果。如此轻视自己国家军人的生命，荒唐发动战

争，在世界史上也是没有前例的。

第二。随着菲律宾战役的惨败迎来的1945年发生的事件。谁都已经明白，战争已经没有出路了。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获得保留天皇制国家的保证，当局拒绝了和平谈判。如果那时候选择和平谈判，那么本土大空袭、3月～6月的冲绳战役、8月的广岛、长崎，还有因苏联参战而导致的满洲、桦太的悲剧都可以避免。但是对战局既没有预见也没有任何计划，把维持国体看得比国民的生命更重要，叫嚣“本土决战”、“一亿玉碎”的天皇制国家的统治者们，正是他们导致了1945年给国民带来的巨大的惨剧。

第三。日本投降之时，世界对日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日本接受的联合国“波茨坦宣言”里所记载的，既不是要取消也不是要灭亡日本这个国家。目标是改造战争国家，也就是把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变成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日本。这个大局的方向，跟我们党追求的民主主义革命是一致的，也证明了我们党的斗争是顺应世界和平与社会进步的潮流。

在论述国民的三种经验的同时，我想对挑战天皇制国家、为和平和民主的斗争而倒下的无数先辈战士们，献上发自内心的敬意。（大声鼓掌）

二、与霸权主义的斗争

战后的斗争，第一次跃进

战后，我们党第一次获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就立即开始了复兴国民生活和建设民主主义日本的活动。对于这一场斗争，希望能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是宪法的问题。现在日本国的宪法强调主权在民的原则。但是，战后日本的政党中主张这一原则的仅仅只有日本共产党。1946年召开了制定宪法的会议，占领军认可的日本政府提出的草案中没有提到主权在民的词句。我们党的议员团立即提出了要求修正的提案。之后，联合国的远东委员会也做出了和日本共产党宗旨一致的严厉的提议。以这样内外合力的形

式，主权在民的原则明确写进了日本国宪法。

第二，国家的独立问题。在美苏对立日趋严峻的世界背景中，美国占领军抛弃了一开始制定的日本民主化任务，转变为针对国民和民主势力的压制者。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在 47 年 12 月的党大会上提出了“严格实施波茨坦宣言”、“日本的完全独立”的行动纲领。日本共产党在占领期间勇敢举起了这一旗帜，是所有政党中唯一的一个，这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历史。

（大声鼓掌）

第三。在新宪法的基础上举行的一次选举，即 47 年选举中，党只获得了 100 万张选票和 4 个议席。但是，在持续斗争中，49 年 1 月的总选举跃进至 298 万张选票和 35 个议席。在其他的政党都在竞相追从占领军的同时，坚决贯彻国民立场的我们党获得了战后第 1 次跃进。

苏联变质为霸权主义国家

但是这个时候，对日本党和民主势力的进步构成威胁的意想不到的对手出现了，即斯大林支配下的苏联。

我们当时是这么看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强大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形势，成为推进日本民主运动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事与愿违。在我们与外界交流断绝 10 余年的时间里，苏联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里连同苏联解体之后暴露的问题包括在内，非常简略地做一个说明。

首先，30 年代中期，几万几十万甚至为数更多的献身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人，被苏联陷害为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爪牙”，成为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很多外国的共产党员也被卷入其中，我们党在共产国际活动的山本悬藏同志也包括在内。

在这场风暴之后，苏联彻底变成为一切政策决定权掌握在斯大林一个人手里，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专制国家。

斯大林在完成体制建设之后，走上了以扩大苏联领土和势力范围为目的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道路。首先在欧洲大战开始之前，将反法西斯旗帜抛在一旁，和希特勒联手，通过秘密条约（39 年 8 月）合并了东波兰及波罗的海三国。

征服了西欧的希特勒于 40 年 9 月和日本、意大利结成了军事同盟，即所谓的 3 国军事同盟。希特勒于 11 月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至柏林，提议苏联也加入军事同盟，约定在战胜英国以后，由 4 国瓜分世界，德国和意大利占欧洲和非洲，日本占东亚和东南亚，苏联占中亚到东欧的地域。对如此荒唐的计划，瓜分了东欧尝到甜头的斯大林，在听取了莫洛托夫的报告之后，同意了希特勒的提案。同希特勒和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结盟以图自己国家的领土扩张，只要尚存一点点社会主义精神的话都会断然拒绝，然而斯大林满不在乎地选择了同希特勒合作。

但是，这个 4 国同盟的提案，无非是已决定对苏作战的希特勒，为准备战争而迷惑苏联的一大阴谋。希特勒在得到斯大林的赞成之后，立即对德军下达了对苏作战准备的命令，第二年的 1 月份开始，逐渐把军队开进了巴尔干。但是斯大林完全相信了希特勒关于调动军队是针对英国的解释，没有做任何认真的应对。

如今关于希特勒 41 年 6 月发动的战争为什么能打得苏联措手不及，已经成为二战历史的谜题之一。而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希特勒利用了斯大林的领土欲望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阴谋。

在战争开始之后，斯大林又重新捡起了反法西斯的旗帜，同美国、英国结成同盟，在粉碎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因此抛弃领土扩张主义。特别是在战争的晚期，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在回应美国要求苏联尽快对日参战以便早日结束战争时，斯大林提出，如果没有领土获得作为补偿，苏联国民不会同意参战。要求不仅将原本属于

俄国领土的南桦太，而且将日本领土的千岛，以及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中国国内的权益收归苏联。这成为后来“北方领土”问题的根源。

在这场战争中，联合国一方宣扬“领土不扩大”的原则，将战争目的同自己国家领土扩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苏联一个国家，这一点有必要清楚认识。

在战后世界登场的苏联，抛弃了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精神，成为了这样一个国家。

“50年问题”

斯大林在战争时期解散了共产国际。但是，作为替代，把主要共产党的指导部套上秘密的网眼，建立了由苏联直接控制的体制。

但是，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却游离于网眼之外。为了弥补网眼的空隙，斯大林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开始制定对日本党和运动进行干涉的计划。

造成我们党巨大的苦难和分裂的“50年问题”，就是由斯大林的干涉计划发动的。最初他装成“好心的指导者”伸出双手。然后把一批干部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进而使党发生分裂，将一部分代表邀至北京，在那里组织了分派的司令部，并提出了武装斗争这一无谋、荒唐的路线。这一错误路线，再加上美国对事实上半非合法化的日本共产党的镇压，对那个时代的我们党造成了巨大的苦难。49年选举中跃进赢得的议席也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全部丧失。

在党正处于衰弱的时期，美国以“议和”的名义将日美安保条约强加给日本，从此日本成为了美国的基地国家，一直到现在。

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越过了艰难，踏出了统一和重建的步伐。虽然还尚未认清苏联霸权主义的真面目，从自己的经验教训出发，确立了“不管对方是持有何种经验的大国共产党，不允许外国势力干涉，日本共产党的方针完全由自己来决定”这一独立自主的态度。

经过1958年第7次党大会和61年第8次党大会，确立了党的纲领。首先致力于切断和美国的从属关系，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以国民为本的民主改革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在下一阶段推进至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发展战略。在当时世界的运动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方向，我们的方针被视为异端。但是，我们党在60年的国际会议上，驳倒了苏联、意大利、法国等党的反对意见，将我们的路线意义明确地写进了国际会议的声明。

当时掌握日本政权的是由保守政党合并而成的自民党。美国和日本的统治势力为自民党规定了两条异常的政治轨道。

一条是，维持日本作为美国的基地国家的地位，将日美安保条约作为绝对的道路推进，即“对美国惟命是从”的轨道。另一条是，使国家服务于大企业集团的复兴、成长和发展，即“对财界惟命是从”的轨道。

这两句话经常听到，而其根源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这两条一直存在到今天，使日本政治失常的错误轨道，我们应该要记住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鼓掌）

日本共产党的纲领就是与这两条错误轨道的对决，其内容是为日本的前途开辟新的道路。

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第2次跃进（69、72年）

我们在这一纲领下致力于政治革新斗争的1964年，不允许独立自主党存在的苏联共产党再一次对我们发起了攻击。斯大林虽然已经死了，但是霸权主义的DNA继承在后续者身上。（笑声）两年后的66年，中国也开始了对我们的攻击。在国内开始了失控的“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派，宣称日本共产党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积极开始了对我们的全面攻击。

苏联和中国都不限于言论的攻击，分别是举全国之力，在日本国内反日本共产党战线扩大的同时，支援我们党内的叛徒制造了冒牌的“共产党”，是有计划有预谋

要击溃日本共产党。

同时受到世界上两大共产党粗暴干涉和攻击的共产党，除了日本党再无其他。

我们一步也不退让，正面同这种攻击做斗争。全党真正地振奋起来，彻底打破这两股干涉攻击。同时，在国内政治方面，在党的纲领的旗帜下，取得了飞跃发展。

58 年的总选举，101 万票、1 个议席。60 年安保斗争之年，也仅 115 万票、3 个议席。而到了 69 年，320 万票、14 个议席，直至 72 年，563 万 7000 票、39 个议席，取得了斗争的大跃进。

支持选举胜利党的力量，从 59 年 7 次大会时的 3 万 6000 党员，“赤旗”读者 4 万 7000 人出发。当时的“赤旗”还没有周末版。

到了 73 年 12 次大会的时候，党员数 34 万 2000 人，日报读者 63 万 4000 人、周末版读者 257 万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现在回过头去看，真是了不起的时代。对内对外都是激烈斗争的时代。一个个党员，手挽手回击干涉者，保卫日本的和平民主主义的自主性，所有的这一个个人都称得上“英雄”的名号。回首往昔，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正是那个历史性的奋斗的时代。（大声鼓掌）

70 年代，政治状况为之一变

日本共产党的跃进使 1970 年代的日本政治状况为之一变。

1950 年以来，京都持续推进了府政革新，67 年在东京都、71 年在大阪府、川崎市、72 年在冲绳、埼玉、冈山 3 县、73 年在名古屋与神户、74 年在香川与滋贺 2 县，革新势力相继取得胜利。75 年 4 月地方总选举中，全国的革新地方政府达到 205 个，涵盖人口 4700 万。日本总人口的 43% 生活在革新政治的地图上。这对国家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要特别举例的话，可以举老年人免费医疗在革新地方政府不断推广的例子。于是，影响所及连中央政府也无法坐视，72 年 6 月国家通过了老年人免费医疗的老年人福利法修正案。

国会的论战也活跃化。我们基于纲领的立场，致力于在国会宣扬日本的新道路。不论哪一个在野党，都对自民党的路线提出异议，从各自立场争论国家的方向，这在当时是国会论战的一般情形。

国会的运作也因为共产党的参加，不断展开了新的面貌。

73 年发生石油危机，大企业的惜售囤积给国民的生活造成巨大困难。国会召见大企业的代表，声明将彻底追究不法经商的行径。这是国会历史上首次壮举。

76 年洛克希德公司行贿案曝光以后，执政党试图掩盖了事。共产党联合社会党和公明党突破自民党的压制，召开了两院议长和 5 党党首的会谈，为彻底调查洛克希德案铺平了道路。

统一战线也在国政上发挥影响。尽管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论战不断，但是 70 年代后半期以来，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党首之间就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斗争有 3 次达成共识。

即使简单描述，我们也能看出来 70 年代的国家政治与今天的状况是多么的不同。

三、打破“联合执政党”体制的斗争

1980 年，统治势力开始全力实行反共战略

70 年代的政治状况对日本的统治势力造成巨大的打击。他们曾经认为，日本共产党已经因为“50 年问题”完蛋了，已经解决掉了。这个党居然还能起死回生。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甚至没有输给苏联和中国的攻击，这是一个大麻烦。于是他们开始策划反共战略。所谓战略，要效仿战前以及美国占领期一样的镇压却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他们选择的战略是，造就一个排斥日本共产党进出可能性的日本政界。

也就是在自民党政治的轨道上吸收除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形式上虽然还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区别，在总的路线上除

共产党之外的政党全部联合一致。换句话说，在类似于安保这样的大政方针上，日本共产党以外的政党全部是执政党，也就是所谓的“联合执政党”。制造这一体制的战略开始于 1980 年。

刚开始还没有到改变政治制度这一步。总之，以所谓政党工作的名义，由公明党出马，把目标对准社会党，将社会党从革新政治中拉下来。这就是 80 年 1 月的“社共识”。

把日本共产党排挤出政界，造成即使给这个党投票也是浪费选票的局面。80 年代的国会也好、地方政治也好，革新的声音完全偃旗息鼓，通过社会党和自民党之间的协议勾结来运作政治的状况由此开始。

但是，这样的体制必定贪腐丛生。到了 90 年代初，统治势力已经清楚这一体制无法为继，不能仅仅依靠“政党工作”，必须要改变政治制度本身来维持统治。于是，便有了所谓“政治改革”的问题。通过实施小选区制度和政党补助金，将“联合执政党”一分为二，制造“自民”和“非自民”两个政党之间的选举结构。企图建立起一套共产党无插手余地的政治体系。选举的结果，细川首相率领的“非自民”联合取得胜利，实现了政权交替，完美地拯救了自民党的政治危机。但是，所谓的“非自民”政党，无法整合 8 个党派之间的联合，细川内阁仅仅因为政治改革的法案就垮台了。于是，“非自民”联合也四分五裂。其结果，两大政党的战略失败了，日本进入了多党并立的时代。

第三次跃进（96、98 年）。构建“两大政党”的新战略

就这样匆忙建立的“两大政党”体制崩塌之后，新选举制度也失去了“封印共产党”的力量。如此，是谁在保卫国民的利益？是谁拥有开辟日本前进道路的力量？不由分说，选举结果将给出答案。

党在 1996 年的总选举中，获得比例选区投票 726 万 8000 票，98 年参议院选举

中，获得比例选区投票 820 万票，在这种形势下，实现了第 3 次飞跃。

这两个选举结果让日本的统治势力大感情况不妙，这次由财界发起了第 3 次的反共总动员，这就是 2003 年开始的构建“两大政党”的新战略。

像 10 年前细川新党一样乱糟糟的联合不管用了，应该有一个更耐久的“非自民”的统一政党，在这样的构想下诞生了新民主党。把所谓“选举就是选执政党”的“原则”任意强加给国民，目的是把“两大政党”以外的政党排除在外。在这个目标底下，强行推动了对选举方式的大规模替换。如今声明骤降的“政权公约”就是由那个时候提出来的。

但是，这第 3 次的战略，从 3 年前堆积选票这最后一招终于实现的“政权交替”来看，又是白费力气。（笑声）结果，无非是改换了衣装的自民党政治重新上台罢了，这样的操作手法，很快就大白于天下。

反共战略导致的恶政推行

这 30 年来，统治势力一心一意对付共产党，耗费了大量的能量。那么，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政治上的本职工作干得怎么样呢？那就是在半个世纪前已经设定好的“对美国惟命是从”、“对财界惟命是从”的轨道上，无责任无反省地继续着“敷衍政治”。

为了了解这一政治的过程和后果，我们来考察一下今天作为增收消费税口实的财政危机这个大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衡量财政危机深浅的尺度是国家和地方的借债（长期债务的结余）的问题。计算债务占一国经济能力、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率多少，是世界上评测一国财政危机深浅的普遍采用办法。

现在的借债比率达 190%，世界上最糟糕的状况。

这些债务不是自然生产出来的。谁推动了债务累积，谁在这个过程中获利，让我们通过事实来看看。

日本的财政在 1970 末，也就是“联合

执政党”体制成立之前，借债总额为 98 兆日元，借债比率为 44%，尚在正常的范围内。在“联合执政党”体制开始的 10 年后即 80 年代末，借债总额为 254 兆日元，借债比率为 61%。当时欧盟提出危机警戒线为 60%，一旦突破这个数字说明财政趋于恶化。94 年年底，当比率达到 75% 的时候，政府的顾问机关财政制度审议会提出一项报告（95 年 5 月），严重警告财政将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严重危机，现今的状况已经如抱着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必须要认真对待解决。但是，政府与执政党高层完全把警告当成了耳边风。

到了 90 年代末，借债比率超过了 120%，我在党首讨论会上（2000 年 2 月）向当时的小渊首相就现状提出警告，结果他得意洋洋地回答说，“我在一年半的时间让债务增加了 101 兆日元！”，（笑声）简直是一副准确描绘“敷衍政治”的漫画。

这一政治持续的结果，就是现在终于借债总额达到 900 兆日元，借债比率达 190%，我们正处在十几年前所警告的“定时炸弹”随时爆炸的状态。

财政浪费的责任人是谁，受益者是谁

要为这一危机负责的是“联合执政党”势力，而不是日本国民。谁是这一危机的受益者？观察宽松财政的实际运作就能明白。

宽松财政的首要问题，是军费开支和公共事业开支。预算的动向，以 10 年为期，按照年代比较，如下所示。

军费开支在 70 年代为 12 兆 6000 亿日元，80 年代为 30 兆 5000 亿日元，90 年代为 46 兆 8000 亿日元，2000 年代为 48 兆 7000 亿日元。这一增长趋势，在 90 年代出现了陡增。

公共事业开支在 70 年代为 153 兆 2000 亿日元，80 年代为 291 兆 3000 亿日元，90 年代为 460 兆 3000 亿日元。这项支出同样在 90 年代大幅增加。此后由于赤字压力多少有所回落。

为什么 90 年代支出出现大幅度增

长？提到 90 年代，在其初期，91 年苏联解体。“防卫”方面第一威胁的苏联既然已经解体，军费开支本该减少，却反而逐渐膨胀。经过调查，比如说旨在针对苏联作战使用的“90 式坦克”在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建造了 300 辆以上。同样对苏作战用的宙斯盾舰，一艘造价 1200 亿日元，又建造了 6 艘。仅这两项兵器合计超 1 兆日元的费用支付给了军需产业。愚蠢至极！

而公共事业开支，90 年代的预算超过了 70 年代的 3 倍。还记得吗？最初是海部首相与美国的布什总统（90 年），接下来是村上首相、桥本首相与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商定，结果，决定了以每年 50 兆日元连续 13 年进行公共投资。所谓公共投资，本来是为了满足国民的需要而进行投资。但是，政府和美国事先商定了花钱的上限，然后再来寻找投资的去处。如此颠倒的政治决策开始于 90 年代。

于是，“浪费即美德”就成为“联合执政党”的政治口号。日本的财政就在谁也不担心的情况下轻轻松松突破了警戒线，达到了今日的地步。

而且，在这段时期，税金的负担面也大大恶化。80 年代末财界背景的法人税占总税收的 34%，现在已经大幅度下降至 20%。

预算的浪费最后都落到了财界的口袋，税金改革也一直是围绕财界的利益来谋划。认真观察这段历史，日本国民不能为今天的财政危机承担责任，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也不能为危机承担责任，有关社会福利开支和财政危机之间的关系还很有讨论的余地。（鼓掌）

按照美国和财界的订购，30 年来竭力组织“浪费”的“联合执政党”才是真正的责任者。而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就是财界-大企业集团。承担危机责任的政府执政党，尽自己的职责，让最大受益者的财界-大企业集团来承担和解决财政危机——寻求这一途径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大声鼓掌）

但是，“联合执政党”中没有人有这种责任意识。将自己的施政恶果若无其事地

强加给国民。仅仅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就已经清楚明白不能再把政治交到这样一群势力手中。

四、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史

在讲党史的时候，不能省略 60 年代以后党的理论史。这半个世纪，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党史方面，都构成特别的时代。

斯大林的冒牌理论体系成为世界的定论

确立独立自主的立场，成为党的理论发展的新起点，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能解决问题。斯大林那套与科学社会主义似是而非的理论体系，在很多场合都被认为是世界的定论。

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有人认为已经有苏联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模式，现在已经没必要再保留那些陈旧的理论。这种观点将马克思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财产放进了历史博物馆。对于革命理论，也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在革命尚未成为现实的阶段创立的，在当下已经成为无用之物，于是，就轻易地丢弃了。

经济学方面，认为只要继承《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再添上斯大林派的“资本主义的全盘危机”论，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最高理论了。

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认为斯大林写的教科书、小册子里面，已经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掌握这些内容就是掌握了精髓。

在世界形势上，把世界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苏联的强大与发展是世界进步、发展的动力，由此推导出苏联第一主义。

这样的一些理论，在很多场合成为世界运动的常识性定论。抛开这些定论，用科学的眼光分析日本与世界，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现代观点，对于刚刚举起独立自主旗帜的我们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再生为目标

我们在同苏联和毛泽东派论战的过程中，在不断清理日本与世界诸多问题死结的过程中，倾注全力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相关的全部领域，激活马克思以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之本来面目与精神，克服斯大林发明的冒牌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中阅读马克思”，对马克思理论归宿点的研究，辨析列宁的积极面和错误之后选择性吸收理论遗产，都是要回到这句口号提出的立场上来。这里无法详细报告其中的内容，如果浏览一下党的第 7 次大会以来的大会记录，或者这段时期我们发表的主要论文，就能了解大致的内容。另外，经典理论研究课上最后一次的讲义，已经刊载在《前卫》7 月号上，也做了稍稍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

我们党在 2004 年的第 23 次党大会上对党纲进行了彻底的修订，新党纲里面包含了 1961 年以来党的理论发展的所有成果。

们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把斯大林时代的中世纪阴影一扫而空，激活了理论的本来面目，使之适应于现代，也可以称之为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文艺复兴”为目标的活动。（鼓掌）在这个意义上，同时需要强调日本共产党这段时间的理论史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性意义。

五、立足于历史，开创日本社会的新道路

用那段历史来看待日本现状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到有一种预感，今天的日本社会正迫近巨大转变的前夜。

——在持续的恶政底下，国民的生活和权利在全部领域遭遇苦难。并且，在“对美国惟命是从、对财界惟命是从”的政治推进下，独占利益的财界自身尽管欢迎这种政治，但是若论及对未来长远的规划时，完全陷入没有任何预见能力的困局中，这一点在很多事情上都暴露了出来。

基本上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国经济的健全发展，只能依赖以国民生活为中心

扩大内需。这是经济的铁的规律，牺牲国民利益一味追求财界大企业的成长，这样的构造只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在外交方面，现在的世界完全没有日本的存在感。大家可以看一看，世界上哪里发生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国家派人到日本来商量的？（笑声）这不是内阁作为不作为的问题。缺乏自主性完全依赖美国的外交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这样的外交是不可能打开前途的。

当下的世界迎来了发展的大急剧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主角的时代正渐渐终结。其人口现在仅占世界总人口的 7 分之 1，经济的比重也在二十年间由占世界的 80% 降到了 60%。

现在重大登场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诸国。这些国家在 16 世纪至 19 世纪受到资本主义的侵略，都是被突然打断了原本各自发达的文明。这些国家在殖民体系崩溃以后，作为独立国家登上了世界舞台，在政治和经济上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的确使世界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今我们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变动的世界。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日本仍然紧紧抱住 60 年被强加的日美安保和“对美国惟命是从”的政治，从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大声鼓掌）

——在日本的国民中间，也正在发生如政治地壳震动一样的深层次大变动。零核电、反对消费税增税、反对 TPP、反对配备鱼鹰战机等，针对各个问题的运动如势不可挡的细流冲破各种障碍，汇聚成巨大的国民性浪潮。在每周星期五的反对核电再启动的运动中，年轻的一代冲在队伍的前列，可以看到未来日本的希望。（大声鼓掌）

在这场变动中，依旧恪守着旧轨道的政党和向新道路转换的政党，两者之间的

区别也渐渐分明起来。此后的政坛也将会有许多聚散离合吧。但是，即便是改头换面成这个名字那个口号，如果这个政党在立场上没有与“对美国惟命是从”“对财界惟命是从”的旧轨道做断然决裂，是没有能力打破今天日本的困局的。

日本共产党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不屈不挠地为打破自民党政治的异常构架而斗争。因此，能够提出诸如“经济建议”、“外交展望”等改变日本政治的具体路线，由此预见一个崭新的日本图景，在很多迄今为止与我们并不密切的团体和领域里，连带与共鸣的声音也在不断扩大。

——在外交方面，作为在野党的日本共产党，这十多年以来通过在野党外交的开展，与亚洲邻邦、伊斯兰诸国、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之间构筑了对话和友好的网络。这一网络的广度和质量，或许比政权党依靠资金构筑的网络更广阔更坚固。

这些都昭示着，长期持续的“联合执政党”体制底下陈旧的政治所产生的闭塞感正在被打破，与 21 世纪相适应的、开辟崭新的前进时代的诸多客观条件正在成熟，难道不是这样吗？（鼓掌）

如今，我们在社会的不同场合的活动，都是为了加速那些使日本走上新道路的诸要素的成长。而迎接党创立 90 周年的纪念就是其中的一项活动。这次纪念有着深远的意义，我要向肩负着日本未来的年轻一代们，特别呼吁这一意义。（鼓掌）

如今，我们期望日本共产党的跃进是，完成日本道路的 21 世纪转换这一大事业。对党创立 90 年以来，为了日本的社会变革事业贡献力量的无数先辈，寄托我们的思念，继承他们的志向，为日本共产党的跃进倾注全力，开辟日本共产党历史的崭新一页，开辟日本社会历史的崭新一页。谢谢！（持续鼓掌）

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角 看当今的阶级意识

Platypus Review 51 | November 2012

《鸭嘴兽评论》第 51 期（2012 年 11 月）

作者：Chris Cutrone



金刚 翻译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今的社会经济阶级划分是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的问题的结果，而并非其起因。

现代的阶级与古代的等级分隔（诸如教士等级、贵族等级和被称为“平民”的大多数人民）不同。而这些平民既不懂得神学，也无所谓荣耀，在多数历史时期中都以农业维生，成为古代世界宏大画卷的一幅沉默的背景。

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现代城市社会，是第三等级——平民们反抗、暴动的产物。这些平民即所谓的“自食其力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别无其他资产。在法国大革命中，第三等级与其他两等级——教士和贵族划清了界限，他们自称为国民议会，并发表了著名的《网球场宣言》（译注：《网球场宣言》，是法国三级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代表和少数第一等级代表在皇家网球场签署的宣言，该行为是为了对抗法王将第三等级代表驱逐出三级会议）。这响应了西哀士在名为《什么是第三等级？》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中发出的号召，他说应获得“一切”的第三等级在旧秩序中却“一无所有”（译注：西哀士，

法国大革命的著名理论家、活动家、第三等级代表，力主建立独立于三级会议的国民议会，起草了《网球场宣言》）。

正如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狄奥多·W·阿多诺所说的，“社会就是第三等级的概念”。他此言的意思是，第三等级提出了人们应当与他人相关联的意见，而这与过去将人们按照存在链条而分类的古代文明不同（译注：存在链条，是古代天主教提出的重要概念，将世间万物按照有无灵魂和有无实体进行等级划分，最高等级为上帝，次为天使，最低等级为矿产和土壤，人类介于有灵魂无实体的神灵和有实体无神灵的动物之间，同时在人类范畴内部也根据不同的基准进行等级划分）。他们基于自己的工作，换言之就是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来与他人发生关联。他们在在一个自由市场内而非一个受传统价值观约束的严格的等级制结构中寻求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人们可以在社会中自由地追求自身的价值。

因此，在推翻了教会和封建贵族的统治后，现代社会就成了第三等级的社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基于第三等级的价值

观，这种价值观的核心是工作的价值。现代社会的最高价值观并非宗教、尚武精神衍生出的荣誉，而是物质生产力、效率和成为“社会中从事生产的一分子”。从这种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所有的历史看上去都是不同的、向前发展的生产方式的历史，而这其中，资本主义是最新最高级的生产方式。于是，过去就成了人们在愚昧和迷信中迷失的年代，保守的习俗和傲慢自大的精英阶层也阻止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潜在的生产力和心智。这种事情的典型事例，就是教会威胁伽利略使其公开放弃其科学观点。

随着第三等级的反抗成功，在与自然世界和与其他人的关系两方面，人类看起来都达成了其启蒙的“自然”条件。无限的可能性貌似已经打开了大门，黑暗的时代终于落幕。

然而，随着 18 世纪晚期到 19 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新矛盾也发展起来了。这就是资本的价值与劳动者工资的价值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个矛盾而来的是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冲突，即工人为其工资与需要资本保值乃至增值的资本家之间进行的阶级斗争。这就必然地导致了 19 世纪 40 年代的高潮，当时被称为“饥饿的 40 年代”。这是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这个危机看上去超越了温和的市场调节，而指向更新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个在 19 世纪中叶盛行于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新冲突的表现方式是对“社会主义”或对真实社会的追求，它主张所有成员的贡献都应得到承认，并且他们都应该被允许毫不受限地参与到人类的发展和政治导向中去。这种追求在由 1840 年危机激发的 1848 年革命中得到了表现，这场革命呼吁实行一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求的、被称为“社会共和国”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制。

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来说，1840 年的危机和 1848 年革命展现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需要和可能性。

1847 年末，两名年轻的波西米亚知识分子——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在革命潜流即将来临之时撰写一篇宣言。发表于 1848 年革命前几天的共产党宣言是一次对当时社会矛盾状态、资本主义自身的激进的可能性和其自我毁灭倾向的审视。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名黑格尔历史辩证主义的优秀追随者而言，这种矛盾现象显示出了变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当时所处社会的明显危机以及同时显露出来的对激进变革的需要深信不疑。他们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而只是试图总结当时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历史经验。他们并不告诉工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工人所得到的好处，而是试图阐明工人们对自身历史地位的认知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所在。

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现代的、工业革命后的劳动阶级的完全独特的属性。普遍失业的支配使得现代劳动阶级或者说“工业无产阶级”与众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将这种失业看作是市场波动或者技术革新所引发的暂时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将其看作工业革命后现代社会的永恒特征。在这种社会中，资本的价值总是与工人工资的价值发生冲突。与亚当·斯密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后提高生产力并不依赖于工人工作效率的提高，而是依赖于机器（亚当·斯密是前工业时代经济学家，他发现高工资低利润策略可以整体上提高社会生产力）。而这就意味着，正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者麦克斯·霍克海默所说，“机器使工人，而非工作发生过剩”。

从全球角度来看，更高的生产力并未

增加就业和财富，增加的只是失业和贫困。这正如同资本主义摧毁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比如农民)，却没有为所有人提供有意义的生产性劳动以及对社会事务的参与。而这正是第三等级的反抗一开始设想的，并在资产者们反抗旧制度的等级制时所承诺过的。对现代城市的许诺正在被全世界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贫民窟所嘲弄。

旧世界已然毁灭，但很难说新世界比它更好。对自由的许诺被残忍的滥用，而(对自由的)希望也落空了。

马克思主义者最早认识到现代社会的这个矛盾是它的本质和特征，而这种认识也仍然是最为一贯的。马克思与我们之间时代的差异并不在于社会的实质问题——工资与资本之间价值的矛盾，而在于社会和政治冲突。与马克思的时代不同，社会和政治的冲突已经不再以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为主要形式。阶级已经不再像马克思的年代和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时一样是一个主观的、积极的范畴，而成为了一个客观、消极的范畴。曾经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阶级意识”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

这就为今日“阶级”的经历带来了一种忧思。特权和缺点看上去都像是偶然的，并非社会中人民的角色所应得的价值的体现，而更多地体现了他们或好或坏的运气。从阶级立场出发的政治学就变得不再合理，其他的政治学于是取代了它的位置。文化、族群和宗教冲突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贫穷的工人并不攻击非常值得怀疑的特权秩序，而是在互相仇恨中攻击其他工人。同一阶级立场的意识看上去完全被掩盖和抹消了。

马克思所预见的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但与之不同的是，失业

的人民挥舞着自己的锁链作为攻击彼此的武器。同时，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于幕后，构成、操纵着一切。这一点已经不再为人所知。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对这个问题的适当认知只能从对它的深入实践中得来。问题是，为什么当今看上去它如此的不合时宜？为什么人民不再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们听到一种言论，称我们处于一个正在深化的、自20世纪早期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与其同样规模的政治危机。现在并不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当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从左翼和右翼两个方向挑战资本主义，推动着重大的社会改革和政治转变。

这是由于已经没有人对社会主义——一种真实表现自身的社会——的观点尚存幻想。随之消失的是，工人反对资本家以寻求实现现代社会对自由承诺的阶级斗争。它已经被从古代价值观中借鉴来的关于社会正义的一些相互矛盾的概念所取代。但由于这些古老价值观的来源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宗教)，为这种正义的奋斗并不指向全社会整体的转变，而是将这种奋斗导向不同“文化”中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在现在的美国，一个人是住在一个“红色”还是“蓝色”的州(译注：“红色”、“蓝色”是美国两个主要政党的象征颜色)，或者是这个人的种族、性别、性向如何，看上去要比这个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更重要，无论这些特征可能意味着什么。文化亲和力貌似比社会经济利益更加重要。人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紧握着束缚着他们的锁链不放。

事实胜于雄辩

——统计数据告诉你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

作者：Chris Carlson

墨意 翻译



几年前，每当临近委内瑞拉总统大选之时，很多民营媒体会描绘出一幅即将国破家亡的图景：腐败政权不改善治理国家的方式、不巩固早已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却吮吸着本该用于发展国家经济和公共机构的石油收入。而朝气正盛的候选人乌戈·查韦斯虽在期待巨变的民众中享有极高威望，但竞选结果却令民众大失所望。

近年来，国际媒体将委内瑞拉描述成一个罪犯滋生、食品短缺、电力供给不足、政策失效、经济不景气、政权濒临瓦解的国家。他们根本没有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用片面的描绘让人们误认为那是一群妄图通过民粹主义政策和夸张的口号巩固政权的社会主义小丑，而民众在为此忍受煎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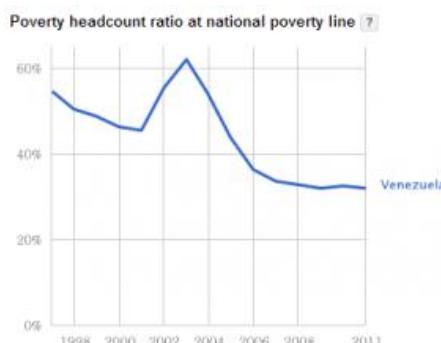
而他们提供的少量信息集中于在野党三名均为精英后裔的总统候选人身上（Henrique Capriles Radonski, Maria Corina Machado, Leopoldo Lopez Mendoza）。虽然这三位的家族都分别掌管

着委内瑞拉最大的商业帝国（Grupo Capriles, Grupo Zuloaga, Grupo Mendoza），但他们在公众场合一再掩饰自己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赤胆忠心。

然而实际数据所揭示的真相与国际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大相径庭。尽管在委内瑞拉电力供给不足、食物短缺、犯罪率上升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查韦斯政府在十年执政中取得的成就。凭此我们便能理解为什么委内瑞拉的大多数民众一直重新选举政府上台，虽然按照私营媒体的说法，政府把这个国家弄得一团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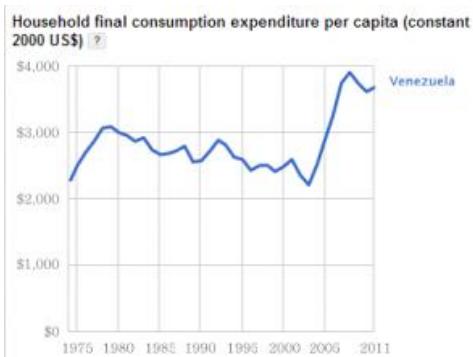
贫困指数和家庭消费

在考察委内瑞拉的近年的发展时，我们要注意这两个重要的指标：贫困指数和家庭消费。而从下列图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内，贫困指数显著降低。



委内瑞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极端贫困人口数从1999年的23%降到2011年的8%。

更重要的是消费指数的显著增长：



查韦斯政府在 02 年的政变阴谋和 03 年的石油罢工中夹缝求生，坚定地实施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最终经济也得以显著发展。十年后人均消费指数创历史新高，甚至超过了 70 年代由于石油产量激增创造出的数据。

与此同时，消费指数的激增、贫困人口数的下降、国家人口总量的稳步增长（1999 年到 2011 年上涨了 23%），使得委内瑞拉人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多。以前饱受忽略、穷困不堪的社会部门也逐渐变得经费充足，开始消费越来越多的食物和商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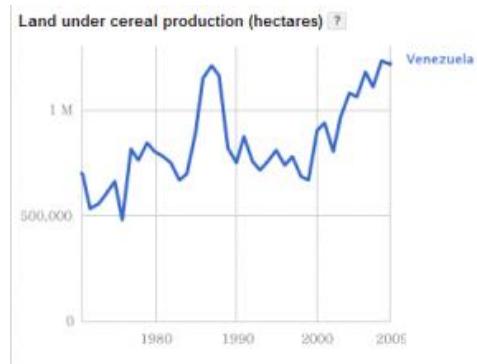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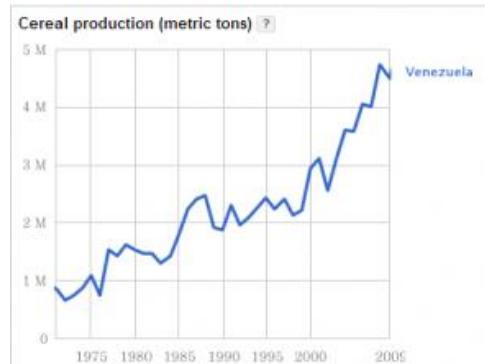
当然，批评人士指出，这些成就应该归功于自从查韦斯 99 年执政以来石油的大幅涨价，根本不是新政府的功劳。但查韦斯政府做到了前任新自由主义政府做不到的事—激增的社会开销；在欧佩克（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制定石油生产配额时力挽狂澜，在“石油热”出现之前让原油价格翻了三番。即便没有 2000 年出现的大宗商品热潮，欧佩克也能通过控制原油的生产来维持其高价。

食物短缺

在 00 年代后期，委内瑞拉基本食物短缺、超市里排满购物长龙、群众毫无秩序的消息常常见诸报端。查韦斯政府被迫大幅提高食品进口量，也因此被私营媒体认为是政策失败的明证。土地征收政策和导致产粮量减少的国有化私有企业的政策，也同样受到了指责。

可数据又告诉我们不同的答案。纵观

委内瑞拉近几年的粮食生产数据，我们会发现，在委内瑞拉，不仅谷类产量显著提高，种植粮食的土地面积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委内瑞拉农业部的数据表明，90 年代相对停滞的粮食生产情况已经一去不返，03 年至 11 年牛奶产量增加了 2.3 倍；牛肉产量增加了 19%；鸡肉产量增加了 60%；稻米产量增加了 25%；玉米产量翻了 3 番。

所以，对查韦斯政府执政不力的指责便显得苍白无力了。食品短缺的现象的确存在，但真正原因却并非私营媒体所言。当增长的粮食产量满足不了同样增长的消费需求时，政府进口粮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委内瑞拉人因此在吃穿用度上明显优裕了许多。一个在野党活动家认为空空如也的超市货架证明了查韦斯政府执政失败，并讽刺地问“牛奶在哪里？”，对此，一位民众回答道：“牛奶，在委内瑞拉穷人的肚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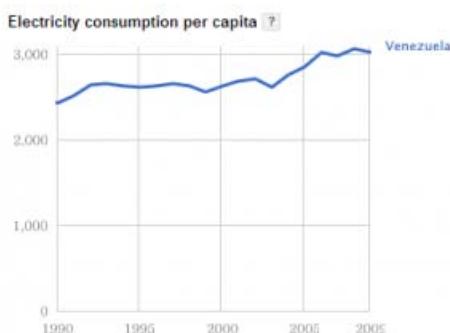
停电

关于委内瑞拉的电力供给，也是同样的情况：媒体乐此不疲地报道停电的新闻，

作为攻击查韦斯政府的武器。自 07 年电力基础设施被收归国有以来，媒体和反对派就一直声称这个问题的根源在缺少投资、低效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猖獗的腐败行为。他们只看见政府没能使得发电量增加，却忽略了创纪录水平的石油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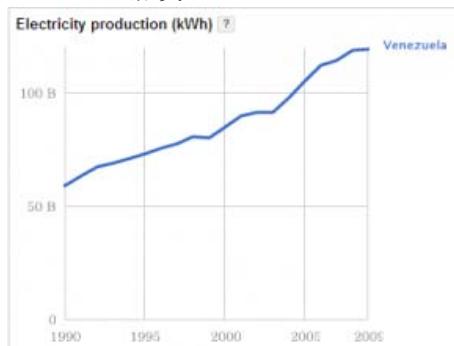
今年的总统大选，在野党候选人卡普里莱斯始终在强调电力短缺的问题，并承诺终结该问题。

然而，数据又一次告诉我们，问题在于需求的增长而并不是政府的不作为。减少的贫困指数和增加的消费指数造成对电力的大量需求——人们需要更多的电来使用电视、空调之类的电器。较于 90 年代，近年来委内瑞拉的人均耗电量增长了五分之一：



要不是查韦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安装的成千上万的节能灯节省的电量，否则人均用电量会更多。

“由于政府投资资金不足，导致产电量没有增加。”这一论断同样缺乏说服力。委内瑞拉现有六座水电站，其中三座是由查韦斯政府出资建造的。产电量在其执政期间也一直呈涨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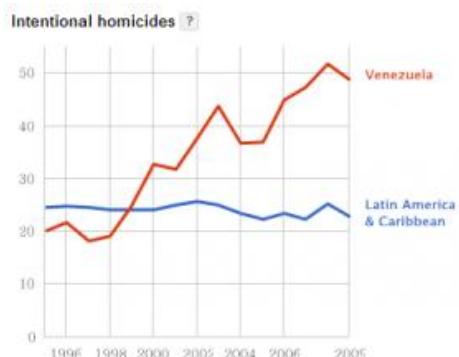
换句话说，委内瑞拉反对派所谴责的

供电不足的问题，是成千上万的劳苦人民从贫穷到享有更好生活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所以，不能消极地看待供电不足这一问题。媒体和反对派忽视社会改革的背景，仅仅聚焦于变革产生的负面影响。看来在野党们对于自己执政的日子无比怀念——灯火通明，商场里堆满了货物，国家还不用理会穷人增长的消费需求。

犯罪活动

没能有力打击犯罪是查韦斯政府的一大失败。近年来不断升高的犯罪率使政府成了众矢之的，数据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在下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故意杀人案件数量是查韦斯 99 年上台时的两倍。到 2009 年，委内瑞拉每 10 万人中就有 49 人是杀人犯；2010 年是 48 人；2011 年数字就更高了，比地区平均水平要高得多：



查韦斯政府承认犯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已经采取措施以应对这一趋势，比如训练国家警察力量。但这些措施的效果还有待观察。最初，政府对这一问题强调得很不够，以为增加社会支出和减少不平等就能扭转犯罪率的上升。但情况并非如此。政府现在已经认识到，仅仅减少贫困和社会项目是不够的，要与已经变成严重问题的犯罪作斗争，还必须采取额外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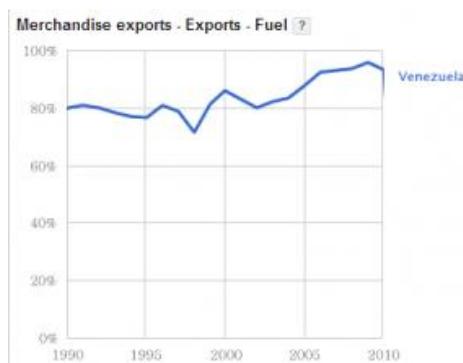
经济前景

最后，几个关于委内瑞拉的经济前景的数据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媒体一再暗示当前经济的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国家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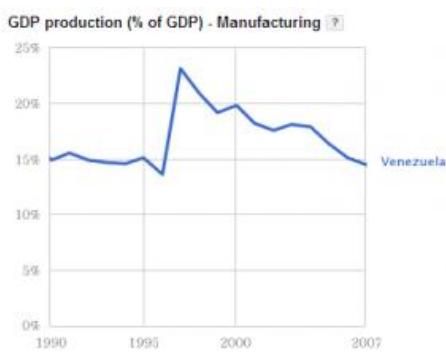
于经济危边缘机；下表中的部分数据虽然能被用来质疑委内瑞拉的远期发展，但大部分数据将给出强有力的反驳。

尽管社会开支的增长和贫困人数的减少极大地提高了委内瑞拉穷人的生活水平，但如果重大经济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政策的带给人民的远期利益将会是有限的。确实，倘若没有对这种过于依赖商品输出的经济给以深刻的变革，收益不见得能稳步增加。

首先要提的是，石油输出量占商品输出总量的比例由 90 年代的 80% 提高到 2010 年的 95%，意味着委内瑞拉对依赖石油输出的依赖与日俱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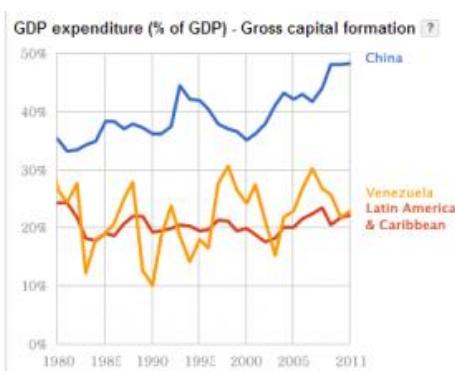


这个单个数据也不能说明委内瑞拉的经济从此走向不归路，因为出口更少的非石油制品说明国内市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既然国内能自产自销，那么对这些商品的进口依赖就大大降低了。



尽管这些都是 07 年的数据，但自此之后的数据并没有显著的改变。此外，如果

我们看资本形成总额（用于检测对固定资产的投资，揭示工业化进程），会发现委内瑞拉的资本形成总额与邻国平均水平并无显著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与一个正经历“赶超”阶段的国家（比如中国），会发现它的资本形成总额并非一个试图摆脱经济结构单



一化的正常国家。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尽管委内瑞拉的粮食产量在查韦斯政府的领导下有显著提高，但一般而言，对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高生产力能使农业工业化、多样化，在第一产业生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些数据暗示着委内瑞拉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在缓慢提升，尽管它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结论

我们从数据中得出，近些年，委内瑞拉国家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社会发展迅速；它的现实生活远好过国际媒体带有有色眼镜的描述。

可是，国内产品产量虽有显著提高，但仍然跟不上人们发展的需求。食物短缺和电力供给不足也给查韦斯政府招致了更多批评。可是有一基本事实不容忽略：穷人生活得越来越好。

委内瑞拉国内的制造业和工业需要被更加重视，农业生产力亟待大幅发展。总之，如果要完全解决它的经济问题、摆脱单一化的石油输出，等待他们的，仍将是任重而道远的跋涉。

“自由市场”体制使我们所有人注定走向威权主义吗？

（原题：中国接受了我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我们也会接受他们的专制么？）

斯拉沃热·齐泽克（2007/12/4）

：黑夜里的牛 译 带Q过人 校

中国资本主义的激烈增长使得许多西方人询问政治民主——作为资本主义的“天然”伴侣——何时会出现。但很快，更切近的观察驱散了任何此类指望。

当今中国不是一种被东方专制所扭曲的资本主义，相反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自身的重复。在现代化的初期，大部分欧洲国家远远谈不上民主。而且如果他们是民主的（就像 17 世纪的荷兰来），也仅仅是少数有财产的自由主义精英的民主，而不是工人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条件被一个野蛮国家专制创造并维持下来，像极了今日的中国。政府把对人民财产的野蛮掠夺合法化，将他们变成无产阶级。国家随后训练、教育他们去顺从一种新的隶属角色。

许多如今被我们看做与自由民主一致的特征（工会、普选、新闻自由等）远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然成果。下层阶级通过整个 19 世纪的长期艰苦斗争才赢得他们。回想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结论中所列举的要求。除了废除私有制，其中大部分——如累进税、免费公共教育和禁止童工——今天都已经被资产阶级的民主所广泛接受，这全都是群众斗争的结果。

所以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异国情调：只不过是重复我们自己已经被遗忘的过去。但一些西方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在问，如果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经济发展能有多快？如何看待这种事后的想法呢？德裔英国哲学家达伦多夫^[1]就把不断增长的对民主怀疑与一个事实联系起来，那就是在每次革命之后，通向新的繁荣之路都需要穿过“泪之谷”。换句话说，在国家社会主义垮台后，一个国家不可能马上变成成功的市场经济。有限的——但却是真实的——社会主义福利和安全不得不取消，最初这些的步骤往往是必须而又痛苦的。对于达伦多夫来说，通过“泪之谷”的时间会比两次民主选举之间的平均时间要长。因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为了短期选举受益而推迟艰难变革的诱惑是很大的。

在西欧，从福利国家向新的全球化经济体的转变过程中，有着痛苦的放弃，更少的安全和更少的社会保障。在后共产主义国家，新的民主秩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让许多阶层都失望了。在 1989 那段愉快的日子里，这些群众把民主和西方消费社会的丰裕等同起来了。如今，二十年过去了，丰裕依旧不知所踪，于是人们责备民主自

身。

然而，达伦多夫没有注意到相反的诱惑：有一种观念认为，如果多数人抵制经济结构的变革，开明的精英就应该接管权力，即便是通过非民主的办法，来为一个真正稳定的民主奠定基础。沿着这个思路，《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指出，民主如何只能“抓住(catch on)”经济发达国家。他说，如果发展中国家“民主早产”，经济灾难和政治专制会紧随而至。难怪，现在经济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台湾、南韩、智利)在拥抱完全的民主之前，都有一个威权统治时期。

这种推理难道不正是论证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与俄罗斯道路截然相反的最好的论据？在俄国，共产主义崩塌之后，政府采取了“休克疗法”，把自己直接扔到民主和快速资本化的轨道中——结果经济破产。(在这里，有充分理由适度怀疑：那些向叶利钦提出这个方法的西方经济顾问们，真的像看上去那样无辜吗？他们怕是借助削弱俄国经济，来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吧？)

另一方面，中国则按照智利和南韩的路径走向资本主义，使用不受妨碍的威权国家暴力来控制社会成本并以此避免混乱。对中国来说，资本主义和共产党统治的奇怪结合被证明是因祸得福。

这个国家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威权统治不是其阻碍，而恰恰是其原因。以一种听起来像是斯大林主义的妄想，我们不得不问：“也许那些担心中国缺乏民主的人，实际上是担心中国快速的发展会使其成为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并因此威胁到西方的主导地位。”

今天，大跃进的悲剧正作为一个喜剧重演，变成了快速通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跃进。曾经的口号“村村铸铁厂”再现为“街街摩天大楼”。历史的最大讽刺是，毛

泽东自己创造了快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条件。文化革命中，他给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的号召是什么？不要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该做啥，你有权利造反！所以，为自己思考和行动，摧毁文化糟粕，推翻和打倒你的长辈，还有政府和党的官僚。踢开压迫你的国家机器，组织起自己的公社！

人们听到了毛的呼唤。随之而来是脱离了限制的激情的爆发，一切形式的权威都被剥夺了合法性，最后，毛不得不借助军队重建秩序。文化革命中最激烈的战斗不是发生在共产党政府和受到公开抨击的传统主义敌人之间，而是在共产党和毛创造的势力之间。这是最大的悖论。

在今天的中国也可察觉到类似的变化。为了遏制自己创造的资本主义爆发的非兼容性后果，党当局唤醒了庞大的意识形态传统。是以，我们应当把近来中国出现的官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看作是一种高效的国家意识形态行为(这一冒险的确花费了上亿美元)。

那些将此视为对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威胁的人完全没抓住重点。听起来可能奇怪，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回归是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完全制度化的标志。例如，中国最近已经立法保障私有产权，西方将这一动作视为通向法律稳定的关键步骤而欢呼。

但哪种马克思主义会被中国青睐呢？首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的区别。左翼这一术语可以指向任何关于工人解放的讨论——从自主工会到推翻资本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论点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关键，而正是这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培育了持续快速“现代化”的条件。

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角色可以保持快速现代化。官方(儒家)说法是，中国应该变成一个“和谐社会”。

用老式的毛主义术语，主要敌人似乎

是“资产阶级”威胁。但是，统治精英眼里的最大敌人，却是让共产党统治者从中获益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同来自工人农民的反叛威胁所构成的“主要矛盾”。

去年，中国政府加强了某些镇压机构——包括组建特种的防暴警察单位来镇压群众骚乱。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像是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动态，在社会层面上藉由这些警察得到了最好的表述。1905年，托洛

茨基曾经将沙皇俄国刻画为“亚洲皮鞭和欧洲股市的残酷结合”。这一描绘不是仍旧符合当今中国吗？

但如果威权主义“汨之谷”之后，允诺的民主第二幕永不到来呢？这就是让我们对今天的中国如此不安的原因：它的威权资本主义可能不仅仅提醒了我们的过去，而是预示着我们的将来。

注释

【1】达伦多夫（Ralf G. Dahrendorf, 1929~2009.6.17）：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生于德国汉堡，曾在汉堡大学学习哲学和古典语言学，1952年从汉堡大学毕业后到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社会学，1956年获博士学位。曾在萨尔、汉堡、图宾根以及康斯坦斯大学任教。1967~1970年任德国社会学协会会长。1974年起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达伦多夫是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58年，就对功能主义提出批评，从变迁、冲突、诸要素对系统分化的作用以及暴力等方面对社会进行解剖。他认为现代阶级冲突的根源不是占有和不占有生产资料之间的矛盾，而是权威的分享和排斥之间的矛盾。还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理论探讨》（1958）、《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冲突》（1959）、《走出乌托邦》、《社会人》、《阶级后的冲突》、《生活的机会》等。

原文链接：

http://www.alternet.org/story/69788/china_adopted_our_capitalist_model_-will_we Adopt_their_despotism

为了全学联的大跃进

——战后学生运动的教训与课题

革共同和全学联的同志一同为革命胜利的大事业而奋斗

木崎汎子

《前进》周刊（2574号5面1）（2013/03/04）

 : lostinkatakana 译

1月，木崎汎子同志在全学联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演讲，鲜明揭示了战后学生运动的教训与历史课题。特发表在此。在危机与动乱的时代，让我们为全学联大跃进的胜利而斗争！（编辑部）

承担革共同 50 年史中流砥柱的学生运动



(法政大学校区千人集会顺利举行之后，在出发的游行队伍中的全学联与文化联盟[2012年10月19日])

从06年“3·14”法大斗争到11年“3·11”全学联斗争，都是21世纪开始后举足轻重的现代革命实践。由马克思主

义学生同盟（马学同）中核派所主导的全学联，自1966年12月全学联重建大会以来大踏步前进。

62年9月，革共同第3次全国委员总会（3全总），由于反革命的革马派叛逃和分裂，马学同中核派从只有13个人开始出发。66年9月革同共第3次大会，革命性地总结了全面开展反帝国主义·反斯大林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摇战后世界体制的“安保·冲绳决战”的现代革命论。这是一次开拓时代的政治性的大会。提案使主客观形势为之一变。

马学同中核派反复学习了“第三次大会报告”，即便在激斗的漩涡中，全力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早期马克思的学习摄取，突入组织战，开辟了全学联的革命再建之路。中核派掌握了三派全学联（马学同中核派、社学同、解放派）的主导权，作为主流派将日本阶级斗争史上不朽的67年10·8羽田斗争^[1]进行到最后。

在此过程中，正因为革共同领导下的马学同中核派和全学联结合成一体，学生运动获得了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与大众性。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堪称战后史上最大规模的“70年安保·冲

绳决战”，学生运动在日本阶级斗争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地位。

2013 年年初以来，进入了远超过 2012 年的革命的大变动中。全球经济危机与 3 · 11 形势、战争的危机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战将颠覆日本和全世界、垂死挣扎的新自由主义与革命性推进的工人运动之间激烈的冲突。日本阶级斗争正处于世界史的决定性位置。

“日本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中最薄弱的一环。……战后宪法体制下劳动者统治的危机性和安保·冲绳问题，即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矛盾与危机，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大的破绽点。……日帝如今作为财政悬崖国家，其政治支配体制正在面临崩溃的危机。战后革命运动以来，最大的革命形势正在到来”（革共同纲领草案）

针对日帝企图强行维持“最薄弱的一环”，革共同与日本的工人阶级与学生连绵不断地奋起，肩负“纲领草案”向日帝出击！



（1967年10·8羽田斗争。革共同（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旗帜在封锁通往机场道路的机动队装甲车上飘扬）

革共同 50 年史的革命性创造、发刊的斗争，紧密联系日本革命—世界革命，是自身的一项大事业。承担革共同 50 年史中流砥柱的全学联运动不断地搏动。越是追问这段历史的主体性，06 年“3 · 14”以来的法大斗争的意义便越发鲜明。即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危机发起世界史的大反击，跟随千叶工会运动奋起，有着不灭的意义。

以 13 年法大决斗为前导，革共同与全学联的同志们一起为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跃进而斗争！

作为大学自治会运动杠杆的全学联的成立

如何看待革共同的 50 年史？

“总的来说，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努力学习革命的基本的必要的东西，自革共同创立以来穿过了最短的距离到达了今日的地平线。”（《清水丈夫选集第 2 卷》序文，1999 年）以 50 年的历史为基础，从 06 年开始，08 年经过“党的革命”提出了“反对派遣制·撤销非正规雇佣，开辟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路线，一直到提出“国铁·反核决战，星野审判全部证据公开运动，打倒极端反动的安倍政权”。

革共同成立于俄国革命 40 年后的 1957 年。其源泉是：①无限地相信不息追求解放的日本工人阶级的存在与斗争；②在现存阶级斗争中紧紧抓住作为工人解放自我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兴；③重新把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托洛斯基反对派的斗争。这些把对始于中国·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上升到革命的共产主义高度的力量。特别是达到了“斯大林主义是现代革命必须要打倒的反革命对象”这一认识，从而使工人党=革共同创立的历史性决断成为可能。

战后革命期以来，学生运动在日本阶级斗争中的地位，它的视野与历史性总结，只有在把革共同 50 年史作为一个整体才能够完成。除此之外不能成为真正的问题。例如进入 21 世纪之后，特别是仅仅论述 04 年国立大学法人化以来的日本学生运动或者全学联创立初期的相关刊物文章，对现在学生运动的革命复兴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只是作为妨碍。

粉碎对左翼的清洗

伴随着战后革命期如暴风雨般的工会结成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崛起，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了以自治会运动为杠杆的全日本学

生自治会总联合（全学联）。（战前社会科学研究会社团的联合体称为“学联”）从反对大学学费上涨的罢课斗争，到全学联的结成，经过反对清洗左翼的斗争，成长为在日本的阶级斗争中与工人运动并肩战斗的学生运动。

促成 1948 年 9 月全学联成立的契机，是“反对战争”、“绝不允许再发生战争。追究战争责任”的运动。记录下参战学生和死于特攻队的学生心声的东京大学阵亡学生手记《向着遥远的山河》于 1947 年出版，在此基础上，1948 年出版了日本阵亡学生手记《听吧！海神的声音》，对战争的憎恨与悔恨跃然纸上，激发了日本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以及阶级斗争的开展。

另一个原因是，国立大学学费上涨 3 倍的决策预示了对生活的压迫，“活不下去了！”的口号反映了所有的愤怒。以反对战争和追究战争责任为中心，1948 年，116 所大学的 30 万人参加了总罢课，同年 9 月结成了全学联。

45 年夏天和 46、47 年，学生们发起了驱逐在推进战争中位于中心的教授，同时迎入在战前和战时被学校开除的教授，即“追究战争责任・大学民主化”的运动，成为了学生自治会建设的基础。全学联结成之后，继而组织了劳资纠纷现场的支援斗争。

50 年的反对清洗左翼斗争开始于要求将制定驱逐信奉马克思主义教授的美国民间情报教育局顾问 Eells 驱逐的运动。以东北大学为首，取消了 Eells 的大学巡回演讲，完全粉碎了大学内的左翼清洗。学生运动最终推回了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大弹压。并且与 52 年相同背景下发生的东大坡坡罗事件等反动弹压进行了无所畏惧的坚决斗争。

反核运动的大高涨

54 年比基尼环礁事件开始的反核运动，是以高中生发端的青年・学生的大斗争。今天我们将继承这一运动，以粉碎“和平利用核能”的反核能斗争与广岛联合成一体，进行历史性的大斗争。其中的关键

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学生运动在此与阶级的工人运动的创造联合成一体，与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从大学校园开始奋起。

57 年革共同结成之后，全学联的主导权从日本共产党・民青那里革命性地转移到了反斯大林主义的革命的共产主义那里。此外 58 年结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bund）。59 年全学联大会选举产生了共产同的唐牛健太郎为委员长，60 年成立了北小路敏委员长代行体制。

60 年安保斗争是，①战后革命期以来的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发展到“冲入国会一国会内集会”，其中②反斯大林主义的学生运动一革命的左翼鲜明地登场；③最先确立的战略是打倒帝国主义。但是，围绕这次运动的总结，共产同分解。革共同原则性地革命性地获得了领导权，完成了大合流。

由此，从 3 全总到第 3 次大会，然后经过全学联再建、67 年 10・8 羽田斗争开始激动的 7 个月，通往 70 年决战的爆发。

70 年安保・冲绳决战动摇了国家权力

现在对革共同 50 年史的研究，《本多延嘉著作选》、《清水丈夫选集》为革共同在 21 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真正胜负的斗争的基础前提条件如何形成和准备，做出了明确的论述。

目前为止的斗争都是 21 世纪革命的前史。自革共同创立以来，革命的工人党建设被称之为“70 年世代”的骨骼形成，对于当下的全学联运动，具有重要的教训意义。

并且 70 年决战中的“政治犯”星野文昭同志在狱中 38 年贯彻非转向坚持斗争，我们与他坚决连带，将“全部证据公开・立即释放”这一动摇全大学・全国的运作作为全学联的历史使命的自觉。星野同志的释放—解放同时也是全体工人阶级・学生的解放斗争。

67 年 10・8 羽田—69 年・71 年的“两个 11 月”，67 年—69 年国铁 5 万人合理化—反对废止机车助手斗争—72 年千叶工会

“反合理化・运输安全斗争”，必须将这一系列运动视为一个过程性的整体。

“两个十一月”的斗争

70年决战不论从质量和规模上都是一次大爆发。从70年年末和73年警察机关发表的内容可以窥见这一运动的概况。

- 游行动员总人次超2千万。
- 当日最大动员人数80万。
- 国家机关的动员人次接近1千万(其中死亡6人，负伤1万9千人)
- 逮捕人数3万6500人。
- 参加游行的大学，68年116所、69年173所、70年176所、71年136所、72年132所。

如此规模的大斗争是以66年革共同第3次大会提出的“美军基地撤去=冲绳夺还、安保粉碎・日帝打倒”“与战斗的亚洲人民连带、将日帝的亚洲侵略转化为内乱”的战略总路线与口号为基础进行到底的。这些斗争同时与冲绳开展的全岛奋起、总罢工、暴动性奋起相呼应，“两个11月”所象征的工人阶级人民的实力奋起=内乱性奋起。由此，针对68年10·21斗争的骚乱罪适用、针对69年4·28斗争与71年11月决战的破防法(每一项都是针对冲绳斗争发动)，这些敌对权力最后的弹压手段都被一一消解于无形。

当时全学联作为150万学生的主流派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革共同胜利召开了62年的3全总和66年的第3次大会，在67年10·8羽田斗争中乾坤一掷，倾全力战斗到底。开始于日大斗争、東大斗争的大学斗争席卷全国。69年9月5日全国全共斗结成，全面驱逐了革马派和日共斯大林主义。通过这一系列斗争开辟的地平线全体转化为“两个11月”的力量。

反战派工人也行动起来

69年10·21高田马场—新宿斗争、11月蒲田—羽田斗争、71年11·14涉谷暴动斗争、11·19日比谷斗争……。在65年结成的反战青年委员会的指导下，反战派工人在街头集结起规模巨大的武装斗

争，将“两个11月”胜利地坚持到底。也即，围绕全学联在安保・冲绳的流血，开辟了政治斗争的全社会化，反战派工人的部队从工厂武装奋起，贯彻了对敌对权力的政治性暴动。通过这些斗争，获得了完成决战的力量一思想，超越了斯大林主义和民同的支配，与革命的共产主义党和本阶级队伍形成坚固的结合关系。开辟了从根本上变革重组阶级斗争・工人运动全体的条件。这就是胜利的核心。

当时革共同揭露了自认为是唯一先锋党的日共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和敌对，直面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性工人党的建设这一历史性大挑战。跨越战后革命的失败、跨越60年安保、跨越三井三池斗争的失败与总评工人运动的局限，全面刷新战后工人运动一战后阶级斗争，开辟了向着革命一往无前的主体性条件。我们实际完成了这一任务。持续动摇打击了日帝的基础和声势，日帝权力不断溃败。

反越战的斗争也是70年决战的重要契机。二战结束以来，美帝发动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级的大战争。美帝从64年挑起北部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发动对越南的全面侵略战争，一直持续到75年越南失陷=败退。由此战后世界体制的全部矛盾喷发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促进其动摇，为旧体制的崩溃做准备。从这个历史角度看，70年斗争是作为与侵略越南的美帝对决而进行的斗争。“10·8”的历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推动党派斗争的奋起

70年决战的全过程伴随着与日共斯大林主义、革马派、诸派・诸潮流持续不断的党派斗争。党派斗争的贯彻和学生大众的奋起相互联动。

68年9月的整个月中，与日共斯大林主义发起的法大袭击进行了大决战，完全粉碎了日共武装袭击占据第2自治会的图谋。法大学生自发大众性地奋起，占领了学生大会，发起了10·21罢课。法大学生在68年10·21新宿骚乱斗争中组织了数千人的规模。并且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与日

共斯大林主义的攻防战，经过壮绝的殊死斗争取得了胜利，在 69 年 1 月的安田讲堂攻防战中坚持到最后。

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伴随着与革马派激烈的冲突，将“两个 11 月”贯彻到底。在整个 70 年决战的过程中，革马派一刻都没有与国家权力进行过斗争，仅仅是在斗争的背后为了瓦解斗争本身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袭击。在 70 年历史性的大斗争中，巨大规模的工人·学生全体奋起，同时日共斯大林主义与革马派的反革命面目也得到了充分暴露。

70 年决战的彻底性与全面性在于，通过激烈的武装暴动，突破了战后日帝的根本弱点，动摇了统治体制本身。它的影响力遍及工人阶级本队伍和战斗的全体人民。为此革共同必然要直面，一方面是国家权力破防法的弹压，另一方面是反革命革马派的白色恐怖袭击。

为了打破这双重灭绝性的攻击，革共同挺进了超过 20 年内战性的死斗期，取得了世界阶级斗争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内战胜利（2001 年革共同第 6 次大会发布了“胜利宣言”）。工人·学生集结为革命军，以地区工人同志为先导，全党在对革马派的战斗总决起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挺进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对革马派战斗的胜利

自 71 年“12·4 反革命”^[2]开始的革马派白色恐怖袭击的反革命“彻底性”在于，它在针对革共同的来自权力的破防法攻击指导下，抢先应对了对战后帝国主义体制崩溃期的冲击。

经过 70 年决战，从中产生的大量的工人集团乘势掌握了在工厂内拥有权威的工会组织，当通向革命的大道敞开，革马派将这视为根本的恐怖，这与他们自己的死灭直接联系在一起。为了从这种恐怖中逃脱出来，仅仅是依靠国家权力的弹压、资本或者御用工会的处置不能彻底摆脱，革马派自己着手将一个个人用白色恐怖的手段使其肉体破坏不能活动，最终要抹杀掉威胁到其生命的存在物本身（确实可以称

之为日本的“休克主义”）。

但是，革共同没有畏惧这样的白色恐怖，对革马派发起了更彻底的革命性反击，将内战进行到最后。并且和以千叶工会为首的国铁工人运动的力量革命性地连接在一起。对革马派的胜利是现在革共同能够开创局面的绝对前提。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一直到现在，千叶工会运动和国铁决战是打倒革马派的桥头堡。这是革共同 50 年史的核心主题。

在把握 80 年代的时候，是由 70 年代阶级攻防战的胜利，也就是说无数工人·学生和很多革命家的血汗所成功开辟的，确认这一点是重要的。<以国铁·三里塚为核心的 80 年代的殊死斗争与挑战—阻止国铁分割·民营化斗争的历史性决战（对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阶级反击）>，这些运动的位置也应该正确地加以确认。

革共同在与国家权力·革马派的斗争持续激烈扩大的同时，决断和贯彻了对千叶工会的国铁分割·民营化绝对反对的历史性决战的加入。以革命军为核心的武装斗争、从三里塚开始的大众斗争=大众性武装斗争以及国铁决战中崛起的工人阶级本队伍，革共同与他们结合成一体，战斗到最后。

特别是在 85 年的 3 大暴动斗争^[3]中，全学联发动组织的所有力量与千叶工会和三里塚连带，不惜长期牢狱监禁，坚持斗争。由此建立了日本阶级斗争史上无可比拟的 3 大据点，向 91 年 5 月决议挺进。

以法政大学为先导打破新自由主义大学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以法大为先导打破新自由主义大学的时机正在到来。

新自由主义一方面让革马派当先头兵，一方面使日共成为自己体制的补充物。但是经过 85—87 年国铁分割·民营化决战，不仅于此，经过 26 年不屈不挠的国铁决战，革马派的生命力已经完全断绝。日共斯大林主义也终于在 3·11 的形势下完全暴露了它的大破绽与犯罪性。自战后革命期开始，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一

直到现在作为巨大的反革命而苟延残喘的斯大林主义，要将它与新自由主义一同打倒！

面对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与新自由主义全球的僵局，日共甚至一刻都没有对大学的反动变质发起过斗争，反而采取完全容忍的态度。御用学者也将它作为前提支持其继续存在。面对“3·11 大地震与核电事故”这样世界史性质的事态，革马派与日共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犯罪性暴露于天下，而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强力推进学生自治会的建设。

革马派的黑田在 1959 年的《现代和平与革命》中，将核武・核电赞美为“人来的智慧终于在核能的解放中取得成功”。日本共产党的宫本显治在 1958 年的第 7 次大会上，放言称“自动化与核能维系着人类未来之光辉前景”。“和平利用核能”，在这类言论的鼓动下，产生出了推进核能的大学和御用学者，终于制造出 55 个核电基地。

在 2011 年 3·11 以来福岛根本的愤怒与无数民众反核电的奋起的基础上，以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为先导的继续展示“革命现实性”的全学联运动，为废弃一切核电、打破新自由主义大学，决意刷新历史奋起战斗。

战后革命期以来持续不断的学生运动，其对日帝统治阶级一贯的斗争口号是，拒绝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对大学的支配，

追求“学间的自由”、“真理的探究”、“大学的自治”。这是在 70 年斗争中作为学生奋起底流的大主题。对第 2 次世界大战根本性的反叛，在提出绝不允许再度发生战争这一压倒性思想的同时，强烈要求“大学恢复为‘真理的大学’”（《本多延嘉著作选》第 6 卷，《早大斗争的意义为何？——为恢复“真理的大学”》）。

通过 70 年斗争，大学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据点，发展为“让大学成为冲绳夺还、安保粉碎・日帝打倒的堡垒！”

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和 3·11 形势，是让大学・教育继续由资产阶级掌控？还是由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依靠自己的实力争夺回来？这是使 21 世纪革命复归的世界普遍的巨大课题。推进粉碎新自由主义大学的斗争同时要发展国际间的连带。这场斗争与阶级的工人运动・工会运动革命性地直接联系，一同迈向前进。

1 千人全学联部队的登场，剧烈地推动了阶级斗争・工人运动的局面。1 千人在法大登场、在福岛大登场，全部旨在引起面向革命的化学变化。

学生运动中产生出共产主义者学生，在建设坚忍不拔的革命党同时，发展了阶级性工人运动。让我们与革共同一起开辟革命的时代！让我们在全党总奋起的背景下开辟出迎战危机的学生运动大跃进时代！

注释

- 【1】10·8 羽田斗争：为阻止 1967 年 10 月 8 日佐藤首相访问南越而发起的斗争。日帝访美企图参与美帝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对此全学联突破了机动队的防线，夺取、占据机动队的装甲车，强忍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被虐杀的悲痛坚持斗争。
- 【2】71 年“12·4 反革命”：71 年 11 月决战之后的 12 月 4 日，革马派袭击了正在进行反对学费上涨斗争的关西大学，虐杀了京都大学的辻敏明同志、同志社大学的正田三郎同志，并于 15 日在三重大学虐杀了革共同三重县委员长武藤一郎。
- 【3】85 年 3 大暴动斗争：①85 年的阻止成田机场二期工程的 10·20 三里塚战斗、②与阻止国铁分割・民营化的 11·28—29 千叶工会罢工连带的 11·29 全国统一游击战斗、③12·9 横滨国立大学对革马派的战斗。10·20 战斗中，工人农民学生 1 万 4 千人对峙警视厅 1 万人的机动队，尽管面对被捕 241 人的空前弹压，仍然坚持贯彻武装斗争，粉碎了机动队 8 个大队。

有名无实的激进分子、希腊的新星

——阿莱克斯·齐普拉斯^[1]

作者：杰尔姆·鲁斯

日期：2012年6月6日



: Lukex 翻译



对于欧洲而言，激进左翼联盟的领袖是个危险的希腊民粹主义者。对于齐泽克而言他是理性的喉舌。事实上，他只是个直率的社会民主党人。

最近几周，人们加给他各式头衔：“性感的阿莱克斯”、希腊的政治新星、紧缩政策的对手、激情洋溢的雄辩家和传神老练的表演者、希腊怒火的捍卫者（也是个单纯的激进分子）、危险的骗子、民粹主义政客或是怪异的极端分子。这位激进左翼联盟（激进左盟）37岁的领导人突然之间成为公众焦点，并以动荡全球市场、使欧洲战栗的本事而广为人知。

两个月前，在希腊以外，还没有谁听说过齐普拉斯或是他那由毛泽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欧洲共产主义者、社民主义者以及绿党拼凑而成的处于边缘的大杂烩。但在不断宣誓反对三驾马车的紧缩

备忘录的激进左盟于5月6日失败的^[2]选举中击败中左翼的泛希社运而成为议会中第二大党的一个月后，齐普拉斯突然成为最受国际媒体关注的希腊政客。

他意想不到地获得了摇滚明星般的地位，与此相应，这位欧洲左翼党的新星迅速对巴黎和柏林进行了短暂访问，而且在昨天雅典的一次公众演讲中发现“西方最危险的知识分子”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旁支持自己。6月17日选举前的最后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齐普拉斯的政党以6%的优势领先于右翼的新民主党，一切似乎都在转向希腊革命。但，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对于希腊社会的革命化以及把希腊从欧元区的新自由主义枷锁中解放出来，激进左盟的胜利意义不大。虽然齐普拉斯的心无疑在他的左胸膛跳动，但是激进左盟的政策与其说是要推翻还不如说是要稳固他所蔑视的信誉扫地、机能失调的制度。实际上，他的滔滔言辞和美好意愿表明，齐普拉斯所承诺的东西和激进的社民主义没什么差别。激进左盟之所以被视为极左翼，不过是因为中派政党激烈右转了。

拯救资本主义的齐普拉斯革命

“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失败了，”激进左盟在其一系列纲领性承诺中声明，“我们必须推翻它！”激进左翼联盟誓言瓦解欧盟

—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的紧缩备忘录、立即暂停偿还所有债务、并就大幅削减剩余债务进行谈判，这令希腊的统治核心、欧洲领导人们和金融市场不寒而栗。

虽然削减长期债务无疑将损害债权人并使希腊多年免于财政紧缩，但是，把削减债务视为对于正统经济的“激进”背离的想法着实是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不清。早在去年九月，德国经济部长就提议让“希腊有序违约”^[3]，而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参与重组墨西哥债务的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4]则认为齐普拉斯所提议的解决方案“不仅正确而且符合正统经济学教科书。”

同样，认为紧缩对减少债务来说将起着适得其反的作用，这样的观点也是很难说是革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就在一份报告中承认道：“财政紧缩带来的是经济萎缩而不是经济增长。”（切！）齐普拉斯宣称欧洲的钱“应该朝向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这几乎是在重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华尔街基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话。

《纽约时报》慧眼独具，觉察到“齐普拉斯先生的说法和那帮齐聚戴维营八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没什么两样。”在一次《卫报》的访谈中，齐普拉斯表达了自己对凯恩斯、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及奥巴马与美联储的财政政策的赞赏。正如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所言：“凯恩斯革命就是他拯救资本主义的尝试。”

欧元枷锁和债权人的结构性权力

不过，激进左盟纲领中最矛盾的部分或许是留在欧元区的旦旦誓言。“我们，”齐普拉斯对新自由主义的《每日报》（Η Καθημερινή）如是说，“不会选择退出欧元区”。从选情来看（85% 的希腊人希望能留在欧元区内），这种立场是很知趣的。然而，这与激进左盟所宣称的追求增长、创造就

业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主要的三点原因如下：

首先，欧元是希腊陷入目前困境的罪魁祸首。如果希腊有自己的货币，不仅不会出现国外信贷的大量涌入，而且也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来重获对外市场的竞争力。阿根廷在 2002 年就是这么做的。但是受制于欧元，希腊别无他法，在政策上只能选择所谓“对内降低工资水平”。

其次，一当希腊加入欧元区，就放弃了本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它将依赖于欧洲央行来制定利率。作为一个臭名昭著的正统货币机构，欧洲央行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来说是反对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而且其章程也禁止这么做。齐普拉斯号召对欧洲央行进行激进改革，但这在短期来讲仍是个白日梦，

第三，欧元区的成员资格把希腊“骗入”从而使之服从于债权人的结构性权力。正如政治经济学家乔纳森·基什内尔（Jonathan Kirshner）所指出的，“结构性权力不仅仅意味着操控”服务于大银行的“体系的规则，而且意味着只要加入某个货币体系就要丧失独立性。”科斯塔斯·拉帕维塔斯（Costas Lapavitas）两周前在《金融时报》上写道：

“如果希腊执意留在欧元区，其经济将会衰退停滞。希腊将成为欧洲穷困潦倒、暮气沉沉并且异常不平等的一隅，总之，就是一块新殖民地，虽然名义上……债务违约同时应该退出欧元区，这样就能使希腊从这个货币联盟的陷阱中解脱出来……退出欧元区将会使紧缩政策得到废除，并且让希腊拥有重建经济的喘息之机。”

紧缩政策日益严厉，而接下去呢？

然而，即使齐普拉斯想留在欧元区，他也做不到。齐普拉斯坚信欧洲是不会任由希腊走向失败的（因为害怕危机蔓延到西班牙）——而这不过是个美好的懦夫游

戏^[5]，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事情会如此发展。是啊，对把钱扔入希腊无底洞已经愤怒不已的德国人还会不会继续帮助一个高调宣称不会还账的左翼政府呢？

不妨设想如下（很现实的）情景：激进左盟赢得选举，组成了一个反紧缩的同盟并且暂停偿还债务。几乎可以确定，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拒绝进行下一轮救助。既然希腊仍维持着 24%^[6]的基本财政赤字，并且完全隔绝于国际资本市场，那么激进左盟将不得不推行甚至比当前紧缩备忘录所要求的更严厉的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

与此同时，暂停偿还债务以及欧洲央行停止援助希腊银行将使得希腊金融部门突然内爆。在这种情况下，激进左盟将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是让整个银行业崩溃，摧毁数百万希腊人的生计；要么是把银行国有化——正如其在选举纲领中所誓言的。如果选择后者的话，就得印钱来筹集必需的资金了。

要想印钱，希腊就得重新引入德拉克马（译者注：希腊 2002 年前的货币）。德拉克马相对欧元的汇率将立刻贬值，所以政府将不得不控制资本并限制提款，以防银行资金外涌。阿根廷在 2002 年就通过出台臭名昭著的“小畜栏”政策这样做过，从而引发了骚乱。人们冲击银行和总统府。如果这发生在希腊，那么齐普拉斯还去哪里找寻人们的支持呢？当他的选民反过来对抗他的银行和政府时，他会站在哪一边？

议会道路的局限

毫无疑问，阿莱克斯 齐普拉斯对于希腊人民的关怀是真切的，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激进左翼联盟将会把数百万希腊人从贫困和萧条中解救出来。同样，作为一个由 2001 年热那亚反全球化运动中希腊代表的组织平台而成长起来的组织，激进左盟对于社会运动的支持也是有目共睹的，并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在希腊政治体系中最

面向草根阶层的政党。



斯拉沃热 齐泽克最近在《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和随后在雅典的一次公众演说中，对齐普拉斯赞誉有加。他写道：“（激进左盟的声音）不是极左‘狂言’，而是对于市场意识形态癫狂的理性抗议。”而且，“他们已经准备好掌权了，”齐泽克满怀希望的疾呼，“他们已经驱走了左翼对掌权的恐惧；他们有勇气去清除别人所制造的混乱。”

不过，上述的现实情景倒显示出掌权之路的局限。正如莱昂迪纳斯 奥伊科诺马基斯（Leonidas Oikonomakis）最近在“革思网”（ROAR）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中指出的，齐普拉斯有变成希腊版基什内尔的危险，从而成为一个通过激进的花言巧语来驾驭民众反抗浪潮的民粹主义社民党人，他虽然可以改善人们的基本生活，但却消解了人民运动并且使旧有制度自我再生。本杰明 丹格尔（Benjamin Dangl）总结过：“当许多人要求革命的时候，基什内尔送出的却只是一点面包屑。”

解放广场和恰帕斯的革命者公开抵制自己面临的埃及和墨西哥选举绝非偶然。今天早些时候，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干脆声明：“我不去投票，我要从底层组织起来。”昨天我们发布的一篇开罗的同志的文章就写道：“我们拒绝接受‘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这些带着平等伪装的坏人都是服务于同一个政权。我们相信还有别的选择。”

那些让革命半途而废的人 ……

1968 年 5 月 29 日的巴黎，面对气势如虹的人民起义和史上最大规模的自发罢工，丧气不已的夏尔·戴高乐觉得革命迫近，便乘坐直升机离开爱丽舍宫逃往德国。在那里被雅克·马苏将军劝回后，戴高乐便孤注一掷地试图挽回局面：他号召举行选举。出于对权力的渴望，共产党同意了。接着就是历史所发生的那一切了。

革命的热潮在街头在消退。随着各路政党参与选举，工人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在 6 月 16 日，警察夺回了索邦。拉丁区墙上的一角涂鸦仍存：“Ceux qui font les révolutions à moitié ne font que se creuser un tombeau（那些让革命半途而废的人只是自掘坟墓）。”一周后，戴高乐赢得了选举——而且是法国历史上最一边倒的优势。

2011 年 5 月 25 日的雅典，成千上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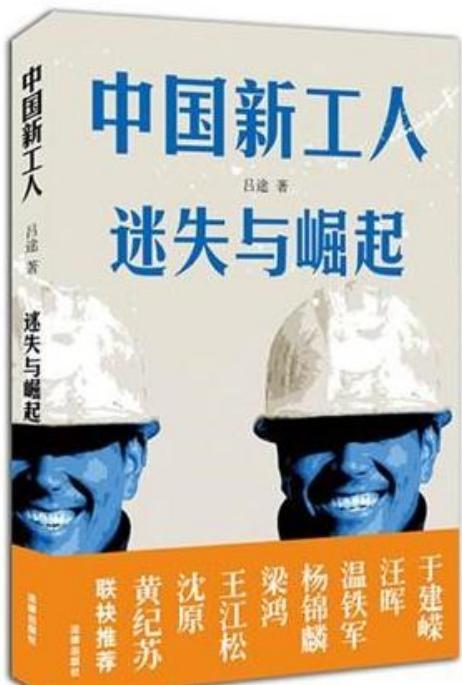
的人占领了宪法广场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自己的自治政治区。根据同样激励过法国六八革命者的直接民主原则（来自于自由社会主义者、希腊裔法国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的思想），普通希腊人开始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数百万人似乎看到了理想社会的曙光。

一年后，我们又临近选举。革命的热潮已在街头消退，各路政党继续他们的竞选活动，工人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5 月 15 日，在一群活动分子试图支起他们的帐篷后，警察夺回了宪法广场。在雅典市郊的一座桥下，一角涂鸦仍存：两只紧握着的手绝望地伸出一枚燃烧着的欧元硬币。一个街道小贩走了过去。这般的情景中，过去的喃喃细语仍在耳边萦绕。那些让革命半途而废的人……

注释

- 【1】 原名“Alexis Tsipras, Greece’s Rising Star, is a Radical in Name Only”。作者杰尔姆·鲁斯〔Jérôme E. Roos 1985—〕系欧洲左翼作家、活动家和电影人，曾就读于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政治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现在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博士在研领域为欧债危机。是“革命思考”网站（革思网）〔Reflections on a Revolution – ROAR〕的创建人和编辑。
- 【2】 failed，作者的意思似乎是 5 月 6 日的选举未能保住已有的希腊政治地图，这样一来，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也就多少算是失败的了。
- 【3】 指德国经济和技术部长菲利普·勒斯勒尔 2011 年 9 月 11 日表示可以接受希腊有序破产。
- 【4】 指荷兰经济学家斯维德·范·维京伯根〔Sweder van Wijnbergen〕。
- 【5】 game of chicken，指需双方轮流示弱来获取最优结果。
- 【6】 原文为 2.4%，恐有误。

新书推荐



这本书站在新工人群体的立场和视角，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代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在经历的这一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

——孙恒

此书的主体内容是描述打工者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及打工者对自身和社会现状的反思。在大量的访谈中，她记录了许多工人的自主意识，并不因为这种意识是跳跃性的、片段的和自我矛盾的而加以舍弃。作者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细致地观察新工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达和群体意识，这种自我表达是他们在经历了种种斗争和妥协之后产生的，其中缠绕着他们与城市、与资本、与家乡、与家庭、与亲戚、与朋友、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工人的感受和想法成

为了这本书的主体，而不是引进西方的一些概念，然后对工人的感受和实况做些说明。

与作者的宣称不尽符合的是，书中其实也不乏一些有趣的概念讨论。比如其中第十八章《自由》中，就界定了一个富于哲学意味的概念“无奈选择”。所谓无奈选择，是在无法实现主动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做的其他选择。除了在找不到工作时必须选择返乡之外，辞职也是无奈选择。打工者在和企业的角力中处于弱势，但是打工者的动力在于用脚投票，这就是弱者的武器。使用这个武器使得打工者工作和生活不稳定，但是离开和跳槽是打工者无奈的选择。像机器一样在流水线上工作是打工者无奈的选择，离开这枯燥的没有前途的工作也是无奈的选择，必须继续打工又是无奈的选择。劳动是一种无奈选择的工作，这让劳动和自由失去了应有的联系和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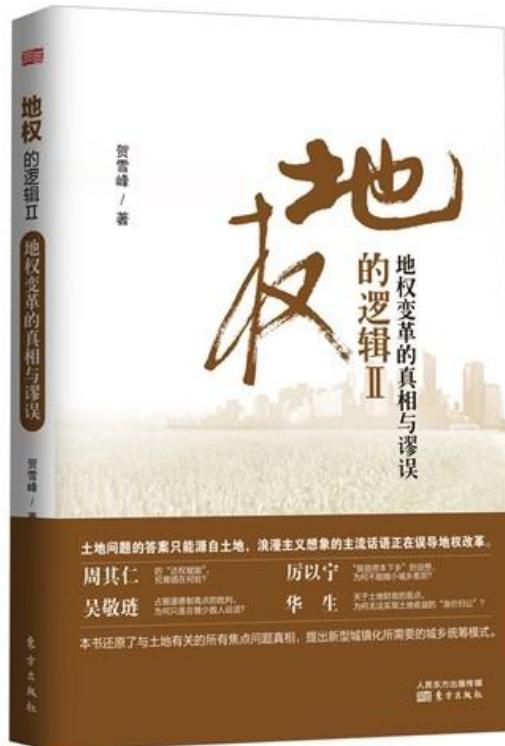
书甫一问世就受到了思想界的热切关注。汪晖在此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新工人群体在政治领域的沉默状态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新工人在“世界工厂”的创造中贡献最大，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和抵抗，但他们的自我意识难以像“新穷人”那样借助于媒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动员。但我们也可以说：一旦新工人在政治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的政治图景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新工人在政治领域的缺位是中国政治体制危机的最深刻的症候，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宪法原则早已土崩瓦解。

法律维权对于新工人群体的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也将工人群体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框架内。法律正义与政治正义存在着交叉点，但在多数情况下，法律正义只涉及个

人权利，而不涉及有关一个社会及其形态是否正义的问题。

新工人群体并不具备 20 世纪工人阶级的那种强烈的政治意识，也从未产生过宪法所规定的那种国家领导阶级的愿望，但这并不是新工人群体本身的缺陷所致，因为这种意识和愿望并不是单纯地从工人生活和境遇中自发产生的，而是一个基于工人阶级生活的互动的政治过程的产物；离开了 20 世纪的政党政治、工人组织、民族运动、武装斗争、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建国运动，我们无法解释中国工人阶级形成。

（《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吕途 著，法律出版社 2013 年）



房价居高不下、拆迁此起彼伏，腐败接连不断，土地制度因此被一次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变革地权几乎成了泄洪的唯一通道。此时，我们希望听到和看到的，往往是自己想要的“真相”，而不是基于土地自身逻辑常识的真相，谬误便由此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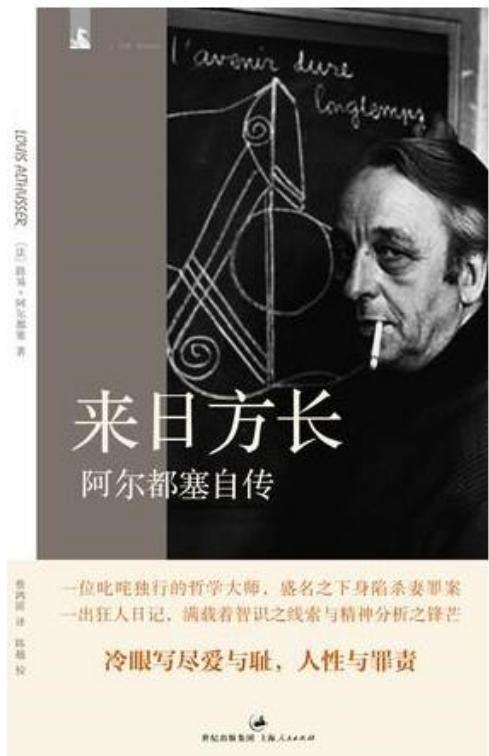
在三年前出版的《地权的逻辑》中，贺雪峰以极富挑衅意味的姿态写作了一篇名为《主张土地私有化的人，尤其要看本书》的序言。在那本书里，对经济学界的土地私有化思潮和成都模式为代表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政策进行了严厉批判。

主流经济学阵营中的巨擘周其仁等撰写了长篇文章对贺雪峰进行反批评。

在此番出版的《地权的逻辑（II）》中，一个吸引读者的看点就是贺雪峰对经济学家们的着力反驳。

他认为周其仁的错误在于试图仅仅在改变生产关系方面做文章，不是在生产领域而试图仅仅在分配领域做文章；吴敬琏则忽视了城中村的少数农民与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土地不可能被征收的农业地区农民的差异。95%以上农民的承包地是永远不可能有机会被征收的，他们也因此不可能有因为征地而一夜暴富的机会。

（《地权的逻辑 II：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贺雪峰 著，东方出版社 2013 年）



这时我懂得了什么叫行动，行动顾及原则，但和对原则的简单应用完全不同；因为他必须面对各种难以估计的因素，如形势、人、人们的激情、敌人，等等。因此，行动除了需要原则上的明晰和严格，还要发挥其他一切人力的作用。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中文版，第108页

谈论阿尔都塞的欧美文献在最近几年骤然增多。然而名声的重振，未必意味着对其理解的深入。阿尔都塞在谈起国际上的“阿尔都塞主义”现象时，曾经伤感地说：写书就像发送储存在漂流瓶里的信息，你根本没法知道你说的话会被谁碰上，又会被他们用作什么意义。

由于阿尔都塞的大多数主要著作移译较为迟缓，至今汉语学界难以窥其全豹。同时对于深受80年代人文意识形态狂热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理解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是一件必须挑战“认识论障碍”的事情。

大多数中文学者迄今仍然要么把阿尔都塞作为一个已经过时的结构主义者，要么接受安德森30年前的判定将其看做后现代主义非阶级政治的前奏。最极端的事例，就是近期有理论票友以法国认识论传统的幌子为掩护，将阿尔都塞塑造成一个科学上的相对主义者，甚至任意解释晚期阿尔都塞对“认识论断裂”的修订。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全面译介阿尔都塞的经典文本，有不可轻视的意义。正如阿尔都塞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命运一样，他必然也会以某种方式介入中国的实践。

《来日方长》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者以某种卢梭式的自我剖析来阐述政治。“认识论断裂”必然需要有政治形势、个人阅历的相遇为条件，阿尔都塞对自我精神发展的叙述，无疑是对其理论思考的重要参考。但如果以为此书仅仅是一本叙述性的自传，就大错特错了。晚年阿尔都塞谵语式的叙述结构里总是混杂大量兴之所至的理论探讨，除了传统共运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外，还涉及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和精神分析等等。在对科耶夫、萨特、梅洛庞蒂、巴什拉等人的漫画性描述里，贯彻了自己“极端思考”的理论原则。

此书由著名翻译家蔡鸿滨先生译出后，国内第一阿尔都塞研究专家陈越先生又进行了精心校订。毫不夸张地说，此译本是可堪传世之作。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 L' avenir dure longtemps》，[法]路易·阿尔都塞 著，蔡鸿滨 译 陈越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也把对象变成人。

——马克思

一对恋人相遇的时候，美好的激情往往来自于另一半的想象。但两个相异的、孤独的个体，各自有着不同的经验世界，从相遇开始交换各自不同的体验，这就注定原先的想象会出现破灭。但如果因为如此就对爱情本身持犬儒主义的态度，那是比浪漫主义更严重的灾难。

在破除相遇之刻的光晕后，通过交换各自的经验世界，彻底改变一个人看世界的方式。如果至少有一方足够崇高或足够有智力，将带给爱情中的双方比原先的想象更美好的二人的共同体。借用兰波的话说，爱就是不断地重新创造。不能创造的爱情会死亡，但有创造能力的爱情会不断重生。

当我们陷入爱情的时刻，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我们无尽的思念，无边的喜悦，无穷的精神都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般的色彩。我们在生活中变得主动积极，富有创造力，

具有亲和力。相爱的结果，不仅仅创造了生命，而是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在爱中我们领略到的是另外一种生活。爱情本身具有乌托邦的属性。爱情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但创造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生命和家庭的再生产之外，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新的生活方式。巴迪乌说：“爱，就是用世界上既有的一切来赋予生命以获利，打破和跨越孤独。”

陷入爱情意味着摆脱异化疏离的状态，把对自身的关注投射到别人身上去，希望从此开始作为两个人而不是独自的生活，所以爱情只能是主体间的实践。但单子之间的运动，必然有偏斜、碰撞，没有任何必然之神保证爱情的结果。乌托邦主义者的伟大在于懂的失败的痛苦，却敢于追求有可能失败的事情。在相亲节目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性明码标价，也把对另一半的期望，如爱好职业收入等等都加以限定。但爱情需要的正是冒险和偶然性，爱情的伟大就在于它可能将我们从原来被家庭和社会所规定的身份中解放出来。爱情的魅力在于它会改变、改良甚至增加你的需求，但会更大程度地符合你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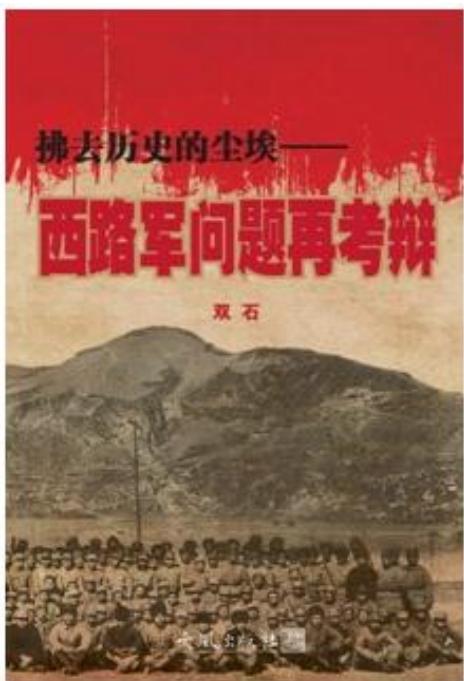
正如波兰人往往比美国人更惧怕选择共产主义一样，自以为成熟的人，往往用怀疑主义或者计算主义的观点来看爱情；因为恐惧乌托邦，而造成的损失，一定远远大于勇敢者有可能付出的牺牲。仅仅迷恋于复制、拟制相遇时刻浪漫主义喜悦的人，必然实质上等同于计算主义的爱情。古典唯物主义必然胜过实践本体论。

历史上的一切传奇故事，都是曲折的。成功——失败——成功——更大的失败——更新的成功……英雄人物的魅力是在不同境遇的因应中得以体现的。同样，仅仅只懂得，开始一段恋情的浪漫主义快感的人，必然会失去爱情历程所应该带来的更美好的生活。走出瓶颈的路径，只能是创造的爱情。

巴迪欧说，爱情是通向真理的一步。这个真理指的不是认识论的主客观统一，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生存。两个人的爱是一次最小的共产主义实践，同时也就意味着反抗隔离的过程。真实的生存，必须面对各种社会关系。只有政治与爱的交叉，才是真理的爱。

中国的老电影《天涯歌女》无疑是一部最有乌托邦意义的爱情戏剧。叙事学意义上的阻碍要素是这个社会的统治势力，而青年男女走向对方的愿望，不仅仅是靠自己的反抗而实现，更重要的方面，是依靠无私帮助他们的同阶级兄弟姐妹。爱情从两个人，走向了人民。

（《爱的多重奏》，[法]阿兰·巴迪欧 著，邓刚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西路军问题是史上一个长期纷扰不断的奇案。主流广泛认同的看法是：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者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甚至还引伸出了诸如“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等等“阴谋论”，毛泽东也成了工于心计以权术排除异己的“黑老大”！这些看法推翻了当时的历史问题决议，不是结论却似结论的耸人听闻之说不胫而走。由于某些红二代红三代的推波助澜，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权威党史军史典籍和各种传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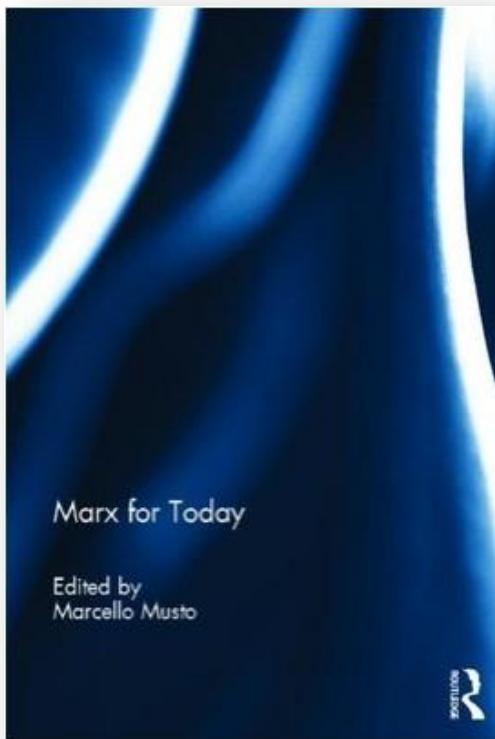
这股颠覆历史之风乍起之时，曾经有很多人吵吵嚷嚷闹着要公开更多的历史档案，似乎这当中掩藏着“黑老大”毛泽东多少阴谋似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发掘整理并得以公开，却出现了令这些吵吵嚷嚷着翻案的历史颠覆者们

十分尴尬的局面：历史文献档案公开公布得越多，对作翻案文章颠覆文章的人就越不利，西路军真正的历史真相也越来越浮出了水面，翻案文章颠覆文章也越来越经不起时间的沉淀。

双石的一段话足以为今日所有治史者戒：“笔者当年也曾经是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拥趸，毕竟人家言之凿凿又有‘证据’在手，而且还与自己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旧有好感相吻合。然而当带着要对这段历史的疑惑问个究竟的心境走进故纸堆，对照着地图成天埋头于那些有着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数字的文字，把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核对并粘贴复位，最终还原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本象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残砖断瓦随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组合，与认真细致冷峻客观地鉴别归位，得出的成象可以是完全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乱零碎的‘证据’如果是随意抽取采撷而不发现并揭示出彼此间的相互关联，是还原不出真正本质的历史本象来的。这种‘发现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时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在寂寞与清苦中进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业。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为普遍真理，稍见奇异就忙着抖落‘惊天猛料’，实为史家之大忌。革命导师列宁就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至理之言：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书竟然只能在香港出版。在一个号称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地区，竟然很难公开出版一本为毛泽东辩护的书籍。这个有趣事实也确实让人看清楚了谁是真毛五。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双石 著，香港大风出版社 2013 年）



自从全球危机爆发以来，来自不同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学者和经济学家重新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的论断产生了浓厚兴趣。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马克思的复兴”。

这部文集的目的就在于紧密结合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问题，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告诉人们，对于理解和批判 21 世纪早期的世界来说，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是最重要的工具。文集收录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全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不同主题的文章，如政治学、经济学、民族与种族、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与民主等；第二部分则是对近 10 年来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概述。

论文集的主编马塞罗·默斯托在掌握马克思原著的深度广度上是毫无疑问的国际权威。他深入研究了深孚盛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EGA2 版，其近著《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 年》已有中文版，由闫月梅等翻译。

此书第一部分的文集颇具有读者号召力。安德森、伍德和沃尔夫等国际巨擘都撰写了观点极其新颖的文章。我们翘首以盼华语学界的青年才俊早日将此书精要转译为中文。

（《今日马克思》， Marx for Today, edited by Marcello Musto, Routledge, 2012, 256pp. ）

后记

本期文萃是近一年来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辛勤劳动的结晶。虽然呈现在读者面前只是干巴巴的文字，但在这全部的文字背后跃动着的，是作者们真诚的思考，热情和对理想的信念。在社会主义已经彻底地成为回忆，资产阶级的打手和庸人到处招摇撞骗的当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绝不仅是一种个人思想活动，同时也是无产阶级政治的一个阵地。少年中国评论存在的目的，就是坚持这种群众性的政治，通过艰苦的阵地战，为未来的斗争蓄积力量。

左翼能否真正的发展壮大，首先在于能否沉下心来做最基础的理论普及、政治教育和组织建设工作。这本是再普通不过的道理，但左派们却是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才逐渐认识到“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的真实含义。左的机会主义幻想尚未破灭，又滋生了右的机会主义幻想，一次次失望之后，人们才从幻灭中醒来，睁眼看世界，开始真正的战斗。少年中国评论的网友们亲历了这一切，也一次次地被这些事件所影响。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同志逐步认同我们一直所坚持的观点，想要把事情做起来了。

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经济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政治斗争也一定会被提上日程。在这个时候，如何将马列主义的政治跟工人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就成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结合，必须一方面不拘形式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把艰深的理论用生动通俗的语言向群众讲述；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积极分子的活动，逐步将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联合起来，使之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这就首先要求我们把政治积极分子的培养，包括对我们自身的训练，放到当前政治紧要任务的高度。

斗争从来都不是风平浪静的，即便没有血雨腥风刀光剑影，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暗含杀机。自封的革命者其实都还只是群众。群众要创造历史，必须先要生活着。然而，劳动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谋生，永远都是艰难的。不仅要牺牲大量的闲暇，甚至还得不透支身体和精神。有社会主义理想的群众或许还未被剥削者的屠刀压服，就先在这种让人透不过气的生活中慢慢颓废消沉了。个人的力量总是薄弱的。这种情况也要求我们必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积极推动组织发展，以集体的力量来克服生活和斗争中的实际困难。

少年中国评论网站创办至今已经五个年头了。在这五年里，资本主义在危机的泥沼中挣扎，社会主义则从失败中汲取力量，蓄势待发。YCA 作为信仰社会主义的群众的小集体，也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当然，这一发展片刻都离不开网站读者同志们的支持。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很难想象五年十年之后的自己会怎样，YCA 会怎样，中国左翼会怎样，工人阶级运动又会是怎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只要认真努力过，坚持过，就不会后悔，不会愧疚，即便只取得了一点不起眼的成绩，那也是青春和理想的踏实的足印。

此次文萃的编印工作时间较为紧张，多亏了大家一齐努力，文萃才能够按时与读者见面，不少同志都牺牲业余时间参与了撰稿，翻译，校订，排版等工作。在此，我们对所有支持少年中国评论网站发展的同志们都一并表示感谢！同志们！反动的资本主义暮气沉沉迈向死亡，革命的左翼青年们意气风发走在大路上。世界终将是你们的！不要犹疑！前进！达瓦里希！

少年中国评论编委会

2013 年 9 月 1 日

